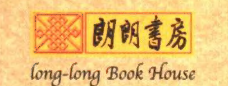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晚清史事

杨天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学界对本书作者及其研究的评论

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文章。

——胡乔木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金冲及（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天石）以其文学的底子、哲学的素养，加上科学的方法、求真的精神，以锲而不舍的毅力，追求难得的史料，思考问题，故其发表的文章，引起同道的重视和欣赏，非偶然也。

——蒋永敬（台湾政治大学）

杨天石先生作为解放后第二代史学家中最前列的研究者之一……以学有根底的渊博知识为基础，尽可能地广收博采有关资料，分析立论敏锐而明快。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

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他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在中国乃至在广阔的海外发掘最新的资料，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独创性论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日可就，它的背后是敏锐的历史感和日积月累的知识与教养。

——山田辰雄（日本放送大学）

（杨天石先生）对民国史的学术贡献伟大。有史风。特别重视于揭示历史之“谜”的核心。这样的学风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日本神户大学）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美国圣若望大学）



ISBN 978-7-300-08300-1/K·317

定价：36.80元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晚清史事

杨天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史事/杨天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ISBN 978-7-300-08300-1

Ⅰ.晚…
Ⅱ.杨…
Ⅲ.中国—近代史—清后期—文集
Ⅳ.K25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0990 号

朗朗書房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晚清史事
杨天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31　插页 3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5 000	定　　价	36.80 元



本书著者像

序　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金冲及

在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同志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

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本来，史学工作者必然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教授，曾提倡对史料要做到“竭泽而渔”。可是，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常有一种苦恼。和古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根本谈不上“竭泽而渔”，倒是常要“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识别并发掘出前人没有利用过的珍贵史料又谈何容易。杨天石同志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勤奋。他不仅经常深入国内一些重要档案馆和图书馆，细心搜罗；还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披沙拣金。他有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就叫《海外访史录》。此中甘苦，凡多少做过一点儿这类工作的人，大概都能领会到。二是有敏锐的识别力。这需要有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眼光，能够分清什么是沙和什么是金。否则，再重要的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杨天石同志恰恰具有这两个条件。

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他另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叫《寻求历史的谜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工

作，从它的本来意义来说，无非是要解开包括自己在内原来弄不清楚的谜团，寻求符合实际的答案。如果只是把一些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回答什么人们原来感到迷惑的问题，这种著作或论文也有它的用处，但很难说是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杨天石同志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说中发现疑点，提出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他的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运用可靠的原始档案，对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不明其所以的问题，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我曾听胡乔木同志称赞过这篇文章。

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读起来没有沉闷的感觉，容易引人入胜。写文章，是要给读者看的，落笔时应该处处替读者着想，而不是作者在那里自说自话。如果文字晦涩，思路不清，让人看得十分吃力，甚至看不下去，再好的内容也难发挥作用。杨天石同志这个优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三点，也许同样是这部《文存》的特色。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国民党曾经统治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二十多年。它的种种活动和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有些还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同它两度合作，一次是大革命，一次是抗日战争；又有两次破裂，一次导致十年内战，一次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作为历史对象，作为了解中国近代国情的需要，我们对国民党以及它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研究，实在太不够了。不深入进行对它的研究，中国人在20世纪是怎样走过来的，在不少方面就不容易说得清楚。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来说，如果不研究这个既是对手，又是两度合作伙伴的国民党，许多事情的认识也难以深入。

从事这样一项开拓性的又相当敏感的研究工作，谁都很难一下就

做到什么都说得准确无误或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引起一些争议是自然的。我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和杨天石同志的看法都相同。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我对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那篇文章也提出过商榷性的意见。这些，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的。

杨天石同志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许多问题，经过他的潜心研究，已把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问题，虽然存在争议或有不同意见，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它对推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这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2007年6月24日

于北京万寿路

序二　以文会友——天石与我

台湾政治大学　蒋永敬

一

我对杨天石先生(以下称天石)的神往,是读到他发表于1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以后凡是天石发表的文章,只要能见到,我都仔细地阅读。1991年9月,我到北京初次与天石见面,我们是一见如故。交往久了,我们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说也奇怪,近年由于听力衰退,与别人谈话,总觉听力不行;但和天石谈话,则仍正常。我问过天石,为何如此?天石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听力也较差,说话声音较大之故吧。同样情形,别人和我谈话,虽然大声,我还是听不大清楚。我想,应是我与天石"心灵相通"的原因。

自从认识天石以后,他每有新的著作问世,必定尽快送我一份。重要者有如《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民国掌故》(收入与多位学者发表的文章)等。总计有120多篇天石的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此外还有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我曾为此书作过"评介"。这次《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即将出版,将天石历年来的著作,有系统地整理、收存起来,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天石的著作,每篇都是

精心之作，有新资料、新见解，富有启发性。这部《文存》的出版，对于近代史学，也是一大贡献。天石由北京来电话，并传来《文存》的目录，嘱我为之作序，兴奋之余，愧不敢当，但也不愿放弃这一大好机会，来表白我对天石才华的钦佩。故愿借此机会来谈谈天石与我在史料、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琐事，题为《以文会友——天石与我》，以代序焉。

二

首先来谈谈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对于我的启示。我曾在台北《传记文学》介绍过天石这篇文章。在我的回忆录《浮生忆往》中也有详细的记述。大要如下：

近代史中两大疑案不易解决，一为1926年3月20日之“中山舰事件”，一为1936年12月12日之“西安事变”。此两事件均为蒋介石亲身经历之事，过去多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当事人蒋介石对此两事件之经过，曾有多次之陈述；与此两事件相关之人士亦有各种不同之记述，还有多种其他相关文献，互有出入与矛盾，故欲了解此两事件之原因、真相，至为困难。研究者多，难有满意之结果，久为“历史之谜”。幸此两“谜”为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二杨”解开之。“二杨”者，即杨天石与杨奎松也。

杨天石首次利用中山舰事件档案数据，解开中山舰事件之“谜”。我为补正过去研究此事件之不足，乃撰《中山舰事件原因的考察》一文，刊于1989年10月之《历史月刊》第21期，介绍杨天石之发现，并就此事件之背景、原因作一考察，此时尚不识杨天石其人也。留美学者李又宁教授已访问北京多次，谈及杨天石的研究。我问天石何许人也？又

宁曰：与汝当年相似，乃“一表人才”也。

我对中山舰事件之研究，曾于1984年4月参加在台北举办之“中华民国初期历史”学术研讨会，发表《3月20日事件之研究》一文，所用资料，以国民党党史会收藏者为主。就当时情况而言，应须参考之数据皆已尽可能地利用之。评论人刘凤翰曰：“蒋教授在这篇论文中，对事件的背景、事件的发生与处理，都达到求真的目的。所用的方法与数据被史学家所接受，其结论将被史学家所肯定。”此事件之关键问题，为李之龙是否承汪精卫之命，对蒋介石进行谋害？据蒋之多次陈述，似是如此，而汪及共方则否认之。研究者苦无直接证据可资断定何方所述者合乎事实，于是成为“悬案”。一般论著对此事件资料之采信，各有不同尺度。“右”者采信蒋方之资料，“左”者采信汪及共方之资料，而对对方数据常质疑之。我之论文，两说并陈，而以第三方面之资料佐证之。凤翰评之曰：“蒋永敬教授这篇论文，写得严谨、公正，而有学术上永久价值。”但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未出现前，凤翰之言，尚难否定也。我在《中山舰事件原因的考察》一文中介绍天石对“解谜”之贡献曰：

> 中山舰的调动，是否为汪、共劫蒋之阴谋？尽管各方有不同的陈述，而其关键所在，李之龙（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有无矫令调舰行为，应该考察当时中山舰调动的真实情况。为期了解这种情况，对于当时调动中山舰有关人员的陈述，须加以考察和对证。调动中山舰有关人员除李之龙本人于1927年在汉口发表《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一文中有“派舰经过”外，其他有关人员如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王学臣，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军校办公厅秘书季方，副官黄珍吾等，因与调舰事有关，均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留有笔录。这些文件的日期，都是在1926年3月24日到31日之间。从这些文件来看，李之龙并无

矫令调舰行为。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首次利用了这些文件，解开了此一事件多年之谜。

其后天石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对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既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以及事件后苏联顾问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作用等问题，诚如作者所云："史学界都还不完全清楚。"为求真相，天石运用诸多可信资料，作出精辟的解答。

天石这两篇中山舰事件研究，愿以刘凤翰对我《3月20日事件之研究》之评语"写得严谨、公正，而有学术上永久价值"，让之天石。

三

我对天石的才华，十分欣赏；但不迷信其"权威"，总想找个机会，与之挑战，以尽"以文会友"之道。

1996年，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六十万言的巨著出版了。这是一部水平很高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在同类的著作中，难有出其右者。我曾以挑战的心情，作一"评介"，提出五点意见：一点表示肯定与欣赏，两点讨论，两点挑战。讨论不谈，先谈肯定与欣赏，再谈挑战。肯定与欣赏是认为本书有"新的资料和新的内容"，节录如下：

本卷重大特色之一，是采用了大量的档案数据。这些资料不仅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还包括中共方面的；不仅包括中文

> 的，还包括英、俄、日文的。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如《蒋介石个人全宗》、《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蒋介石日记类抄》、《冯玉祥个人全宗》、《吴稚晖个人全宗》、《张静江个人全宗》等。大多是由本书首次引用，其价值之高，可以想见。要使著作有创新的内容，就必须充分利用新的数据。人云亦云，陈词滥调，徒使读者乏味。而本书在新数据方面的利用，确居优势。（举例略）

挑战的两点，一是"抓漏"，一是"找碴"。"抓漏"方面，抓出编者的马虎，把几种不同的资料，糅合在一起。"评介"的标题为《引用资料不可马虎》。节录如下：

> 鲍罗廷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变化，实即标志着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变化。此一关键性的问题，从本书相关的记述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例如为了迁都武汉之争，鲍、蒋之间发生了一次正面的冲突。本书对此记述（略），颇为生动。资料来源，据注是根据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载于1927年5月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但就我手头现有的资料来查证，这段记述，并非完全出自蒋的《讲演词》。（举例略）把这几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凑合在一起，未注据蒋的《讲演词》，这就显得有些马马虎虎了。同时，对于鲍、蒋两人的争执，以及是非曲直问题，著者显然认为蒋有不对之处，说"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

蒋介石在武汉对鲍有无"允诺"，是须加以查证的。按鲍在1月15日（1927年）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发言中，对蒋所提意见，表示"赞同"，并认为"亦无不可"。这段发言记录，该书略而不采，今补充之（略）。"找碴"

的一点,"评介"的标题是《过度曲护有碍历史真相》。该书对武汉分共时宋庆龄坚持"三大政策"颇加肯定。我知此一肯定,似非出自天石之笔。此书既为其主编,乃有意向之"找碴"。其文如下:

> 孙中山有无制定"三大政策"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经过近年中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孙中山生前,并未提出此一特定的政策,更无此一名词的确立,而是在他去世一年多以后,始由中共人员提出来的。如果把"赝品"视为"真货"而肯定之,便使学术性大为减色了。

后来天石有两篇论文,似在回应我的挑战,一篇是《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其中有"迁都之争"一项。另一篇是《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尤其后一篇响应我的"找碴"甚为明显,如该文结语所云:

> "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 1925 年 10 月至 1926 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个比较精确的概括。应该承认,所概括的三方面确实都来自孙中山,不是赝品。

天石此文,把"三大政策"的概念形成,提前到 1925 年 10 月,似乎早了些。此时应是酝酿,而非形成。形成的时期,应是 1926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日。天石根据这天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出版《总理周年纪念特刊》所载施存统(当时是共产党员)以"复亮"为名发表《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文。即如天石所云:"空前明确地提出了'三大革命政策'的概念。"过去对此概念形成和"三大政策"名词的

出现，只追踪到1926年10月，天石此文把它提前7个月，这是一大发现。

这一问题，由于中外和两岸学者多年来的探讨，大致已有定论。这一概念和名词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由共派方面的人士概括而来，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历史上很多概念和名词，都是后来概括而成的。例如“辛亥革命”、“联俄容共”等名词，都是如此。所以天石说它“不是赝品”，也是有根据的。

四

我对天石之文的另一次挑战，是2005年10月在台北举行之“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研讨会。天石发表的论文为《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大会安排由我评论之。天石此文认为蒋介石对这个“底”曾有四次改变、四个层面，即四个“底”。我则认为只有两个“底”，即卢沟桥事变“底”与珍珠港事变“底”。前者为不澈底之“底”，后者为澈底之“底”。原稿节略如下：

天石此文所表现之特色，一为精彩选题，可谓“小题大作”，用一个“底”字来贯串整个抗战过程中重大问题。次为精彩选材，此文多以第一手原始数据完成之，特别是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成为天石研究“底”的根据。蒋介石此一演讲，十分坦率，在当时有高度之机密性。存于国民党党史馆，迄未公开。天石以此文件所解释的“抗战到底”之“底”来量蒋介石以后对“底”解释的变化。天石根据五中全会以后的文件，认为蒋对“底”作了“新解释”，改正前“底”（五中

全会的)“错误”。改正有两点,一是将“底”追溯到九一八事变(收复东北),一是将“底”扩大为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

此两点是否为改正前“底”之“错误”? 这要看在前“底”之前的蒋介石文件有无和“新解释”相同之处。据我的了解,这种“新解释”在五中全会前或五中全会中的演讲里已经有了。例如蒋介石1938年9月18日《告东北同胞书》中有云:“此次牺牲,发动抗战,即为恢复东北失地。”关于中日问题须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蒋的五中全会演讲即有详细说明,他说:“中日问题,无法单独解决;要解决中日问题,一定要解决远东问题;远东问题即是太平洋问题,必须在解决太平洋问题中获得一个结果。”

太平洋问题如何解决? 一是和平,一是战争。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倾向和平解决;此后则为战争解决。天石文中引用一件极为机密而极重要的文件,为1940年8月在蒋介石指导下起草的《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要》,有两大底限,一为战争底限,一为和平底限。战争底限名曰“最大之成功”,和平底限名曰“最小限度之成功”。这是天石一大发现。从这一文件,可以看出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是求“最小限度之成功”(和),之后是求“最大之成功”(战)。结果“最小”的未能成功,而“最大”的反而成功了。正如胡适在抗战期中有句名言“和比战难”。依此文件,我认为“抗战到底”之“底”只有两“底”,一为卢沟桥事变“底”,不澈底之“底”,一为珍珠港事变“底”,乃澈底之“底”也。

评过天石此文以后,想到1986年10月在台北的“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中,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蒋中正先生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两相对照,异同互见。19年后,有幸评论天石此文,亦乐事也。

五

天石精于资料的搜集，他所探讨的问题，颇多我曾经思考而未能解答的。例如他对胡汉民的研究，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曾接触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著作发表过。在读到天石的《蒋胡"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和《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胡汉民档案》后，使我深感过去研究的不足。对于他的发现，也引起我去思考存疑未决的问题。例如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一文，就使我想起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因解决国共纠纷而由国民党中央于1924年8月通过的《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国民党档案中，列为"极机密"。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讨论到通过时，鲍罗廷和中共瞿秋白都曾与会。此案全文早已收入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迄未引起学者的注意。胡汉民1930年在南京向新亚细亚学会演讲《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提到他1925年到1926年间在莫斯科"提议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经过和原因"，显然与前项决议案有关。2004年，我在广州"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孙中山与鲍罗廷》一文，曾提到这一决议案问题。再阅天石的《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一文，可以看出从孙中山、胡汉民到蒋介石，对中俄、国共关系的改善，都曾有过强烈的需求。共派人士提出的"三大政策"，亦为需求国共合作关系的维护。然而终致决裂者，此亦值得深思之问题也。

六

天石的年龄和我相比,差了一大截。但其出道很早。1958 年从事南社的研究,观其搜集和运用资料的方法,就已十分内行。"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忘潜修,一旦开放,便脱颖而出。加入《中华民国史》编写行列,以其文学的底子、哲学的素养,加上科学的方法、求真的精神,以锲而不舍的毅力,追求难得的史料,思考问题,故其发表的文章,引起同道的重视和欣赏,非偶然也。

天石参与民国史的工作,涉猎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派系斗争等,特别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下过很深的工夫,有很多的发现和创见。由于彼此的行道不谋而合,所以我对天石的发现和创见,体会较深,受益更多。因此,能与天石"以文会友"是我生平最大的乐趣。《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的出版,不仅可以展现他 50 年来努力的成就;更重要的意义,能为继起研究者,提供宝贵的经验,这是我的期待与祝贺。

2007 年 6 月 2 日

于台北

序　三

日本放送大学　山田辰雄

我尊敬的老朋友杨天石先生的著作集即将出版，有幸为该书作序，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当代中国涌现出了许多的历史学者。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他在这部《文存》中收录的论文，我大都拜读过。只要浏览一下它的目录，就会让人折服于杨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在这部《文存》中，他研究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和领导人，论述了自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以至国民革命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与思想史的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优点在于，他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在中国乃至广阔的海外发掘最新的资料，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独创性论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日可就，它的背后是敏锐的历史感和日积月累的知识与教养。

作为学者和他的朋友，我自己也从杨天石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仅在思想史领域，他就不仅关注政治家，而且论述到许多知识分子。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也引起了我的注目。在中华民国史上，对于蒋介石的客观研究，迄今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其中有资料上的制约，并含有微妙的政治评价的问题。而杨天石先生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则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既阐明了诸多新的事实，同时又发表了独创性的见解。

我是日本人，要克服语言的障碍、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

易事。但所幸可以理解杨天石先生的大作。我近来通过翻译他关于蒋介石的论文,来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努力理解他的研究。我在许多国际会议和日常会话场合,与杨天石先生有着交流。他的汉语发音,婉转而清晰,不但表明他头脑清楚,也让我克服了作为外国人的语言障碍。

最后,我祝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的出版,并期待着他为中华民国史的国际性学术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7 年 6 月

(臧运祜　译)

编辑说明

一、《文存》收著者此前所写关于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大部分文章,少数人物传记、序跋未收,专著、小册子不收,超出中国近代史领域者不收。所述历史事件在1949年以后而有关中国近代史者,列为附录。

二、《文存》依时期与主题厘为五卷:《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各卷分别独立。

三、前四卷主要反映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方便读者阅读,大体按历史事件的先后排序,不便排序者列为附录。

四、第五卷主要反映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分类排序。其所论人物事迹涉及当时政治发展者,列入前四卷;评述人物思想、学术、文学者收入本卷;如黄遵宪、孙中山、章太炎、柳亚子、胡适等。少数人物研究,虽从政治上立论,但无法纳入某一时期者,亦收入本卷。

五、王了一(力)师主张“龙虫并雕”,《文存》师其意,长短兼收,庄谐并取,论议之文与叙事之文同存。

六、所收文章,均尽量保持发表时原状,注明原发表书刊。少数篇章,此前有改动或此次编集时有小改动者,均加说明。

七、《文存》附有部分插图,为著者辑自海内外的珍贵、稀见资料,一般常见、易见者不录;虽珍贵、稀见,但未得允许,无法复印、摄影者从阙。

八、所作各文,内容有较多重复者不收;论题相同而论证、叙述方式不同者酌收。

九、与师友合作撰写的文章,《文存》仅收以本人为主执笔者。对合作中有关师友的指导、教益,谨致衷心谢意。

十、《文存》不是通史性著作,所论仅是著者有兴趣并且深入研究过的部分问题。近代中国的历史空前丰富、复杂,内容广阔。所有重大问题一一论述,非著者精力所及;若干问题,著者尚有兴趣探讨,请期之异日。

十一、所引文字,有缺漏或模糊不清者以□标示,错字的订正用〔 〕号,增补的脱字用〈 〉号,删除的衍文用[ ]号。

目　　录

马桶阵、面具兵与“五虎”制敌

鸦片战争时期有几则故事，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谈。

其一为杨芳大摆马桶阵。那是 1841 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说起这位杨芳，原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位名将，在镇压川、楚白莲教及河南天理教起义中，屡立战功，官也从把总一直升到提督，成为省一级的高级将领。当他初到广东之际，人们耳闻他过去的事迹，“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不想在他进入广州之后，却突发奇论，说是：我在实地，夷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夷炮却能经常打中我，我炮却不能打中夷，肯定夷人有邪术。于是传令保甲大量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载在木筏上，派一副将率领，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一声炮响，所有木筏一字排开，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他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令下之后，保甲当然照办，副将也遵命布阵。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其二为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侵略军打到浙江了，杭、嘉、湖地区的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戴铜面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在市场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招募了 342 个乡勇，装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习。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这支“特种部队”出战。那天是个大白天，三百四十多个乡勇，人人带着假面具，“跳舞而前”。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其三为奕经据签语决定反攻时间。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子，位居吏部尚书。1841 年 10 月，道光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带兵驰赴浙江，反攻英军。途经杭州时，在关帝庙求得一签，签语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

全家谁保汝平安”之句。奕经大喜,决定以“虎”制敌。按旧时说法,寅属虎,于是奕经便选择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作为反攻之期。这样便把时间定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42 年 3 月 10 日)夜四更,共四虎。为了增加一“虎”,奕经又特命生年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率西路兵马。根据这样的原则确定的反攻,其结果当然更可想而知。

上述三事,第一事见于梁廷柟的《夷氛闻记》与佚名的《夷匪犯境闻见录》,第二事、第三事见于贝青乔的《咄咄吟》,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作,所述自当可信。特别是《咄咄吟》,它的作者原是苏州的一介书生,激于爱国义愤自动投到奕经麾下,“始命入宁波城侦探夷情,继命监造火器,寻又带领乡勇派赴前敌,终命帮办文案”,“内外机密,十能言之七八”,因此,他的著述就更加可靠。

鸦片战争中,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败在“蕞尔岛夷”的手下,人们读了这三段故事,也许可以恍然于其原因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把人伦、义理看得高于一切,视科学为雕虫小技,再加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昏庸和愚昧。龚自珍曾经慨叹,当时不仅没有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杨芳、宋国经、奕经的事例虽是个别的,但又是有代表性的。其他人的知识水平并不见得比他们高明多少。官僚如此,百姓们又何尝相反。以后来的义和团为例,相信一道灵符下肚便可以刀枪不入,其实和杨芳的马桶阵之类并无多大差距。

愚昧不能抗敌,自然也不能兴邦裕民。中国要奋飞,就必须于铲除旧制度根基的同时,铲除滋生于这一土壤上的形形色色的愚昧。“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于呼喊民主之外,又呼喊科学;今之国家领导人既提倡决策的民主化,又提倡科学化,都实在是对症的良方。

原题《愚昧焉能抗敌》,载《光明日报》,1987 年 12 月 7 日

《天朝田亩制度》与“割尾巴”

不知怎的，近来读《天朝田亩制度》，常常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是我们的史学著作竞相引用的名言，一向被认为是农民革命的伟大理想。这诚然是不错的。对于缺少土地、啼饥号寒的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来说，无异是向他们展示了一个诱人的美丽的天堂，会激励他们去推翻现存的只给他们带来贫穷和痛苦的社会。但是，未来社会果真是那么诱人吗？《天朝田亩制度》接着写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这就是说，每家都束缚在土地上，除种地外，还要植桑、养蚕、缝衣，可以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家家只养母，不养公，如何交配、繁殖？不能交配、繁殖，如何能生生不已地养下去？第二，如果有一家想多养几只鸡、几头猪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回答，笔者无从揣想；那第二个问题倒是好解决的。《天朝田亩制度》接着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这里说得很清楚，每家只能留足自己的使用部分，其超额部分，则要无偿“平调”，“归国库”了。自然，你要是多养了一只鸡、一头猪，也是要“归国库”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使笔者想起那些年头的“割尾巴”的原因。虽属比拟不伦，但总不是匪夷所思吧？

史书上说，太平天国统治地区，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太平军所到之处，地主不是被杀，就是逃亡，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有了土地，自然积极生产。然而史书上又说：《天朝田亩制度》似乎从未实行过，因为它根本行不通。先不论它那烦琐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即以规定每家“五母鸡，二母彘”而论，也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不足以造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动不动就“余则归国库”，谁还肯多干呢？

太平天国以“处处平匀”相标榜，它之所以规定“余则归国库”，看来也是为了保证“处处平匀”，不至于造成贫富分化的“不匀”现象。但是，“处处平匀”从来都只是一种幻想，即使在太平天国也没有严格实行过。就拿吃肉来说吧，太平天国规定：天王每日给肉十斤（天哪！我不知道洪秀全的肚子如何吃得下），依次递减，至总制（相当于知府），每日半斤，总制以下则不给肉。至于鱼，有材料说，只有诸王才可食用。所以，凡是平均主义盛行的地方，总是伴生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同时也伴生着普遍的贫穷和匮乏。

原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22日

太平天国的“太阳”

偶翻史书，发现太平天国竟也有一位“太阳”，那就是洪秀全。

据说，那是在1837年，洪秀全应试失败，正是十分落魄的时候，忽然造梦上天，见到“天父上主皇上帝”，蒙赐金玺、金剑，封为“太平天子”，醒来时，“太阳照身”，于是，吟诗一首：

> 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
> 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

这里，洪秀全还只是“身照金乌”，金乌者，太阳也。但不久，洪秀全就逐渐与“太阳”合二为一了。他的《真日诗》云：

> 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
> 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
> 东北西南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
> 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

战国时，孟老夫子有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此诗则称“五百年临真日出”，这个“真日”，普照大千，光焰万丈，它温暖“东北西南”，倾倒“蛮夷戎狄”。“真日”指谁，诗中没有明言，但洪秀全以之自喻是无疑的。果然，这一层意思很快就点明了。他另有一诗云：

爷立永约现天虹，天虹弯弯似把弓。

弯弯一点是洪日，朕是日头故姓洪。

这里，洪秀全干脆自称“朕是日头”，把自己等同于太阳了。

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虽夫妇不得自由同宿，违者处以极刑。当然，领袖们是不在此限的。洪秀全的《多妻诏》规定：东王、西王十一妻，南王、豫王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至于他自己有多少老婆，恐怕最精明的历史学家也考证不清，据《洪大泉自述》，洪秀全“有三十六个女人”。据幼天王自述，“他有八十八个母后”。这么多后妃集中在一起，管理教育自然是个大问题。于是洪秀全又以“天父”的名义作诗晓谕：

一心对日是娘娘，心不对日罪难当。

果然心正邪难入，万载千秋配天王。

狗子一条肠，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何能配太阳？

晓照本心是娘娘，不照本心罪难当。

不照本心就是鬼，速照本心对太阳。

草木接日得菲芳，臣下接日得荣光。

智者踊跃接为福，因何草不接太阳？

这里的“太阳”都是洪秀全自称。诗中，洪秀全要求他的后妃们“一心对日”，不搞“鬼计”。此类《天父诗》共五百首，其中四百多首都是对后妃

的“诗教”。它们细致地规定了服侍天王的各种要求，以致娘娘们的姿势、声调、眼神、头颈、口形、动作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如：

> 悠然定叠莫慌忙，细气娇声配太阳。
> 月亮不同星宿伴，各炼长久做娘娘。

这是在告诫“娘娘”们行动文雅，谈吐柔媚了。蒙昧社会里不会有近代文明。洪秀全自称“太阳”，以之作为号召群众、推翻清政府的手段，对此，不应过多非议，但用以管理他的“娘娘”，则实在蒙昧之至。

在太平天国时代，并不只是洪秀全自称“太阳”，别人也是这么称呼他的。某次，杨秀清审问叛徒，其词为“皇上帝有无所不知之能，又知得日头能照得普天下，今天父皇上帝在此，尔主天王日头又在此”。可见，在杨秀清的嘴里，天王和“日头”已经紧密相连而不可分。

古书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又说：“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五色备。”还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可见，在我们民族的古老文献中，太阳从来是和“王”、“君”一类人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出现于封建社会，不足为怪。洪秀全虽然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但他是小生产者的代表。小生产者总是皇权主义者，他自称“太阳”，也不足怪。然而，在号称“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太阳”，“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类呼声响彻神州大地，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原载香港《21世纪》，1992年2月号

《冯婉贞》的真相与史学家的困惑

徐珂的《清稗类抄》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说的是英法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时，有一位女英雄冯婉贞英勇杀敌的故事，梗概如下：

距圆明园十里处，有一谢庄，居民均为猎户。其中山东人冯三保精于技击，其女婉贞，年方十九，也身手不凡。一日中午，英兵百余人来犯，冯三保率众潜伏于寨墙后，待敌军接近时，猎户们众枪齐发，敌兵纷纷倒下。正当众人兴高采烈之际，冯婉贞却忧虑地说："小敌退，大敌将到。如果敌人携炮来攻，咱村就将变成齑粉了！"冯三保瞿然醒悟，忙问有什么办法。于是冯婉贞讲了一通道理："西人长于火器，短于技击。火器的长处在远攻，技击的长处在巷战。咱村是十里平原，与敌人比火器，如何能胜？不如操刀持盾，以我所长，攻敌所短，与敌人进行近身的搏斗。"于是，婉贞即将全村会武术的年轻人召集起来，一律黑衣白刃，埋伏在村边的森林里。不久，果然有敌兵五六百人抬着大炮来攻，冯婉贞率众奋起，持刀猛劈。英兵仓皇失措，以枪上刺刀迎击。自然，洋鬼子的刺杀比不上中国的武术。冯婉贞刀锋所至之处，敌人非死即伤，纷纷退却。冯婉贞大喊道："快追！快追！不要让鬼子开枪开炮！"于是，谢庄的年轻好汉们死死缠住敌人，在交互错杂中展开白刃战。直杀到天暮日落，敌兵死了百余人，弃炮而逃，谢庄得以保全。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让中国人感到特别窝囊和憋气的战争。1860年10月初，英法联军由北京东郊绕至北郊，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将文物珠宝劫夺一空。18日，英军又出动大批士兵，焚烧圆明园，致使这一

中国古典园林的杰作付之一炬。当时，咸丰皇帝是逃到热河去了，似乎也没有清兵奋起抗争杀敌复仇的记载。然而，就在圆明园的近侧，却有一位小女子，率领一批热血男儿狠狠地惩罚了侵略者。虽然只是小胜，但总可以让一切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略舒一口气。因此，这篇文章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冯婉贞的知名度也就大为提高了。

前些年，北京的几位历史学家对冯婉贞发生兴趣，想查清这位女英雄的身世和事迹，于是，组织起调查队，从文献和实地两方面进行调查。自然，这是极为应该的。为了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人们对这位女英雄的了解多多益善。然而，万事就怕认真，一调查，问题就来了。不仅找不到冯婉贞其人的记载，而且，圆明园附近也没有谢庄其地，《清稗类抄》所云，完全是子虚乌有。

史学的生命是真实，《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的记载既然完全失实，对于历史科学来说，自然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有次讨论一部书稿的选材时，有些史学家就主张将该文删去。

我很早就读过关于冯婉贞的这一篇文章，很遗憾，虽然身居北京多年，却从不曾想到过去调查。听了有关史学家的介绍后，除了敬佩其科学精神外，我就想，这也许是一篇小说。作为史学，该文没有任何价值；作为文学，其价值就不低了。

研究工作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要查找一项资料，却怎样也找不到；有时候，它却不请自来，跃入你的眼帘。某日，我在查阅 1915 年 3 月 19 日的《申报》时，突然发现，它有一个专门栏目，名为“爱国丛谈”，其中一篇就正是《冯婉贞》。它的作者是陆士谔，徐珂只是将它收入了自己所编的书中。“类抄”者，正说明了徐珂是编者，而不是作者。

陆士谔是何许人呢？再查。原来此人名守先，江苏青浦人。自幼

习医。后在上海以出租小说为生。久而久之，自己便也写起小说来。由短篇而中篇，由中篇而长篇，先后出版了《三剑客》、《白侠》、《黑侠》、《红侠》、《八大剑侠》、《北派剑侠全书》、《南派剑侠全书》、《新三国侠义传》、《新梁山英雄传》等大量武侠小说。他有时也写清代历史或宫闱小说，如《顺治太后外纪》、《清朝开国演义》、《清史演义》等。他大概做梦也不曾想到，他的那么多长篇小说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而一篇小小的《冯婉贞》却在新中国受到重视。

《冯婉贞》在《申报》发表时，篇幅稍长。徐珂收入《清稗类抄》时不仅改了题目，而且对描写人物和作战气氛的部分细节作了删节。末尾作者有一段议论：

> 救亡之道，舍武力又有奚策！谢庄一区区小村落，婉贞一纤弱女子，投袂奋起，而抗欧洲两大雄师，竟得无恙。矧什百于谢庄，什百于婉贞者，呜呼可以兴矣！

这是对《冯婉贞》一文主题的最好说明。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正逼迫袁世凯接受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汹涌澎湃。作者塑造冯婉贞这样一位女英雄，也是有寓意的吧！

原载《北京日报》，1995年11月9日

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及其风波

黄遵宪任驻日参赞期间，曾和朝鲜访日使臣有过来往，写过《朝鲜策略》一文，在朝鲜朝野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我最初接触这一方面的资料，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我正准备为黄遵宪写一本传记，承黄遵庚先生惠示黄遵宪文抄本一册，其中有《朝鲜策略》一篇。1991年我访问日本，在宫岛吉亮先生家中读到了大量黄遵宪未刊笔谈遗稿，其中保存有黄遵宪等和朝鲜派赴日本的修信使金宏集等来往的记录。1993年11月，我应汉城大学金容德、闵斗基教授之邀，赴该校亚洲史系讲学，又在该校奎章阁见到了何如璋、黄遵宪等和金宏集的笔谈记录。这样，黄遵宪写作《朝鲜策略》的前前后后就比较清晰了。

黄遵宪拜会金宏集

朝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1876年（光绪二年），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李朝政府订立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从而敲开了朝鲜的大门。自此，日本商人利用条约所赋予的特权，迅速扩大对朝鲜的出口，控制金融，扩张势力。为了解决两国间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李朝政府于1880年（光绪六年）7月派礼曹参议金宏集为修信使访日。8月上旬，金宏集到达日本，就通商、定税等问题开始与日本政府会谈。当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非常关心日、朝之间会谈的情况，但金宏集又迟迟不

来拜会。何如璋便于8月20日(七月十五日)派黄遵宪和翻译杨枢去拜会金宏集。见面后,首先由黄表示欢迎和慰问:

> 黄:今日初见,春风蔼然,使人起敬。第不知滞留此间,为多少日?钦使何公,亟欲图晤,从容半日,畅彼此怀抱。不审何日乃得暇?使仆敬请命。①

金宏集当即表示,第二天就准备去中国使馆拜见何如璋。黄遵宪接着陈述了他对中朝关系及国际形势的看法:“朝廷与贵国,休戚相关,忧乐与共。近来时势,泰西诸国,日见凌逼,我两国尤宜亦加亲密。”并说:“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黄遵宪表示,希望金宏集常驻东京,同时赞美金的“聪明”和“闻见日拓”,预言他将来主持国是之后,必将为亚细亚造福。

金宏集同意黄遵宪对时势的看法,表示希望得到中国的保护,抵御外国势力。金称:“宇内大势,高论诚然。敝国僻在一隅,从古不与外国毗连。今则海舶迭来,应接嘎嘎,而国少力弱,未易使彼知畏而退,甚切忧闷。然所恃者,惟中朝庇护之力。”

黄遵宪欣赏金宏集对中国的态度,但不赞同金宏集依赖中国“庇护”的意见,他说:“请〔得〕此数语,足见忠爱之忱,溢于言表。朝廷之于贵国,恩义甚固,为天下万国之所无。然思所以保此恩义,使万世无疆者,今日之急务,在力图自强而已。”

金宏集赞同黄遵宪关于“自强”的建议,连忙表示:“自强二字,至矣尽矣,敢不敬服!”

二人当即约定,第二天金宏集访问中国驻日使馆。

---

① 金宏集:《修信使日记》卷二《大清钦使笔谈》,见《金宏集遗稿》,下同。

金宏集拜会何如璋

8月21日（七月十六日），金宏集应约到中国驻日使馆拜会何如璋。二人在互致寒暄后，何如璋表示："我朝与贵国，义同一家。今日海外相逢，尤为亲密。"接着，何如璋打听金宏集此行的目的："使节之来，闻有大事三，不知既与日本外务言之否？唐突敢问。"对此，金宏集仅作了简单的回答："使事，概为报聘书契中，有定税一事而已。"

黄遵宪见此，动员说："钦使何公，于商务能悉其利弊；于日本事，能知其情伪。有所疑难，望一切与商。我两国如同一家，阁下必能鉴此。"

金宏集则解释说："仆来此，大小事，专仰钦使指导，而形迹亦不能不存嫌，所以稍迟迟，庶谅此意。"

话说到这份儿上，黄遵宪就开门见山了。他说："贵国与日本所缔条约，仆未见汉文稿，能饬人抄惠一份，感谢不已。"

对此，金宏集表示同意。此后，三人间的谈话再次转入寒暄。金宏集表示，非常仰慕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希望一见，黄遵宪答应赠送《日本杂事诗》数部给金宏集，同时告以《日本国志》系与何如璋同著，篇幅庞大，达三十卷之多，尚未完稿。

初次见面，何如璋不能深谈，只称，改日将回访金宏集。

何如璋与金宏集之间的会谈

8月23日（七月十八日），何如璋与中国驻日副使张斯桂到金宏集



黄遵宪与朝鲜金弘集笔谈(采自汉城大学)

寓所回访,询问金宏集谒见日本天皇的日期及与日方会谈、订约等情况。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积极与西方列强谈判,企图修改不平等条约。何如璋向金宏集介绍道:"近日此间,方拟与泰西各国,议改条约。其议改之意,在管理寓商及通商税则各事。其稿极详细,亦极公平,大约系西洋各国通行之章程。若各国通商,均照此行,固无所损也。"他建议,朝鲜仿此,与日本订立"妥善章程"。但是,朝鲜当时还完全没有和列强打交道、做生意的经验,因此,金宏集答称:"敝邦全不谙商务利害,极闷闷。"何如璋当即表示,将设法取得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约稿,提供给金宏集参考。

自 19 世纪中叶起,沙俄即积极侵略中国,图谋向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因此,中、日、朝三国都面临沙俄侵略的威胁。谈话中,何如璋

向金宏集询问道:“顷俄人在贵国图们江口一带经营布置,究竟情形如何?”对此,金宏集毫无所知,向何请教应付的办法。何称:“近日西洋各国,有均势之法。若一国与强国邻,惧有后患,则联各国,以图牵制,此亦自〔目〕前不得已之一法。”

“均势”二字,金宏集到日本前后刚刚见到过。他觉得,这是个办法,但一想到本国的情况,又发愁起来。他告诉何如璋说:“本国凛守旧规,视外国如洪水猛兽,自来斥异教甚峻故也。大教如此,第当归告朝廷。”

话说到这地步,只能暂告段落了。何如璋邀金宏集及随行人等改日到中国公使馆一叙。

8月26日(七月二十一日),金宏集第二次到中国使馆与何如璋会谈。

此前,金宏集已经阅读了何如璋提供的日本与西方列强议改的约稿,因此,谈话仍然从“通商”开始。何如璋力劝朝鲜对外“通商”,说明只要关税能自主,此乃有益无损之事,同时,何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关税保护办法:

> 西例通商,惟欲己国有益,故两国往来税则,无论出入口,均由本国自定。凡进口税则,以值百抽三十为率;更有所谓保护税,则不欲此货进,令便加重税以阻之。至出口之货,则或轻或重,均由自己酌定,告知通商之国照行。如此货欲其多出口,即免税,以便本国商民,亦无不可。总之,权由自主,则利益自归本国,不致为他国占尽便宜。

自《江华条约》签订之日起,朝鲜与日本通商已经四五年,还不懂得应该设关收税,保护本国权益。对何如璋的热情介绍,金宏集颇为感动,回答说:“开谕至此纤悉,虽甚愚鲁,岂不晓得!”

这次谈话的中心议题仍然是防俄问题。何如璋说:“现西人竞言功利,而俄人横暴,如战国虎狼之秦。闻其近年于图们江口一带,极意经营;且本年又增设水师于东海。此事大为可虑,迟则变生。我朝与贵国,谊同手足一家,殊难漠然也。”金宏集由于对此无所了解,不愿多谈,便转而询问中俄伊犁谈判情况:“俄事最为目下急切之忧,不知伊犁一事,如何究竟?”

何如璋不愿岔开话题,回答道:“中土西边之事,以近情观之,与俄人不致构衅,但观其兵舶,络绎东来,悉舶于图们江口,恐其心怀叵测也。”

1879 年(光绪五年)8 月,李鸿章曾致书朝鲜政府,建议朝鲜“秘修武备,慎固封守,与英、法、德、美诸邦逐渐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即可备御俄罗斯”[①]。何如璋向金宏集打听朝鲜舆论对此的反应,并称:“昨言均势之法,亦不得已之事。”

朝鲜虽已和日本通商,但对其他西方国家,仍然紧闭大门。1880 年春,俄国曾派使者到朝鲜元山津,要求开辟口岸通商,被朝方斥退。同年,美舰开抵釜山,向朝鲜政府投书,也被拒绝。其后,美国政府通过日本外务省的介绍,再次企图投书,朝鲜政府以格式不合为理由退还。对于朝鲜政府的这些举措,何如璋都不以为然。他说:

> 愚见,俄事颇急。现海内各国,惟美系民主之国,又国势富实,其与列国通好,尚讲信义,不甚图占便宜。此时彼来,善求通商,若能仿此间议改之约稿,与之缔立条规,彼必欣愿。如此则他国欲来通商者,亦必照美国之约,不能独卖(?),则一切通商之权利,均操在我,虽与万国交涉,亦有益无损之事。此万世一时之机会,不可

① 《中日交涉史料》,第 1 卷,32 页;第 2 卷,6 页。

失也。若必欲深闭固拒,致他日别生波澜,事急时所结条规,必受损无疑惑,卓见以为然否?

要改变闭关锁国政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金宏集表示:"敝国事势,未可遽议交涉。"

何如璋不以金宏集的犹豫为然,鼓励说:"不相往来之气,今日屈指数之,宇内已无几国。此事有决难终拒之势,固不如先一着为之。"

在何如璋的剀切陈述后,金宏集终于表示:"所教切当。"

会谈之后,何如璋担心双方言语不通,靠笔谈不能尽意,便命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一文。

中、日、朝三国文士的欢聚

8月29日(七月二十三日),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花房义质邀请金宏集、李祖渊、姜玮及何如璋、黄遵宪等在东京飞鸟山暖依村庄聚会。当时,日本人宫岛诚一郎等与何如璋、黄遵宪等正在组织兴亚会,宫岛诚一郎兴奋地说:"今日之会,系三国集一堂,旷古所稀,是为兴亚之始。唯恐路远天雨,诸公或不能来,忽得此佳契,何喜如之!"他表示,希望"自今以后永好,图三国之益"[1]。

何如璋同意宫岛诚一郎的意见,他说:"栗香先生深重同洲之谊,所虑深且远。今日之会,素非偶然。"

宫岛诚一郎补充说:"仆自何公使之东来,相交尤厚且久矣!其意

① 《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笔谈遗稿》,宫岛吉亮先生家藏。

专在联络三大国而兴起亚洲。今先生之来，若同此志，则可谓快极！”

面对二人的热情话语，金宏集不知该怎样回答，只说了一句：“盛意猥不敢当！”

当日尽欢，宫岛诚一郎要黄遵宪写一首诗来纪念这有意义的聚会。黄遵宪带着醉意挥毫写道：

> 满堂宾客，三国之产。更无一人，红髯碧眼。纸笔云飞，笙歌雨沸。皆我亚洲，自为风气。人生难得，对酒当歌。今我不乐，复当何如！纵横战国，此乐难得。奚怪有人，闭关谢客。

在西方列强日渐东侵的形势下，中、日、朝三国联合，共同振兴亚洲，这自然是一种十分美好的愿望。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却走上了一条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道路。

黄遵宪起草《朝鲜策略》

其间，黄遵宪根据何如璋的指示，迅速写出《朝鲜策略》一文，对朝鲜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具体而详尽的建议。

《朝鲜策略》的核心思想是防俄。文章一开头就宣称：

>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1]

---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13卷，389～396页。下同，不一一注明。

文章接着叙述了沙俄向西发展受阻，转而将侵略矛头东指，朝鲜岌岌可危的情况：

> 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据高屋建瓴之势，其经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掠地，必自朝鲜始矣！

文章认为，朝鲜当时的急务是防俄，而要防俄，就必须“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

黄遵宪从历史与地理等角度分析，说明朝鲜与中国有着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密切关系：

> 朝鲜有事，则中国必糜天下之饷，竭天下之力以争之……今日朝鲜之事，中国当益加于旧，务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朝鲜与我，谊同一家。大义既明，声援自壮。

文章接着提出，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朝鲜有着共同的利益，应该结为唇齿之交：

> 为朝鲜者，自当捐小嫌而图大计，修旧好而结外援。苟使他日两国之轮舶铁船纵横于日本海中，外侮自无由而入。

黄遵宪像何如璋一样，对美国怀有好感，认为美国以“民主立国，共和为政”，“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义”，因此，文章说：

即使其使节不来，为朝鲜者，尚当远泛万里之重洋而与之结好，而况其迭遣使臣，既有意以维系朝鲜乎！引之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

文章接着设为问答，解释对“结日本，联美国”的种种疑虑，然后，建议朝鲜政府讲求通商、富国、练兵之计，奠定自强之基。文末，黄遵宪警告说：

嗟乎！时势之逼，危乎其危；机会之乘，微乎其微。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举五大部或亲或疏之族，咸为朝鲜危，而朝鲜切肤之灾，乃反无闻知，是何异处堂之燕雀，遨游以嬉乎！

文章呼吁，朝鲜志士把握机缘，奋起图强：“惟智慧能乘时，惟君子能识微，惟豪杰能安危，是所望于朝鲜之有人，急起而图之而已。”

一面力图自强，一面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联合或接近部分国家，借以抗御沙俄的威胁，黄遵宪的基本策略思想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积极图谋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黄遵宪对此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警惕。

黄遵宪再访金宏集

9月6日（八月二日），黄遵宪听说金宏集即将归国，匆匆来到金宏集寓所，将《朝鲜策略》一文赠给金宏集。黄称：

仆平素与何公使，商略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谨，冒渎尊严上呈。其中过激之言，千万乞恕，鉴其愚而怜其诚，是祷！

黄并称：关于“禁输出米”和“定税则”二事，何如璋尚有一二条意见，未及在《策略》中提出，不知此两事是否已和日方议妥？

当时，日本所属对马岛须从朝鲜进口大米，朝鲜则担心本国饥荒，不愿输出，准备课以重税，因此，“禁输出米”和“定税则”是金宏集和日方谈判的内容之一。日本外务省认为金宏集不懂商务，没有谈妥。金宏集对黄遵宪称：“本国从未识外国事情，此等处，极是难办。甚闷！甚闷！”黄遵宪答称：“何公使每见日人，常劝其事事务持大体，且告之曰：既欲两国之交，以防俄而多所要挟，益滋朝鲜疑惧，恐大局亦坏，彼亦深以为然，故不甚坚执也。”

黄遵宪建议：“必欲防其输出太多，则惟有税则由我之一法，加税而防之。”他进一步解释说：

万国公法，不禁输米；若遇凶年，亦何以禁？英、德之米麦，常仰于俄，而今年不熟，亦禁输，他国亦不得有后言，故曰不如声明税则由我自主之一语为善也。切记！切记！与他人立约，必声明细则由我自主之一语，以待他日。不然，则如日本需十数年，乃能议改而尚未定矣！

主张“税则由我”，实际上是主张关税自主，对此，金宏集极为赞赏，他说：“节节精到，税入多寡不足计，迟速不足论，惟自〈主〉不被人牵制为今日最急切之要务，敢不敬服！”

黄遵宪觉得碰到了知音，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 税之多寡，于国关系不重，惟输出之金银多于输入，则民生窘而国计危矣！财为生人养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贫而乱作矣！日本通商十数年，输出金银，至于十二千万之多，朝野上下，半不聊生，此税则由他人商定之害也。苟能重课进口货，则外货来源不多，即金银输出不多，何至于此？故税则自定之语，一乃全国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谨也。

听了黄遵宪的话，金宏集感到，要使输出大于输入，必须发展生产和商务。但是，朝鲜当时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商品经济。他说："敝处输入，想亦不多，而输出则国贫无产，尤当少少矣……欲救其弊，不得不师彼之所为，务农与商，使我之出品，亦足以取人之金钱而后可耶！敝国朝野，只有凛遵成宪，安于俭啬而已，万不可议此也。"一想到这里，金宏集感到两难起来。他接着表示："通商虽无显害，日后应接极难，以是为苦；闭关亦不足为无上善策。我国读书人，皆以通商为不可。此论于时务何如？窃想中朝，亦多有主持正大之论者矣！"

黄遵宪坚决反对闭关政策，他果断地说："今日尚欲闭关，可谓不达时务之甚！仆策中既详及之，请归而与当局有力者力主持之，扶危正倾，是在君子！"

金宏集欣然接受黄遵宪的意见。他觉得，黄遵宪是个有眼光、有见识的外交家，愿意和黄建立长久的联系，便询问今后的通信办法："归国之后，他日欲通音讯，当从何处寄，乃不得浮沉？"这说明，金宏集对黄遵宪已经有了相当的信任感。

9月7日，金宏集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辞行。何如璋特意提起黄

遵宪的《朝鲜策略》,希望听到金的意见:"昨日黄君所呈,系揣度今日情形如此,虑阁下恕其狂直而辱教之。"

金宏集不好轻易表态,答称:"忙未一披,容得暇细读而揣度筹划矣。所不用其极,万万感服,敢不存心!"

临别之际,何如璋握着金宏集的手,告诉他:俄国海军大臣率领的十五艘军舰已屯泊珲春,形势紧张,再次建议朝鲜联合日本、美国以抵御俄国。何同时提出,如俄国要求通商,也不可拒绝。他说:"万一俄人叩关请议通商,不如勉强许之。第俄人素横,与之结约,恐多周折也。"何并称:"近日情形甚急,如阁下归国,众论稍通,请飞函告我,当相谋一善法也。"金宏集一一答应。[①]

9月8日(八月初四日),金宏集离日返国。

朝鲜政府讨论黄遵宪的建议

金宏集回国后,将与何如璋的谈话情况以及黄遵宪起草的《朝鲜策略》上陈国王李熙。10月2日(八月二十八日),二人之间有如下问答:

> 金:清使亦以自强相勉矣。
>
> 国王:自强是富强之谓乎?
>
> 金:非但富强为自强,修我政教,保我民国,使外衅无从以生,此实自强之第一先务也。
>
> 国王:清使亦以俄罗斯为忧,而于我国事多有相助之意否?

---

① 金宏集:《大清钦使笔谈》,参见何如璋《上李鸿章函》,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438页。

金：臣见清使，几次所言，皆此事，为我国悬悬不已也。[1]

其后，朝鲜国王将《朝鲜策略》交给大臣们传阅、讨论。10 月 10 日（九月初八日），他和领相（首相）李最应之间有下列对话：

国王：见其策子，则果何如乎？

领相：臣果见之，而彼人之诸条论辩，相符我之心算，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大抵俄国僻在深北，性又忌寒，每欲向南，而他国之事，则不过兴利而已。俄人所欲，则在于土地人民，而我国白头山北，即俄境也。……方今俄人聚兵船十六只，而每船可容三千人云矣。若寒后则其势必将向南矣！其意固不可测，则岂非殆哉岌岌乎？

国王：防备之策何如乎？

领相：防备之策，自我岂无所讲磨，而清人策中，论说若是备尽。既给于他〔我〕国，则甚有所见而然也。其中可信者信之，而可以采用。[2]

讨论完毕，朝鲜政府的结论是：

俄罗斯国处在北，虎视眈眈，天下畏之如虎，厥惟久矣。近年以来，每因中国及各外国文字，常以是国为忧。朝鲜壤界相接，安知不受其弊乎？今前修信使回还，赍来中国人黄君册子，其言所谓《朝鲜策略》，自问自答，设疑设难，忧深虑远者，比前日所见各国文

① 《李朝实录·高宗》卷 17，128 页。

② 同上书，135～136 页。

字，益加详密。虽未知其言言皆当，亦安知非大加讲究于安不忘危之义乎！[①]

可以看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得到了朝鲜君臣的积极评价。

10月19日（九月十六日），金宏集自朝鲜致函何如璋，中称：

黄公所赠《策略》一通，代为筹画，靡不用极，谨已一一归禀。敝廷莫不感诵大德，异声同叹。现众论虽未可曰通悟，殊不比往时矣！[②]

显然，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发生了作用。又过了一个月，黄遵宪在使馆接见了朝鲜国王特派的密使李东仁。李向黄报告说："朝鲜朝议现今一变。"[③]次年2月（光绪七年正月）朝鲜中枢府知事李容肃向李鸿章报告说："敝邦壤僻人拙，常多歧贰之论。曩者获见何侍讲《笔谈》，黄参赞《策略》，节节窍要，于是乎廷议回悟。"[④]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朝鲜策略》促进了朝鲜政府思想观念的变化。

1880年11月3日，金宏集被升为吏曹参议。次年2月（正月），仿照中国制度，设立统理机务衙门，下设交邻、军事、边政、通商、机械、船舰、语学各司，迈出了内政改革的第一步。同月，金宏集被任命为统理机务衙门经理。

---

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445～446页。

② 同上书，452页。

③ 同上书，437页。

④ 同上书，462页。

轩然大波

在获得朝鲜君臣的积极评价时，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也受到了朝鲜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朱子学曾被朝鲜定为国教，朱熹的地位也因而极为崇高。《策略》在说明美国宗教状况时曾称："美国所行乃耶苏教，与天主教源虽同，党派各异，犹吾教之有朱、陆也。"这下就捅了娄子。1880 年 11 月 3 日（十月初一日），在金宏集升任吏曹参议的同一天，兵曹正郎刘元植上疏说：

> 朱夫子上接孔、孟，亲炙周、程，道炳千载，师表百世，虽蛮貊之邦，莫不遵奉为大贤。夫黄遵宪中国人，必无不知朱子之为斯文尊师。今于遣词之际，何患无证，乃以如彼耶苏、天主之秽，肆然凭据乎？[①]

刘元植声称：金宏集当初见到这种"凶惨之句"时，应该当面斥责，不应该安然接受。据他估计，此事之所以发生，一定是朝鲜的"邪孽余种"，偷偷地勾结"异类"，才做出这等"骚扰人心，蔑染邪道"的事。他要求国王采取断然措施，将潜伏的"凶徒"彻底消灭干净。国王见了这通奏文后，只简单地批了"省疏具悉"四字。第二天，朝鲜政府宣称：刘元植"阳托卫正之说，阴怀逞邪之计，摘出他国人文字，诽讪朝廷，污蔑士林"，决定将其发配边远地区。11 月 4 日，金宏集上疏，说明黄遵宪的《朝鲜策

① 《李朝实录·高宗》卷 17，144 页。

略》用意深切，代画详密，言论可采，但其中的个别句子受到刘元植的指责，自己满心惶愧，不料却升了官。他要求朝廷收回任命，治以误事之罪。疏上，国王批称，人言本不恰当，劝他不要辞职。[①]

1881年3月25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李晚孙等一万多名儒生聚会京城，向国王伏阙请愿，上书说："伏见修信使金宏集所赍来黄遵宪私拟一册之流传者，不觉发竖胆掉，继之以痛哭流涕也。"请愿书继续攻击金宏集将《朝鲜策略》带回国内，同时攻击黄遵宪从事西学，尽力于"致财"、"劝农"、"通工"等主张。请愿书称："财用农工，自有先王之良法美规"，"何尝舍先王之道，而从事于别样妙术耶"！请愿书并称：

> 彼遵宪者，自称中国之产，而为日本说客，为耶苏善神，甘作乱贼之嚆矢，自归禽兽之同科。古今天下，宁有是理！[②]

请愿书要求国王发配一切传播西学的人，销毁一切有关西学的书籍，"益明周、孔、程、朱之教"。朝鲜国王坚决地批驳了李晚孙等人的意见，认为李等断章取义，误解了黄遵宪的用意。国王并给李等扣了一顶"谤讪朝廷"的帽子，声言要从严惩处，劝他们退去。一部分儒生听从国王的劝告离开了京城，但还有部分人坚持不散，第二次上疏请愿，于是，国王不得不下令，限期逮捕"作头主论"的人，"严刑远配"，同时派"禁隶"（警察）将儒生们押出城外。[③]

朝鲜政府的镇压措施并没有消弭《朝鲜策略》所引起的风波。4月7日（三月十九日），又有黄载显、洪时中二人上疏，攻击《朝鲜策略》只

---

① 《李朝实录·高宗》卷17，146页。

② 《李朝实录·高宗》卷18，183～184页。

③ 同上书，185～188页。

是"疑似之信息",要求将《中西闻见》、《万国公法》、《申报》以及《朝鲜策略》等著作一一搜出,付之一炬。国王将二人的奏章发交朝廷讨论。[①]领议政李最应等一批大臣要求严厉惩办。结果,二人都被发配远恶岛屿。其后,李晚孙也被捕,被减死发配远恶岛屿,"围篱安置"。一部分大臣仍然不依不饶,一定要将李晚孙等处死,国王不愿做得太过,否定了大臣们的意见。

关于黄遵宪《朝鲜策略》以及金宏集是否应该接受《策略》的争论,实际上是朝鲜开放与闭关的争论。其后,儒生们仍然一批批地到京城上书,朝廷中的两派也辩论不休。同年 8 月 30 日(闰七月初六日),儒生洪在鹤、申夔等上疏,对当时朝鲜人穿西装、用洋货的情况表示忧心忡忡,继而攻击将黄遵宪的《策略》"达之天陛,扬之朝班"的金宏集与领相李最应,牵连而及退休太师李裕元,要求在全国收缴洋货,将金、李等斩首示众。奏疏并严厉地指责国王:

> (殿下)漠然不悟,无他,由不事学问,故知不足以烛理,心不足以胜私,甘于宴安之毒,悦于谗佞之诱也。[②]

在儒生们的压力下,李裕元上疏,声称自己当初即认为《朝鲜策略》"挟杂不足取信",没有说过赞成的话。结果,大臣们又批评李裕元忙于自辩,对儒生们的上疏没有严正"声讨",态度暧昧。最后,洪在鹤被处死并被抄没家产,李裕元被"远窜"。

在日本的黄遵宪听到了李晚孙被处分的消息,并且读到了李晚孙等人的上书,他表现得异常宽容和通达。

---

① 《李朝实录・高宗》卷 18,190～197 页。

② 同上书,227～236 页。

宫岛诚一郎：曾闻李万〔晚〕孙为激昂之论，顷挥缚之，不知果真否？

黄遵宪：仆尝读李万〔晚〕孙论，既赏其文章，复叹其人，殊有忠爱之气，以为可惜在不达时变耳！前见韩人议论文，此仆劝韩廷拔用此人。自来倡锁港之论者，一变即为用夷之人。①

其实，黄遵宪不了解，有些人可以转变，而有些人是固守旧章，宁死也不肯改弦易辙的。

尾声

1891年（光绪十七年），黄遵宪自驻英参赞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作有《续怀人诗》，其一云：

绕朝赠策送君归，魏绛和戎众共疑。骂我倭奴兼汉贼，函关难闭一丸泥。

这里所说的“策”，即指《朝鲜策略》；所说的“君”，即指金宏集；“骂我倭奴兼汉贼”云云，即指李晚孙等人的上书。黄遵宪说得对：“函关难闭一丸泥”，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各国广泛交往的年代，闭关自守再也不可能了。

---

① 《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笔谈遗稿》，宫岛吉亮先生家藏。

附记：笔者在汉城期间，得到汉城大学金容德、闵斗基、吴金城、朴汉济、金浩东、梨花女子大学金稔子等教授以及姜明喜女士、车雄焕、崔熙在、罗弦珠、裴京汉、李升辉、金培喆、朴德俊等先生的热情接待，谨此致谢。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

多年前，承黄遵宪的曾孙敬昌先生赐寄黄遵宪与日本谈判时亲拟的《苏州通商场章程》复印件一份，上有黄遵宪亲笔修改文字。从该件追溯谈判经过，可以反映出《马关条约》签订后，黄遵宪为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艰难努力。兹为纪念黄遵宪逝世 100 周年，特为检出，略加考订，并阐述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章程文本

敬昌先生所赠文献全名为《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共五条：

一、中国允将苏州盘门外图中标明之地作为新开通商场。此通商场西界商务公司连界马路，北界运粮河河沿马路，东界水渌泾河沿马路，南界陆家桥小河，所画红色线以内作为日本人住居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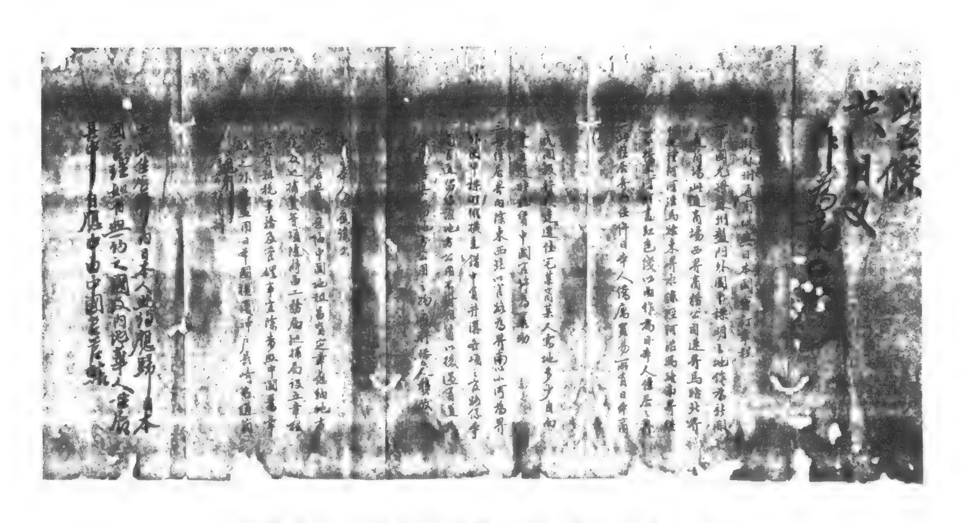
二、此住居界内，任许日本人侨寓贸易，所有日本商民开设行栈，建造住宅，某商某人需地多少，自向业主随时租赁，中国官场许为襄助。

三、此居住界内，除东西北以官路为界外，图中标明纵横交错中，有井沟各项之官路，系本国官道，留作该地方公用，不得租赁，以后遇有道路、桥渠一切地方公用之物，应行添□移改之处，日本人亦应让出。

四、此居住界内应纳中国地租，另有定章；应纳地方税及巡捕费等项，随时由工务局、巡捕局设立章程，所有租税事务及管理事宜，除查照

中国旧章酌定外，应兼用日本国横滨、神户、长崎各通商口岸现行章程商办。

五、此居住界内日本人，照约应归日本人管理，如有无约之国及内地华人居住其中，自应由中国官管辖。



黄遵宪所拟谈判章程第一案（黄敬昌先生赠）

以上第四条末句中的“现行”二字，为黄遵宪亲笔，第五条全款为黄遵宪亲笔。右侧有黄遵宪批注“此五条廿八日交，作为第一〈案〉”等字。原件已漫漶，个别字无法辨认。

据黄敬昌先生函告，此件原藏其姊夫张佳恩处，后归黄敬昌先生保存。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澎湖，赔偿军费二万万两以外，其第六条规定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黄遵宪被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专办苏州商埠谈判事宜。上述文献应是当时遗物。

广州、上海、宁波三种“租界”模式与张之洞、黄遵宪的选择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列强开放，设立通商口岸，有广州、上海与宁波三种模式。

广州模式的特点是由中国方面在通商口岸划出部分土地，交由洋人租用，华人不得杂居。在此区域内，列强有行政、司法、征税等权力，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系统之外，成为“国中之国”。上海模式除允许华人居住外，大致与广州相同。以上两种当时统称为“租界”。第三种是宁波模式。其特点是，虽仍划出部分土地由洋人租用，但各项权力均归中国自主，称为“通商场”。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日本派林董任驻华公使，其任务之一为商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指导日本领事在沙市、苏州等新开口岸建立租界，落实《马关条约》第六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日本侵略势力即将深入中国内地。为了尽量减少该款给中国“国家税厘，华民生计”带来的巨大冲击，同年六月，光绪皇帝命江苏、浙江、四川、湖北四省总督“预筹善策”。同月十六日，光绪皇帝谕令李鸿章、王文韶二人为议约全权大臣，研究“补救”办法。在与日方谈判时“先持定见”，“力与磋磨”。上谕称：“凡此次所许利益，皆不使溢出泰西各国章程之外，庶可保我利权。谅该大臣等已将应议各条，熟思审处。李鸿章为原定新约之人，尤当惩前毖后，力图补救。总期争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益。”[①]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16，18～19页。

同年七月初九日，张之洞向光绪皇帝提出十九条补救办法，要求在新增的通商口岸采取“宁波模式”。内称：“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资，雇募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该地方出资募人办理。中国官须力任诸事，必为妥办，不准日本人自设巡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①]八月二十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受张之洞的意见，通知各有关地区督抚：“日本将派上海领事往苏、杭、沙市等处选择租界，宜预为筹画，照宁波通商场章程最妥。”[②]九月初五日，张之洞又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明广州模式与宁波模式的差异。电称：“查租界洋文有二义，一曰宽塞甚，洋文作 concession，译其文义曰让与之地，乃全段由官租给，统归外国管辖之租界，华人不得杂居。如广东之沙面、汉口之英租界是也。一曰塞托门特，洋文作 settlement，译其文义曰居住之地，乃口岸之内，限定地界，准洋人自向民间租买地基建房居住，桥梁道路仍归中国管辖之租界。华洋可以杂居，官可自设公堂，拿犯断案，此则只可名为通商场，如宁波口岸是也。”[③]张之洞特别提出：“二者大有区别，中国统名之曰租界，易于相混。内地口岸必照宁波通商场办法，方能相安。”他表示，在日本人到苏州开议时，当命派出人员“与之磋磨”。此后，张之洞又调查日本向西方开放情况，说明日本在本国境内的“租界”，“凡土地乃系日本政府所辖，是以街市、道路并码

---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 117，7 页。

② 《致成都鹿制台、武昌谭制台、苏州赵抚台、杭州廖抚台》，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148，8～9 页。

③ 《致总署》，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148，11～12 页。

头，皆应归日本政府常行修理”[1]。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黄遵宪所拟《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采取的是宁波模式，并且参考了日本横滨、神户、长崎等地的“租界”经验。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日，黄遵宪致朱之榛(竹实)函云：

> 国势如此，空言何补！弟辈惟自尽人力，以冀少救时艰，毁誉得失，不必论也。去年奉旨垂询补救新约，弟有上香帅条陈十条，虽不免策士蹈空之习，然比之今之论时务者，犹觉卑近而易行。[2]

“去年”，指光绪二十一年；“奉旨询补救新约”，指上述光绪皇帝征求补救《马关条约》第六款的有关上谕。当时，因刘坤一在甲午战争中调往前线，指挥军队与日军作战，尚未回本任，所以两江总督一职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黄遵宪由于主持江宁洋务局，成为张之洞的下属。据黄遵宪此函，可知光绪皇帝有关上谕发布后，黄遵宪曾向张之洞提出十条补救意见。

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黄遵宪致梁鼎芬函云：

> 内地通商一事，昨上广雅尚书一函，详陈其利害，此事惟广雅能主持之，将来或在金陵会议。宪归自海外，碌碌无所短长，或藉此一端，少报知遇也。[3]

---

① 《致总署、苏州赵抚台、杭州廖抚台、武昌谭制台、成都鹿制台》，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50，16页。

② 《黄遵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③ 同上书，首都博物馆藏。

据此函可知，黄遵宪极为关心"内地通商"事务，除"十条"之外，还有一通致张之洞的长函。由于黄遵宪的"十条"尚未发现，其提出的确切时间也无法考定，因此难以厘清黄遵宪的"十条"和张之洞的"十九条"之间的先后关系。但从情理上推论，其过程应该是：光绪皇帝发出"补救"上谕后，张之洞向下属及幕僚征询意见，黄遵宪向张之洞提出"十条"，张之洞加以综合，向光绪皇帝提出"十九条"。正因为黄遵宪的"十条"深合张之洞之意，又积极关心此事，张后来才命黄遵宪主持苏州开埠交涉。

《马关条约》签字后，黄遵宪有过一段非常沉痛、郁闷的时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黄致王秉恩（雪澄）函云："时局日棘，有蹙国万里之势，无填海一木之人。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亦只好缄口已矣。"[①]黄遵宪向张之洞提出"十条"，说明他并未"缄口"，而是尽心尽智，力谋为国家效力。

黄遵宪主持谈判与六条新章的制订

中日苏州开埠交涉开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日方代表为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中方代表为苏松督粮道陆元鼎及罗嘉杰、杨枢、朱之榛、刘庆汾等人。

最初，日方要求将苏州阊门或胥门等繁华地区辟为租界，中方则坚持须在离城较远地区。几经交涉，不能定议。十月二十九日，中方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建议将租界设于盘门外，相王庙对岸，自华商公司

---

① 《黄遵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以东地带，但必须保留沿河十丈土地，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电杆、路灯、马路及船支纤路、小民负贩往来之用”[①]。十一月初二日，林董复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新改地段，如于商务极为便利，未必不可迁就，但沿河十丈土地必须划入租界，归日本管理。照会称，“沿河地方之于租界，犹室之有堂，堂之有门，船只往来焉，百货起落焉”。如中国扣除此项土地，将使日本商民“坐失舟楫之便”[②]，“不啻咫尺阶前不得自由”[③]。直到十二月初十日，林董才复照中方，表示该问题“暂且作为悬案”[④]。

租界的地段及沿河十丈土地的管理权解决了，更大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日本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日方坚持：“在新开港头开设日本租界一节，《马关条约》第六款载有明文，是素属帝国政府之当讨求之权，而贵政府毫无可有异议之权。”[⑤]这一问题事关租界的性质和国家主权，张之洞将解决这一难题的希望寄托在黄遵宪身上。

谈判伊始，张之洞就要求黄遵宪到苏州主持，不过，当时黄遵宪正因“教案问题”与法国驻上海领事谈判，无法分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十九日，黄遵宪致电张之洞云：

> 钧谕敬悉，应即往苏。惟教案业经开议，立告法领事，渠谓两国政府委办之事，未便开议即停。电询苏局，复称：倭领日内回沪。职道窃思邀索不允，停议亦事理之常，但求总署坚持，将来可再将宝带

---

① 《十一月初八日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见《江苏苏州日本租界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研院”近史所藏，台北，以下简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

② 《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

③ 《十一月十五日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

④ 《十二月初十日日本国公使林董照会》，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

⑤ 《照抄告知外部节略》，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

桥再续议，此事彼因而我应，似可坐以待之。如何办法，候示遵行。[①]

从电中可见，珍田以“回沪”相胁，谈判已陷入僵局，但黄遵宪不以为意，主张暂时停议，“坐以待之”。同月二十一日，黄遵宪再电张之洞，建议听任日本领事离开，“稍挫其气”。电云：

苏局函电言倭领即回沪，似不必挽留，听令回沪，稍挫其气，再告以黄道在沪，可以续议。如邀俯允，职即约杨道来，当禀承钧命，力任艰难。[②]

可见，黄遵宪身上完全没有当时官场中已经出现的媚外、惧外风气。

黄遵宪接受任务后，即深入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通商条约、各类租界和日本的外国人“居留地章程”。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黄遵宪和日本翻译官楢原长谈，对当时中国出现的几种租界模式分别作出评论。黄遵宪批评上海租界使外国人享有过分的治外法权，广州租界使外国人享有界内的统治之权。他表示倾向于宁波模式：建立“各国共同通商场”，华洋杂处，自由营业，清政府负责建造道路、桥梁，掌握警察权，管理街衢道路。黄遵宪要求楢原将上述意见转告珍田。[③]

张之洞十分重视关于苏州开埠的谈判。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张之洞致总署电云：“江、浙、鄂、蜀新开各口，若逐处派员辩论，必延时日。不如请其派日领事在沪，予以议定章程之权，由南洋派黄道遵宪

---

① 《黄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见《张之洞存各处来电》，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黄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见《张之洞存各处来电》，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③ 《黄遵宪氏ノ谈话》，见日本外务省档案，3－12－2－32－2。

与议,或在苏议,或在沪议。"[①]张之洞设想,十天即可定议,然后江、浙、鄂、蜀各口,一律照办。这样,黄遵宪的谈判成果就不仅关系苏州一地,而是关系到四个省区了。张之洞将这一任务交给黄遵宪,可见其托付之重。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示江苏巡抚赵舒翘,谈判中要尽力争取较宁波模式更为有利的条件。电称:"租界权归我管,宁波章程尚不足,应以内地通商非沿海、沿江之比,中国应善保自主之权,握定'内地'二字设措。"[②]赵舒翘当即电催黄遵宪先期到苏州商量。同月十七日,刘坤一回两江总督本任,按照张之洞的成议,委派黄遵宪主持对日谈判。

黄遵宪的谈判对手是到任不久的驻苏州一等领事荒川巳次。二月二十六日下午,谈判在日本驻苏州领事馆的邻地沧浪亭开始,至二月二十九日暂告段落。二十八日,黄遵宪提出上引《酌拟苏州通商场与日本国会订章程》作为"第一案"。谈判中的最大困难仍然是日方以《马关条约》为据,坚决要求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特别要求取得租界内的警察权和道路管理权,而黄遵宪则"终始抗辩",声称《马关条约》并无相关规定。[③]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其原因,一是中国是战败国,《马关条约》已签,黄遵宪无法改变总体上的外交劣势;一是谈判对手是战胜国,蛮悍狡猾。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江苏巡抚赵舒翘曾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诉苦说:"日人狡谲多变,早知其绝不能顺理成章,从速定议。然苏省首当其冲,使持议过于高坚,则必致决裂,贻朝廷忧;若塞责求其速了,

---

① 《致总署》(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50,32页。

② 《赵抚台来电》,见《张文襄公电稿甲编》第51册,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③ 荒川巳次:《苏州日本人居留用地指定济并に取极书案裁可す成度件具申》,机密第一号,见日本外务省档案,3-12-2-32-2;参见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见《人境庐集外诗辑》,128页,中华书局,1960。

则必致失体，招彼族侮，不得不与之浓淡相参，刚柔互用，始磋磨延至今日。”[1]弱国无外交。中方过于强硬，谈判必然破裂；过于软弱，又将损伤国体。黄遵宪在谈判桌前的困窘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谈判至三月初一日，黄遵宪照会荒川巳次，提出六条新章程：

一、清国允将苏州盘门外，西界商务公司地，东界水渌泾，北界运河沿官路，南界绵长泾，图中所画红色线以内，暂时拟作日本人可以居住之界。

二、此住界内，日本某商某人需地多少，可以随时向业主租赁，官为襄助。

三、此住居界内，图中标明中有井沟各项之道路，系公用之物，不得归一家租赁，亦无须居民输纳国税。

四、此界内道路、桥梁、沟渠、马头各项建筑之费，现由中国国家自办，将来商务日盛，岁修各费，再随时商立章程，向各居住户捐收。

五、此界内如有华人杂居其中，仍归中国官管辖。如日本商人日见繁盛，将来若经两国政府商定允许，由某处至某处，划作日本人专管之界，并将该管道路编入界内，此日本专管界内，即不许华人杂居其中。

六、此系暂时拟作可以居住之界，十年之内任听日本人随时租赁。如过十年后，即可任凭业主随便租给各华人及别国人居住。[2]

① 《致总署》，见《慎斋文集》。

② 黄遵宪:《致荒川巳次照会》，见《支那各地帝国专管居留地设定一件》，日本外务省档案，3-12-2-32-2。

丙號

大清奏派專辦蘇州商埠開辦事宜總辦蘇州洋務局二品銜分省補用道黃　為

照會事照得本道奉

欽差南洋通商大臣兩江總督部堂劉
兵部侍郎江蘇巡撫部院趙　會札飭令專辦蘇州

商埠開辦事宜業與

貴領事迭次商議彼此擬議辦法六條開列如左

一　清國允將蘇州盤門外西界商務公司地東界水流涇北界運河沿河官路南界綿長涇圖中所畫紅色綫以內暫時擬作日本人可以住居之界

二　此住居界內日本某商某人需地多少可以隨時向業主租賃官為襄助

三　此住居界內圖中標明中有開濬各項之道路係公用之物不得歸一家租賃亦無須居民輸納圖稅

四　此界內道路橋梁溝渠馬頭各項建築之費現由中國國家自辦將來商務日盛歲脩各費再隨時商立章程向住居各戶捐收

五　此界內如有華人雜居其中仍歸中國官管轄如日本商人日見繁盛將來若經兩國政府商定允許由某處至某處劃作日本人專管之界並將該管道路編入界內此日本專管界內即不許華人雜居其中

六　此係暫時擬作可以住居之界十年之內任聽日本人隨時租賃如過十年後即可任憑業主隨便租給各華人及別國人居住

以上六條已經兩國委員和衷商辦意見相同除呈報本國

大憲核定外相應備文照會即希

貴領事查照須至照會者

計移送地圖一張

右　照　會

大日本欽命駐劄蘇州兼理杭州通商事務一等領事官荒川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

黄遵宪致日本荒川领事的照会(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从表面看，它对日方要求似乎有所让步，但处处暗藏机关。黄遵宪提出的这"六条"，据黄遵楷称，其特点是：

> 日商需地几何，许其随时分赁，则专管之界，暗为取消；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而实则为公共之物；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人，实则还我业主之权；杂居华人，归我自管，则巡捕之权在我。道路公地，归我自筑，则工务局之权在我。凡所以暗破专界，撇开向章，补救《新约》（即《马关条约》——笔者）之所穷，挽回自主之权利者，无孔不钻，无微不至。[①]

由于日方始终坚持设立"专界"，由日本"专管"，黄遵宪不得不虚与委蛇，在第五条提出：将来如日本商人日见繁盛，经两国政府商定，可以划出"专管之界，并将该管道路编入界内"。黄遵宪意在将当时僵持不下的问题，推到"将来"再议。对此，黄遵楷分析说："其紧要关键，不过将事实变作虚辞，由现在推之他日；亦由负债者约退后期，别立新单，谓他日家业兴隆再行设法偿还云尔。"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智慧、策略和手段的斗争。黄遵宪身处弱国，因此特别讲究外交策略，提出和对手谈判时有所谓"挪展之法"、"渐摩之法"、"抵制之法"等等。他说："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词气终不愤激；词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黄遵宪与日本议订苏州开埠条款的过程，是他施展外交斗争策略和手段的具体表现。

---

① 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见《人境庐集外诗辑》，128 页。

张之洞的尖锐批评与黄遵宪退出谈判

六条章程初稿拟订后，黄遵宪即与日本领事荒川交换照会，同时向各方请示，征求意见。

黄遵宪对六条新章程很满意，自认为“此事必能办到，可为四省造福”①。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黄遵宪所拟章程给予了极高评价，评为“用意微妙，深合机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议约全权大臣王文韶评为“保我固有之权，不蹈各处租界之流弊”，“委曲从权，仍操纵在我”②。但是，此时已经回到湖广总督本任的张之洞却很不满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初六日，张之洞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江苏巡抚赵舒翘，肯定黄遵宪所拟章程“具见苦心力辩，先为其难”，但是，张之洞激烈批评其中的“道路公地，归为自筑”一条，认为此前上海租界的马路、捕房建筑费用，均采取“收捐”办法，无须中方出资，较黄遵宪的方案为优。对第五条，张之洞认为与中国方面历来的主张相背。他说：“历次所争，原欲除专管之弊，今许日后可以商令专管，各国亦必援例，是与原意大殊。且马路、沟渠已费大工巨款，尽付他人，似乎无此情理。”③对于章程中的第一、第三、第六条，张之洞也有批评意见。同日，张之洞又亲自致电黄遵宪，在说了一句“想见为难情形”之后，即批评他：“未禀请督抚详酌，遽换照会，未免急率。”④他从电文中

① 黄遵宪：《致王雪澄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② 转引自黄遵宪：《致梁鼎芬手札》(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首都博物馆藏。

③ 《致总署》，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51，8～9页。

④ 《致苏州黄道台公度》，见《张文襄公全集》卷151，9页。

得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批准黄遵宪所拟章程，在致赵舒翘和浙江巡抚廖寿丰的电文中特别表示："总署虽许可，或一时未及深思，大利害所关，似仍应力争也。"[①]为了挽救黄遵宪所拟章程的消极影响，张之洞建议赵舒翘，命曾经参加早期会谈的道台朱之榛继续参与，又命苏州刘庆汾在谈判中"按切时势，设法补救"[②]。四月初九日，张之洞致电赵舒翘，肯定刘庆汾在谈判中的作用，电称："刘守庆汾所议地价八条，均有裨益。所惜者黄道六条中'专管'一层，不知能否更正耳？"[③]

对于张之洞的批评，黄遵宪很委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致参加谈判的同僚朱之榛函云：

> 香帅来电，昨奉中丞抄示，于"允许将来"一节，极力翻腾，不知此系就现在推到将来，乃疑为弟所擅许。

对此，黄遵宪解释道："弟此议即系请示之稿，所以先换照会者，不能据口说为凭以请示。弟并非议约大臣，不得以往时约已签押设法补救比论，此亦不达外交之语也。"信中，黄遵宪尖锐地批评张之洞的办事风格"能发而不能收，计利而不计败"，"当其发虑，若事在必成，未几而化为乌有"。他强硬地提出，如张之洞"确有定见，应请其径电总署，以备参核"。他说："此议准驳之权在各大宪，一经驳斥，弟敢决彼国之必能允行。"[④]

刘坤一理解黄遵宪的用意，于三月十四日致函，既表示同情，又要他在进一步讨论"地价、地租"时，"设法弥缝"。函称：

---

① 《张文襄公电稿乙编》第 49 册，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致苏州刘守庆汾》，见《张文襄公全集》卷 150，6 页。

③ 《张文襄公电稿乙编》第 49 册，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④ 《致竹实先生函》，见《黄遵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大凡言易行难，动辄从旁指摘，安知当局磋磨！执事会议苏省埠务，何尝不知第五条将来准作专界，编入桥道，不无语病，顾无此松动之笔，恐其不就范围，幸是后文兼系活著，未始不可挽回补救。续接台示云："但期不至办到专界，便无大碍。"亦可见左右之用意矣。今香帅既不谓然，众论并多附和，仍仗鼎力，于续议地价地租时，设法弥缝，更为妥善。高明酌之。①

黄遵宪所拟六条章程未能满足日本设立"专界"的要求，提交荒川后，荒川表示，已超出本国训令之外，不能接受。黄遵宪则告以如日方坚持自立专界，则中国政府将严禁华人杂居，同时重索界内租价。荒川表示，将向政府报告，等候训令。

此后的一段时期，黄遵宪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他既为自己能不辱使命自豪，又为张之洞等人的不理解苦恼。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二日，黄遵宪致梁鼎芬函云：

议约大臣指为万做不到之事，方窃其不辱。而广雅尚书，不考本末，横生议论，殊为可惜。此事彼国尚未批准，允否实不可知，未敢遽将曲折宣告外人。②

此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批准了黄遵宪所拟章程，认为日本之后，西方国家必将跟进，"六条争回之利，藉后议证成；六条未尽之事，藉后议补救"③。五月四日，黄遵宪再致朱之榛函云：

---

① 《致黄公度观察》(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见《刘坤一遗集》第5册，2173页。

② 《黄遵宪手札》，首都博物馆藏。

③ 《致竹实先生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四日)，见《黄遵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苏州所议，总署复函已允照行，此刻惟有坐待……弟商办苏州开埠事宜，收回本国辖地之权，不蹈各处租界流弊，抚衷自问，至幸无负。然议成之后，条约具在，参观互勘，不难知其得失，而局外口说沸腾，尚不悉其用意所在。

不过，黄遵宪表示，在得到日本答复后，将自上海再到苏州，最终完成谈判。函称："弟于倭议，必始终其事，如月内得有复音，必拨冗前来，再聆雅教乎！"[1]过了几天，黄遵宪又得到小道消息，有一位四川的吴姓官员认为"苏州开埠，所议极善，请饬川督一律照行，已奉旨依议"[2]。这样，黄遵宪就更感欣慰了。

五月二十二日，黄遵宪、刘庆汾等连续在沧浪亭与荒川会谈。荒川面交日本外务省所拟《苏州租界章程》八条，要求"将界内一切行政归日本政府办理"，同时要求将"租界"向北扩张至运河。荒川并称：日方要求有《马关条约》作为依据。二十四日，双方继续会谈，黄遵宪等面交《备忘录》一份，声称《马关条约》"只许通商"，"遍查华文、日本文、英文，均无在苏州让给一地，准令日本管理之文"。《备忘录》强硬表示："外务所拟，实难照行。"对于日方所提将日本人居留地扩张到运河边的要求，黄遵宪等表示："亦难改议。"[3]

黄遵宪的六条章程顶住了日本在苏州设立"专界"的要求，日本政府自然不会同意。同年六月，日本政府将荒川巳次撤调回国，明确拒绝了黄遵宪的六条新章。七月三日，黄遵宪致陈宝箴函云：

---

① 《致王雪澄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七日)亦有同样表示。该函称："弟近办教案，易于就绪。惟苏州开埠，彼国尚无复音，得复后仍须往苏一行耳。"上海图书馆藏。

② 《致竹实先生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见《黄遵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③ 荒川巳次：《帝国居留地设置案清国委员卜商议不调ノ件具报》，见日本外务省档案，3-12-2-32-2。

惟苏州开埠一事，经与领事订定，缮换照会，而彼国政府尽行翻弃，横肆要求，不审何日乃得就范也？前议六条，施政之权在华官，管业之权在华民。夔帅称为保我固有之权，不蹈租界流弊。遵宪区区之愚，亦窃幸得保政权，而外间议者未悉其命意所在，反挑剔字句，横加口语，诚使国家受其利而一身被谤，亦复何害。何意彼族狡谲，坚执约中照向开口岸一体办结之言，虽欲依样葫芦，自划一界，归彼专管也。

函中充满了不被理解的痛苦和对日本谈判对手的愤郁。七月二十五日，黄遵宪再次致函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称："奔走半年，举呕尽心血之六条善章，彼族概行翻弃，实可痛惜。"黄遵宪绞尽心力，希望以巧妙办法争回国家部分主权，一旦被拒，自然极为痛心。

当时，除张之洞外，浙江巡抚廖寿丰也不以黄遵宪的六条新章为然，认为"日人狡展，毋受其欺。许以将来，即遗后患"①。有人甚至散布谣言，诬蔑黄遵宪接受日本人的贿赂，为日本人求方便。② 黄遵宪一度很灰心，说过很丧气的话，五月二十一日致朱之榛函云："时事实不可为，观于苏议，亦灰心短气，当摈弃万事，从事于空文耳。"但是，这不过是他一时的愤激之词，致陈宝箴函所称"诚使国家受其利而一身被谤，亦复何害"，才是黄遵宪思想感情的真实反映。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但战后却被清廷加以"办理殊未妥善"的罪名遣戍伊犁，登程时赋诗明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黄遵宪致陈宝箴函所言，和林诗精神完全一致。

黄遵宪的六条章程受到张之洞等人的严厉批评，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仍然希望黄遵宪能坚持重任，继续与日方谈判，指示他"一手经理，

---

① 《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见《人境庐集外诗辑》，129页。

② 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见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

力任其难”。不过，黄遵宪已觉事情难为，又正值王文韶要调黄遵宪去天津海关任职，黄遵宪遂萌去志。七月十四日致王雪澄函云：

> 弟所议苏州开埠六条，彼族全行翻弃，意谓前议并非照向开口岸章程办理，又非比各国优待，声明划一专界，归彼管辖。凡议中所有微妙之意，婉约之辞（总署云尔），直抉其阃奥而破其藩篱，总署仍有一手经理之电，然弟则何能为力矣。……半年以来，又苏又沪，奔走鲜暇，一事无成，苟使国家受其利，我受其咎，亦复何害，况议者第未悉其本末耳。参观互较，久亦论定，今则但托空言，此弟所为绕床而行抚肩长叹者也。

其间，黄遵宪曾去江宁拜见刘坤一，要求“销差”，刘坤一在多方挽留之后，觉得不便阻碍黄遵宪的前程，便要他去苏州，会见赵舒翘。赵舒翘也表示挽留，但黄遵宪去志已决。这一过程，刘坤一在七月十九日致赵舒翘函中曾说：

> 黄公度因闻北洋相需甚殷，将以津海关为之位置，故亟欲修谒。弟以该道既抱奢愿，默计此间无力相偿，朋友相与有成，不敢苦为维絷。

函中，刘坤一称，黄遵宪系“奏留”办理埠务人员，现在事尚未完，难以用“销差”名义同意其离职，要赵舒翘衡量，如可行，请巡抚衙门发给咨文。八月初三日，刘坤一再次致函赵舒翘，劝赵尊重黄遵宪的意见，“听其自审”[①]。刘坤一既一再发话，赵舒翘自然不能不准，但赵也因黄遵宪“经

① 《复赵展如》（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见《刘坤一遗集》第5册，2179～2180页。

手未完”,“不好措词”,不能发给黄遵宪咨文。最后,黄遵宪以“请假”代“销差”,离开了苏州。①

黄遵宪离苏之前,留函朱之榛称:“教案一概办结,商务事败垂成,甚以为怅,两省驰驱,半年奔走,而一事无成,惭无以对我知己。”②可见,他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八月十六日,黄遵宪抵达天津,向王文韶报到。

清廷妥协,日本全胜

日本政府拒绝黄遵宪所拟六条章程之后,继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九月初五日,林董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责清廷没有认真履行《马关条约》。林董称:“马关新约准新开苏、杭、沙市、重庆四口租界,应照向章办理,现中国自定行船章程,日本又不得专界专管及威海卫、山东驻兵之地,均与《马关条约》不符,商催逾年,各省迄不遵守。”初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电王文韶,饬调黄遵宪进京商量,黄遵宪定于十二日进京。③ 十一日,林董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措辞更为严厉,要求清政府“以明日正子时为定”④。在林董的压力下。奕䜣、奕劻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于九月十三日向光绪皇帝上奏称:

---

① 黄遵宪《致梁鼎芬函》(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六日)云:“前谒新宁,以苏州商务,总署有仍饬黄道一手经理,力任其难之电,故一再絷维。既知其不可,嘱往苏,苏亦同此意。然决计北行,遂变销差而为请假。”首都博物馆藏。

② 《黄遵宪手札》,上海图书馆藏。

③ 袁英光等整理:《王文韶日记》,966～967页,中华书局,1989。

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催行马关新约请互立文凭并商订制造税抵换利益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0,4页。

现各该口通商已久,别国本有租界,原难独拒日本,我虽全许,谅彼力亦尚不能同开。此次新约议定,日本武臣议士,以未得格外利益,颇多不满林董之词。林董来署,自言政府责其颟顸,撤调回国。刻当外部易人,意存反复,利害之间,不能不略权轻重,相应请旨,饬下南洋大臣、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山东、江苏、浙江各巡抚,遵照《马关条约》,饬属奉行,毋令启衅。[①]

奏上,光绪皇帝批示:“依议,钦此。”不久,清政府与林董议定,“照上海章程办理”[②]。

清政府既决定屈服,刘坤一等即不再坚持。十月二十九日,刘坤一、赵舒翘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苏埠事自日领珍田会议以来,多方要挟,办理较难。现正商办专界。”[③]光绪二十三年二月,清政府江苏当局与珍田舍己议定《苏州日本租界》十四条,决定在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一带树立“界石”,作为日本租界;界内桥梁道路以及巡捕之权,由日本领事官管理。[④] 这样,黄遵宪所精心设计的六条章程遂付之东流,而日方则得到完全的胜利。

2005 年 3 月,为纪念黄遵宪逝世 100 周年而作,同年 12 月校订于台北。原载《学术研究》2006 年第 1 期,2007 年 3 月据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的新资料,略加增补修订。

---

①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日本催行马关新约请互立文凭并商订制造税抵换利益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50,4 页。

② 《三月二十二日南洋大臣刘坤一等文》,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

③ 《两江总督刘坤一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到),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50,9 页。

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

慈禧太后其人

慈禧发迹

慈禧太后曾经统治中国四十七年，她虽然名义上只是太后，但是实际上的女皇帝。关于这个人，大家可能在电视、电影里经常见到有关她的节目，我在这里讲的是历史上真实的慈禧太后。电视、电影里的有些情节是艺术创作，并不可靠。我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可靠的、真实的西太后。

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慈禧太后的身世。慈禧（1835—1908）为满族那拉氏，即她的姓是叶赫那拉氏。叶赫是满语，是个地名，也是一个部族的名称，这个地方就在今天东北吉林省的梨树县。那拉氏，用汉语来翻译，就是太阳的意思。叶赫那拉氏的意思是说叶赫这个家族是这个地方的太阳。叶赫的祖上，曾经跟清朝的祖上努尔哈赤打过仗，最后被努尔哈赤消灭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后来叶赫这个家族成为满洲贵族的八大家族之一。在整个清朝统治中国的二百多年里，叶赫这个家族始终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慈禧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乳名，叫兰儿。她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前五年，大家知道，鸦片战争发生在道光二十年（1840 年），那么慈禧太后呢，出生在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 年 11 月 29 日）。慈禧太后的出生地有安徽芜湖、内蒙古呼和浩特、甘肃兰州、浙江乍浦、山西长治等

多种说法。其中长治说近年来炒得很热闹，故事本身很有传奇性，说是慈禧原是长治县汉族农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因家贫被辗转卖到当时潞安知府惠徵的家里当丫头，后来被收为养女，云云。其实，以上各说都有明显破绽，并不可信。根据档案资料记载，慈禧的出生地是北京，家可能就在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父亲惠徵自道光八年（1828 年）入仕到咸丰三年（1853 年）去世，始终地位不高。开始时在吏部当“笔帖式”，做的是起草文稿和抄抄写写的工作，属于小职员，后来才做到“道员”，成为省以下，州、府以上的地方行政官员。她的母亲是出身于封疆大吏家庭的名门闺秀。这个兰儿呢，是在咸丰二年（1852 年）作为秀女被选到清宫里边，当时的身份叫兰贵人。现代人可能不知道兰贵人这个身份有多高，在清朝的皇宫里，皇帝的后妃一共是七等：第一等是“皇后”，第二等是“皇贵妃”，第三等是“妃”，第四等是“嫔”，第五等是“贵人”，第六等是“常在”，第七等是“答应”。西太后进宫的时候，属于第五等。

兰儿虽然说身份不高，但是自身条件不错。第一，她长得很漂亮；第二，她很聪明；第三，她会写字。此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兰儿给咸丰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儿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有一句话，叫“母以子贵”，就是说，母亲的地位是根据她的孩子来决定的。兰儿既然给皇帝生了一个男孩，而且又是皇帝唯一的男孩，自然，兰儿的身份就迅速升高了。在短短的五年里，兰儿从原来的第五等升到了第二等，被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 年）八月，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懿贵妃”的儿子、六岁的载淳即位，这就是同治皇帝。新皇帝封咸丰皇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皇太后，转天又封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按次序，慈禧位在慈安之下，但是由于慈安比较忠厚、老实，不太愿意管事，因此慈禧就实际上成为第一位的人物。

政变行家

一提起慈禧太后,我们就很容易想起慈禧太后是个投降派、卖国贼。我们大家记忆里知道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几项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慈禧太后当权时候订下来的,比如说最有名的《马关条约》,然后是《辛丑条约》。这两项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卖国的条约,都是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条约,因此我们很自然会想起慈禧太后是卖国贼。但是,慈禧太后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咸丰十年(1860 年),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二十年,英法联军从天津外面的大沽口登陆,然后打到通州,打到北京。他们一把火把圆明园烧掉了,这次事件在近代史上叫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据可靠的历史记载,那时,慈禧太后是反对清朝跟英法两个侵略者谈和的。当时朝廷分成两派,一派主张跟英国和法国谈判讲和,另外一派主张要跟英法两个侵略者继续打下去。"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反对跟英国和法国谈判,反对讲和,认为讲和是耻辱。另外,由于英法联军打到通州,离北京不远了,咸丰皇帝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只能跑,跑到哪儿去?就跑到热河行宫,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避暑山庄。就在皇帝要逃,要离开北京,离开紫禁城,躲到热河的避暑山庄的时候,慈禧出来劝阻皇帝,要皇帝不要离开北京。她说:如果皇帝留在北京,形势就可以镇得住;如果皇帝跑了,形势就乱了,皇室宗庙就有可能受到洋人的践踏。所以,从这两件事情来看,慈禧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投降派、卖国贼,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打到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主张抵抗的。

当年八月，咸丰皇帝逃到热河之前，命他的六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和英法侵略者议和。途中，又任命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为留京办事王大臣。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奕䜣为首的留京官僚集团。咸丰皇帝还带走了部分王大臣，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这一部分人逐渐形成热河行宫官僚集团。同年九月，奕䜣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英法两国的侵略军退出北京，不再打仗了，于是，咸丰皇帝就表示要回北京，当时称为“回銮”。奕䜣等留京官僚集团支持皇帝“回銮”，而热河行宫官僚集团则以种种理由反对，他们希望皇帝继续留在行宫，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当时，咸丰皇帝已经自感病重，即将不起。他虽然宠幸这个给他生下太子的“懿贵妃”，但是，又担心她揽权，危害皇室统治，曾经想杀母留子。对此，肃顺赞成。这样，“懿贵妃”与肃顺之间就种下很深的仇隙。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七月，皇帝去世，遗命肃顺等八位大臣辅佐幼主，当时称为“顾命大臣”，同时给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否决权。皇后和“懿贵妃”被尊为皇太后(慈安、慈禧)。从此，两宫皇太后与八大臣之间开始了权力之争。肃顺等主张：臣下阐发主张的奏折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览；皇帝的谕旨由八大臣拟定，皇太后只管盖印。自然，慈禧是不甘心的。结果是：二十六岁的慈禧太后，在二十五岁的慈安太后的密切配合下，得到三十岁的奕䜣的支持，成功地发动了政变。

奕䜣没有被列入顾命大臣，自然不高兴，于是慈禧即和奕䜣联系，密召奕䜣赶赴热河，确定在护送咸丰皇帝的棺材回京时发动政变，同时，在北京的官僚则声称肃顺等图谋不轨，要求皇太后权理朝政。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到京。第二天，立即宣布载垣、端华、肃顺三位“顾命大臣”的罪状，加以逮捕。载垣、端华自缢，肃顺被斩。于是，六岁的小皇帝即位，年号“同治”，由两宫垂帘听政，以奕䜣为议政

王。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对中国的统治。这次政变，由于发生在中国农历辛酉年，所以称为"辛酉政变"。

慈禧垂帘听政后，为了进一步掌握国家权力，对奕䜣打打拉拉，又打又拉。在打了一顿之后，仍任命为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奕䜣就不敢不听慈禧的话了。同时，她又重用汉族地主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将清朝统治从垂垂欲坠的困境中挽救出来，形成所谓"同治中兴"。

支持洋务运动

讲到这里，大家发现，慈禧太后这个人，是阴谋家，善于搞宫廷政变，善于夺取权力，那么她一辈子有没有做过几件好事呢？做过。她做过什么好事呢？就是她支持洋务运动，特别是支持奕䜣提议设立的天文算学馆。

算学就是数学。研究天文、研究数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普通而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要让中国人来学天文，学数学，并且还不是让小孩来学，而是让清朝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翰林院的人，让五品以上的官员来学，这可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因此，就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这一情况下，慈禧太后站出来，以皇帝的名义，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下发了十道谕旨。讲什么呢？说：天文和算学是读书人、儒者所当知，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种技巧，而且说，这件事情不能再犹豫了，投考人员要认真考试，送到馆里来学习。正是由于有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天文算学馆才开馆了，一批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批中国的官吏被送到同文馆，去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教育。这是当时的

“先进文化”，学习这种“先进文化”，对中国是有益的。

洋务运动又叫自强运动，以富国强兵为号召。多年以来，我们对洋务运动采取批判态度，认为其目的在于实现军事现代化，对内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对外是投降帝国主义的，今天看来，过去的这些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不错，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发展军火工业，建立兵工厂，建立轮船制造厂，当然有军事现代化的目的，但是，军事现代化会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会推动中国各方面的进步。军事工业发展起来了，会推动其他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洋务运动发展的结果是，民用工业发展起来了，新式学堂建立了，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了自己的留学生。所以，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是有推进作用的，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西太后支持开办天文算学馆，支持洋务运动，是做了一件好事情。

镇压戊戌变法

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皇帝，就在进入第十四年(1875年)后不久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代。由慈禧太后主持，将另外一个皇族，名叫载湉的孩子过继给咸丰皇帝，继承帝位。载湉当皇帝的时候，只有四岁，年号光绪。慈禧太后选择这么一个孩子当皇帝，当然是为了继续垂帘听政，掌控国家最高权力。但是，光绪皇帝长大后，慈禧太后就要“归政”，把国家最高权力交还给皇帝，慈禧太后不情愿，这就有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光绪皇帝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急于改变清朝政府受洋人欺负的局面，他要搞改革，这就引发了历史上很有名的戊戌变法，这里我要讲的主要是西太后对戊戌变法是什么态度。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西交往，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或留学、或

考察,发现了"洋鬼子"的长处不仅仅在科学、技术上,而且在文化教育及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许多优点,因此主张部分地学西方,这一部分人我们称之为改良派。早期的改良主义人物有冯桂芬、容闳等,但是,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现实的政治领域,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处在改良主义的萌芽状态。光绪二十年(1894 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地大人多的堂堂中国败在地小人少的岛国日本手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普天忠愤",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人必须奋发图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还经不起日本人的一击? 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仅仅学西方的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还不够,学船坚炮利也不够,还应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个改变,在保存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弃旧图新。这一部分人逐渐形成了派别,有了规模,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历史上称为维新派,或者称为改良派。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后来读到了一些由中国人编写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对西方有所了解。他家居广东南海县,后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不能一概看成"夷狄",从此立志讲求西学。他不仅阅读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编写的《万国公报》等新书,而且还自己编写了《康子内外篇》,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他开始运用生吞活剥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解说人类社会,认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写作《大同书》的草案。他还吸收西汉儒学中今文经学派的思想,将他所接受的西学披上中国传统儒学的外衣,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是维新派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办刊、办

报，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第三位是谭嗣同，他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激进思想比维新派中的任何人都高出一筹。第四位是严复，他是跨出国门的英国留学生，对西方的了解最全面、最深刻。他的最大功绩是翻译了《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说：中国弄不好，有一天我们会被开除出地球。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君主立宪”，像西方一样，在中国建立上下议院（国会）。但是，他们担心这一主张在当时的中国难以为人接受，因此在“百日维新”之前，他们就将这一主张改为开“制度局”，由部分维新人士讨论、研究、决定变法的各种问题，后来又退到开“懋勤殿”（在紫禁城内，康乾时代皇帝与内阁大学士等议论政事的地方），由皇帝、维新人士和部分官僚讨论、决定各项改革制度。由于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建议不仅包括军事、经济，而且也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因此，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完整的改革运动。

政变的导火线是“礼部六堂官事件”。当时礼部有一位官员，名叫王照，他写了一道奏章，建议皇帝与慈禧太后这二位“最高领导”一起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之间的团结；二则开开眼界。当时的礼部堂官（正副部长）不同意向上转达这道奏章，指责王照心怀叵测，相互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皇帝知道后，认为礼部堂官阻挠新政，大为生气。为了“立威”，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人，光绪皇帝就决定把礼部的六位堂官全部罢免。这六位堂官，其中有一个叫怀塔布，官居尚书，是礼部的最高长官。他老婆是通天的，就把此事告到慈禧太后那里。与此同时，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隶总督荣禄面谋，共同阻止变法。过去，大臣的晋升和罢免这一类事件都是由慈禧太后决定的。这一次，光绪皇帝事前没有请示，擅自做主，慈禧太后认为是侵犯了自己的权力。是可忍，孰不可忍！

荣禄手握北洋兵权，维新派担心荣禄先动手，便设计了武力夺权的

计划。康有为等是一群书生，要夺权，自然要靠军队。当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同情变法，于是，康有为便派谭嗣同出面，夜访正在北京的袁世凯，建议他先夺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然后请湖南来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西太后抓起来，杀掉，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过去，史学界都不相信这个说法，1985 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了有关档案，看到了毕永年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但是，就在维新派密谋之际，日本的退休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伊藤曾经协助明治天皇进行维新，使日本很快变为世界强国，光绪皇帝准备召见伊藤，还有人建议聘请伊藤为顾问，指导中国的维新变法。当时有一位御史叫杨崇伊，他密奏慈禧太后，攻击康有为等“变更成法，斥逐老臣”，“位置党羽”，并且危言耸听地说，伊藤博文很快就要进京，“将专政柄”，就是说要掌握中国的政治大权。慈禧太后感到，这将进一步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迅速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下令逮捕康有为。同时，袁世凯也在天津向荣禄告密，将谭嗣同夜访所言，通通报告荣禄。结果，慈禧太后又匆匆下令，逮捕谭嗣同等，将打击面扩大了。

西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的。维新之始，光绪皇帝曾经颁布过一个诏书，名叫《明定国是诏》。光绪皇帝企图通过这份诏书，将变法、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之前，是请示过慈禧太后的，慈禧太后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表现得相当激进，慈禧太后讲了什么呢？核心是六个字，说“今宜专讲西学”，意思是说，皇帝你不是要变法嘛，很好啊！“今宜专讲西学”呀。这不是很彻底、很进步嘛！进步到连光绪皇帝的老师——变法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翁同龢都觉得过头了。光绪皇帝自己是不会去起草文件的，光绪皇帝把起草这个变法文件的任务，交给了他的老师翁同龢，而且把慈禧太后的思想“今宜专讲西学”告诉了翁同龢，翁同龢改动了一下，叫

做“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什么意思？就是说，翁同龢在西太后意见的基础上，做了一点折中，一点调和。他说，我们首先要把中国古代圣人的学问作为国家的基础，同时呢，把西方学问里对我们有用的那部分东西学过来。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说，西太后她是赞成变法的，而且是主张学西方的，有些变法的内容西太后是支持的。例如，当时维新派主张要废八股文，顽固派就坚决表示八股文不能废，双方在皇帝面前发生争论，争论得很厉害。怎么办？请示老佛爷。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跑到颐和园向老佛爷请示，你们想，老佛爷是什么意见啊？老佛爷说八股文应该废！由于老佛爷都表示八股文应该废，所以维新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废八股文。可见，慈禧太后在一开始对变法是允许的，在某些问题上是支持的。但是，西太后的变法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不能超越的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就是不能损害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不能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步子不能走得太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维新派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恰恰和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以及满洲贵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正是在这个情况下，西太后决心镇压，把谭嗣同他们六君子送到菜市口杀了，把维新变法全部否定了。

《辛丑条约》与“新政”

在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时，英国和日本出面保护了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且关心光绪皇帝的状况。此后，慈禧太后就想废掉光绪皇帝。第一步是宣布光绪皇帝病重，命令朝廷的内外官僚保荐“精通医理之人”给皇帝看病。第二步是“捏造”并公布光绪皇帝的病

案和药方,传示各衙门及各国使馆。第三步是选中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皇长子),继承同治皇帝,准备随时替换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此举受到部分大臣、江南绅商,特别是各国驻华使节的反对。册封"大阿哥"的仪式各国公使无一参加。最终迫使慈禧太后放弃这一打算。因此,慈禧太后非常仇恨洋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华北地区发生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慈禧太后觉得义和团可以利用,便下令向八个国家宣战,进攻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写得非常慷慨激昂,里面有这样的话:"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又说,中国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什么意思?西太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者,说我们今天受洋鬼子欺负,与其马马虎虎地活着,还不如跟洋鬼子拼一拼,看看谁打得过谁?中国就土地来说,有二十多个省。就人口来说,有四百多兆,要打败洋鬼子有什么难的?这样,西太后就下令向八个国家宣战了。西太后这个做法是愚蠢的,你想,腐朽的清王朝它怎么可能是八个列强的对手呢?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怎么可能跟洋人的洋枪洋炮相抗?我想,当时的义和团它一定有一套办法,表面上看,刀枪不入,用刀砍,砍不进,用枪刺,刺不进,慈禧太后一看,信以为真,说行啊,咱们打吧!这一打,八个国家打到北京,西太后从北京匆匆忙忙带着光绪皇帝出逃。临行之前,还不忘处置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命太监崔玉贵将她扔到井里淹死。这一次战争的结果,是订立了一个《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最重要的部分是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个四亿五千万两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中国是四亿五千万人,就是每一个人要赔一两银子。第二点,就是拆毁大沽炮台,允许外国的军队驻扎在北京和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十二处地方,这就是要清政府敞开国门,让帝国主义者的军队驻扎在清朝中央政府的身边。

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促西逃,一直逃到西安。

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可能不对慈禧太后的思想产生影响。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就在西安用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要继续变法。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用屠刀镇压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领导的改革运动,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又不得不宣布要进行变法。这个变法我们在历史上称为"新政",就是新的政治,它的内容大概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编练新军,第二是废科举、兴学堂,第三是奖励实业,第四是宣布预备立宪,第五是进行法制改革。这些都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也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改革。她跨出的步子,有些地方比戊戌时期还大。但是,慈禧太后进行改革,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慈禧太后幻想,经过她的改革,满洲贵族就可以千年、万年地统治下去了,因此,新政改革并不彻底,对于"立宪",即使是"君主立宪",慈禧太后也顾虑重重,因此,她所同意的只是"预备立宪",做做准备而已。

光绪皇帝之死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去世。关于光绪皇帝之死,康有为等迅速判断是被毒死的。有一种说法,袁世凯曾经想用三万金作为代价,贿赂御医力钧,要他下毒,力钧吓得辞去御医职务。此外,还有过慈禧太后下毒或太监李莲英下毒等几种说法。不过,前些年,有人研究了光绪皇帝的医案,认为光绪确系因病死亡。此说似乎已成定案。但是,根据近年启功先生的回忆,他的曾祖父曾亲见光绪皇帝是在喝了"老佛爷"赏的一碗酸奶之后死去的。这就说明,这一事件还有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余地。启功先生说: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儿哪儿都是,情景非常狼狈。

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

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才死,也许早就死了,只是密不发丧,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而那位太医院正堂姓张,后来我们家人有病还常请他来看,我们管他叫张大人。

启功先生的说法来源于他的曾祖父礼部尚书溥良。作为当时情况的目击者,其说有一定价值。启功回忆中提到的太医院正堂“张大人”,名叫张仲元。据传,他在民国时期曾对人说:据他所知,光绪之死,确系由于中毒,指授之人,即系慈禧。因此,光绪皇帝之死可能和慈禧太后命人

下毒有关。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不是确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妨再介绍一些材料给大家参考。

有一位给光绪皇帝看过病的大夫叫屈桂庭，他回忆说：他给皇帝看过一个多月病，药力有效，但是到十月十八日，皇帝却突然肚子疼起来，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这位大夫认为这一症状和皇帝此前所生之病“绝少关系”，觉得很奇怪。是啊，是很奇怪。现在我们可以想：光绪皇帝突然“肚子痛”和慈禧太后赏赐的这碗“塌喇”有什么关系吗？

根据文献记载，启功先生的曾祖父十月十六日才从东陵回京，他看到慈禧太后赏“塌喇”应该就在这以后，和屈桂庭回忆的皇帝“肚子痛”的时间大致相合。然而，还令人奇怪的是，十八日当天给光绪皇帝看病的医生们留下的病案却没有任何皇帝“肚子疼”的记载，只有咳嗽、气逆、作喘、胸膈堵截、大便躁急、腿软、寒热麻痹、耳鸣头昏等。这种情况令人怀疑，医生们当时留下的病案有无可能仍然是“奉命之作”呢？

光绪皇帝自幼体弱是事实，长年多病也是事实，但是，正如启功的曾祖父所说：“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据内务府司员增德、增麟等写给他们的哥哥增崇的信说：“皇上无病，所进的药也不吃。”又称：“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无非虚不受补之意。”至于病案上罗列的种种症状，“系由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虽然煎药，未必全吃了，故此一时不能见效”。力钧于 1906 年 5 月入宫，为慈禧太后看病，疗效甚佳。从 1907 年 8 月 28 日起至同年 11 月 6 日期间，又为光绪皇帝单独看病。他的诊断是皇帝“肝气不舒，胃气不健”，要皇帝喝牛肉汁、鸡汁，饮葡萄酒，实行“饮食疗法”。慈禧太后听说力钧在为光绪皇帝看病后大怒，狠狠地骂道：力钧为何还不死？吓得力钧赶快装病，用鸡血滴在唾壶里，假称咳血，逃离宫廷。可见，慈禧太后并不希望光绪皇帝病愈。

光绪皇帝去世前的这一个月，从十月一日到十六日，皇帝一直坚持每天去仪鸾殿向慈禧太后问安，陪她吃晚饭，其间，光绪皇帝还曾接见日本使臣和西藏的达赖喇嘛，都不像有大病的样子。据为光绪皇帝写《起居注》的一位官员回忆：十月十日是慈禧太后生日，光绪皇帝自南海步行，入德昌门，正在活动筋骨，准备向慈禧跪拜，但是，慈禧却传旨，皇帝卧病在床，免拜。皇帝听后"大恸"，很伤心。这时，慈禧太后已经得了痢疾，接连几天拉肚子。她得到情报，光绪皇帝面有"喜色"，这使她非常恼怒，发狠说："我不能先尔死。"这以后，就发生赐"塌喇"和光绪皇帝"肚子痛得了不得"的情况。十九日，宫中突然增加禁卫，太监们纷纷出东华门理发，扬言"驾崩矣"。二十日，慈禧太后下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二十一日，正式宣布光绪皇帝去世。此时，光绪皇帝刚刚38岁。

光绪皇帝去世后，溥仪只有三岁，慈禧太后让一个三岁的小孩当皇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她为什么这么做？无非是想故技重演，想继续垂帘听政，继续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让溥仪的父亲载沣做监国摄政王，她命令说，"以后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就是说，"要按照既定方针办"。尽管光绪皇帝死了，你载沣当上监国摄政王了，但是所有的军政大事，都要按照我的训示、我的意思来做。慈禧太后这时病得也不轻。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西太后也仍然紧紧地抓住权力不放。她显然不会想到，隔了一天，她自己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盖棺论定

西太后是一个什么人？我想，如果简单而言，慈禧她是个权力迷。

她一生善于抓权、夺权、集权，是一个善于搞宫廷政变的专家。在她统治中国的四十七年里，她有三大罪过：第一大罪过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第二大罪过是镇压了戊戌变法，将谭嗣同等几个爱国的改革家，送上了断头台；她的第三个罪过，是在她当权期间，订立了两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是《马关条约》，一个是《辛丑条约》。这三大罪过，就让慈禧太后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同时她也做过某些好事，主要有两件，一件是支持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洋务运动，另外一件是实行了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新政”。这是慈禧太后一生做过的两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有益的好事。

宋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有两句词，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意思是说江水浩浩荡荡，向东奔向大海，那是青山都挡不住的。慈禧太后想为清王朝建立万年基业，建立永久的统治，虽然进行了某些改革，但是她的改革不到位，其目的仍然是集权于满洲贵族，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所以，在慈禧太后死后第三年，就爆发了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专制统治。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们研究了慈禧太后的一生以后应该得出的结论。

2004年11月12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演讲，2005年10月据马燕整理稿修改。

没有不可变的“祖宗之法”

——戊戌维新运动一百周年感言

中国古代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农业社会，所以除“敬天”之外，又提倡“法祖”。凡祖宗，都是神，祖宗之法，都是“良法”、“美法”，无论如何都动不得，变不得。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冬，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提出“大集群臣而谋变政”等主张。皇帝本来想当面和康有为谈谈，但格于“四品以下不得召见”的“祖宗之法”，只好命王大臣代为问询。次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到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花厅接受召见。代替皇帝出面的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五人。本来，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二人也是应该参加的，但他们就是不肯出席。康有为到后，初时还算客气，“待以宾礼”。接着讨论“变法之宜”，荣禄劈头一句就给康来了个下马威：“祖宗之法不能变！”

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垂帘训政，行礼如仪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审讯光绪皇帝。她疾言厉色地责问说：

>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
> 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

慈禧太后的话，反反复复，说了几遍，但核心还是荣禄的那句话："祖宗之法不能变。"

查阅史籍，戊戌时期其他顽固派、半顽固派反对变法的理论武器也无非此语。它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在所有要求改革的志士仁人头上。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要求变法，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当时，他竭力争辩的主题就是"祖宗之法"可变。此后，他二上书、三上书，直至光绪二十四年第七次上书，十年间，每次上书的内容虽有侧重，但都要论证同一个主题。

祖宗之法不可变吗？康有为在接受荣禄等人召见时回答得好："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在荣禄的汹汹气势面前，康有为一点儿也不怯场，回答得很勇敢，也很有力。

祖宗之法，有好有坏。那坏的，自当革除；那好的，也当斟酌情况，决定弃取。遥想当年，康、乾之世，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统一、繁荣的大帝国，那时的法，一定有相当好的部分。但是，正如龚自珍所言，"一祖之法无不敝"。再好的法，在岁月的迁移中也会或衰败，或过时，不能再用。到了戊戌时期，中国人已经被洋人打败过好几次，不仅败于西洋，而且败于崛起不久的东洋，赔款之外，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可以说，真是丢尽了脸面。丧权辱国，孰此为甚！一切的一切，都足证"祖宗之法"已不能保障"祖宗之地"，必须"变法图强"了。然而，荣禄和慈禧太后等人却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

祖宗之法，不仅有好有坏，有适用于当世者，有不适用于当世者，而且更重要的是，祖宗见闻、经历有限，不可能十分清晰地预见后来的事

情，因而他们制定的“法”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解决后来的各种问题。例如，康、乾之世，和中国来往的“夷人”还不多，还没有设立外交机关的必要，但是到了道、咸、同、光，进入“海通”时代，不设外交机关行吗？所以还是康有为说得好：“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这一问，问得荣禄等人哑口无言。

在和荣禄辩论时，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原则：“因时制宜”。这实在是一个极为正确、必要的原则。任何“法”，都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目的在于解决当时当地的问题。历史发展了，环境变化了，“法”就要相应变化。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英明的政治集团，绝不能“执古方以药今病”，抱住“祖宗之法”不变，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选择适宜于当时当地的制度。中国有两句古话说得非常好：一句叫“实事求是”，一句叫“因时制宜”；一句是唯物论，一句是辩证法。

荣禄和慈禧太后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并不惜动用屠刀镇压变法派，但是，他们并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戊戌政变后不到两年就是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急匆匆携着光绪皇帝逃难。大概是风尘仆仆中受到了点教育，到西安之后，慈禧太后就发表诏书，声称“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云云。不过，诏书又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不易者三纲五常”，还是不肯彻底抛掉“祖宗之法”。于是就应了康有为的话：“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孙中山起而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推翻了清朝统治。

所以，从历史的某一段来说，顽固派可以得意于一时，而就历史的长河来说，胜利终将属于改革者。

原载《百年潮》，1998 年第 5 期

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梁启超与友人往来函札多通，一向为研究近代史者所珍视，但是，该书所辑梁札仍然多所遗漏，有广事收罗增补的必要。我曾见过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抄件一通，为《长编》所未收，诸种研究梁启超的著作也均未提及。函云：

读七月廿九书，具悉一是。大军以八月十八日失利于平壤，全军尽歼，丰伸泰、左宝贵死之，叶、聂诸人不知何往。二十日又在营口丧战舰五只，出我不意，彼水师曾不一毫用力也。平壤军心之溃、器械之缺、饷道之断、敌焰之雄，前于慧广带归一信已略言之。今之覆没，实意中事矣。

重白呈请自募湘军，其折甚可观，然上必不能用也。重伯亦非真办事才，只成一篇好文字而已。想数日间倭人陆兵必达东三省，陪京之亡，在于瞬息，水师亦且捣大沽矣。此间人民咸有愁惨之色。嗟乎！城阙烟尘，乡关风鹤，百感交会，一事无成，奈何奈何！

慧儒极称孙，某固亦疑之，曼宣亦谓其人不足言也。此皆由未尝见人，动为所慑，其在此间亦然，凡时流与之相见者，皆退而轻薄之。盖慧儒有时太自尊大，然所见实皆未莹，故每发论，动遭揶揄，此其所蔽。弟子辈欲规之，然彼甚自张而好上人，故无从进言，望长者之有以裁之也。

来谕又言，兵事虽殷，讲和亦速，十年内尽可从容。某则虑其不然。日本之来，与他国异。彼亦当岌岌之势，出死力以争此土。度其势更非英、法圆明园可比。且狡焉思启，何国蔑有？英、法忌俄实甚，若联为掎角，鼎足而立之，即谓事在旦夕可也。即外患稍缓，会匪能勿动乎！自此以往，无宁岁必矣！

某以为行道亦不在治乱。与乱世之人言，其一切富贵利欲之心早已打断，则下手洁净田地功夫可以不劳而成，人人打入自己安身立命处一想，茫茫四海，舍此罔归，则从之者亦众矣。弟子每日作如是思惟，某与长者，不知尚能相见否？但求坚定此心，令虽历千劫，皆能自立，此区区之意耳！

礼吉病复加重，益增远念。病情若何，望告。局事如此，某人言也，当以告之。来言者，事虽无大小之异，然犹恐因小失大，亦复无谓。即如办同人之事，而戕通父之生，其得失轻重当可见，又况更有甚于此者乎！虽乐天知命，正不必尔也。

某以为天地所恃以立者，固在于仁之一字，然爱质太多，不加割舍，则于事必多窒碍。某自验，颇以此为累，亟欲破除之，苦不能也。墨氏之道美矣，而不可行，欲行事者，非老学无由也。长者其许之乎？

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同学咸言进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即驳奏，觅人亦不易易，非肝胆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为力！且政府向无交情，曲折更数人乃始达之，未有能尽心者也。顷欲俟杨副宪出关商之，惟太迟耳！原奏语甚辣，若有人从而媒蘖，亦可招大祸，故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黄昏时候，纵为无道，亦只若嬴秦之于六艺耳，何足芥蒂，但在粤稍窒耳！其实已经此事，此后若有来游者，必皆命世之才也，所缺者亦不过风流沾被之人，多寡不关轻重，听之而已。

某决意欲移家就陕。某不自行,仍在此与孺博作伴。第究能如愿与否,尚未可知。此间事,林、麦二事〔君〕想述甚悉。不一一,敬请夫子大人道安!

弟子

名心叩

八月廿四日

季直来云:常熟已允周旋一切,惟日来军务倥偬,常熟又病剧,已请假十日矣,恐未必能十分尽力也(季直亦往三次,始见之)。顷庆典已停。闻廿四日召见高阳,君臣对泣竟日,顷高阳亦无日不哭泣云。初翁、李二人主战,今见一败涂地,翁乃自翻前议,而蔽罪于李,两人优劣可见矣。召见恭邸廿次,惟老太太不欲见此人云。然事至今日,虽有善者,亦无如何矣!倭奴有书布告,地球中有华夏文物之邦,为北方犷悍游牧种族所占据,荼毒生民等语,实属横谬可恨。

先生有书来,可以善言谢佛山。

本函由于是抄件,无可校核,个别文字可能不准确,故在〔 〕号之内注明正字。

本函未系年,仅署八月廿四日。据函中所言"大军以八月十八日失利于平壤"等语,知此函为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23日之作,时当中日甲午战争,平壤溃败,黄海大东沟海战失利之后。又附言称"顷庆典已停",按,当年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9月25日(八月二十六日),慈禧以"倭人肇衅",决定不在颐和园受贺。据此,知此函写好后,并未立即寄发,几天后又添加了一段附言。

当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共同入京会试。6月9日(五月初六日),康有为因下车时伤足南归,梁启超留京。8月3日(七月),给事中余联沅

（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荒谬绝伦”，“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诚圣人之蟊贼，古今之巨蠹”。余联沅不仅要求焚毁该书，禁止粤士从学，而且声称“如此人者，岂可容于圣明之世”，暗示清廷应该像孔子诛少正卯一样对康采取断然措施。书上，清廷命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复：“如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这样，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一开始就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上引梁函云：“原奏语甚辣，若有人从而媒蘖，亦可招大祸。”所述“原奏”，即指余联沅所上弹劾《新学伪经考》的奏章；“可招大祸”云云，足见梁启超对此事的严重性作了充分的估计。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刊行于 1891 年（光绪十七年）。该书认为：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为刘歆伪造，目的是为了协助王莽篡夺汉朝，建立新朝，因此，历来为古文家所尊崇的传世儒学经典并非孔学“真传”，而是“伪经”。此说一出，传统儒学中的古文经书的神圣地位立即受到挑战，但是，此说并无充分根据，主观臆测成分较多，因此，不能为人所信服。6 月 5 日，翁同龢日记云：“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同龢尚且如此，其他儒学维护者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余联沅的上书，正反映了这一部分人的情绪和态度。

据梁函可知，余联沅上书弹劾后，在广东的康门弟子中有不少人主张将《新学伪经考》直接“进呈”清廷，请光绪皇帝裁决，但梁启超不同意，“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复诸君矣”。又有一种意见，主张找人上奏，驳斥余联沅，梁启超也不同意，函称：“即驳奏，觅人亦不易易，非肝胆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为力！且政府向无交情，曲折更数人乃始达之，未有能尽心者也。”梁启超权衡再三，决定拜会权贵，疏通关节，致电广东方面，以图缓和此事。

当时，为梁启超出面奔走的是张謇（季直）。上函附言称，张謇曾经

三次拜访翁同龢。翁同意出面“周旋”。又据梁启超致夏曾佑函:“前仆已面托通州君,若相见时可再托之。但得常熟允致电(待此间自行电去),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张謇之所以出面,乃是梁启超一再“面托”的结果。

两广总督李瀚章虽奉旨查复,但当时管理广东文教的是学政徐琪(花农)。除张謇外,梁启超又动员沈曾植(子培)、盛昱(伯熙)、黄绍箕(仲弢)、文廷式(芸阁)等人致电徐琪疏通。同时,梁启超又运动曾广钧(重伯)致电李鸿章说情。经过如此一番活动之后,李瀚章决定大事化小。同年12月17日(十一月二十一日),李瀚章复奏,对康有为小加批评:“揆诸立言之体,未免乖违,原其好学之心,尚非叛离。”又称:“该举人意在尊崇孔子,似不能责以非圣无法,拟请无庸置议。”这样,就将康有为保护下来。但是,李瀚章又不能完全不加处理,其办法是让地方官谕令康有为“自行销毁,以免物议”。对于这一处理办法,光绪皇帝表示满意,当日即朱笔御批:“知道了。”

其实,“自行销毁”本是梁的主张,上引梁函云:“故某以为事若逼迫,则板勿爱惜也。”梁启超估计到,此事会给维新派在广东的活动带来一定困难,但有志之士必将继起,函称:“一片江山,已近黄昏时候,纵为无道,亦只若嬴秦之于六艺耳,何足芥蒂,但在粤稍窒耳!其实已经此事,此后若有来游者,必皆命世之才也,所缺者亦不过风流沾被之人,多寡不关轻重,听之而已。”

本函涉及的人物较多。丰伸泰,疑为丰升阿之误,满洲正白旗人,1894年率奉天盛字练军入朝,守平壤,战败后退守鸭绿江大东沟,1909年卒。左宝贵,高州镇总兵,入朝将领,9月15日在平壤玄武门中炮牺牲。叶,指叶志超,直隶提督,入朝清军总统(总指挥),平壤之战中下令竖白旗停止抵抗,全军撤退。聂,指聂士成,太原镇总兵,入朝将领之一。慧广,亦作慧庵,指康有为的弟子林奎,字慧儒,广东新会人。1891

年入万木草堂求学。据本函，林奎1894年曾随康有为入京。重白、重伯，均指曾国藩长孙曾广钧，时任翰林院编修。孙，疑指孙中山。曼宣，指麦仲华，康有为弟子。礼吉，指康有为的另一个弟子陈千秋，亦字通父，与康有为同乡，为万木草堂学长。孺博，指麦孟华，亦为康有为弟子。常熟，指翁同龢，时为户部尚书。高阳，指李鸿藻，时为礼部尚书。李，指李鸿章。恭邸，指恭亲王奕䜣。老太太，指慈禧太后。杨副宪、佛山，未知何指。

本函写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危急时期，所述前线战况，得自传闻，所以不很准确，例如，将丰升阿讹为丰伸泰，并讹传其战死；将大东沟海战讹为营口海战等。所述光绪帝与李鸿藻"对泣"，翁同龢与李鸿章、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矛盾等情，当亦得自传闻，可备一说。但是，所述平壤溃败及黄海海战失利以后北京震动的情况以及梁启超既忧"外患"，又忧内乱，立志救世的心态，则具有高度真实性。《梁启超年谱长编》称："关于先生在中日战事起后的奔走情形，《三十自述》以外很少材料。"本函发现，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附带应该说明的是，函中所言"局事"、"同人"事，均指南海康、张两族争夺同人团练局的纠纷。该局原为康有为的伯祖父康国熹所创，目的是抵御太平军。其后，同人局为罢职官僚张嵩芬所踞，陈千秋（礼吉）起而对抗，集合三十余人攻张，迫其交出局戳。双方武力对峙，几乎发生械斗。康有为支持陈礼吉，张嵩芬则结托言官弹劾康有为。陈千秋有肺病，故梁函问其病情，担心他操劳局事过甚，将不久于世。果然，次年夏历正月，陈即吐血而死。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8日

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

维新运动刚开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翁同龢即被罢官，开缺回籍。多年来，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西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但是，也有萧公权、孔祥吉等几位学者认为，是光绪皇帝主动罢了翁同龢的官。本人经过研究相关资料、反复思考之后，觉得前说无据，后说有理。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对戊戌维新史和西太后、光绪皇帝等历史人物的认识，因作本文，进一步加以论证。

西太后最初同意变法，不会在维新伊始时就处心积虑地加以反对

维新运动中，西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捉拿康有为弟兄，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软禁光绪皇帝，尽罢新法。西太后的这些举措，铸就了一个铁杆顽固派的形象，也将自己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想象，西太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老谋深算，之所以从光绪皇帝身边赶走翁同龢，目的在于削弱维新派的力量，警告光绪。人们的这种想象是合理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西太后是否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变法？

翁同龢日记1898年6月11日（四月廿三日）条云：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

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某某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①]

"慈谕",就是西太后的"谕旨"。当年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陈述"台湾既割,胶变旋生"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皇帝"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②]。6月8日,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折》,要求光绪皇帝立即施行新政,"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③]。根据光绪皇帝所言,西太后不仅读过这两份折子,而且给了积极评价:"良是。"至于变法方向,西太后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以至于连老成持重的翁同龢都觉得"过头"了,要说一句,"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在所拟诏书中特别强调,变法必须"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④]。

《明定国是诏》是颁示天下的文件,光绪皇帝不会也不可能假传"懿旨",翁同龢的日记也不会误记,因而,这一则资料的真实性应该无可怀疑。然而,活跃在其中的西太后形象实在和我们多年来的印象相差太远了。

又《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云:

---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2页,中华书局,1998。

②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71页,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8。

③ 同上书,96页。

④ 《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2页,中华书局,1997;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枢臣拟旨。是日，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连数日寂然。闻上得芝栋折，即令降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①]

6月16日（四月二十九日），宋伯鲁（芝栋）上《请改八股为策略折》，痛斥八股文的空疏无用，要求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在科举考试中"改试策论"[②]。接着，光绪皇帝和顽固派大臣刚毅之间展开了激烈辩论：皇帝要立即降旨，而刚毅则坚决反对，惹得皇帝动怒，但是刚毅仍不屈服，抬出"请懿旨"相抗。6月20日（五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请示。23日，颁布诏书，自下科始，"一律改试策论"，维新派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

《康南海自编年谱》的上述记载本意是想说明光绪皇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条材料，说明了在"废八股，改策论"这一问题上，西太后支持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顽固派刚毅。[③]

关于西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的情况，近人笔记中多有记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

① 《戊戌变法》(四)，147～148页。

②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113～114页。

③ 西太后支持部分改革的情况参见《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廿三日条。当时翁"论及兵须精练，借款之难，节省之难"，西太后当即表示："绿营可尽裁，局员当尽撤。"见该书3081页。

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①]“康初上之书”，指1898年1月29日（正月初八日）康有为所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在该折中，康有为陈述埃及、土耳其、高丽、安南、波兰、马达加斯加等国被侵略、受欺侮，以致被宰割、瓜分的惨状，警告光绪皇帝：“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②]列强侵略、欺侮清王朝，西太后与清王朝共命运，所以说康有为的这段话打动了西太后是完全有可能的；甲午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西太后从维护满洲贵族和自身利益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或支持变法也是合理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称：“适德人假细故，扰我胶、澳，举朝无一策，帝复泣告后，谓不欲为亡国之主。后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③]《清廷戊戌朝变记》还记载：西太后曾对光绪皇帝面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又曾对庆亲王奕劻等表示：“由他（指光绪皇帝——笔者）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④]这些资料都说明，西太后最初曾经给予光绪以一定程度内的变法自由。

苏继祖自称，他的书“采之都中上下口吻，证之京津先后见闻”，但是，戊戌政变属于宫闱高层机密，人们所知甚少，苏著所述大多来自“访询”，必然真伪杂糅。《慈禧传信录》的性质与之大体相同。二书所载上述各事，需要利用其他可靠资料验证，才能使用。

西太后主张“讲西学”由来已久。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1866年（同治五年）12月，奕䜣上折，要

---

① 《戊戌变法》（一），331页。

② 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5页。

③ 《戊戌变法》（一），464页。

④ 同上书，331、342页。

求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以官方姿态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折中，奕䜣提出，以满汉举人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京外各官入学学习，西太后批示："依议，钦此。"当时，同治帝仅十岁。这一批示显然反映西太后的态度。不久，奕䜣再次上折，提出"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要求将招生范围扩展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高级文官。[①] 该折再次得到西太后批准。1867 年（同治六年）2 月，奕䜣提议以徐继畬为同文馆事务大臣，当天就又得到批准。3 月，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与反改革论争。在这场论争中，西太后支持奕䜣，"上谕"称："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②]其后，顽固派仍不肯罢休，通政使于凌等人继续上折反对，杨廷熙更利用旱灾，要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6 月 30 日，西太后命军机处起草上谕，指斥杨奏"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一场争论得以平息。[③] 与此同时，一场以军事现代化为主，包括兴办民用工业和新式文化教育在内的"洋务运动"兴起，当时称为"自强新政"。应该承认，这场运动为古老的中国引入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近代科学文化，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益。

有意思的是，西太后不仅要求部分文官和知识分子学习西学，而且也要求光绪皇帝学。自 1891 年（光绪十七年）12 月 1 日起，光绪皇帝即奉西太后"懿旨"，每日上午在勤政殿学习英文，由同文馆的两位洋教

---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2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清实录》第 49 册，560 页，中华书局，1987。

③ 同上书，640 页。

习授读。[1] 这项学习，一直坚持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才由西太后下令，与“满书房”同时停止。让皇帝学英文，今天看来平常，但在当时，却是旷古未有、惊世骇俗之事。

西太后既然支持同治年间的“自强新政”，她在甲午战争后，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之际，自然有可能同意一定程度上的“维新”。《慈禧传信录》记载，西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2]既给光绪皇帝以一定的变法自由，同时又给光绪皇帝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符合西太后在变法伊始时的心态的。该书载，光绪皇帝曾向西太后表示，“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并向西太后推荐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都得到西太后的肯定。[3] 这也是符合西太后的性格和思想发展逻辑的。《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西太后下诏实行新政，甚至预备立宪，虽是形势所逼，但毕竟和她此前的思想性格有关。

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张荫桓在和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密谈时曾称：“太后具有开新之见。”[4]此说用以论衡“洋务运动”至维新初期的西太后，不为无见。历史事实表明，西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龢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

① 《翁同龢日记》，第5册，2482页。

② 《戊戌变法》(一)，464页。

③ 同上。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1-6-2-4：《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252～253页，巴蜀书社，2004。

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①]《戊戌政变记》以西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此段说"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又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犯禁"。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证梁启超之误。

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有一条记载与梁著近似，为史学家们广为引用。该书称："太后已许不禁皇上办事，未便即行钳制，故于未见康时，先去翁以警之。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②]这段文字写得历历如绘，似乎无可怀疑，然而，问题是，苏继祖并非朝廷重要人物，宫闱秘事，他何缘得见？得知？

《清廷戊戌朝变记》还有一条记载，被视为西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该书称：6月8日（四月二十日）之后，翁同龢罢官之前，西太后曾召见奕劻、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奕劻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西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

① 《戊戌变法》(一)，260页。

② 同上书，332页。

毅并哭求太后劝阻。西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①]其实,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西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乱为"之愤?如果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肯定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变法的奏折,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

仔细考察晚清文献,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西太后意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历史学家治史,有时难免受到既定观念的制约。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罢翁"之意出于西太后,其原因盖在于认定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而又不很了解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研究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

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极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6 年 3 月,翁同龢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 1600 万英镑。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

① 《戊戌变法》(一),332 页。

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二)处理胶州事件。1897 年 11 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䜣不以为然,连西太后都觉得"甚屈"。12 月 11 日,翁同龢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龢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①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 年 3 月,御史何乃莹、徐道焜、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 4 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同时指责翁同龢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②。5 月 29 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龢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③。

上述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有影响。6 月 10 日(四月二十二日),光绪发布上谕云: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着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着崇礼补授。这是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前的人事安排,必然经过西太后同意,或者竟是西太后的意旨。它的要点是,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

---

① 《翁同龢日记》,第 6 册,3067 页。

② 《请简用贤能大臣并陈五事以救时局折》,见《于中丞奏议》,136~141 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③ 《权奸误国请予罢斥折》,见《军机录副奏折(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缩微胶卷第 405 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只是在五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觐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那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么,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找,而据《翁同龢日记》,这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又确实大有关系。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①]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是推荐、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有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同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光绪皇帝准备在毓庆宫接见,同时批准其乘轿进入东华门,仍然受到翁同龢反对,以致惹得光绪皇帝"盛怒",逐条驳斥翁同龢意见,并且

① 《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3页。

借指斥刚毅为名发泄了一通对翁的不满。[①] 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②]。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③]。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王"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不幸的是，第二天又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之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④]。14日早朝，翁在是否赏给张荫桓"宝星"奖章问题上又和光绪皇帝闹起别扭，他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意在说明他本人不赞成嘉奖张荫桓，但是，光绪皇帝却马上决定，"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当面否定了翁的意见。[⑤]

---

① 《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9页。

② 同上书，3133页。

③ 《参张荫桓贪奸误国折》，见《军机录副奏折（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缩微胶卷第405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86号，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⑤ 《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3页。

翁同龢推荐过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但是，翁同龢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1898 年 2 月，光绪皇帝向翁同龢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的回答不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很受光绪皇帝“诘难”[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早就被翁视为“说经家一野狐”[②]，及至翁读到康的《孔子改制考》，更有意拉开和康的距离。5 月 26 日（四月初七日），光绪皇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命其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但翁同龢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这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惊讶，追问缘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回答如前。两个人都很执拗，在光绪皇帝“发怒诘责”的情况下，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光绪皇帝仍然寸步不让，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③]光绪皇帝贵为天子，如何能忍受翁同龢的这种执拗和抢白！[④]

翁同龢顶撞光绪皇帝的事件非仅上述数例，也非仅一时。1898 年 2 月，光绪皇帝为解决胶州湾事件，命翁同龢前往德国驻华公使馆谈判，但翁始终坚拒。第一次，翁称：“此举无益”；第二次，翁称：“未敢奉诏。”当时，翁为抗辩讲了许多话，其固执态度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翁在日记中自云：“同人讶余之憨。”又过了几天，皇帝再次催促，翁仍然“顿首力辞”。在场的恭亲王奕䜣不以翁的态度为然，但也拿翁没有办法，只

---

① 《翁同龢自订年谱》，见《近代史资料》第 86 号。

② 《翁同龢日记》，第 5 册，2696 页。

③ 同上书，第 6 册，3128 页。

④ 有学者可能认为，上述各事，均出于《翁同龢日记》所载，戊戌政变后，翁为了避祸，曾对日记作了修改，因此不能完全相信。不错，翁在政变后确实修改过日记，但仅限于少数几处，今人已作过考证。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更重要的是，翁去世的时候，光绪皇帝还健在，翁不会也绝不敢修改日记中和光绪皇帝有关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一，翁忠于光绪；第二，修改如有不实，将是欺君大罪。

好改派李鸿章和张荫桓前往。[1] 对此类事件，光绪皇帝都容忍了。

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研究该上谕，可知将翁同龢“开缺”理由有二：一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其内容当即上述举借内外债及处理胶州湾事件，但是，前文已述，光绪皇帝对有关弹劾并不十分重视，写在这里，不过是顺手牵来的一条理由，而其真正原因则显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其所指，当即上述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都发生于君臣“召对”之间，光绪皇帝如冬日饮冰，点滴在心，而西太后则不会很清楚。即此一点，亦可以证明，“开缺”上谕为光绪亲笔，出自本意。

笔者的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光绪皇帝颁发“开缺”上谕及其后几天内对翁同龢的态度得到证明。

人们熟知，戊戌政变前夕，当光绪皇帝感到大事不妙，危险在即时，曾通过杨锐、林旭带出密诏，要“诸同志”妥筹“良策”，并向康有为解释要他迅速离京，“将来更效驰驱”的意思。如果罢免翁同龢出于西太后意旨，而光绪皇帝只是被迫，他一定会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向翁有所说明，至少，要作出某种暗示，然而，种种事实说明，光绪皇帝表现得很严酷。

---

① 《翁同龢日记》，第 6 册，3089～3090 页。

首先，颁发“开缺”上谕当天，光绪皇帝就不让翁同龢有和自己见面的机会。《翁同龢日记》载，当日晨，翁入朝后，“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①。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那道决定自己命运的“上谕”。其次，第二天，翁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龢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②此时，翁同龢可谓伤心之极，而光绪皇帝却“回顾无言”，任何表示也没有。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王太监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无言”。以上种种，说明光绪皇帝在竭力避免当面向“师傅”宣布这一出自己意的残酷决定时所必然会有的尴尬，也说明，光绪皇帝除了“开缺”上谕所列举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

也许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乃是由于光绪皇帝害怕西太后的淫威，所以不敢有任何表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翁同龢被“开缺”之后，光绪皇帝第二天就召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接着，一连串地颁发“新政”诏书，完全是一种放手大干的心态。倘使西太后强迫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而光绪皇帝又胆小到不敢向亲爱的“师傅”做任何表示，他必然瞻顾、徘徊，小心翼翼，何敢如此雷厉风行地迅速推动变法！

凡此都说明，翁同龢被“开缺”出于光绪皇帝本意，而非西太后干预。

光绪皇帝锐意改革，求治心切，是其优点，但年轻气盛，操之过急，遇事冲动，是其缺点。翁同龢纵有不当，但总不应该轻率地将其赶出朝廷，自毁股肱。不久之后，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再一次暴露了光绪皇帝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感情用事，惩罚过重，打击面过大，又破例没有向西

① 《翁同龢日记》，第 6 册，3134 页。

② 同上。

太后请示，在自身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挑战西太后长期掌握的权力，从而引起西太后和顽固派的强烈反弹。限于本文主题，这里就不论了。

西太后批准罢免翁同龢

那么，西太后是否和“开缺”翁同龢毫无关系呢？也不，她是此事的批准者。理由很简单，西太后长期掌握最高权力，罢免翁同龢这样的大臣可以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光绪皇帝不可能不和西太后商量。如果西太后不同意，光绪皇帝决不可能一意孤行。翁同龢被罢后，光绪皇帝曾告诉康有为，黜革高级官员的权力“握在太后自己手中”[①]。根据《清代起居注册》和《德宗实录》等史料，6 月 11 日《明定国是诏》颁布后，12 日、13 日，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分居紫禁城和颐和园两处，未曾见面，14 日，光绪皇帝早朝之后，返回颐和园。当日正午，翁同龢也赶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西太后还关心地问了一句：“远来饭否?”要翁“且下去饭”[②]。次日，光绪皇帝即颁发将翁“开缺”回籍的上谕。显然，正是 14 日下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的会晤，决定了翁被赶出朝廷的命运。

西太后之所以批准光绪皇帝的要求，而未提出异议，原因复杂。

西太后是个自私自利、嗜权如命的人。同治皇帝去世，她选择年幼的载湉，就是为了便于继续控制国家权力。因此，在光绪皇帝成年之后，仍迟迟不肯归政，而且对任何危及她权力的人都坚决打击。

翁同龢受到过西太后的宠信。1865 年(同治五年)，被任命为弘德殿行走，教读同治帝。1876 年(光绪二年)，被任命为毓庆宫行走，教读

---

① 《中国的危机》，见《戊戌变法》(三)，509 页。

② 《翁同龢日记》，第 6 册，3133 页。

光绪皇帝。此后，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会办军务大臣、总办皇太后万寿庆典大臣等要职，多次受到西太后召见，所受恩宠，一时少见。但是，自1894年(光绪二十年)珍、瑾二妃事件后，宠信渐衰。当年11月，西太后借口“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瑾妃降为“贵人”。此事是西太后打击光绪皇帝亲信的开端。事件中，翁同龢再三要求西太后“缓办”，并且抬出光绪皇帝相抗，当面询问西太后：“上知之否?”[①]事后，御史高燮曾上折，直斥“懿旨”，西太后召见翁同龢等人，指令批驳，但翁同龢却主张“以静摄之，毋为所动”[②]。12月，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权臣李鸿章，声称和议为“皇太后旨意”，尖锐地提出：“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光绪皇帝指示拿交刑部治罪，但翁同龢却以安维峻“究系言官”为理由要求从宽处理。[③] 这些，都会引起西太后对翁的不满。当时对西太后专权不满的还有侍郎汪鸣銮与长麟，他们在光绪皇帝面前指责西太后只是咸丰皇帝的“遗妾”，与光绪皇帝“本非母子”，劝光绪皇帝“收揽大权”。1895年12月，光绪皇帝被迫将汪、长二人革职，永不叙用。次年2月，西太后为减少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等人接触的机会，决定裁撤汉书房，翁同龢多年的授读生涯自此结束。[④] 一个月之后，御史杨崇伊参劾珍妃之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遇事生风”，“议论时政”，结果，文被革职，永不叙用。一时间，北京气氛沉闷，翁同龢也“惶惶自危”[⑤]。

---

① 《翁同龢日记》，第5册，2754页。

② 同上书，2756页。

③ 同上书，2765页。

④ 同上书，2878页。

⑤ 吴樵：《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4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翁同龢是汉臣，他与光绪皇帝关系亲密，满洲亲贵早就不满。1896年2月，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大学士刚毅陈述，中国应该研究其他国家，西太后应该有两个外国女教师，光绪皇帝应该有两个外国导师，要求刚毅设法让他见到皇帝，刚毅的回答是："他对于皇帝没有影响，翁同龢最有力量，在内阁里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实行一切，甚至恭亲王、礼亲王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他宣称翁同龢蒙蔽了皇帝的视听。"①4月3日，在北京的维新派成员吴樵致函汪康年报告："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们天下自做乎？抑叫姓翁的做？"②这里所说的"太上"，应指西太后或另一位身份极高的贵族；"每谓之曰"的对象应是光绪皇帝。两份材料都说明，满洲亲贵对翁同龢日益增长的权力及其对光绪皇帝的影响深怀不安。但是，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西太后与翁同龢之间还维持着既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关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9月，翁同龢还被加任为协办大学士，在官阶上再次上升。西太后的特点是敢于重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受到她的信任。没有充分必要，她不会轻易甩弃翁同龢。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98年5月底，恭亲王奕䜣去世。

据金梁的《四朝佚闻》记载，奕䜣去世前，曾对临视的西太后"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③。又据光绪时期的御史赵炳麟称："恭王卒，大事决同龢，刚毅腹诽觖望，时京中为之语曰：自言自语刚枢密，独断独行翁相公。刚毅、莲英合构同龢于太后，遂开缺回籍。"④刚毅与翁同龢素不相合，某次二人论事，意见冲突，几乎当面翻脸。⑤ 奕䜣去世后，刚毅

① 李提摩太：《中国的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三），558页。

②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480页。

③ 《戊戌变法》（四），222页。

④ 《光绪大事汇录》卷九，《赵柏岩集》，见《近代中国资料丛刊》（303），480页。

⑤ 《翁同龢日记》，第6册，3068页。

为防止翁的权力继续上升，向西太后"进谗"是可能的。当翁同龢仍然受到西太后宠信时，刚毅等人的谗言不会有多大作用，但是，当翁同龢宠信渐衰时，刚毅之流的谗言就会产生影响。不过，6月10日的上谕仅任命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并未解除翁同龢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职务，说明西太后也还没有决定甩弃翁同龢。但是，这以后几天光绪皇帝和翁同龢之间连续发生的冲突使情况急剧变化。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写道：

> 等到恭王一死，小人渐渐出头擅起权来，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①]

这里所说的"小人"，仍指刚毅。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与翁相知甚深。戊戌政变后，翁同龢曾将他和光绪皇帝关系的部分情况告诉张謇，张謇又告诉了张孝若。上述光绪皇帝觉得翁"过于持重"，苦于被"掣肘"等情，非局外人所能知，当亦出自翁同龢本人。张孝若叙述此段历史时，不采光绪皇帝被迫之说，而从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两方面分析翁同龢被罢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但是，揆诸史实，光绪皇帝与翁同龢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则是次因。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①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见《戊戌变法》（四），245页。

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

光绪皇帝给人的印象是“窝囊废”，是个一见西太后，就心慌意乱、两腿发软的人物。人们的这一印象当然不错，笔者丝毫没有为他“翻案”之意。对于光绪皇帝的优点，例如，他主张抗击日本侵略，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史家们已经说得不算少，笔者也不拟在此啰嗦。本文想说的是，在上述两项优点之外，他还很有点见地，例如，他的新闻思想就很进步，领先于当时的时代潮流，对后世也不无借鉴意义。关于这一点，此前似乎还没有历史学家谈过。

据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58年(咸丰八年)创刊的《中外新报》，地点在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内地人见不到。三年以后，传教士伍德等在上海创办《上海新报》，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不过，那其实是一种七天出版一次的周刊，半年后才改为三日刊。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在上海创办《申报》，中国内地才出现了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中文报纸。该报既登商业新闻，也登政治新闻，并且破天荒地发表“论说”。此后，中文报纸就一天天多了起来。

对《申报》的出现，中国统治者并不高兴。早些年，我在伦敦档案馆里查到过一份照会。递送者是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殿下，收件人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其中引用了一段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

> 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照会要求威妥玛饬令英国驻上海领事："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

这是一份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专制、横蛮、愚昧的照会，也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的新闻思想。在奕䜣等人看来，报纸只能谈"贸易"，其他新闻，均在不准之列；至于"妄论是非"，"纵谈官事"，那就更加不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但不久就被清朝统治者下令封闭，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报纸也被改为《官书局汇报》。清廷规定："皆译外国之事"，"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

光绪皇帝也糊涂过，封强学会，封《中外纪闻》，都经过他同意，但是，他很快就后悔，很快就进步。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7月，光绪皇帝派康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报》时发布过一道"上谕"。"上谕"者，那个时期的"最高指示"也。中云：

>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
>
> 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时务报》原是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报纸，以梁启超为主笔。创刊之后，倡言"民权"，再加上梁启超那支通俗而又饱含感情的文笔，于是，受到广泛欢迎。然而，世间事常常是，受到的欢迎愈热烈，受到的反对

也就愈强劲。有人扬言，要打“民权”屁股一万板。张之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维新派，但是，也不喜欢“民权”之说，指令在《时务报》担任经理的亲信汪康年设法“收敛”，其后，《时务报》遂为汪康年掌握，光芒大失。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企图借官方力量收回《时务报》，指使御史宋伯鲁向光绪皇帝上奏，要求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仍派梁启超办理。光绪皇帝将这一道奏章批给当时掌管文化教育的“管学大臣”孙家鼐，孙家鼐于 7 月 26 日复奏，认为梁启超正在奉旨“办理译书事务”，太忙了，建议派康有为到上海督办《时务报》。当时，北京的顽固派正在攻击康有为，光绪皇帝想让康避避风头，就同意了，因此就有了上面引述的那道“最高指示”。

为什么说光绪皇帝的上述“最高指示”在当时领先于时代潮流，于后世也不无借鉴意义呢？

第一，光绪皇帝认为报纸有两重任务。一是报道国家的政策、法令，即所谓“宣国是”；一是反映社会动态，表达百姓的愿望与意志，即所谓“达民情”。中国古代的《邸报》，清代的《宫门抄》，其内容都是皇帝诏令，官家意旨，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达民情”，反映人民的心声，显然是个大进步。

第二，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胪陈利弊”，这就是说，报纸的言论要全面，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朝廷的政策、法令、兴革、举措，要允许人们议论，有“利”言“利”，有“弊”言“弊”，报纸上不能只有“睿智”、“圣明”、“万岁”一类的恭维话、颂扬话。

第三，光绪皇帝要求报纸“开拓见闻”，这就是说，报纸不仅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且应该传播知识，扩大、增进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

第四，光绪皇帝表示：“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这就是说，报纸取舍稿件的标准是客观实际，只要“实”，就可以“据实昌言”，而不必“意存忌讳”，顾虑这，顾虑那，这也不敢写，那也不许登，也

不必吞吞吐吐，说半句，留半句。“许”者，许可也，对于此类文章，此类办报方针，光绪皇帝采取“均许”态度，一律批准。

第五，光绪皇帝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朝廷“明目达聪”，找到治理国家的正确办法。正确的决策源于对情况的正确、全面的掌握。只有报纸说真话，说实话，才能帮助“朝廷”了解实际，了解民情，作出正确的决策。

我想，不必再多解释了。光绪皇帝的这道“最高指示”发布于一百多年前，是否过时了呢？我想，也许不会有人认为过时了吧！

原载《炎黄春秋》，2003 年第 8 期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幾先，其事何堪设想！①

① 《德宗实录》第427卷。

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①]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②]《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③]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二十九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1908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惟此之故。[④]

---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同上书，466页。

③ 同上书，347页。

④ 《戊戌变法》(二)，518页。

康有为这封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原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自求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来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①

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书后中称,他写这篇日记,

---

① 《戊戌变法》(一),550~551页。有关情节袁世凯生前也曾对人说过,张一麐任袁世凯幕僚时也有所闻,见《心太平室集》卷8。

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1]。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2]

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3]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4]。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又说:

---

① 《戊戌变法》(一),555页。

② 《戊戌变法》(四),332~333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161页。

>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禁起来。[①]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第，刘说：“确曾有此一议。”[②]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

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③]

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

---

① 《戊戌变法》(三)，562～564 页。

② 《台北人间世》半月刊(1961 年 4 月)，第 5 卷第 4 期，26 页。

③ 《戊戌变法》(四)，52 页。

后不可"[1]。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2]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
>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往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

---

[1] 《戊戌变法》(四),331页。

[2]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

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①

491316

记录康有为“围园杀后”密谋的毕永年日记之一（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5-491318。成济，三国时人，司马昭党羽，曾以剑刺杀魏帝曹髦。

491317

记录康有为"围园杀后"密谋的毕永年日记之二(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此件大约写作于 1899 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本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 2 月 8 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①] 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②],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袁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

---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 1·6·1·4-2-2,491312-491314。

② 冯自由在《毕永年削发记》一文中有简略记载,但未说明资料来源,见《革命逸史》初集,74 页。

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1]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意志的"表白"。历史是糊弄不得的。

附记：承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松本英纪惠借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特此致谢。

原载《光明日报》，1985 年 9 月 4 日

① 《戊戌变法》(二)，519 页。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戊戌政变前夜，康有为为了挽回局势，曾与谭嗣同、梁启超密谋，利用袁世凯，乘机派毕永年捕杀西太后。有关事实，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一文中已作阐述。近读梁启超致康有为密札一通，发现它不仅为戊戌密谋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而且说明了梁启超力主掩盖事实真相的情况和政治目的，因据之以作补证。

密札首尾均佚，中云：

> （上脱）唐已撤回矣。顷得诸要人为我斡旋，各事可称顺手。惟张、鹿两军机仍不慊于吾党，监国之待彼革，处处还其体面，故尚不无小小阻力。弟子已有书与张，通殷勤，释前嫌，若吾师别致一函更妙（函寄此间可也）。
>
> 师所上监国书奉到时，袁贼已败，故措词不能不稍变易，已僭改若干，誊写递去矣。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若此次再出岔，则中国真沉九渊矣。师谓何如？①

---

① 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860～861页，台北版。

函中所言唐，指唐绍仪。张、鹿两军机，指张之洞与鹿传霖。监国，指摄政王载沣。袁贼，指袁世凯。德宗，指光绪。孝钦，指西太后。函中提到“袁贼已败”，故知此函作于1909年1月2日，清政府罢斥袁世凯之后。函中所言“彼革”，亦指袁世凯。“处处还其体面”，指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开缺回籍养疴”为名革除了他的职务。所谓“戊戌密谋”，即指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的计划，因为“诛荣禄”等一类打算，早已由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等处公布，不必再“隐讳”了。

戊戌政变后，康、梁流亡海外，对袁世凯出面告密，以致“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多次策划倒袁。1908年11月，光绪和西太后相继死去，由光绪的弟弟载沣摄政。这使康、梁大为兴奋，视为“讨贼复仇”的绝好机会。他们多方活动，联络满汉贵族、大臣，企图使清政府惩办袁世凯，其中重要的方式就是给载沣上书。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力辩“谋围颐和园”，说这是袁世凯捏造的“无根浮言”，“至狠极毒”，恶贯满盈，要求载沣像康熙诛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杀肃顺一样处置袁世凯，“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①。从梁札可以看出，《上摄政王书》是经由梁启超之手转递给载沣的，其间经过梁启超的“僭改”，而其“僭改”的最重要之处则是周到地掩盖“戊戌密谋”。

还在1900年，康有为在给英国人濮兰德的书信中就曾说：“盖自前年八月，庆、荣、刚诸逆贼欲弑皇上，而假托于仆，诬以进毒丸，欲杀弟而即弑皇上，一起两得，既而足下见救，弟不可杀，则改诬以围颐和园。”②当时，光绪是西太后的阶下囚，康有为泄露“围园”密谋必然会危及光绪。现在囚人者与被囚者都已经死去，康有为觉得时势不同了，因此在

---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424页，中华书局，1981。

《上摄政王书》中作了某种透露，而这遭到了梁启超的强烈反对，声言“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要求老师和他统一口径：“以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

确实，梁启超比他的老师精细。载沣虽然是光绪的亲弟弟，但他的地位是西太后给予的。把“围园”这样的密谋提到载沣面前，就会使他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肯定密谋是正义之举吧，这就要证明西太后不义；而且，光绪与密谋的关系也无法交代。如果光绪知情，这就有悖于“孝道”；如果不知情，又难免失察之过，和改良派力图塑造的光绪形象大相径庭。这一时期，梁启超还有一封给肃亲王善耆的书札，中云：“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又云：“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而德宗岂其然哉！”[①]康有为的《上摄政王书》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当即梁启超的“僭改”之一。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梁启超的内心矛盾。他权衡再三，只有“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均由袁世凯“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这样，就可以撇开西太后的关系，“而事易办”，载沣下决心惩办袁世凯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力主掩盖事实真相的另一考虑是“开放党禁”。载沣摄政后，康有为、梁启超除活动倒袁、惩袁外，同时还企图为戊戌一案平反，其内容包括：抚恤“六君子”，起用因参与变法而被罢斥的维新党人，允许康、梁等合法地从事政治活动等。如果包围颐和园一类密谋泄露，必将增强反对力量，惹出许多麻烦，不如矢口否认来得干净。所以，梁启

---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4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超又告诫康有为，不能再“出岔”了：“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

对梁启超的考虑，康有为深以为然。所以他不仅同意梁启超的“僭改”，而且终其生一直守口如瓶。1926 年，当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在《申报》上发表时，曾经有人认为“个中人物，只有南海”，希望他出面“证明是非”，但是，康有为却保持沉默，“始终未有只字相答”[①]。康有为的疏忽之处在于，他没有想到毕永年留下了一份日记，也没有将梁启超的密札销毁，使得我们在“确证”之后，还可以“补证”。

原载《文汇报》，1986 年 4 月 8 日

① 张一麐：《致蔡元培书》，见《中国现代史丛刊》(二)，1～2 页，台北版。

附:天津"废弑密谋"是维新派的虚构

戊戌政变史上有所谓天津"废弑密谋",说的是慈禧太后曾与荣禄密商,准备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九月,利用皇帝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之机,废掉以至杀掉光绪皇帝。这一问题的真相,至今尚未揭开,是百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留下的谜团之一。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说"有",袁世凯、荣禄说"无"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维新、守旧两派的斗争渐趋激烈。同月二十九日(9 月 12 日),康有为曾对自湖南来京的会党领袖毕永年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此说见于 1899 年初毕永年以日记体所写的《诡谋直纪》。

八月初三日(9 月 18 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对袁说:"荣某近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此说见于袁世凯以日记体所写的《戊戌纪略》。

以上所述,都比较简略,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写得比较详细。该书多处提到慈禧太后的"废立"密谋。

一处说:自从恭亲王奕䜣于同年四月初十日(5 月 29 日)去世后,皇上就每天与翁同龢商量改革之事,而慈禧太后则每天与荣禄"谋废立之事"。

一处说:四月二十七日(6 月 15 日)这一天,光绪皇帝连下数道诏

书，均出于慈禧太后之意。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回籍，二是规定二品以上受职官员皆须到皇太后前谢恩；三是命王文韶、裕禄来京；四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五是决定九月间，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阅兵。梁启超由此分析说："盖废立之谋，全伏于此日矣！"

一处说：荣禄与慈禧太后决定阅兵，目的是"胁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废立"。该书并称："此意满洲人多知之，汉人中亦多为皇上危者，而莫敢进言。"

关于弑害光绪皇帝一事，《戊戌政变记》并没有指实在天津阅兵时，而是笼统地说：戊戌年四月以后，北京谣言极多，都说皇上病重，或说张荫桓进红丸，康有为进红丸。梁启超分析说："盖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也。"

综上所述，可见，所谓天津"废立密谋"或"废弑密谋"之说，均出于维新派。

对维新派此说，袁世凯不相信，荣禄本人则坚决否认。当八月初三谭嗣同向袁世凯透露"废弑密谋"时，袁世凯就立即表示："在津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八月初五日（9 月 20 日）荣禄得知此讯，立即大声呼冤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有耶？无耶？

天津"废弑密谋"问题疑窦重重

所谓天津"废弑密谋"之说，十分可疑。

第一，如果慈禧太后和荣禄确有此意，那么，事属极密，康有为等人

何从得知？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承认：宫廷废立之意，"事秘难知"。既然"事秘难知"，又何以能言之凿凿？

第二，光绪皇帝软弱无能，纯属光杆司令，如果慈禧太后和荣禄确实准备将他废掉或杀掉，在北京办理就可以了，何必远到天津，劳师动众？关于此，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就曾指出："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压制之耳。"应该承认，这一质询是很有力量的。证以后来情况，也确实如此。八月初四日（9 月 19 日），慈禧太后真正发动政变了，只须车驾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即可，简简单单，何曾费什么力气？

第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四月二十七日之时，距离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不过四天，还几乎什么也没有做，招致后党不满的几件事，如精简詹事府等衙门、罢斥怀塔布等六个礼部大臣，都发生在七月，慈禧太后和荣禄何以在四月时就如此狠心，要将皇帝废掉、杀掉？

第四，慈禧发动政变，抓康有为，杀六君子，和光绪皇帝的矛盾前所未有地尖锐化了，对光绪皇帝的处分也仅止于软禁瀛台，但是仍然保存了他的皇帝名号，并没有废，更没有杀，何以在四月时就既想废，又想杀？

第五，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召荣禄回北京任事，荣禄即声称，"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以调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自任，并不曾落井下石。据金梁的《四朝佚闻》记载，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常为帝宽解"，为光绪皇帝说几句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1899 年 12 月），慈禧真想废弃皇帝了，荣禄还曾出面劝阻，以避免外国干涉为名，想了一个设立"大阿哥"的办法，使光绪的名号一直保持到去世。既然

光绪在实际上成为阶下囚之时，荣禄都不曾企图加害于他，何以当初就既想废，又想杀？

根据以上各点考察，所谓“天津废弑密谋”之说并不可信。

那么，所谓天津“废弑密谋”之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又说：

> 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赐以密谕，有朕位几不能保之语，令其设法救护，乃谕康有为及杨锐等四人之谕也。当时诸人奉诏涕泣，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最初主张开议院，后来为避免守旧派反对，改为建议开懋勤殿，邀请中外人士讨论制度改革。七月二十九日（9 月 14 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慈禧不悦。其间，慈禧并严厉批评光绪罢斥礼部六大臣处理不当。第二天，光绪皇帝就召见杨锐，授以密诏，告以“太后不愿将法尽变”，自己权力不足，勉强做去，“朕位且不能保”云云。康有为等见到这道密诏后，既紧张，又惊慌，怀疑慈禧太后等要对皇帝下毒手。“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一个“意”字，一个“谅”字，说明了所谓天津“废弑密谋”只是维新派的一种猜想。

自当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廷决定在天津阅兵起，维新派就怀疑其中有鬼，关于此，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这里的“虑”字，也说明了所谓“天津废弑密谋”云云，只是维新派的一种忧虑、一种担心而已。

敌我两派斗争到白热化阶段时，精神难免高度紧张，将对方的行动、举措估计得过于严重，所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也。

维新派自身武力夺权计划的需要

既然所谓"天津废弑密谋"只是维新派的一种猜测与忧虑,并无情报根据,那么,维新派为什么要将它视为事实呢?这是由于维新派自身武力夺权计划的需要。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最初企图通过成立学会、报刊宣传等手段自下而上地鼓吹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康有为被光绪召见后,感到皇帝英明,即转变为"尊君权",主张通过扩大皇帝的权力,借以实行变法。然而,很快,康有为等就发现,当时,中国大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皇帝并无多大权力。于是,康有为就准备武力夺权。其办法是,利用一支军队,包围颐和园,逮捕慈禧太后,将她杀掉。康有为等认为,慈禧一死,变法的阻力就不足道了。

最初,康有为、谭嗣同看中的是淮军将领聂士成,要王照利用和聂的把兄弟关系去做说服工作,许以事成之后提拔聂为直隶总督。但是,王照不认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有势不两立的矛盾,拒绝见聂。于是,康有为就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他和谭嗣同制订了一个两步起事计划:先命袁世凯在天津起兵,杀死荣禄;然后命袁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同时命毕永年率领敢死队百人,乘机逮捕慈禧太后,将她杀掉。

要实现这一计划,就必须说服光绪皇帝,也必须说服袁世凯、毕永年等人,而这就需要一个堂皇正大的理由,"天津废弑密谋"正适应了这一需要。它一可以吓唬光绪皇帝,使他就范;二可以激发袁世凯、毕永年等人"保卫皇上"的激情;三可以在事成之后,作为向天下万世交代的理由。

如前述,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动员毕永年时就是这么做的:他先是告诉毕,太后准备弑皇上,问毕怎么办,然后才逐步向毕透露自己的围园计划。后来,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也是这样做的:谭先是告诉袁世凯,荣禄“将废立弑君”,然后向他出示准备奏呈光绪皇帝的奏章,内称:“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谭嗣同准备在说服袁世凯之后,即携带这一道奏章,深夜进宫去说服光绪皇帝,要求皇帝次日交给袁世凯一道朱谕,命他立即带本部兵在天津行动。当然,根据康有为的指示,准备对皇帝留一手,只说明废太后,而不说明杀太后。谭嗣同对说服光绪皇帝很有信心,声称“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自然,按“废弑密谋”,光绪不仅皇位不保,连性命都要丢掉,怎能不批准维新派的计划?

因此,与其说,“天津废弑密谋”是康有为等人的猜测或忧虑,不如说是他们的虚构,其目的在于为自身的武力夺权服务。

一切假话、假史都应该揭露

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借此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辟道路,这是事实。但是,在《戊戌政变记》等书中,梁启超却对此讳莫如深,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相反,对于莫须有的“天津废弑密谋”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叙述、渲染。无他,梁启超写作《戊戌政变记》时,维新派和清政府的斗争还在继续,因此,自然无法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作。这是应予理解的。

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有为、梁启超等曾经改造过部分史料,伪造过部分史料,说过不少假话,对此,史学家出于维护历史真相的目的,已经多有揭露,但是,还不能说已经揭露得很够。"天津废弑密谋"就是应予揭露的假话之一。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8 年 7 月 15 日

附：围园杀后——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

维新派得知要在天津举行阅兵大典，怀疑慈禧太后要借机废弑光绪皇帝，便将疑惧当做事实，计划武力夺权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898年8月24日），皇帝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从两个多月前下诏明定国是，维新变法起，光绪皇帝就不断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有时，皇帝自己也住在那里。这次已经是第八次了。

光绪皇帝原是醇亲王的儿子，四岁（虚岁）那年，由于同治皇帝突然暴病死去，没有子嗣，便由慈禧太后选择，登上了帝位。这种年龄的孩子，还正是拖鼻涕、穿开裆裤的时候，自然，只能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直到光绪皇帝十八岁，结婚之后，慈禧太后才不得不移居颐和园，"归政"皇帝。然而，已经习惯于控制国家大权的慈禧太后仍然牢牢抓住权力不放，用人、行政，还是太后说了算。

光绪皇帝去颐和园，名为请安，实为请示，争取太后批准自己的维新举措。不过，请安后发布的"上谕"却常常使维新派不安。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光绪皇帝第一次诣园请安的第二天，皇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接着，陆续谕令，以刑部尚书崇礼署理步军统领职务，以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怀塔布管理北京圆明园等处官兵，以刚毅管理健锐营特种部队。这样，守旧派就掌

握了京畿地区的军权，维新派怎样闹腾，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掌心了。

光绪皇帝第八次诣园请安后发布“谕旨”说：皇帝将在九月里巡幸天津，举行阅兵典礼。天津是荣禄的势力中心，维新派不知道这里边暗藏着什么鬼名堂，怀疑太后想乘阅兵之机，废掉以至杀掉皇帝，因此，便将疑惧当做事实，积极推进武力夺权计划。

康有为早就认为，慈禧太后顽固不化，要扩大光绪皇帝的权力，维新变法，必须除去太后，然而苦于找不到堂皇的理由。现在，这样的理由终于找到了。

康有为留下了湖南好汉毕永年，准备将一项重要的机密任务交给他

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毕永年从湖南到达北京。

毕永年是长沙著名好汉，八岁时就随父叔辈生活在军队里，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也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武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和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取得了入京参加朝考的资格。自此，即和唐才常、谭嗣同结为生死之交，三人经常一起商议救国大计。当时，会党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一支有组织的秘密力量。为了联络会党，毕永年又亲自参加哥老会。由于他体格魁梧，轻财仗义，文武双全，因此，很快就得到哥老会里那些山堂龙头们的赏识。

毕永年此次到京，是为了追随谭嗣同，参与维新活动。到京的第二天，毕永年拜见康有为，被康留在南海会馆，和钱惟骥同住一室。钱和毕既是同乡，也是好友，二人异地相见，感觉分外亲热。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夜9时，康有为将毕永年召到自己的房

间。此前,康有为已经从谭嗣同那里知道了毕永年的为人,因此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形势危急,太后想在九月天津阅兵时谋弑皇上,怎么办?我想学唐朝张柬之废除武后之举,但皇上手头无兵,实难举事。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让他当李多祚。”武周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依靠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的兵力,杀入宫内,杀死为武后宠信的张昌宗弟兄,恢复唐中宗的帝位。康有为想重演当年那惊心动魄、关系国家命运的一幕。

“袁世凯是李鸿章一党,李鸿章是太后一党,恐怕不能用。而且袁亦非谋此事之人。当年驻守高丽,情况危急,就自请撤回,实在没有胆量。”毕永年没有全盘反对康有为的计划,但反对用袁世凯。

“我已派人到袁处行反间计,袁深为相信,痛恨荣禄与太后。而且,我已奏知皇上,在召见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赏以茶点,袁一定感激图报。”康有为显得很有信心。对毕永年说:“你先等着,我有事要重用你。”

毕永年不知道康有为将怎样用他,心里打起鼓来。

光绪皇帝精简机构,罢斥六个部长级大臣,受到慈禧严厉批评,传出密诏,要杨锐等迅速筹商,找出既变法,又不触犯太后的两全之计

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维新后,在一段时期内颇有干劲,下令改革的诏书不断。

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光绪皇帝下令精简机构,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汰

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及若干不办实事的官员。京外其他应裁、应并各缺,由有关衙门、官员“分别详议,切实办理”。

光绪皇帝的这些改革举措受到守旧大臣的强烈反对,新政很难推动。在此情况下,光绪皇帝就想惩处几个守旧派大臣,借以立威。正巧,发生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大臣阻挠主事王照上书事件。

按清制,低级官员没有直接给皇帝上书的权利。为此,光绪皇帝特别下诏,准许部院司员及士民上书言事,不得阻拦。当年六月,王照写了一道奏章,提出请皇帝、皇太后巡幸中外等几条意见,要求礼部代为呈递,遭到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人的拒绝。王照不肯罢休,写了呈文,亲自到礼部衙门抗议,声称如不递,我当亲往都察院递送。怀塔布无法,只好应允代奏。但是,许应骙却奏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事件为光绪皇帝得知后,便于七月十九日(9 月 4 日)将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的六个堂官(部长级)革职,同时,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第二天,又乘余威,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至此,光绪皇帝才算抖了抖威风,有了点当皇帝的感觉了。

然而,光绪皇帝的这个娄子捅大了。

怀塔布和慈禧太后同属叶赫那拉一族,满洲正蓝旗人,靠亲贵的地位发迹。他的老婆经常出入颐和园,陪慈禧太后吃饭、玩耍、解闷儿,是个直接通天的人物。怀塔布被革职后,立即赶赴天津,与荣禄密谋。他的老婆则到颐和园向老佛爷哭诉,造谣说:皇帝“且尽除满人”!

慈禧太后虽然一开始赞成变法,但有限度,有底线,皇帝的许多举措她都不赞成。当时,康有为建议开懋勤殿,选拔英才,延聘外洋顾问,讨论各项制度,扩大议政人员范围。七月二十九日(9 月 14 日),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提出这一建议,慈禧不悦,怒形于色,吓得光绪皇帝一句也不敢再说。这次请安中,慈禧太后特别批评光绪皇帝对

怀塔布等人处罚过重，乱了家法。第二天，光绪皇帝即召见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谕，内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密谕自述为难之处道："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皇帝要杨锐与诸同志妥速筹商，找出"良策"，既能罢免守旧大臣，选用新进，变法图强，而又能不触犯太后，"有拂圣意"。他表示："十分焦急翘盼之至！"

这道密诏传出了慈禧反对变法，皇帝力量薄弱，"朕位且不能保"等信息，令杨锐既震惊，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直到八月初二，才交给林旭。

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想利用他的兵力保驾

康有为和毕永年初次密谈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奉召到了北京。

袁世凯是淮军将领袁甲三的侄孙，曾随吴长庆督兵驻扎朝鲜。光绪二十一年签订《马关条约》之后，袁世凯在北京请人译撰兵书十二卷，提倡用西洋办法治军，因此，被委任为新建陆军督办，负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袁世凯捐过五百元钱。此后，康有为就将袁世凯看做维新人士。

康有为在一道道向光绪皇帝呈递变法奏章时，逐渐感到旧党势力强大，皇帝只是光杆一个，处境十分危险。他当然懂得，要保护变法，保护皇帝，必须靠军队。军中有谁堪当此任呢？他想到过淮军将领聂士成，想利用聂的把兄弟王照去动员他，但是，王照不认为慈禧太后有废

皇帝之心，拒绝了。康有为觉得，此外就非袁世凯莫属。当年六月，他派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到袁世凯幕中，和袁厮混，借机对袁进行政治考察，同时离间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袁知道徐的背景，便当面称赞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世凯的这些话听得康有为心花怒放，便命徐仁禄继续用话激他：

“康有为屡次和梁启超、宋伯鲁、谭嗣同向皇上保荐阁下，皇上说荣禄说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我公为何与荣不和？”

“当年翁同龢想增加我的兵员，荣禄声称汉人不能任掌兵大权。翁说，曾国藩、左宗棠也是汉人，何尝不能领大兵，但荣禄仍然不肯为我增兵。”袁世凯仿佛恍然大悟，补充说。

康有为从徐仁禄那里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便决心荐袁。他先替徐致靖草折，要求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加官奖励；接着，又命谭嗣同上密折，要求光绪皇帝收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处于孤立状态的光绪皇帝也觉得是个办法，便于七月二十六日(9 月 11 日)，命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

七月二十九日(9 月 14 日)，袁世凯遵命进京。八月初一日(9 月 16 日)清晨，打过四鼓，袁世凯便梳洗整齐，匆匆赶到颐和园门口等候。黎明时，光绪皇帝在毓兰堂召见。据袁世凯日记记载，皇帝关心的是“军事”，问得很详细，袁世凯一一据实奏明。少顷，袁世凯见没有新问题，便奏说：“九月有巡幸阅兵大典，荣禄命臣督率修理操场，先期演习阵图，亟须回津料理。陛下倘无垂询事件，臣就要请训回津了。”但是，光绪皇帝却要袁世凯再住几天，四天后请训，说是那样不会有“大耽搁”。

袁世凯回到寓所不久，忽然，军机处值勤人员来报，皇帝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要他于初五日(20 日)请训。袁世凯原来的职务是直隶按察使，属于副省级，提拔为侍郎，就是副部级了。因此，幕僚们迅速前来祝贺，袁世凯却狐疑满腹，说是自己没有一寸功劳，受

如此重赏，绝不是福，有何可贺！他表示，要上疏力辞。幕僚们不赞成，于是，袁世凯便命人拜折谢恩。

当日下午，袁世凯在京城先后拜见军机大臣刚毅、户部尚书王文韶、礼部尚书裕禄等人。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康有为，送去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帖子。但是，袁世凯的心中，恰似有十余个辘轳打水，七上八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心怦怦”。

初二日(9月17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谢恩，自称无尺寸之功，却受到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皇帝笑了笑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荣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是他的部下，理应受其节制，然而，皇帝却要他和荣禄“各办各事”。退朝后，袁世凯反复琢磨着皇帝这一句话的含义。

袁世凯老于政坛，熟知当时形势。他很快就悟得：光绪皇帝的不次之之赏是将他放到火炉上了。

康有为定计，让毕永年打入袁世凯的部队，在包围颐和园时逮捕慈禧太后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毕永年知道康有为计划已定，便和谭嗣同商量。谭称：“此事甚不可，但康先生一定要这样做，而且想让皇上面谕袁世凯，我亦无可奈何！兄能在此帮助我，极好，但不知康先生准备怎样用您?”二人议论到下午1点，没有结果。这一段时候，谭嗣同身体不好。毕永年不愿打扰过久，就告辞而出。

当晚8点，康有为、梁启超等正在用晚餐，忽然传来上谕，袁世凯以侍郎候补。康有为高兴得拍桌大叫说：“天子真圣明！如此做法，就比

我等所献之计更加隆重,袁世凯必定喜而图报了!"说毕,康有为放下筷子,命毕永年跟他进房,询问下一步如何做法。

"事已如此,无可奈何,定计而行就是了。不过,我始终觉得袁世凯不可用。"毕永年说。

"袁极可用。我已经得到他应允的证据了。"康有为见毕永年仍在犹疑,便从桌子上拿出袁世凯送来的帖子,内称蒙康荐引提拔,不胜感激,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云云。康有为颇为得意地问毕永年:"你看,袁有如此语,还不能用吗!"

"这样看来,袁也许可用,先生想让仆做什么事呢?"毕永年问。

"我想让你到袁世凯的幕中去当参谋,监督他,如何?"康有为一步步地吐露他的计划,同时试探毕永年的反应。

"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袁如果有异志,仆一人也制不了他。"毕永年仍然顾虑重重。

"我交给你一百人,由你统率。等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你带这一百人奉诏将太后抓起来,将她废掉就可以了。"显然,康有为成竹在胸,所有的细节都想过了。

"那么,仆何日见袁?"毕永年有点心动了。

"再商量吧!"

康、毕二人谈到紧要处,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和梁启超突然推门而入,坐定后,梁启超对毕永年说:"此事兄不必再疑,务请大力担当。"话说到这儿,梁启超见毕永年没有回答,便追问了一句:"兄敢做此事吗?"

"有什么不敢!但仆要熟思审处,好好想想。而且,仆还没有见过袁世凯,他是什么人,仆还不知道呢!"

"袁这个人,大可用!然则兄能答应此事吗?"梁启超急于要毕永年有一个既坚决又慷慨的允诺,然而,毕永年就是不吭声。康广仁不高兴,愤然于面了。

“此事我终不敢独力担任，是否赶紧催佛尘进京商量?”毕永年不能不表态了，他想起了好友唐才常，那是一条有勇有谋、能当大事的汉子。

“太好了！太好了！但我们想在几天内就发动，如待唐君，又多需时日，奈何!”康有为、梁启超见毕永年终于有了答应的意思，很高兴，但形势瞬息万变，他们担心等待唐才常会误事。踌躇了一会儿，决定找谭嗣同商量。这几天，谭嗣同也住在南海会馆，几个人很快就到了谭的房间。谭嗣同听明白双方的争论后，表态说：

“稍缓时日不妨。如能催得佛尘来，更完善。”

“毕君沉毅，唐君深鸷，可称两雄。”梁启超表示极为赞成谭嗣同的意见。

“事已定计。汝等加紧调兵遣将吧!”康有为作出决定。

于是，两封快电相继飞向湖南，要唐才常火速进京。

情况不妙，光绪皇帝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

自从光绪皇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以专折奏事后，康有为就一直成为守旧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各种弹劾、攻击纷至沓来。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上疏攻击维新派，康有为是头一名。为了让康有为躲过风头，光绪皇帝于六月初八日(7月26日)下令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命康有为前去督办。但康有为并未动身，仍在北京指挥维新运动。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光绪皇帝见风头更紧，便发布明诏，命康有为迅速离京，“毋得迁延观望”。同日召见林旭，命他带给康有为一道密诏，解释命他迅速离京的用意，内称：“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

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林旭于当晚访问康有为,适值康有为在御史宋伯鲁家吃晚饭,林旭便将明诏留在康寓,同时留书嘱康第二日勿出,有要事相告。

康有为很晚才回来,毕永年已经等他很久了。

这一天,毕永年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承诺康有为交下的任务。他想:还不知道康有为怎样让我见袁世凯?时间这样紧迫,仓促之间,彼此交浅,如何深言,何能行事?9月17日(八月初二日),他和康广仁商量,不想康广仁大怒道:“汝等尽是书生气,平日议论纵横,及至做事,却又拖泥带水!”

“不是拖泥带水。康先生想用我,必须说清办法。我一命虽微,但不能糊涂而死。凡事贵深谋熟虑。康先生既然令我同谋,何以不能让我置一词!而且,康先生命我领百人行事,尤不能冒昧。我是南方人,初至北军,率领彼此互不相识之兵,十数天中,我何能将他们收为心腹,又何能得其死力?我八岁即随父叔辈来往军中,深知军中弊端。我不过是一个有母丧在身的拔贡生,统带此兵,不独兵不服,同军各将,也会奇怪。”

听了毕永年的解释,康广仁更加不高兴,冷笑着走出房间。

当晚7时,毕永年得知皇帝命康有为迅速离京的消息,觉得情况不妙,待康有为归来后找到他说:“皇上命你出京,事情必定要失败了,但不知袁世凯处消息如何?”

“袁处有幕友徐世昌,与我极交好,我将命谭、梁、徐三人往袁处明言,成败在此一举!”康有为显得既有信心,也有决心。

毕永年见康有为仍然很固执,便将日间对康广仁所说再陈述一遍。康有为也不高兴,生气地说:“你以拔贡生领兵,也很体面嘛,有何不可!此事尚未定,你不用先多虑。”

毕永年不便再说什么了。

康有为不仅要逮捕慈禧太后，而且要乘机将她杀掉，梁启超奉命试探毕永年的态度

初三日（9月18日）一早，林旭来到南海会馆，将光绪皇帝要康有为尽快离京的密诏交给他，康有为便起草密折谢恩，表示誓死救皇上，同时奏报于初四日启程出京，命林旭持还缴命。林旭同时带来的还有光绪皇帝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密诏，康有为找来谭嗣同，共同跪读密诏，又召来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商量营救光绪皇帝的计划。这时，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也来了。康有为等便有意哭得更响亮、更动情一点，企图以此感动徐世昌。这样，徐世昌也哭将起来。于是，南海会馆里顿时一片哭声。

午饭时，钱惟骥对毕永年说：

"康先生要谋弑太后，怎么办？"

"兄如何得知？"

"刚才卓如对我说，康先生的意思是，奏知皇上时，只说废掉太后，待包围颐和园时，将她抓起来杀掉。卓如不知道您肯否担当此事，要我向您打探。此事很明显了，怎么办？"

"我早知道了，他们是想让我当成济。您先等着吧！"三国时，魏帝曹髦与司马昭集团对峙，太子舍人成济一刀从曹髦的正胸穿到背后。毕永年对康有为要自己扮演的角色很清楚。

当晚，毕永年发现谭嗣同彻夜未归。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密谋，袁世凯托词推宕

谭嗣同何以彻夜未归呢！他是受康有为之命去找袁世凯了。

初三（9月18日）晚，袁世凯正在执笔拟折，忽然门房持名片来称："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当袁世凯正准备说"请"时，谭嗣同已经到了客堂。袁世凯知道谭是"新贵近臣"，不敢怠慢，便停笔出迎，请入内室，互道寒暄。

"初次见面，不想公如此相貌堂堂，有大将格局！"谭嗣同恭维袁世凯说。

"公是否初五请训？"谭嗣同继续问。

"现有英国兵船巡行海上，准备具折明日请训后就回津了。"袁世凯答。

"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是内患。"

"为何？"

"公受皇帝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有大难，非公不能救！"听了谭嗣同此言，袁世凯做出大惊失色的样子说："我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答，何况己身又受到不次提拔，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荣某近日献策，将废君弑君，公知此事否？"

听了谭嗣同的话，袁世凯表示荣有"忠义之心"，此说不可信。谭嗣同称：荣禄"此人极为狡诈"。他将六月里徐仁禄对袁世凯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并称："仆也曾几次在皇上面前力保我公，但均为荣某所阻。皇上常说，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此次超升，甚费大力。

公如真心救皇上，我有一策。”谭嗣同说到这里，拿出一份拟就的奏折草稿，内容大意是：

> 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看来，这是康有为、谭嗣同准备在光绪皇帝面前死谏的一道奏章，也是他们清除后党的详细计划。袁世凯读了之后，“魂飞天外”。反问谭嗣同说：“围颐和园欲何为？”

“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表示：要除掉皇太后，部下不会听命。

“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谭嗣同把什么都和盘托出了，要袁世凯立即决定。

“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决定。您今晚杀了我，也不能决定；而且，您今晚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袁世凯想知道光绪皇帝的态度。

“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明日皇上定有朱谕一道，当面交给您。”

袁世凯知道谭嗣同是光绪皇帝的近臣，如果皇帝真的有朱谕交下来呢？但他仍觉得，此事难度太大，便说：“北洋宋庆、董福成、聂士成各

军,有四五万人,淮练各军有七十多营,京内有旗兵数万,本军不过七千人,能够动用的不过六千人,如何能办此事?恐怕外面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皇上的处境就危险了。"袁世凯开始对双方实力进行估算了。

"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嘛!待动兵时,将皇帝的朱谕分发各军,同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谭嗣同知道双方实力悬殊,但认为不足虑。

"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袁世凯毕竟带过兵,打过仗,考虑问题细致一些。

"可以请皇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涉及军事细节问题,谭嗣同不得不退让。

"我万不敢惜死,担心的是万一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袁世凯知道,这是一个紧要关头。他说"不惜死"是假的,真实的情况是他要好好盘算盘算,看看将宝压在哪一方面,才万无一失。但是,谭嗣同自然等不得,他说:

"皇上很着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于是,他拿出皇帝交给杨锐,要他们找出"良策"的密诏来,袁世凯发现是用墨笔写的,立即诘问说:

"此非朱谕,而且并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

"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三天前发交的。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给我,几误大事。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在内。"

"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连累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世凯打定主意,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而谭嗣同却一再催促,声色俱厉,要袁立即决定,以便入宫面奏。袁世凯觉得谭嗣同衣襟高耸,似乎藏有凶器,便转变语气说:

“九月皇上即将巡幸天津，到时军队汇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等不到九月，他们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危险得很！”

“既有皇上巡幸之命，必然不会有意外，必须到下月方可安全。”

“如果九月不出巡，怎么办？”

“现在已经预备妥当，花了数十万两银子了。我可请荣相力求太后，必定出巡，不会停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立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到这里，谭嗣同用手拍了拍脖子，“如您到颐和园告变，杀我，害及皇上，可以得富贵。”谭嗣同觉得该摊牌了，以激烈的语气将两条路摆得分分明明，要求袁世凯决断。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说着，袁世凯慷慨激昂起来，“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营中，杀荣禄如杀一狗耳！”这样，谭嗣同似乎相信了。他从座位上起立，连连向袁世凯作揖，称他为“奇男子”！

两人还谈到“两宫何以不和”等问题。最后，谭嗣同表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除去，才能办事！”

夜已经很深了。袁世凯托词还要赶办奏折，谭嗣同这才离开袁世凯的法华寺寓所。袁世凯没有答应马上行动，他觉得很失望；但是，袁世凯也没有坚决拒绝，这使他对未来仍然抱有希望。他当然不知道，旧党方面的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当日白天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章，这道奏章改变了维新派的命运，使得近代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大曲折。

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还宫,维新派的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

八月初四(9月19日)早餐后,毕永年发现谭嗣同回到寓所,急不可耐地向他打听消息。谭嗣同正在梳头,有气无力地说:“袁还没有答应,但也未坚决推辞,想慢慢地办。”

“袁究竟可用与否?”毕永年再问。

“此事我与康先生争过数次,先生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谭嗣同不无牢骚地说。

“昨夜是否将密谋全部告诉袁了?”毕永年再问。

“都说了。”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吗?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不可与他们同归于尽,无益呀!”毕永年急得差点跳起来。

午后1时,毕永年迁居宁乡会馆,离南海会馆只有几家,好及时打听消息。

当日,康有为访问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想请英国驻华公使出面相助,但是,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想找美国公使,美国公使到西山去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慈禧太后突然于晚间从颐和园回宫。

杨崇伊到颐和园上奏章，慈禧太后决定提前下手

慈禧太后突然回宫是杨崇伊头天上奏章的结果。

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进士出身，时任广西道监察御史。他和李鸿章是姻亲，其活动常有李的背景。康有为和文廷式等组织强学会时，他即上疏弹劾文廷式，因此，强学会一度被封禁。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撤职后，他即继怀塔布之后赴津与荣禄密谋，确定计划。初三日(9月18日)，他通过奕劻向慈禧上奏章，声称文廷式创立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称：今春会试，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奏章激烈地攻击维新运动，说是“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奏章特别提出：“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要求慈禧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密捕大同学会中人，分别严办。在旁哭诉的除庆亲王奕劻，还有端王载漪。

杨崇伊的这道奏章很有煽动性。它不仅迎合了慈禧的守旧心理，而且也迎合了慈禧对洋人的疑惧感。伊藤博文原是日本的总理大臣，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对手。戊戌年下野后，以从事远东外交自任。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来华，二十九日(9月14日)到达北京，先后会见总署王大臣、康有为、张荫桓等人，定于八月初五日觐见光绪皇帝。当时，英人李提摩太已经提出，建议中国政府聘请伊藤为顾问，中国官员中也有聘任伊藤为“客卿”的类似意见，还传说伊藤有可能进入军机处，等等。杨崇伊奏章中所说伊藤“将专政柄”，即指此类传说。慈禧本来

就担心变法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现在,这个洋鬼子来了,马上就要和皇帝见面,如果二人结合起来,如何得了!

这就是慈禧为什么突然回宫的原因。

光绪皇帝照旧召见袁世凯和伊藤博文,但已处于慈禧太后的监视之下

初五日(9 月 20 日),光绪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奏说:"古今各国变法都不容易,非有外患,即有内忧,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而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出而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然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自从初三日谭嗣同夜访后,袁世凯就"反复筹思,如痴如病"。这时候,袁世凯显然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政治走向。据袁世凯日记记载,光绪皇帝听了这一段话后,"颇为动容"。但是,"无答谕",什么也没说。

光绪皇帝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这只能说明他已经受到监视,什么也不能说了。

当日中午,光绪皇帝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倒是说话了。

"贵爵维新以来之政治,为各国所称扬。贵爵对于祖国之功业,实无人不佩服。"

"过蒙奖誉,实不敢当。臣不过仰体我天皇陛下之圣谟,聊尽臣子职分。"伊藤很谦虚。

“贵我两国，地势上同在一洲之内，最亲最近。目今我国改革，迫于必要，朕愿闻贵爵意见，请贵爵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

在伊藤表示“敬奉谕旨”之后，光绪皇帝又说：“常与贵国同心协力，永久继续亲密国交，是朕所最为切望的事。”

这实在是几句套话。当时，慈禧太后就在帘内（一说在屏后）监听，他还能说什么呢！

慈禧太后回宫后，除了监视光绪皇帝外，立即下令呈缴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新章京所签各项文件，她要一一审阅、检查……

袁世凯回津告密之际，慈禧太后已经在北京发动政变

袁世凯初五日请训时，见光绪皇帝不说话，便请安退下，奔赴车站，登车回津。

回津后，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总督衙门拜见荣禄，“略说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正说间，荣的幕僚等人入坐，袁世凯一直坐到二鼓，始终没有说话机会，只好退下，约定第二天早晨再来拜访。

初六日（9 月 21 日）一早，袁世凯本想再次拜见荣禄，不料荣禄却主动来见袁世凯了。这回，袁世凯详细地报告了有关情况。荣禄听到袁转述的天津阅兵时废掉光绪皇帝的计划时，脸色大变，自辩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近来屡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都不及今天所谈详细。”袁世凯也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果累及皇上的

位置，我只有饮药自杀了。”据说，“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

这边荣禄和袁世凯在商量，北京的慈禧太后却已经在当日一早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同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声称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捕拿，交刑部治罪。御史宋伯鲁也因为在维新运动中出了不少风头，以“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

逮捕康氏兄弟之命既下，崇礼立即出动士兵，查抄南海会馆。不过只抓到了康广仁，前一天，康有为已经谭嗣同力促，遵照光绪皇帝指示，离开北京，经天津，换乘英船南下了。

向慈禧上奏，请慈禧“训政”的是杨崇伊。现在如愿以偿，自然高兴异常。他马上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喜讯。荣禄不愿独享，派人持帖找来袁世凯。荣禄拿着一杯茶，笑着递给袁世凯说：“此非毒药，你可以喝！”袁世凯被光绪皇帝破格召见，破格提拔，荣禄不能没有戒心；现在证明，袁世凯仍然忠于自己，忠于太后，荣禄很满意，开了一句玩笑。

初七日(9 月 22 日)，杨崇伊返回北京。自然，他带回了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

康有为“围园”密谋暴露，谭嗣同等英勇就义

慈禧太后再度“训政”时，还不知道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他兵围颐和园的有关情节。所以她的处分对象只限于康有为、康广仁和宋伯鲁。杨崇伊回京后，报告奕劻，奕劻报告慈禧，慈禧立即于初八日(9 月 23 日)审讯光绪皇帝，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

康有为走后，梁启超、谭嗣同还在找寻挽救时局的办法。初六这

天，梁启超到浏阳会馆访问谭嗣同，二人正在对榻密谈之际，忽然传来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南海会馆的消息，接着，又传来慈禧垂帘听政的消息。这两条消息宛如猛然炸响的当头霹雳，二人都为之一震。但是，谭嗣同早就作了为变法流血牺牲的准备，因此很快就平静下来，从容地对梁说："此前想救皇上而无可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可救。我已无事可办，只待死期了。"他建议梁启超到日本驻华使馆，拜会伊藤博文，请伊藤致电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助康有为。梁启超觉得所能做的也仅此了，便依言进入日本使馆。

初七日，谭嗣同到日本使馆会晤梁启超，将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家书等物交给梁启超，托他保管。谭劝梁启超出走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将生的希望推给了梁，将为变法牺牲、激励国人的责任留给了自己。二人都知道，这是生离，也是死别，谭嗣同与梁启超一抱之后，大踏步地走出了日本大使馆。

自初八日起，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张荫桓、徐致靖等陆续被捕。杨深秀因上疏反对慈禧训政，也同时被捕。接着，清政府又下令拿办杨崇伊奏章中提到的孙文和文廷式。凡是重要的新党新派，慈禧太后一个也不放过。

慈禧太后回宫后，即将光绪皇帝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初十日(9月25日)，"上谕"称：皇帝病重，命中外保荐精通医理之人。这件"上谕"，目的在为有朝一日废掉光绪皇帝制造舆论准备。

十一日(9月26日)，清政府宣布：恢复被光绪皇帝精简掉的詹事府、通政司等机关；禁止士民上书言事；停办官报馆，停止各省祠庙改设学堂，维新运动的新芽被一一掐死。同日，慈禧太后下令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行审讯谭嗣同等人。次日，加派御前大臣会审，但不久，又通知"勿用审讯"。十三日(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

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次日，清朝政府发布“上谕”云：

>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

显然，这“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新罪名，乃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

谭嗣同等牺牲这一天，北京先是阴霾密布，继而风雨交作。当时，维新运动的思想家、宣传家严复正在北京，他写了一首沉痛的哀诗：

>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①]，莫遣寸心灰。

诗中，严复对谭嗣同等被害表现了强烈的不平，他勉励自己，不要因此灰心，要为中国的改革和富强继续奋斗！

附记：本文主要依据笔者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的毕永年日记及其他档案、文献写作，所有对话、细节，均有依据，幸勿以“纪实文学”视之。

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4期，有个别修改之处。

---

① 鸣犊，窦鸣犊，晋国大夫，贤臣。《史记》载，孔子不为卫国所用，想投奔晋国，走到黄河边上，听到窦鸣犊等为赵简子所杀，便叹惜道：“我孔丘不渡黄河，是命啊！”折回不赴。此以窦鸣犊比喻谭嗣同等。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①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专著都不能不阐述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在这两份资料中，袁世凯的《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不过十一天，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直接资料；梁启超的著作，其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且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间接资料，而且，梁启超晚年还曾自述，《政变记》并非“信史”，其中有个人“感情作用”支配，将“真迹放大”之处。② 因此，袁世凯的《纪略》似应更为可靠。但是，由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奸大憝”，被认为“一生善于作伪”，所以，尽管他信誓旦旦地保证《纪略》的真实性，仍然不能为人们所取信。有关夜访等记载，史家们宁可取梁而弃袁，其结果是使戊戌政变的真相长期得不到正确揭示。

本文将对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作出评估，并由此探讨戊戌政变中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

---

① 笔者见到的《戊戌纪略》抄件共两种。一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改题为《戊戌日记》；一种存于湖南省博物馆，注明系袁政府秘书监夏寿田（午诒）家藏（馆藏号，史1，3068）。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见《饮冰室合集》专集，91页。

袁世凯的《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则有意隐瞒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包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

对此，《纪略》记谭嗣同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拟上光绪皇帝的奏章，内称：

> 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①

当袁世凯询问谭嗣同，“围颐和园欲何为”时，谭嗣同直言相告：“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谭嗣同所称颐和园中的“老朽”，当然指的是慈禧太后。

这是维新派精心设计的一份完整的政变计划，分两步。第一步，诛荣禄。其理由是荣禄向慈禧太后献策，借九月天津阅兵，光绪皇帝巡幸天津之机，废弑皇帝。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谭对袁世凯称：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550～5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康南海自编年谱》云：

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又记袁表态云：

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在以上记载里，梁启超、康有为为一方，袁世凯为另一方，双方记载相较，在第一步杀荣禄上完全一致，可见双方记载均属实。

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是杀慈禧太后。其进行步骤是：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由维新派自己的人动手杀掉慈禧。关于此，毕永年《诡谋直纪》记钱惟骥奉梁启超之命，试探毕永年态度时曾说：

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①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笔者整理本见《近代史资料》总63号。

可见，袁世凯关于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所述，也属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生死之交，维新派计划由毕永年动手执行慈禧太后的死刑，所以，谭才对袁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稍后，又再次对袁强调："去此老朽，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①

由上述可见，袁世凯关于谭嗣同夜访的主要情节的记载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是准确、适度的，没有夸张之词。反观梁启超的有关记载，则只有诛荣禄的第一步，对第二步，则坚决否认，称之为诬蔑、捏造之词。② 不仅如此，而且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形势变化，康有为有透露之意的时候，梁启超还认为"必当隐讳"，要求康有为继续保守秘密，"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③。

袁和梁的记述，在大关节上，到底谁可信呢！

《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袁世凯《戊戌纪略》不仅主要情节可靠，其次要情节，许多地方也可以一一考实。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英舰游弋问题。《戊戌纪略》称：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

---

① 参阅本书《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② 《戊戌政变记》，64、92页，中华书局，1954。

③ 梁启超《致康有为密札》，见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860～861页，台北版；参阅本书《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查台湾“中研院”所藏总理衙门收电档，八月初二日，聂士成致电荣禄云：“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船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皇岛，风闻系英国兵舰。”同日，又电云：“现外国兵轮已泊塘沽口内。”八月初三，荣禄即据此电告总理衙门。可见，《纪略》所称“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一事，确有来历。又据八月初六日天津《国闻报》载，聂士成军确于初四、初五由芦台拔队来津。可见，《纪略》所称荣禄调聂士成军来津驻扎，亦系事实。①

（二）反间计问题。《戊戌纪略》载，谭嗣同为了打动袁世凯，曾特别提出，荣禄阻碍袁世凯晋升。谭的原话是：“此人（指荣禄——笔者）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关于此事，《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当年六月，康为了离间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曾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对袁说：“我（指康）与卓如、芝栋、复生屡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两者完全相合，特别是“跋扈不可用”云云，竟完全一致。

关于反间计，《诡谋直纪》也记载，康有为曾对毕永年说“吾已令人往袁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

（三）电召湖南好汉问题。《戊戌纪略》称，谭嗣同曾对袁世凯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关于此，《诡谋直纪》记：毕永年曾建议发电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谋，得到康、梁、谭三人赞同，连发两电催促。

（四）光绪皇帝密谕问题。《戊戌纪略》记，谭嗣同曾向袁世凯出示

---

①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524～525页。

光绪皇帝的密谕，其内容大概为："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关于此谕，杨锐儿子后来交出的正本为："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将袁世凯所述和密谕正本相较，虽有长短之别，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提到康有为这一点上，二者也相同。

《戊戌纪略》又记谭在袁面前埋怨说："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查有关记载，光绪皇帝的密谕是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但杨锐惊恐不知所以为计，直到八月初三才通过林旭交到康有为、谭嗣同手里。这些情况，足证《纪略》有关记载相当精确。

（五）袁的推宕策略问题。《戊戌纪略》记，袁世凯没有答应谭嗣同立即回津举事的要求，而是推到九月天津阅兵时动手。袁称："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关于此，《诡谋直纪》载，初四一早，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夜访结果时，谭答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两者所述相合。

（六）举荐张之洞。《戊戌纪略》记袁世凯初五请训时，曾向光绪皇帝推荐张之洞，说是“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按，袁世凯在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奉召到北京时，即有推荐张之洞的打算。当日，钱念劬致电张之洞云：“袁臬明后见，欲请帅入枢。”[①]

根据以上六条，可证在若干次要情节上，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没有说谎，其记述基本可靠。

袁世凯有无不老实之处呢？当然有。其一，上引《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袁世凯称：“杀荣禄乃一狗耳！”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更为详细具体。不仅有对话，而且有对话时的神态。据该书，当谭嗣同说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时，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后，必然向康、梁作详细汇报。袁世凯的这一表态必然给了康、梁以深刻印象，所以几年之后，康有为想再次利用袁世凯的时候，曾经给袁写过一封信，内称：

> 中国岌岌危亡，横睇海内，能救者惟公耳。八月三夜之言，仆犹记之，慷慨而许诛尔朱。中间之变，殆出于不得已。盖闻尔朱已先调董、聂之军，无能为役，杀身无益，不若留以有待。此实志士之苦心也。

函中所称“尔朱”，当即荣禄；所称“八月三夜之言”，当即“诛荣禄如杀一狗”的慷慨表示。给袁世凯本人写信，自无捏造袁本人言行的可能。[②]

---

① 《张文襄公集》卷156，29页，文华斋1928年刊本。

②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微胶卷。尔朱，北魏时有尔朱荣，权奸。这里暗指荣禄。

衡以上述记载及资料，谭嗣同夜访时，袁世凯曾有过“诛荣禄”的表态（哪怕是虚与委蛇），应无疑义。但是，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却只字未提。“诛荣禄如杀一狗”云云，在袁世凯看来，既有损他的形象，泄露之后也影响他和荣禄的关系，加以掩饰是必然的。

其二，在《纪略》中，袁世凯对自己颇多美化。在维新和守旧的两派斗争中，袁世凯投靠守旧派，主要是出于对双方力量对比和个人利害的考虑，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所谓“人臣之大义”。这一点，读者极易明白，无须多言。

《纪略》在某些细节上也可能还有一些可疑之处，但是，就总体而言，它的真实性较《政变记》为高。

相关问题

如果我们肯定《戊戌纪略》基本可信，那么，与戊戌政变相关的几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

维新派要袁世凯举兵的理由是荣禄与慈禧太后密谋，要在九月天津阅兵时废掉甚至杀掉光绪皇帝。八月初六日晨，袁世凯告密时曾将此点告知荣禄，但荣禄坚决否认。据《戊戌纪略》，荣禄听后，脸色陡变，大声呼冤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荣禄内心是否一丁点儿“犯上”的想法都没有，笔者不能妄测，但是，所谓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则可以否定。其理由：1. 光绪皇帝光杆儿一个，没有实权，要废要弑，在北京即可，不必待到天津阅兵时候，也不必如此大动兵戈，麻烦费事。关于此，前人已经指出：“夫太后、荣相

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压制之耳！”[①]2.决定在天津阅兵，时在七月初八日，那时，光绪皇帝还没有下令精简机构，也还没有斥革怀塔布等礼部六大臣，和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化，慈禧太后还不会下如此狠心。3.后来，慈禧太后真正发动政变了，其过程十分简单，车驾从颐和园还宫即可，对光绪皇帝，也仅止于剥夺实权，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并没有取消其皇帝的名分，她在七月时怎么可能就有废弑之想呢？4.即使有废弑之想，事属极密，康有为等何从得知？对此，维新派从无说明。因此，可以肯定，所谓废弑之说乃是维新派的一种虚构。梁启超说：“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②]康有为说：“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③]这里的“意”字、“谅”字、“虑”字，都很能说明实质。当两种政治力量进行生死较量时，神经过敏，估计情况过于严重是常有的事。

然而，问题又不止此。维新派之所以虚构天津阅兵时的废弑之说，与其说是出于疑惧，毋宁说是出于需要——为己方的政变制造舆论。

维新派早就认为变法的最大障碍在于慈禧太后，计划有所处置。当年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的第二天，梁启超即致函夏曾佑云：“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④]后来，王照流亡日本，向犬养毅透露说：

---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一)，336页。

② 《戊戌政变记》，73页，中华书局，1954。

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159页。

④ 《梁启超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照亦深以为然。盖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权也。及叩尊君权之道，则曰非去太后不可，并言太后与皇上种种为难之状。①

由此可知，处置慈禧太后的计划当酝酿于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后不久。至于处置方法，则是利用“兵力夺权”②。康有为、杨深秀都曾表示：“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③为此，康有为曾想利用王照和聂士成的把兄弟关系，动员聂执行这一任务，许以事成后任命聂为直隶总督，为王照拒绝。这以后，康有为才转向依靠袁世凯。但是，要处置慈禧太后，必须得到光绪皇帝首肯，也必须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动员内部，而天津阅兵时废弑皇上之说正好可以满足这两个需要。它一可以制造紧张气氛，吓唬光绪皇帝，逼他按维新派的路子走；一可以动员毕永年和袁世凯等人出来“勤王”。《诡谋直纪》载，七月二十七日康有为曾对毕永年说：

>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试想，如果没有太后想“弑皇上”这一条理由，毕永年、袁世凯如何肯出死力效命？事成之后，又何以向天下后世交代？

此外，守旧派没有天津废弑密谋还可以从荣禄对光绪皇帝的态度

---

①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见《戊戌变法》（四），331 页。

② 王照：《方家园杂咏记事自批》，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43 页。

③ 《康有为事实》，见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

上得到证明。

《戊戌纪略》载，袁世凯在向荣禄告密时曾表示："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为此，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又记载，荣禄奉召入京时，袁世凯叮嘱他："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而荣禄则答以"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声称："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云云。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光绪又还年轻，来日方长，荣禄、袁世凯在决定向慈禧告密时，不愿牵扯光绪皇帝是可能的。上引袁世凯对荣禄所说的一番"忠义"之言，目前虽难以找到证明材料，但是，荣禄对袁世凯的答语却是有旁证可稽的。据当时报纸报道，荣禄入京后，确曾以"调和"自命，声称此行目的，"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①]。这里的语气、基调和《戊戌纪略》所记他和袁世凯的对话相同。有记载说，次年，在慈禧太后真正想废掉光绪皇帝时，荣禄曾建议立"大阿哥"，保持皇帝名义。[②] 还有记载说，荣禄有时还能在慈禧太后面前为光绪皇帝"宽解"[③]。凡此，均可证明《戊戌纪略》记荣禄称"决不至累及上位"，以及他企图"调和"之说为不虚。既然在光绪皇帝实际上成为阶下囚时，荣禄都不赞成将他废掉，此前自然更不会有将他废掉、杀掉的想法。

附带应该论及的是，荣禄的思想和主张大体上属于洋务派，和奕劻、刚毅等有别。将荣禄描绘为死硬、凶恶、阴险的顽固派，是梁启超等人夸张、渲染、"将真迹放大"的结果。

---

① 《中堂入京》，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②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戊戌变法》（一），478 页。

③ 金梁：《四朝佚闻》，见《戊戌变法》（四），222 页。

（二）慈禧太后政变与袁世凯告密的关系

《戊戌纪略》述，袁世凯于八月初五日返津后，即到荣禄处告密，“略述内情”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话还未说完，连续来了两位客人，袁世凯得不到讲话机会，便告退，约好第二天早晨再次拜访。初六一早，荣禄主动到袁处了解情况，袁详述谭嗣同夜访情节。二人商量如何保护光绪皇帝，没有找到办法。当晚，荣禄召见袁世凯，袁发现北京来的御史杨崇伊在座，杨带来了慈禧太后当日宣布“训政”的消息，等等。

袁初五晚向荣禄告密时，何以不要求荣禄屏退入座的两位客人？荣禄何以不单独留下袁世凯深谈，而要待到第二天早晨才去找袁询问？这些情况，由于资料不足，不好揣测。[①] 但是，袁所述的告密情节清楚地摆脱了他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关系，是否可靠呢？

慈禧初六“训政”，立即命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弟兄和御史宋伯鲁，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等，这是慈禧“训政”和袁世凯告密无关的铁证。袁世凯告密而不提谭嗣同，或者慈禧有意缓捕谭嗣同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慈禧太后的再次“训政”应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关于此，时贤已有论述，兹不详论。笔者只想指出，此点亦可证《戊戌纪略》的有关记载属实。

（三）杨崇伊的作用

《戊戌纪略》载，政变当天，杨崇伊即从北京匆匆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再次“训政”的消息。杨如此积极，正说明了他和“训政”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慈禧“训政”，应从他身上找寻原因。按，杨崇伊属于李鸿章系统的守旧派，他连强学会都反对。怀塔布等六个礼部堂官被斥

---

① 根据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未刊稿），袁世凯八月初五晚，曾与徐世昌谈话，所谈内容亦不得而知。

革后，他曾于七月二十八日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其后，他即通过庆亲王奕劻于八月初三日向在颐和园的慈禧上书，要求太后再次“训政”。这道奏章指责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指责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这道奏章特别使慈禧太后不安的是关于伊藤博文的消息：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按，伊藤博文于当年七月二十三日来华后，即陆续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中国官员提议任用他为顾问或“客卿”，光绪皇帝且决定于八月初五日接见他。慈禧太后本来就对变法不满，在她看来，如果光绪皇帝任用伊藤，得到洋鬼子的帮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她才于初四日晚匆忙还宫，并于初五日中午光绪接见伊藤时坐在帘后监听。关于此，张荫桓回忆说：

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坐，太后皆见之。①

---

① 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见《戊戌变法》(一)，493 页；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亦云:“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询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见《戊戌变法》(一)，346 页。

张荫桓把他获罪的根源归结为慈禧太后看见他和伊藤握手、挽袖，未免过于简单，但是，这则材料说明了慈禧太后匆匆还宫"训政"，除了她对维新运动不满外，还在于害怕光绪和洋鬼子结合。[①]

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说明杨崇伊奏章的作用，这就是，慈禧"训政"后，除了首先下令逮捕他奏章中攻击的康有为弟兄外，接着，又于八月初十日下令访拿或密拿文廷式和孙文，于十四日下令拿办梁启超，这三人，都是杨崇伊奏章中的参劾对象。

慈禧太后政变和杨崇伊奏章之间的关系，前人早已指出。例如，长期在光绪皇帝左右供职的恽毓鼎就认为杨崇伊的奏章导致政变。[②] 政变发生后几天，叶昌炽和几位关心此事的友人讨论，"各证所闻，知莘伯发难无疑义"[③]。只是由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认慈禧政变成于袁世凯之手，因此，人们普遍不采恽、叶二说，结果，愈相信梁启超，许多史实之间就愈加显得矛盾扞格，胶葛不解。

明确了杨崇伊在促成慈禧太后政变中的作用，那么，后续的问题就很清楚了。

八月初六晨，袁世凯向荣禄详细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情节。当晚，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政变消息，荣禄特意召来袁世凯。初七日，杨崇伊返京，自然，他会带走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云："(荣禄)遣人变服赍蜡书，驰告奕劻，奕劻言于太后。"[④]"变服赍蜡书"云云，情节未必如此，但是，他指出荣禄"遣人"入

---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明日监视皇上见伊藤也。"见《戊戌变法》(一)，345 页。

② 《崇陵传信录》，见《戊戌变法》(一)，476 页。

③ 《缘督庐日记钞》，见《戊戌变法》(一)，531 页。

④ 《戊戌变法》(一)，378 页。

京告变应该是可信的。谁能当此重任呢？杨崇伊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物了。

《戊戌政变记》、《慈禧传信录》等书载，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后，迅即亲身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许多史家均视此为信史，其实，这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猜测之谈。《戊戌纪略》载，荣禄于八月十日(9 月 25 日)奉召入京，这才是可信的。

慈禧太后从奕劻那里得知谭嗣同夜访情节应为八月初七日下午以后，因此，八月初八日凌晨，慈禧太后立即密令逮捕谭嗣同等人。[1] 八月十三日(9 月 28 日)，清政府处斩谭嗣同等人的"上谕"指责康有为等"首倡邪说"，"构煽阴谋"，其主要内容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就是袁世凯告密后增补的罪状了。

(四)光绪皇帝的知情程度与赐袁世凯密谕问题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光绪皇帝曾赐以"朱笔密谕"[2]；英人濮兰德的《慈禧外纪》称：光绪在乾清宫密室召见袁世凯，"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其他如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等书，都有赐袁世凯"手诏"或"密谕"的记载。其中最有权威的当推张一麐的《古红梅阁笔记》，该书在叙述谭嗣同"谋围颐和园"的有关情节后记载云："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3]张并加注说明，他的有关记载"皆袁所亲告人者"。张是袁世凯的幕客，1909 年袁世凯被清政府赶回老家前夕，他曾向袁面问颠末，袁

---

① 魏允恭《致汪康年等人函》云："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该函末署八月初八日。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115～311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 《戊戌政变记》，64 页。

③ 《心太平室遗集》卷 8，1947 年排印本。

第二天即将《戊戌纪略》交付给他。因此，张说似乎不容置疑。但是，此说却与《戊戌纪略》所述相反。

据《戊戌纪略》，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时，只有袁世凯一人独白，在他劝光绪皇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任用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出面赞襄变法后，皇帝虽然"动容"，但是，"无答谕"，什么话也没有说，当然什么密诏也没有给。两者孰为信史呢？

查毕永年《诡谋直纪》，八月初三日，钱惟骥试探毕永年时言梁启超曾说："（康）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又上引《戊戌纪略》载，谭嗣同夜访时，曾向袁出示一份拟好的奏章，其中谈到"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谭并对袁说："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可见，谭嗣同要在和袁世凯说定后才入宫死谏，袁世凯既未同意，谭嗣同自无深夜入宫面奏的必要，光绪皇帝因而也不可能知情。初四晚，慈禧太后还宫，第二天，即对光绪皇帝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袁世凯请训时，即有某侍卫大臣窃听。[①] 自然，光绪皇帝不可能对袁世凯有什么指示，也不可能以密诏相付；如果有，他的命运肯定要比软禁瀛台糟糕得多。[②]

以上阐释了与《戊戌纪略》相关的四个问题。多年来，史家们为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伤透了脑筋；现在是否到了廓清迷雾、还其本相的时候了呢？

---

① 《古红梅阁笔记》云，袁世凯请训退朝后，"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

② 我过去曾相信光绪皇帝初五日对袁世凯有密谕或密诏，见拙文《光绪皇帝与戊戌密谋》，《历史教学》1986 年第 12 期，应予撤销。

题外赘言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疑站在领导时代潮流的进步方面，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有所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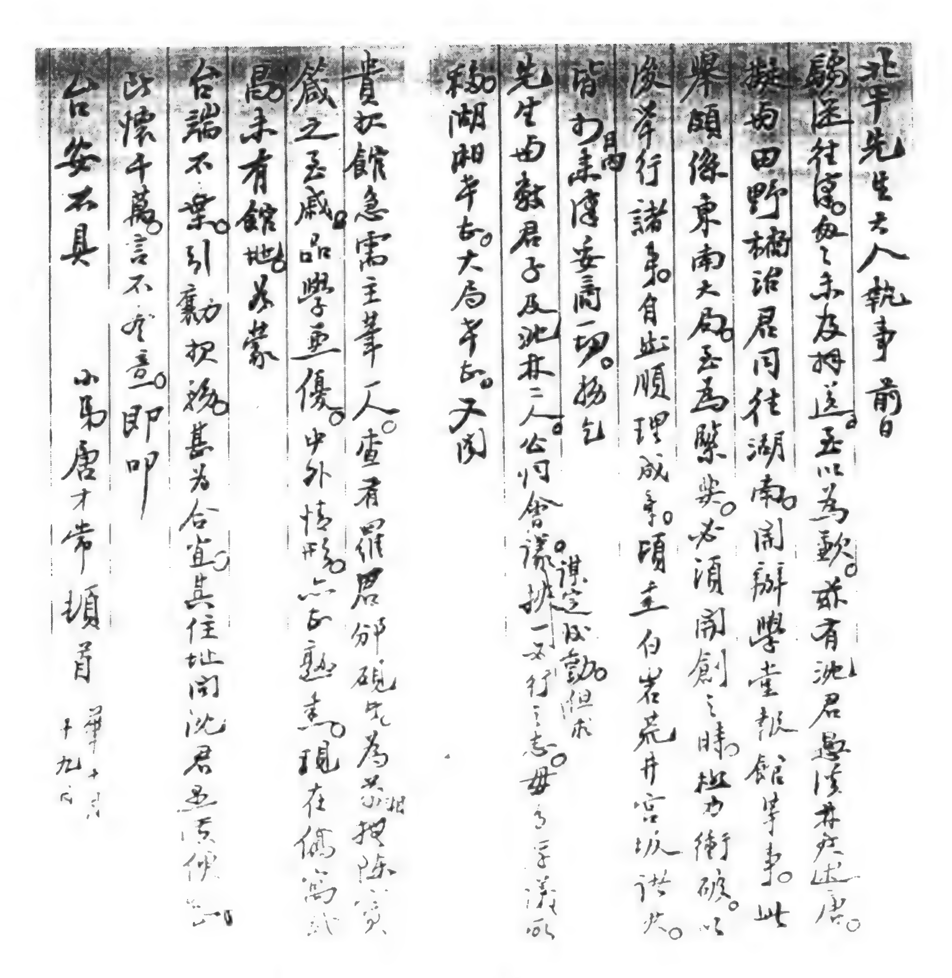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手札一通，为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所未收，迄今尚未有人论及。它为研究唐才常和自立军起义提供了新资料。

函称：

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下略）

末署："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日。"

宗方小太郎，号北平，日本肥后人。1864年生，年轻时从学于军国主义分子佐佐友房，中法战争期间到中国。1890年接受日本海军部任务，在中国收集情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化装潜入威海卫、旅顺两要塞刺探。1898年在汉口经营《汉报》。同年归国，发起组织东亚同文会。1899年，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漫游欧美后，便道访华。10月25日，抵达上海。27日，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宗方小太郎随行。函云："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本函作于1899年11月2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可知唐才常当时在上海。函中所言沈



北平先生大人执事：前日
晤谈，往返匆匆，未及畅谈，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
拟与田野橘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
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
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须走白岩、荒井、宫坂诸先生
皆[illegible]未[illegible]妥商一切。务乞
先生与教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以动，但求[illegible]一[illegible]行之志，毋[illegible]
[illegible]湖湘幸甚，大局幸甚。再闻
贵报馆急需主笔一人，查有罗君[illegible]先生为[illegible]
箴之至感。品学兼优，中外情形亦甚熟悉，现在侨寓[illegible]
岛，未有馆地，为[illegible]蒙
台端不弃，引[illegible]报务，甚为合宜。其住址问沈君愚溪便知。
[illegible]怀千万，言不尽意。即叩
台安不具
小弟唐才常顿首
[illegible]

唐才常手迹（采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君愚溪，指沈荩，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1900年2月，在上海与唐才常共同发起组织正气会（旋改称自立会），任事务员。同年7月，参加张园国会。后被推为自立军右军统领，在湖北新堤发难。林君述堂，指林圭，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1899年冬归国，参加组织正气会。1900年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机关。8月被捕，22日被害。田野桔治，一作田野桔次，日本

人。唐才常等创立的正气会,时对外托名东文译社,即以田野桔治为社长。后来,他又出版《同文沪报》,为自立军作宣传。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相识于戊戌政变之后,二人曾和康有为一起,在日本商量推翻西太后统治的起义计划。宗方小太郎 1898 年 10 月 31 日日记载:

>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①]

柏原,即犬养毅的亲信柏原文太郎。宗方的这一页日记提供了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计划轮廓和进军路线。当时,距西太后重新训政不过四十天,康有为、唐才常就已经决心以武力为维新事业开辟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跃进。旧说以为变法的失败就是改良派堕落的开始,这一划分未免过于机械。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的第二次见面在 11 月 1 日。当日宗方日记云:

---

① 《宗方小太郎文书》,673 页,日本原书房版。

> 湖南人毕永年、唐才常等来访。唐系南学会代表人，拟在湖南举义，为求我同志助力而来。余恳切劝谕，约以暂且沉潜待机，在此间专力准备，待余至清国后妥定方略。[1]

毕永年，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图谋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其中捕杀西太后的任务即交给了他。这时，他正和唐才常一起筹划起义。显然，唐才常对宗方愿为义军"增添力量"的表示极感兴趣，因此，第二天便偕毕永年登门拜访。

唐才常原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激进派。他与康有为一起确定了起义计划后，即积极从事筹备与组织工作，1899 年春，毕永年偕宗方的同学、日本人平山周赴汉口，会见林圭，三人一起入湘，联络各地哥老会。同年 5 月，毕永年派长沙人张灿、谭祖培、李心荣赴日，会见宗方，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2] 此前，唐才常也回到国内，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这年秋，唐才常再次赴日，得见孙中山，商定孙、康两派合作，共同在湖南、湖北及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这一时期，唐才常还联络了在东京高等大同学堂学习的林圭、蔡锷等一批留学生，决定回国举事，11 月，孙中山、梁启超为之饯行。不久，唐才常首途回沪，林圭及田野桔治也于同月中旬到达上海。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函正是在此情况下写成，由林圭等亲手递交的。

湖南是康有为、唐才常起义计划中的发动点。唐才常派沈荩、林圭及田野桔治去武汉的目的是联络张之洞，通过张取得合法身份，以办学、办报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信中，唐才常要求宗方与沈荩、林圭及白岩、荒井、宫坂等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显然指起义一类事

---

① 《宗方小太郎文书》，673 页。

② 同上书，674 页。

情,如果只为了办学、办报,是不值得如此重视的。

在唐才常致函宗方的前十八天,宗方曾在武昌访问张之洞,了解他的态度。谈话中,张之洞激烈地指责康有为一派欺君卖国,对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出境表示感谢,宗方则答以并非驱逐,而是有志之士劝告康有为自动离日的结果。张之洞便顺着宗方的话头,进一步要求"劝告"梁启超离日。宗方发现张之洞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有可能响应义举,失望而去。[①] 这可能是促使宗方改变对唐才常起义态度的原因之一。

沈荩、林圭、田野桔治的湖南计划也因未能打通张之洞的关节而无法进行。据田野桔治记述:"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②]这里所说的"日本愚物三人",当即唐函所称"白岩、荒井、宫坂"。他们不愿充当沈荩等人和张之洞之间的中介。田野愤愤地表示:"倘彼愚物而为德、法人,予必赠以决斗书,而先流其血以浣恨矣!"[③]田野的记述表明,围绕对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态度,日本大陆浪人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白岩等人的态度是宗方小太郎态度的反映。在策划起义的最初阶段,宗方表示支持,这使康有为等增强了起义的决心;但是,宗方后来却并不积极。他们和康有为等发生关系本来就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因而其反复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宗方等改变了态度,但是,唐才常、沈荩、林圭等还是积极筹备,不过计划中的起义中心却逐渐转移到了湖北。

原载《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

---

① 《宗方小太郎文书》,676~677 页。

② 杜迈之:《自立会史料集》,207 页,岳麓书社,1983。

③ 《自立会史料集》,208 页。

保皇会的“妙语妙事”

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流亡海外时期的文献，觉得很有些“妙语妙事”，可以介绍给读者。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史上有一流人，形成了某种立场、观点之后，就很难改变。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把维新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变法失败后，仍然纹丝不变，把扶助光绪皇帝复位作为头等重要的政纲。为此，他们大造舆论，把光绪皇帝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才一见的“天纵之资”。所谓“天纵之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天才了。

在康、梁看来，光绪不做皇帝，中国就要亡国，光绪一做皇帝，中国就要成为头等强国。光绪皇帝的才能可谓大矣哉！神矣哉！要问什么是个人迷信的话，此即一例。

1899 年 7 月，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全称“保救大清皇帝会”。8 月 4 日，适逢光绪皇帝生日，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那场面，据描写是：“烛设辉煌，箫鼓铿锵，冠裳璀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一群人或长袍，或短衣，一律“拳跪起伏，九叩首”。康有为因为感情冲动，竟至于号啕起来。当然，那时有不少加拿大人在旁看热闹，康有为以为他们也很感动，居然记载说：“西人左右视，皆以为未之见云。”

这以后，保皇会逐渐发展到中美、南美、檀香山等一百四十余个城市，会员据说有数百万之多。该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规条。其内容据记载是：“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张灯结彩而恭祝，旬日则召众议事而齐来。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

圣主之像。”一处说是“万岁圣牌”，一处说是“万寿之牌”，两相比勘，推想起来，不外是一块牌子，写上“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至于“人悬圣主之像”，笔者因对徽章史素无研究，不知道保皇会员胸前所挂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铜质乎？铁质乎？圆形乎？星形乎？三角形乎？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光绪皇帝的“御容”是怎样制作上去的？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国内文物部门倘有收藏，那是亟愿一观的。

至于会议程序，檀香山保皇会有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先生(指梁启超——笔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不仅要祝“皇帝万寿”，而且要祝康先生“平安”，还要“齐声喝彩三声”。笔者读了这段记载，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场面，不禁哑然失笑。历史是何等相似呀！当年，“四人帮”之流以扫四旧、立四新相号召，口口声声指责别人为“保皇派”，然而，他们所立的“新”呢，不过是康、梁保皇会的余唾而已。

历史有着巨大的惰性。霉腐的封建沉渣有时会包裹着华丽的装潢，仿佛是什么代表时代趋向的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读点历史，长长见识，还是很有必要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6 年 9 月 28 日

康有为致日、英各国领袖函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着康有为的一份英文函件，下有康有为亲笔英文签名。同函亦见于英国外交部机要档案，可见是写给日、英等各国领袖的。

康有为并不懂英文，显系他人代笔。不过，其内容倒真实地反映了康有为当时的处境和思想。现译出如下：

阁下：

在排外阴谋中，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董福祥、赵舒翘和马玉昆狼狈为奸，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我国。您现在充分意识到卑鄙的义和团和清朝反动军队犯罪而造成的全部破坏。

我感到欣慰，在北京的外国人能坚持不屈，直到被救。所有懂得国际公法的中国人都真诚地哀悼德国公使的被杀。

现在和平在望，联军已经打败了黜废我国合法君主的卖国贼部队。我请求您注意某些建议，我相信，如能实行，将保证：(1)公正地惩罚真正的罪犯，(2)对遭受非法攻击的各国人民和代表实行赔偿，(3)永久和解我国的国际关系。

首先，盟国决不应承认西太后和我已经提到的谋臣们有资格进行和平谈判。他们全都必将受到有盟国强大援助的皇帝陛下的应有惩罚。

其次，光绪皇帝，外国人的伟大朋友，应该恢复皇位。

1898年10月，皇帝陛下以密诏命臣恳求外国的保护和帮助。这以后，我将皇帝的处境通知了代表贵国的公使。

我还指出，西太后是西方文明的敌人。在致贵国公使的备忘录里，我报告说，我们的光绪皇帝渴望采用可行的西方文明原则。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听取我的呼吁，如果外国政府帮助皇上复位，动乱可以不再发生。

由于皇帝陛下已经实际上命令我寻求办法，使他能从卑鄙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因此，我感到，代表皇帝陛下致函于您是我的责任。

为了永久和平，为了正当地惩罚使我的可爱的国家沦入巨大灾难的真正祸首，我恳求，您能友好地考虑我的建议。

(1)使光绪皇帝复位。

(2)逮捕所有的反动官员。

(3)仔细地观察所谓"南方互保"的总督们。

除非荣禄、端王和其他人受到严肃的处理，他们将继续告诉中国人，外国人无力反对他们。一旦他们收集到足够的人员、武装和金钱时，他们将会再次攻击外国人。

至于互保的总督们，我不愿多说，只请求阁下在把他们当做进步分子和国人的朋友之前，充分注意他们的行动，当他们和领事们签订了和平协定时，他们不向西太后输送人员、金钱和武器吗？他们实际上是西太后的忠顺的仆人。阁下应该当心他们，这是重要的。

我希望，光绪陛下将能恢复皇位。那时，整个帝国将会欢庆。帝党由这片土地上最开明、进步的人士组成，这些人士友好地对待外国人，也希望将他们国家古老的文化和西方文明结合起来。

您将受到亿万人民的感激。根据上述条件奠定和平，贵国将从世界贸易和我的可爱国家的不幸人民方面得到巨大的利益。

作为阁下谦卑而顺从的仆人，不胜荣幸！

康有为

海峡殖民地

1900年11月14日

1898年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仓皇出亡。9月29日抵达香港，10月24日抵达东京。1899年4月转赴加拿大，5月31日抵达伦敦。在英国期间，曾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运动英国政府帮助推翻西太后政权，使光绪复位，未成。1900年2月，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保护。同年8月，受新加坡总督之邀，迁居槟榔屿。本函即作于当地。

康有为迁居新加坡之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崛起。西太后及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企图利用义和团"灭洋"。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攻。19日，载漪所属虎神营的一个下级军官在北京东单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20日，义和团及清军董福祥部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但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却拒绝执行。6月26日，由盛宣怀等出面，向驻上海各国领事提出《中外互保章程》，清政府也于7月13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企图乞和。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西太后在马玉昆所部保护下逃往西安。10月4日，法国通牒各国，提出惩凶、赔款、在中国驻扎军队、平毁大沽炮台等为议和条款。康有为本函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

对于义和团运动，康有为不能正确地区分其反侵略的爱国性质与笼统的排外主义错误，一概加以否定；对于八国联军的侵略性质，康有

为也无所认识。他企图利用列强和西太后的矛盾，打击后党，排斥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使光绪皇帝复位，为此，不惜以“巨大的利益”相许，但是，帝国主义懂得，保存一个腐败但是听话的政权显然更有利，因此，康有为的这封信便被扔进档案堆里去了。

原载《团结报》，1993 年 7 月 3 日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时，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和制告别。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

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义的俄罗斯。1906 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 年 4 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改良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从共和、民主转回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其原因，或由于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病，或觉得中国人水平不够，或由于别的一些什么原因。他们不了解，从总的方面看，作为政治制度，共和、民主远胜于专制、独裁。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人类一切民主主义文化的优良部分，克服其局限和弊端，同时积极培育条件，创造出更高级、更完备的民主，而不是相反。

原载《百年潮》，1998 年第 5 期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引　　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根据西太后的意旨，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15日，西太后也突然死去。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了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以极大震动，也带来了巨大希望。当时，梁启超正居留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的怡和别庄。他于22日邀约神户同文学校前校长汤觉顿、现校长张寿波、学监吴肇祥一起商量，“就清国皇室当前发生的事变进行了种种谋议”[①]。23日，以日本中国领署、同文学校等名义向国内发出挂号或普通邮件共八封。25日，继续发出若干封。这些书信，经日本情报人员秘密检查后抄录了四封，由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报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它们反映了当时改良派力图促使清政府诛杀袁世凯的紧张活动，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书信中运用了不少隐语，意思晦涩；日本情报人员辨读汉字草书的能力又很差，抄件讹误严重。笔者参考各种文献，反复揣摩，读懂了这些书

---

① 《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兵发秘第407号，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38。

信的大部分内容，因整理阐述如次。那些不可解，或者虽解而不正确的部分，只好留待高明。

密札解读

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现照录日本情报人员抄件全文。改正的字加〔 〕号，增补的字加〈 〉号，虽改正而有疑问的字加？号，无法辨读或无法排印的字以××代替。所有标点，均根据笔者对文意的理解重新厘正。

其一：

封　　书

须磨怡和别庄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新帝既立，醇邸摄故〔政〕。以醇王之贤，薄海内外，必以平〔手〕加额。帷〔惟〕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而当此变乱纷纂之际，最不能不取奇才异能之士，以定危局，以报先帝，更宜行大赏

罚，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公亲枝忠报，当必有嘉猷远漠〔谟〕献替，当路如萧〔肃〕、泽者，此时真可定奇谋成奇勋在〔者〕也。潘公人极沈击〔挚〕，有大决断，作多常士，望公推诚。兹为公侦诸要人，急叩之。匆匆伤变，为书不详。然石〔所〕言至重，不揣固陋，谈〔祈〕高明英断(?)。敬谈〔祈〕为图〔国〕珍重。第〔弟〕名心叩。十月二十五日。①

本札及下二札均为 11 月 23 日发。在本札中，发信人隐名，仅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收信人长大人，应为长福，是改良派在清朝贵族中的内应。他字寿卿，一作绥卿，宗室正红旗人。1901 年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警务。其后任驻神户领事，和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参加政闻社。归国后在外务部任主事，为改良派做过不少事情。函中所言肃，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泽，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他们都是清朝贵族中的实权派。函中所言潘公则指潘博，康有为的学生，他一名之博，字若海，号弱庵，曾打入善耆主持的民政部任职，是改良派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人物。②

戊戌政变前夜，康、梁等人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消灭变法的反对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告密，形势突然变化：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完全被推翻。因此，康、梁对袁世凯有切齿之仇。1907 年春，康有为批示梁启超、麦孟华二人，将“倒袁”作为首要任务。他在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康有为并指示，必要时可以进行暗杀，声言：“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以下各札均同，不一一注明。

② 康有为：《粤两生集序》，见《粤两生集》。

不得已也。"[①]马良也向梁启超提出，对袁世凯，可以送他一丸子弹。[②]光绪去世，改良派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害，而且怀疑他会进一步篡夺清朝江山。当时有一份传单说："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鸩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③]这份传单不一定出自康、梁之手，但却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对载沣的摄政，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清朝历史上，当权力递嬗之时，曾经有过康熙诛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诛肃顺等例子。康、梁有鉴于此，决定利用时机，力促清政府诛杀袁世凯。

11 月 18 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中云："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④]有关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他们还直接给载沣打过电话，"请诛贼臣以安社稷"[⑤]。

梁启超的第二步便是给长福写信，说明形势危急，"变乱纷纂"，"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勉励他以宗室的身份提出"嘉猷远谟"。由于长福地位不高，梁启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善耆、载泽二人身上。从 1907 年夏起，善耆便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信中所谓"行大赏罚"，"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等，主要是写给善耆等人看的。"定奇谋成奇勋"者，即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之意。本函将潘博推荐给长福，要求他们推诚相见，通力合作，在清政府"要人"之间活动。后来，为联系方便，潘博就住在长福家里。

---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44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② 同上书，451 页。

③ 《东京宪政分会会员公檄》，见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86。

④ 《清国革命党领袖经历及行动调查》，见明治文库藏《有松英义关系文书》；又见日本外务省档案 1·6·1·4-2-1(3)，440805。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51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其二：

封　书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绶公吾足〔兄〕尊右：不意三日之间，叠遭图〔国〕恤，面〔而〕先帝上宾，文〔尤〕为天下人石〔所〕同疑。呜呼！不意奸贼意〔竟〕敢悖逆如此。

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呼天抢地，如何之〔如何〕！仆以前此谣诼避嫌，石〔不〕能入北，穷居海外，忽问〔闻〕此岌，权〔摧〕痛如〔何〕言！比东〔来〕朝局若何？仆不〔所〕知者惟恃报纸，词多影响，且纷杂莫是，焦苦愈不可状，务请明此耳！京上委公，飞示详区，玉〔至〕祷玉〔至〕祷！宝云令清浊上之都，专丙此事，特有何仁，至×时望与密话，宝云因匆促，故区石〔不〕能详，当其致副书复，工〔旦〕夕待令。

本札收信人仍为长福，发信人应为须磨村会议参加者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三人中的一个。函中云："仆以前此谣诼避嫌，不能入北，穷居海外。"汤觉顿于 1908 年春受梁启超委派，秘密前往北京，和善耆、良弼等人联系，但不久即受人怀疑，再度避居海外。[①] 据此，可知

① 参阅《梁启超年谱长编》，450、471、475 页。

发信人为汤觉顿。

本札称光绪之死(上宾)“为天下人所同疑”,愤慨于“奸贼竟敢悖逆如此”,虽不十分肯定,但已相当明确地把袁世凯视为凶手。“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二语,含蓄地提出了诛袁要求。由于已有梁札,所以汤觉顿在本札中仅要求长福火速通报“朝局”。“至祷至祷”以下,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已经看不懂,特别标注了“不明”二字,笔者目前也还不能解读清楚。其中宝云,似指梁启超,大意当为迫切期待长福有所指示,本人“待令”北上云云。

其三:

封　书

上海〈海〉宁路须征呈〔里〕香山何禺〔寓〕何清逸先生

(同文学校)

文　意

兹公:夜〔报〕已到了。此数日内沈静之局面,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此〔北〕行之一法。然今日见夜〔报〕,山公确已首途。恐兹公井〔并〕入北,正石〔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须〕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段真是可畏。奈何奈何! 匆匆。即请

大安。余详荷函

今日×××语夜〔报〕已收到。

两浑

外務大臣伯爵小村寿太郎殿

兵庫縣知事 服部一三

通報先（内外相）

別紙

（其二）

封書 北京西四牌楼南磚塔胡同内錢串胡同路北柵欄門 須磨怡和别荘

外務部長、長大人（吾御勛啓） 日本中國領署賊

文意

新帝既立。醇邸提拔，以醇王之賢，薄海内外。

440840

不明

是。真若愈不可收。湯彦（明此才而上書公龍示注）已至

禱至禱。寶雲今請治上之部，專西北事

特有仁玉訂。時望子安治寶雲因而

任。故此石能治當具致副書湯…待信。

以上一封

封書上海嵩路須微里唐山何寓 （国文学校）

何清逸先生

文意

猛公庭已到了。此數日内沉静之局面，便向

絕。此次在南方，當無從着手。惟有此行之

一法。然今日見庭山公，確已首肯，然猛公卅

入北正石易了，無論如何，必以設法能此爲。

妙。予策處最當注意也。今日庭帝言倉

主拔議運布。宗法手段是日之可畏，奈

何。毎

即頌

大安。餘詳蓉函

雨渾

今日一函一子文詣。庭已收到

以上一封

日本警察秘密抄录并上报的梁启超等人密札（局部，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本札反映了梁启超为诛袁而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收信人何清逸，名天柱，为改良派在上海的据点——广智书局的实际负责人，当即函中所言兹公。山公，指岑春煊。仓主，指袁世凯。[1] 荷，指汤觉顿。[2] 两浑，当时书信中的隐语，常用于收信人、发信人均隐名之时。

岑春煊是袁世凯的老对头。1906 年，清政府将岑从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认为是奕劻和袁世凯的奸计，托病就医上海，暗中和改良派发生关系。1907 年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但同时清政府又规定他"毋庸来京请训"。岑春煊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之际，突然乘车入京，在西太后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和瞿鸿机联结，接连参劾了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和段芝贵二人，被外放两广总督。在他出京到达上海之际，梁启超曾秘密自日本返沪，准备和他会谈。因瞿鸿机已被免职，岑本人也因"暗结康梁"之嫌被参，二人未能见面。自此，岑春煊即居留上海。1908 年 11 月，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岑春煊曾准备带着医生入京，已经定好了船期。[3] 听到光绪的噩耗后，岑春煊更为"激昂"[4]。19 日，上海《神州日报》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岑春煊即将起用。"20 日又报道称："前两广总督岑宫保向居沪北垃圾桥地方，前晚接到京电，着即来京等因，宫保当即北上。"22 日，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岑春煊于 20 日通过芜湖，拟经汉口入京。[5] 梁启超致何天柱函中所称："山公确已首途"，当即本此。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准备派何天柱随岑春煊北上，但因岑已上路，感到"不易"，但仍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能此为妙"。函中所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云云，据《大公报》及日本报纸报

---

① 山，取岑字之头；仓主，因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出身，小站出稻，故由此取义。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518～519 页。

③ 岑春煊：《乐斋漫录》，18 页，台北文星书店。

④ 《某某来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8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⑤ 《大阪朝日新闻》，1908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道，袁世凯在光绪、西太后相继去世后，曾向清政府提议，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1] 梁札当即指此。袁世凯在载沣登台后，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却迅速抓住了“速开国会”、“速行宪政”一类题目，借以收买人心，争取好感。因此，梁启超发出了“手段真是可畏”的感叹。

其四：

封　　书（书留）

上海海宁路须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启

神户同文学校

文　　意

对伟两公同釜〔鉴〕：构父来，得具忠〔悉〕伟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答〔若〕能者〔有〕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待〕一日也。十乘昨未〔来〕一书，乃事前取〔所〕发，不遇〔过〕告急可〔耳〕，尚待次凶〔函〕乃有别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伟公入北，当必能见比〔此〕公也。

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望〕示知。

---

① 《大公报》，1908年11月22日；《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2日第1版；《东京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4日第2版。

本札 11 月 25 日发。书留，日语挂号信之意。收信人中的对公，指麦孟华[①]；伟公，指何天柱（清逸）[②]。发信人仍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函中所言构父，指向瑞彝，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

在改良派中，麦孟华和岑春煊关系最深。1907 年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曾特聘麦孟华随行。岑春煊准备舟次武汉时突然改道入京的计划，麦孟华也深知，并拟借岑之力入京活动，岑也表示愿“出力相助”[③]。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露，麦孟华的随行计划被迫作废。后来，陈庆桂曾参劾岑春煊“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④]。但这并未影响岑、麦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逝世后，麦孟华也认为关键在于载沣能否“行大赏罚”、“戮一二人”，如果袁世凯不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力促岑春煊入京，曾进言说：“上崩必出贼手（且后亦必有变），亟当驰入北，联有力者申大义。”[⑤]由于岑、麦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因而，随岑北行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改良派在上海的另一员大将何天柱身上。从密札看，梁启超从向瑞彝处得悉，何天柱终于未能随岑北行，感到极大遗憾，但仍坚持北上方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因为只有在北京，他们的诛袁谋划才有可能“生发”。

函中提到的十乘，看来是改良派在北京的密探，应指潘博。他向梁启超报告了光绪病重的消息，所以函中称：“十乘昨来一书，乃事前所发，不过告急耳，尚待次函乃有别消息也。”函中提到的子笺，疑指瞿鸿

---

① 麦孟华曾于 1907 年春受岑春煊之聘入蜀。佚名《致梁启超书》：“乃者与对费九牛二虎之力，为入蜀之计。”（《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46 页）据此可知对公为麦孟华。

② 何名天柱，字擎一，故以伟公相称。

③ 《蜕庵致任公书》，见《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42～44 页，台北文海出版社。

④ 《梁启超年谱长编》，383 页。

⑤ 《某某来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89 页，原信残缺，从内容判断，知为麦函。

机。前函称:"子笺处,最当注意也。"本函称:"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当时,有人估计,瞿鸿机有可能被再次起用。梁启超并估计何天柱入京时,将能见到他至于所言高叟,改良派密札中有时称他为固哉,盖取《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之义,当是岑春煊的幕僚。

请杀谋划的失败

改良派虽然作出了请杀袁世凯的种种谋划,但其进行却困难重重。

首先是汤觉顿北行受阻。由于嫌疑未消,北京方面发函劝他暂时不必返国。[1] 其次是岑春煊听了别人的话,对北京政局采取"沉吟观变"态度,决定暂不北上。[2] 报上并发表了"闻岑春煊咯血病甚剧,不能北来"[3]的消息。这一切使改良派很生气,也很失望。麦孟华在致康有为书中愤愤地说:"初闻彼议论,以为一倜傥豪士,今彼先事绝无布置(前此弟尚以为彼有密谋,不令我辈知耳,今乃见其实无预备也),既不能谋,临事又复首鼠,又不能断,嘉州无可复望矣。"[4]此外,子笺的起用也迄无确讯。虽然康、梁二人都很关心此事,但麦孟华只能告以"此间尚无闻"[5]。

尽管如此,改良派仍然在作努力。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载沣的地

---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475 页。

② 《某某来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89 页,原信残缺,从内容判断,知为麦函。

③ 《神州日报》,1908 年 11 月 21 日。

④ 《某某来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89 页。

⑤ 同上。

位并不十分巩固。麦孟华函称:“今醇势颇摇摇,然彼非行大英断,则势必不能固;欲其行大英断,则非有人运动不可。”[1]于是,他们决定,由何天柱携带康有为从海外汇来的款子,单独入京“运动”[2]。何天柱此行的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长福方面却给梁启超传达了善耆和载泽的讯息:元凶必去,决无中变,不必担心。[3] 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命他开缺回籍休养。

对袁世凯的开缺,改良派中有人表示满意,徐勤函称:“袁贼被逐,为之狂喜。中国虽未即强,然罪人斯得,大仇已复,吾党天职,亦可小尽矣。”[4]但康、梁二人都不甘心。梁启超致书善耆,认为对袁世凯,“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至少也应该明诏宣布他的罪状,加上“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5]一类字样。他估计张之洞可能会成为讨袁的障碍,因此极力主张“和张”,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拉拢。康有为则仍然企图以光绪被毒为理由要袁世凯的脑袋。他于1909年1月致书梁启超说:“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6]他提出:在伦敦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金贿买御医力钧下毒。康有为建议揭发此案,查讯力钧。他并曾准备发动各埠华侨签名上书,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已经写好了《讨贼哀启》,内称:“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7]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起草

---

① 《某某来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89页。

② 同上。

③ 《梁启超年谱长编》,477页。

④ 《徐勤致康有为书》,见《康有为与保皇会》,387页。

⑤ 《梁启超年谱长编》,480页。

⑥ 同上书,481~482页。

⑦ 《戊戌变法》(一),434页。

了《上摄政王书》,此书经梁启超修改后发出,信中,康有为提出,袁世凯"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罪亦难从末减"。他历数袁世凯"造言诬君"、"纵匪误国"、"招权纳贿"等罪状,以康熙诛鳌拜等事为例,要求载沣将袁世凯"明著爰书,肆诸东市"。康有为并忧心忡忡地警告载沣:袁世凯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清朝的"宗社"之忧,"且未有艾"①。书上,没有结果。1911 年,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被杀,并非载沣有爱于袁世凯,而是因为:一、袁世凯羽翼已成,且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清朝贵族集团已经极端衰弱,不仅远非康熙诛鳌拜的时代,连西太后诛肃顺的时代也不能相比了。载沣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原载《复旦学报》,1986 年第 3 期;台湾《历史月刊》,1990 年第 9 期,有个别修改之处。

---

① 《戊戌变法》(二),517～522 页。

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

在戊戌维新以至兴中会惠州起义期间，毕永年都是个重要人物，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冯自由辛勤收集辛亥革命史料多年，著有《毕永年削发记》一文，是目前最完整的毕氏传记，但该文讹误甚多，关于毕氏的下落，竟认为“不知所终”[①]。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在涉及毕氏生平时，叙述也常有谬误。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对毕氏的生平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

毕永年，号松甫，一作松琥，湖南长沙人。1870 年（同治九年）生。八岁时随父叔往来军中，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长大时读《王船山遗书》，受到民族思想的熏陶。当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还是不少湖南老乡的崇拜对象，毕永年却愤然表示：“吾乡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②]1894 年（光绪二十年），江标督学湖南，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试士的内容注重舆地、掌故、算学、物理及世界形势等内容，即使是制艺，也允许议论时事。[③] 毕永年所作文即有“民不新，国不固，新不

---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② 《革命逸史》初集。

③ 胡思敬：《江标传》，见《碑传集补》卷九。

作，气不扬”之语，认为中国三代以下，天下嚣嚣的原因在于“陈陈相因，气颓于痳”，表明了这个年轻人已经具有鲜明的维新思想。[①]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与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自此，即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经常一起商议救国大计。三个人都重视会党的力量，毕永年并亲自加入哥老会，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等地。他体格魁伟，为人豪放不羁，轻财好义，很快就结识了金龙山堂龙头杨鸿钧，腾龙山堂龙头李云彪及张尧卿、辜天佑、师襄等人，得到他们的信任。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讲演并讨论新学，毕永年成为会中的活跃分子。当时，谭嗣同等以“保种”、“保教”相号召，而毕永年却独持异议，认为首先必须开通民智，“示群民以人皆读书之益”，“俾知通商之局，终此不更，则中西聚处日繁，不必再作闭关之想”。某次会上，他对谭嗣同说：“所谓保种、保教，非保之于今日，盖保之于将来也。此时若不将此层揭破，大声疾呼，终属隔膜，愈欲求雪耻，愈将畏首畏尾。或以西学为沽名之具，时务为特科之阶，非互相剿袭，则仅窃皮毛矣。”毕永年的话触动了谭嗣同的心思，回答说：“王船山云：抱孤云，临万端，纵二千年，横十八省，可与深谈，惟见君耳。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此层教我如何揭破？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②]

4月14日（三月二十四日），毕永年在《湘报》发表《存华篇》，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结合起来，认为权为人人共有之权，国为人人共有之国，只有发扬民权，才有可能上下一心，保存中华。文称：

人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

① 《沅湘通艺录》卷一，丛书集成本。

② 《湘报》第29号，1898年4月8日。

> 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既为群士群民共有之国，则为之上者，必无私国于己、私权于国之心，而后可以绵绵延延，巩祚如磐石；下亦必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心，而歧视其国为乘銮服冕者之国，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线，救累卵之危于泰山。[①]

文章痛切地陈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呼吁清朝统治者"殷忧启圣，恐惧致福，乘此伐毛洗髓，涤秽荡瑕，与天下更始"。当时，湖南学会林立，毕永年除与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外[②]，又和唐才常共同发起成立公法学会，研究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作为"将来自强之本"。毕永年手订章程十七条，规定会中集资订阅各报，会友各持日记一本，将研究心得按"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项分类编记，定期传观讨论。[③]

为了使南学会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4 月下旬，谭嗣同、熊希龄、毕永年分别致函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邀请他来会讲学。王虽是湖南名儒，但为人守旧顽固。5 月，王先谦复函毕永年，指责南学会诸人"侈口径情，流为犯讪"，"所务在名，所图在私"。王要毕氏"闭户自修，不立名目，不事争逐"，否则，"请各行其是，毋复后言"[④]，叶德辉并拟将此函刊刻张扬。[⑤] 此后，湖南守旧派对南学会和《湘报》的攻击愈来愈厉害，皮锡瑞等曾公举毕永年去日本人办的报馆任主笔，以便在外人的保护下

---

① 《湘报》第 34 号，1898 年 4 月 14 日。

② 《湖南不缠足会总会董事题名》，载《湘报》第 28 号。

③ 《公法学会章程》，载《湘报》第 48 号。

④ 《翼教丛编》卷六。

⑤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 1 期，89 页。

得以放言无忌。[①] 由于学会一类的活动受阻，毕永年又曾受谭嗣同之命，因此便和唐才常相偕去汉口联络哥老会。[②]

同年8月21日（七月初五日），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召入京。9月5日（七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为了追随谭嗣同，毕永年也于8月间离开湖南，经上海入京。途经烟台时，与日本人平山周、井上雅二等相逢。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相偕抵京。毕永年住在广升店中。次日，会见康有为。当时，正是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康有为早已从谭嗣同处得知，毕永年是会党好手，命他留京相助。当日，毕永年移居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住到一起，得以参与密谋。康有为计划命毕永年往袁世凯幕中为参谋，并计划命毕永年统率百人，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胆小，又是李鸿章之党，恐怕靠不住，而且自己是南方人，初至北京，统领彼此不相识的士兵，不可能在短期内收为心腹，得其死力，因此，对接受这一任务表示犹疑。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晨，当他从谭嗣同处获悉，谭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预感到事情必败，表示"不愿同罹斯难"，并劝谭嗣同"自谋，不可与之同尽"[③]。当日午后，毕永年即迁居于附近的宁乡馆。20日（八月初五日），康广仁、梁启超准备推荐毕永年为李提摩太的秘书，为毕氏所拒。当夜，毕永年致书谭嗣同，劝他速自定计，不要白死。又致书梁启超作别。21日（八月初六日），毕永年急驰出京。同日，西太后即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

毕永年行至上海之际，得到谭嗣同等殉难的噩耗，即自断辫发，发

---

①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114页。

② 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转引自邓潭洲：《谭嗣同传论》，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③ 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5-491318。

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统治之下。[1] 不久，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之邀，随日本人安永东之助东渡[2]，在横滨会见孙中山，讨论国事，感到意气投合，于是加入兴中会，走上新的道路。

二

在毕永年离京之前一日，康有为即仓皇南下。10月26日（九月十二日），康离港赴日。到日本后，即与唐才常一起制定了一项湖南起义计划。其内容为，利用南学会的力量和影响，在长沙起兵，引军直进，攻取武昌，然后沿江东下，占领南京，再移军北上，进取北京，推翻西太后的统治。[3] 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支持这一计划。11月1日（九月十八日），毕永年曾与唐才常一起访问宗方，再次说明该项计划，要求宗方相助。[4] 宗方是个中国通，负有为日本军方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任务，当年正在汉口经营《汉报》。他劝毕、唐二人沉潜待机，作好准备，待他到中国后妥商方略。其后，毕永年并介绍唐才常会见孙中山，商量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的起义计划。为此，当时正在日本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飞函通报在香港的革命党人："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5]同月，唐才常首途回国。12月，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也偕平山周回到上海。离日之前，他曾有一函致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函云：

---

① 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29页，岳麓书社，1983。

② 《宫崎滔天氏之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289页，日本平凡社。

③ 《对支回顾录》下册，381、382页。

④ 同上。

⑤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30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 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日因西后淫虐之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面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之。[①]

维新派由于自身没有多大力量，最初依靠光绪皇帝，戊戌政变后，企图依靠列强，本函正反映出这种情况。同时，毕永年又有《留别诸君子诗》，答谢饯别的犬养毅诸人，诗云：

>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会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瞬看玉帛当重来。[②]

末署"双湖浪士毕永年拜呈，均希哂政"。1898年5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两国大合邦会议"，实行两国联合。诗中所称"大东合邦"即是指康有为的这一计划；但诗中又有"羯虏"、"汉家"之语，表明这一时期毕永年的思想已经越出了康有为的范畴。上函及诗稿的原件今均存日本冈山市木堂纪念馆。

毕永年在上海稍作停留，即与平山周相偕赴汉口，会见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三人一起入湘，具体设计了在长沙纵火起义的计划。[③]

---

① 参见拙作：《犬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民表(秦力山)：《林锡圭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1页。

毕永年留别犬养毅等人诗(采自日本冈山犬养毅纪念馆)

毕等先后到过长沙、浏阳、衡州等地,遍访哥老会头目及康有为视为同党的人物,包括威字营统领黄忠浩、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等,发现情况和预料相反,不仅熊、黄不敢有轻动之心,而且整个湖南人心消沉。[①]南学会、公法学会已经消亡解体,《湘报》改为只录上谕的《汇报》,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恢复了老一套。半年前生龙活虎的气概丧失殆尽。只有在和哥老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等人的接触中,才使毕永年和平山周感到鼓舞。[②] 1898 年(光绪二十五年)2 月初,二人回到上海。

此际,唐才常已因康有为的一再催促,离沪赴港,经由广西桂林入湘,毕永年读到了康有为的一封来信。信中,康有为指使毕永年"制造事端"[③]。其内容,已无可查考,可能是康有为得悉湖南人心消沉后,要毕等制造排外事件以激动民气。毕永年对康有为的做法本来就已经不满,读信之后,大为愤激,因而便记述康有为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等情节,题为《诡谋直纪》,交给平山周,平山周交给日本驻上海代理

①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见日本外务省档案 1·6·1·4·2-2,491312-491314。

② 《湖南现状》(平山周回日谈话),载《知新报》第 85 册,1899 年 4 月 30 日。

③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见日本外务省档案 1·6·1·4·2-2,491312-491314。

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随即于2月8日抄呈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此后,毕永年就和康有为分道扬镳了。

为了向孙中山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毕永年于1899年春再到日本。当时,王照和康、梁的关系已完全恶化。原来,王照虽然赞成维新,但主张调和帝后矛盾,利用西太后推行变法,反对康有为拥帝斥后的做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通过杨锐带出密诏,要杨等"妥速筹商",如何既能使"旧法全变",而又不至于得罪西太后,"有拂圣意",但康有为却将它点窜改作,与光绪皇帝的原意有所背离。由于王照了解这一秘密,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的严密监视,王照不能忍受,在平山周的诱导下与犬养毅笔谈,说明"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笔谈中,王照曾引毕永年为证,声言"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①]。笔谈之末,毕永年作跋说:

> 王君又告予曰:原因保荐康、梁,故致此流离之祸,家败人亡,路人皆为叹息。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愤火中烧。康、梁等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②]

此跋虽主要记述王照所言,但充分反映出毕永年对康、梁的敌视态度。

---

① 《王照与木堂翁笔谈》,载《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据抄件印布。"今毕兄在此"之"毕"字,抄件隐去。

② 《王照与木堂翁笔谈》,载《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据抄件印布。抄件跋下有"湖南□□□录竟附识"数字,隐去之三字,当为毕永年。

三

毕永年、平山周的湖南之行虽然没有发现可以立即起事的征兆，但却认为湖南是哥老会大本营，有会员约十二万人，组织严密，其头目沉毅可用，因此，孙中山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便决定在湖南、广东、湖北三省同时大举，并命毕永年再次回国运动。1899 年夏，毕永年先到汉口，在宗方小太郎的《汉报》馆任主笔。不久，因不堪忍受报馆中的日本人虐待中国仆役弃职。[①] 他再度入湘，向会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为人，劝他们和兴中会携手反清。同年秋，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六个会党头目赴港。行至上海时，路费不够，毕永年只好让杨、李等先行。他写了一封信给在港的陈少白和日本人宫崎寅藏，附有哥老会头目的小传。宫崎对这些小传称颂不已，认为文字不多，简明痛快，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如读《三国志》、《水浒传》一般。[②] 李等向陈少白及宫崎表示："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愿待毕君之来共议之。"[③]一星期后，毕永年得到陈少白的资助到港。大家一致同意毕永年的意见，决定将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合并为中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为会长，各事均在其指挥下行动。于是制定纲领三条，饮血盟誓，并且刻了一枚图章，由宫崎带回日本，交给孙中山。10 月 29 日（九月二十五日），毕永年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

① 《亡友录》，见《宫崎滔天全集》第 2 卷，560 页。

② 《宫崎滔天全集》，第 1 卷，152、411 页。

③ 同上书，122 页。

久不相见，渴念殊深，惟德业益宏，无任翘企。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①

函中所言高桥，指日本人高桥谦，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当指兴汉会事。“不忘畴昔之言”，当指宗方小太郎支持湖南起义的诺言。

兴汉会组成后，毕永年携诸会党头目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受到殷勤的款待。12 月返港，经费发生困难。当时，康有为正在香港，他新从美洲归来，得到华侨的资助，囊中富有，暗中赠送给会党头目数百元。毕永年认为不能收，而哥老会头目却愉快地接收了，再次倒向康有为一边。② 毕永年受此刺激，在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的影响下，愤然削发为僧，易名悟玄。他遗书平山周作别云：

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义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今将云游，特来告别。仁兄一片热肠，弟决不敢妄相阻挠，愿仁兄慎以图之，勿轻信人也。③

---

① 日本近代立法会收集，缩微胶卷，日本明治文库藏。

② 平山周签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

③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146 页，商务印书馆，1912。

信中，毕永年表示，日内即将往浙江普陀山，第二年三月，将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干预人世间事。毕永年的削发使兴汉会和湘、鄂会党之间的联系大受影响。1900 年 1 月 26 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林圭曾致函孙中山在香港的代表容星桥，对之惋惜不已，但林圭认为，毕永年是热血汉子，“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①。果然，毕永年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4 月 1 日（三月十一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被推为副龙头。② 5 月 16 日（四月十八日），毕永年介绍长沙人张灿等访问正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③ 这一时期，毕永年在上海来往的人物除宗方外，有文廷式、汪康年、唐才常、张通典、荻葆贤等，大体都是自立会的领导人。也就在这一时期，毕永年和唐才常在政治主张上发生了分歧。唐才常继续游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毕永年则要求他斩断和保皇会的关系。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痛哭而去。6 月，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7 月 15 日（六月十九日）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 沪上两次赐书，均已收到，拜读之余，益增感激。先生如此不辞劳瘁，为支那力图保全，况彦本父母之邦耶！敢不竭虑捐身，以副先生相知之雅乎？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

① 《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见《悟庵先生成仁录》。

② 《岳州镇咨呈匪情一案》，见《俞廉三遗集》卷一〇一。

③ 《对支回顾录》下册，383 页。

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1]

服部，指服部二郎，陈少白的化名。当时，孙中山正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在广东、福建沿海发动大规模的起义。由本函可见毕永年在兴中会中的地位及其在福建的广泛联系。“佳果五千枚”，当指起义所需的枪械，毕永年要求宗方提供帮助。同函又称：

如贵邦人尚有以缓办之说进者，愿先生勿听也。彦孑然一身，久无父母兄弟妻子之念，惟此痛恨胡虏，欲速灭亡之心辄形诸梦寐，不能自已。先生知我，伏祈谅之。

毕永年反对“缓办之说”，急于灭亡“胡虏”之心汹涌澎湃而不能自制，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他炽烈、高昂的革命热情，而且也不难窥知他和唐才常终于分手的原因。

7 月 16 日(六月二十日)，孙中山自西贡抵达香港。由于香港政府对孙中山有过驱逐令，因此，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毕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平山周被任命为外务部长。此际，孙中山正通过粤绅刘学询运动李鸿章在广东独立，毕永年赞成这一计划。他在广州密切注视李鸿章的举动，致书平山云：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

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

① 日本近代立法会收集，缩微胶卷，日本明治文库藏。

户口,未审有何措施? 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

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

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然无资足用也。乞仁兄畀弟二百元,或百五十元亦可,否则百元必须允赐。兹乞紫林氏代到港,乞交彼携回至盼![①]

李胡子,指李云彪;杨胡子,指杨鸿钧。他们这一年曾到上海,结交唐才常,发现唐夸张声势,所言不实,又转回广东,重新和毕永年合作。[②] 紫林氏,指紫林和尚。他原为有志之士,因躲避清政府的追捕遁入佛门,浪迹四方,但仍然和哥老会头目有联系,同情并支持毕永年的事业。[③]本函反映出毕永年惠州起义前夕的活动情况。毕永年写此函后不久,即离粤赴港,改名普航,仍以掌握哥老会为职责。

10月6日(闰八月十三日),惠州起义爆发。11月7日(九月十六日),义军因饷弹殆尽解散。毕永年回到广州,卖掉西服,仍着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隐居于广州白云山。有书致同志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 吾方入其群以求之。”[④] 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年仅三十二岁。[⑤]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1988年第11期,增订改写后发表于南京《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

① 平山周签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

② 《清国之形势及秘密结社》,见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490899。

③ 《亡友录》,见《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561页。

④ 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见《自立会史料集》,230页。

⑤ 《长沙毕永年先生追悼大会通告》,载《民立报》1912年1月4日。

犬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

——日本冈山访问所得

犬养毅是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日本政治家。他的纪念馆位于日本冈山县郊。1985年7月16日，我在冈山大学石田米子、佐藤智水两位教授的陪同下，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狭间直树教授一起参观了该馆。承冈山县政府企画部小出公大、山本光德和纪念馆工作人员盛情接待，得以见到该馆珍藏的孙中山、康有为、王照、毕永年、熊希龄等人的手迹并惠允利用。兹举其要者介绍并略作考释。

王　照

笔谈记录一件。王照(1859—1933)，字小航，号水东，直隶宁河人。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受到当时任文部大臣的犬养毅的接待，曾与犬养毅有过长篇笔谈，已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中。此为另一笔谈，文云：

>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复合。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四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刚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拥护光绪皇帝，排斥西太后，王照则主张调和帝后矛盾，并利用西太后推行变法措施。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感到形势危殆，曾通过杨锐带出密诏，内称："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①]光绪皇帝要杨锐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如何既能使"旧法全变"，而又不至于"有拂圣意"，得罪西太后。但是，康有为却将它点窜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②]康有为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王照的强烈反对，与犬养毅笔谈，即为此而发。他仍然企图调和帝后矛盾，因此力图证明"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并慨叹于"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王照逃亡日本时间为1898年10月。次年8月，即因事与犬养毅疏远。[③] 笔谈当即作于这一段时期之内。

康 有 为

书札两通。其一云：

柏原兄心术最仁，才大心细，再一游历各国，更成大才。如今

---

① 《光绪大事汇编》卷九。

② 《奉诏求救文》，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2册。

③ 《清国亡命者王照转居之内情》，见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

> 者相待以来，无渐不至，何不令一出外国游乎？如今出游，莫若同行。至此间梁生等渐通贵国语，原无待如柏兄者始能接待也。未知宜否？如仍柏兄同去，则佳甚。

柏原兄，指柏原文太郎，号东亩，东京专门学校舍长，东亚同文会会员，通英语，为犬养毅的亲信。康有为抵日后，一直受到他的接待。1899年3月，康有为准备离开日本，经加拿大转赴英国，曾邀请柏原文太郎同行。书札当作于此时。

其二云：

> 我两国同教同文，较东西各国，其情最亲，其办事亦有不同。我邦通人，侧首东望，莫不在此，并不必引公法也。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而已。闻贵国宪法，太后、皇后亦在臣列，此即经法与敝国同者也。今伪临朝之篡废，在西人公法认之，且以为托于训政，亦以公法免干预内政之故。惟我两邦兄弟唇齿，其情亲而势逼，乃有不能以西人公法论者。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主而擅权，外分内讧，支那必亡。高楼大厦之倾，其旁邻亦为危墙所压，乃不能不议支柱之也。

“伪临朝”，指西太后。戊戌政变时，西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实行“训政”。康有为则力辩其为“篡废”而非“训政”。“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帝主而擅权”，从这两句看，本书札当作于西太后准备立溥儁为“大阿哥”，从而取代光绪皇帝之时。它反映了康有为乞求日本人士出面干涉的有关情况。可能犬养毅以“西人公法”相推脱，而康有为则以中国的传统经义相劝。关于此，梁启超在《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一文中说：“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即为

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又言‘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论语》：‘君薨听于冢宰。’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之实为篡逆乎？”[1]这段话不啻是康有为所说“经义”的注脚。按：西太后立溥儁为“大阿哥”，事在1900年1月24日；消息泄露，中外喧腾则在1899年10月前后。本札当即作于这一时期内。

康有为还有一封给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书札，其中明确地谈到，西太后“定正月立新主，续穆宗皇帝后”。春秋时，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曾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康有为也要求大隈重信像孔子一样向日本政府请兵。书札称：“今于大国，有齐鲁之亲，即于明公有夷吾之望。哀我寡君，哀此中国，惟明公深明之。虽不在位，沐浴请讨，不能不望明公。”[2]书札同样表示，不必考虑国际公法：“此吾两邦之特形，不能以西欧公法论也。”这启示我们，致犬养毅书与致大隈重信书是同时发出的两封信，目的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出兵讨伐西太后，恢复光绪的皇位。康有为并表示，如不能出兵，至少也要让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出面抗议。致大隈重信书称“即不尔，亦望令矢野君力争于我朝，正色危言以相挟，或可慑权奸之胆，动牝晨之心，俾寡君少延旦夕，以待他救，惟明公哀怜之”。矢野文雄在华任期至1899年11月16日止，致犬养毅书与致大隈重信书的写作时间必在这以前。

---

① 《清议报》第一册，文字据《戊戌政变记》有所校正。

② 《万木草堂遗稿补编》(下)，584～585页，台北，1978。

梁启超

书札一通，笔谈记录一件。书札云：

> 仆昨日适横滨，彼中绅商感先生教诲之意甚至，且亟命仆请于先生，求其日所演说之文稿，欲悬诸讲堂以厉诸生，并刊诸报章，以告同志。伏望先生日间为录出一通，交仆寄去，副其饥渴之望。

原信无年月，仅署“二十四夕”。查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一文云：“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总理合作最力，自是与总理、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总理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总理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①]按：犬养毅担任横滨大同学校名誉校长，事在1899年3月。当月18日，犬养毅亲到该校发表演说，阐述“学校宗旨及扶翼中国之法”，该校师生及横滨华侨绅商数百人参加。[②]信中所述，当即此事，因而此函的写作时间可以确考为1899年3月24日。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要求发表演说稿，《清议报》也预告“其词甚长，下次专篇印之”，但是，却始终未见发表。可能犬养毅当时正在一心一意调

---

① 《革命逸史》初集。

② 《大同学校开校记》，载《清议报》第十册。

解孙、康二派关系，不愿意将矛盾公开。

笔谈记录云：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也。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有爱国性与否矣。今内地督抚无可望，民间受压制，不敢小行其志，欲其扶危局难矣。故今日惟求之于海外，庶几有望也。

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

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后，犬养毅即积极撮合孙中山、梁启超之间的关系，曾在东京私邸宴请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人，企图使双方合而为一。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梁启超一度表现出同情革命的倾向，但是，他仍然摆脱不了康有为的影响，不愿和孙中山过于接近。笔谈中所谓“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即源于此。

孙中山

书札两通，其一为1900年10月21日致犬养毅函，已刊于中华书

局1981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兹不录。其二为：

> 前委谋之件，已与友人商之，因近日金融太紧，彼有之资又出贷他人，恐不能一时收回，故无所决。彼原可出得余资一二万，而又带侠气，故弟留一介绍书于他，托彼于事决之时则持来见先生，而交涉此事，然彼来否未可必，若来，则望先生随机而勉之，或可令之出一万也。弟今日起程赴神港待船，前途如何，若有好音，立行飞报。

末署“孙文拜启。九月十九日”。神港，指神户。1900年9月，孙中山准备在中国南部发动一次新的起义，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积极筹款，购运枪械。25日，由神户启程，经马关转赴台湾。本函当即作于此时。可以看出，犬养毅对孙中山的起义计划是知情并积极支持的。

毕永年

《与犬养毅》书札一通，诗一首。书札已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樊锥集》，诗题为《留别同志诸君子》，中云：

>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暴如虎豺。湖湘子弟激愤义，洞庭鼙鼓奔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会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瞬看玉帛当重来。

末署“双湖浪士毕永年拜呈,均希哂政”。在维新党人中,毕永年是具有“排满”思想的一个。他年轻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同湖南哥老会首领杨鸿钧、李云彪等关系密切。戊戌政变后赴日,加入兴中会。诗中所云“惨折忠臣燕市死”,指谭嗣同等被杀;武后,借指西太后;湖湘子弟,指湖南会党。此诗当为毕永年告别犬养毅等人回湖南联络会党时所作。诗中充满了急欲有所作为的奋发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东合邦且徘徊”一句。1898 年 5 月,康有为与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两国大合邦会议”,实行两国联合。可能犬养毅重提此类主张,而毕永年则答以“且徘徊”,建议暂缓考虑。

熊 希 龄

书札一通,中云:

> 昨在东京,匆匆奉候,值公他出,未晤为歉。刻因急于归国,于今日行抵门司,直往满洲。本月三十日以内可回至上海。八月初旬内外,仍须随同戴、端两专使至北京。闻贵邦驻京公使林氏力主东亚联合之说,弟意欲往见之,乞公予以介绍书,俾得畅谈一切。尊函作成,请寄上海四马路时报馆狄楚卿氏代收,转交弟手,必不遗误。弟俟将北京事务了妥,恐须再至贵邦,一聆高论也。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维新派人士。1905 年 12 月随端方、戴鸿慈二人出国考察宪政,先后游历日本、美国、欧洲等处。1906 年 7 月经日本回国,21 日抵达上海。此函当作于此前几天内。林氏,指

矢野文雄的后任驻华公使林权助。所谓“东亚联合之说”也即康有为与矢野文雄的“两国大合邦”之议。可以看出,熊希龄对此也是很有兴趣的。

原载《历史档案》,1986 年第 1 期

孙中山在1900年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1897年8月16日，孙中山自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三天后，一份标明秘字的密报便送到了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面前。自此，日本情报人员即十分注意孙中山的动态，各种报告不断送向外务省。日积月累，数量相当可观。这些报告，和其他关于中国革命者的情报汇集在一起，名为《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含亡命者)》。现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号为1·6·1·4－2－1。它们是研究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将其中少部分摄成缩微胶卷，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大部分遗漏未摄。1985年，我应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之邀，赴日访问，有机会阅读了全部该项档案。现就其中1900年部分略作探索。

1900年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这年6月，中国北部土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大举入侵中国。这时，孙中山正居留于日本。他忧心如焚地注视着国内外形势，千方百计地利用时机，筹备发动反清起义，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档案反映出，孙中山的意思是：在南方建立共和国，然后逐渐向北发展，推翻清朝政权。6月上旬，他与人密谈说："目前北京方面形势异常不稳"，"如清政府势力失坠，即我辈奋起之良机"。他表示："我等之最终目的是与南方人民共商大计，割取清帝国之一部另建

一新共和国。"[1]8月,和孙中山一起行动的日本人内田良平也透露:"孙逸仙及其一派党徒策划之目的为,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地,建成一独立的共和政体,然后逐渐向华北方面伸展势力,推翻爱新觉罗政权,最后统一支那十八省,在亚洲建成一大共和国。"[2]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纵横捭阖于香港英国当局和日本政府之间,同时积极争取李鸿章、康有为、容闳等人,力图建立广泛的合作。

当时,香港英国当局正在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孙中山对这一计划表示过兴趣。为此,他于6月11日离日南行。7月12日,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途经香港,曾与港督卜力(N. A. Blake)会谈。有关情况,孙中山于7月24日向日本"某访客"介绍说:"太守(指卜力——笔者)向李氏说明形势,言称:按刻下清国时局,实为分割广东、广西两省之良机等等,并怂恿李鸿章以孙逸仙为顾问,出掌两省之主权。李氏答称:将观察今后时局之趋势,徐行处断。"孙中山并称:"太守所言,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展其利益范围。"[3]这段言论显示,孙中山虽然在华南"自主"问题上与香港英国当局发生密切关系,但对其侵略意图是洞若观火的。

关于孙中山南行的情况,档案称:"目前孙逸仙潜赴香港之际,曾与香港太守进行密商。密商之事似已略见端倪,故又暂来我国。其后,香

---

① 《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秘甲字第212号,1900年6月11日发。

②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48号,1900年8月26日发。

③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兵发秘字第410号,1900年7月25日发。

港太守已有通告前来，略谓：密商之事，当可接受。”[1]孙中山南行时，一直未能与卜力见面。这里所说的“密商”，可能发生在孙中山的代表与卜力之间。据卜力8月3日给殖民大臣张伯伦的备忘录，他和孙中山的代表确曾有过一次会见。卜力要求孙中山等人“起草一份有许多人签名的送给列强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且说明，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会使列强感到为难的任何行动”[2]。卜力报告说，他的建议已送交孙中山的“革新派”。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述，当即此事。档案又称：“孙之同志已将其所谋事项草成一纸建议，拟请交香港太守。”[3]档案并提供了该项建议的具体内容，共四条：

(1)移都中央(上海或汉口)；(2)颁行自治制(中央政府将就施政问题向各国公使征询意见，地方政府将就自治制问题向各国领事征询意见)；(3)改革刑政，使其公平；(4)废科举，兴实学。

从这四条来看，它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致港督卜力书》中的《平治章程》。该函由孙中山领衔，有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兴中会骨干联合签名。所不同的是，《平治章程》为六条，较档案多出两条，文字亦有很大悬殊。这种情况说明，档案所收可能是最初的稿本，而今存《平治章程》则是后来修改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档案记载，平山周认为，上列第二项所谓“中央政府将就施政问题向各国公使征询意见”等语，“将使国家之独立为之丧失”，特地于8月24日赶到门司，和

---

①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74号，1900年9月2日发。

② 《卜力致张伯伦》，1900年8月3日，英国外交部档案，第17组1718卷〔46〕，364～367页，转引自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18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

③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874号，1900年9月2日发。

正在登轮回国、秘密前往上海的孙中山商谈,建议削除此条。[①] 这就说明,《平治章程》到这时还未定稿,今本《孙中山全集》将它定为当年 6、7 月之间的作品,看来需要修正。

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跃,中国政局呈现出微妙多变的形势。老奸巨猾的李鸿章离开香港之后,到上海就逗留不前了。他要等一等,观察一下风向。孙中山此次前往上海的目的之一就是和李鸿章会谈。他认为,北京政府当时已全为“排外思想者”所占据,光绪皇帝随时有被害的可能。只要光绪皇帝一死,南方督抚们便会“另行动作”。早在 8 月上旬,他就声称:“清国南方各省督抚以及新进有识之士,在满清朝廷尚存在之期间,固将维持现状;但随时势之演变,迟早必与我等意见一致。基于此情况,身入故国固属危险,但就某些地区而论,作为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亦可通过无甚危险之和平途径与有上述思想的人士相会合,实属最为必要。基于此原因,只要无何危险,亦愿与李鸿章会谈。”[②]后来,他又进一步声称,如果时机许可,愿与刘坤一、张之洞一见。[③]

孙中山此行目的之二是联络容闳。当时,容闳在唐才常等人的拥戴下,已经出任上海中国国会会长,在其起草的英文宣言中声称:“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孙中山对此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政治改革派中亦有不同派系之分。当今之局,彼此间绝不可纠缠于以往在发展当中所生之某些感情隔阂而互争短长,

---

①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 874 号,1900 年 9 月 2 日发。

②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秘甲字第 308 号,1900 年 8 月 10 日发。

③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 874 号,1900 年 9 月 2 日发。

亟应消除成见，广为联合，团结一致，共同谋划。吾等仰为首领之人乃系容闳。此人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颇孚众望。据推测，此人正与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及康有为一派中之重要人物暗相联结，从事政治改革之策划，正在循序渐进之中；本人亦欲厕身其间，竭诚效力。”[①]孙中山并表示，如果时势合宜，他准备直入北京一行。

孙中山此行的目的之三是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继续与香港当局谈判。档案称：“又闻，孙抵上海后，将由英国领事串通，与香港太守秘议，并将通过此次国际谈判以遂其志。”[②]

孙中山启程之后，在轮船上曾经以笔答的形式对“访客”发表过一次书面谈话。中云：“前略诚如君言，伊侯不过为政策之诡变，不得止〔已〕而为此反对保全之言，原无唱分割之论，仆闻之略安。”当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北京，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瓜分中国，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即形式上保持中国的完整。两相比较，后者对中国人民略为有利。伊藤博文是日本政界名流，对日本政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孙中山极为关心他的主张，明确地表示“喜闻保全之论，而恶分割之言”[③]。这段话，虽是写给“访客”的，实际上是写给伊藤和日本政府的。笔答中，孙中山还倾诉了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和对民族独立、统一的渴望。他说：“吾国自有史鉴以来，数十余朝，每当易朝，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尚如此，况为他国所瓜分者乎！故有识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

---

①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秘甲字第 334 号，1900 年 8 月 22 日发。

②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 874 号，1900 年 9 月 2 日发。

③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兵发秘字第 593 号，1900 年 9 月 22 日发。

国之分割也。"[①]这段话,表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襟怀。

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时候,正是张之洞在武汉血腥镇压自立军起义之后。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终于决定支持张之洞。对唐才常等人的逮捕是经过英国代理领事傅磊斯同意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英国驻沪领事对孙中山的来访只给予了冷淡的接待。孙中山还在船上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进行了会谈,也没有什么结果。9 月 3 日,孙中山与容闳、容星桥等人同船抵日。容闳对九州《日出新闻》社记者说:"英国对清国之行动,其真意何在,实不可知! 世间盖无心事难测之如英国人者。"[②]这应该也反映了孙中山此时此际的心情吧!

上海之行失败使孙中山转而继续经营南方。9 月 25 日,孙中山乘轮船由神户驶赴台湾,经过马关的时候,曾与玄洋社头目、日本人平冈浩太郎会谈。谈话中,孙中山对日本政府的冷淡态度流露出不满之情,平冈解释说:日本政府之所以冷淡,"一是出于对英国外交策略上的考虑;但更主要者,乃因先生对日本尚无任何贡献"。平冈接着向孙中山提出:"现今台湾土匪尚未剿平,儿玉总督为此颇费心机,且对我国之国力消耗亦实匪尠。且今日台湾匪徒已绝非台湾本地之土人,其主要动力实来自隔岸闽、粤两省人之煽动与资助。"平冈要孙中山协助儿玉,"根除匪患",并称,这将是对日本的一项"厚贶"。此后,"我等即可以儿玉总督为中心,在日本为先生奔走效力,裨先生得遂大志"。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台湾各族人民即不断发动反抗斗争,给予侵略者以很大困扰。平冈的这一席话主要目的在于诱使孙中山为日本的侵台

---

① 《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兵发秘字第 593 号,1900 年 9 月 22 日发。

② 《长崎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 336 号,1900 年 9 月 7 日发。

政策服务。孙中山当时表示:“当在可能范围内竭尽绵薄。”[1]后来的事实表明,孙中山的这种表示乃是虚与委蛇,他的真实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台湾总督儿玉的力量,在华南发动起义。

9月28日,孙中山抵达基隆,随即与平山周同赴台北,与儿玉的代表台湾民政长后藤新平会谈。后藤“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2]。其后,孙中山即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聘请日本军人参加,一面命郑士良于10月8日在广东惠州举行起义,一面积极筹备在厦门以南云霄县的铜山港登陆。但是,日本政府迅速改变了态度。10月2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电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等,告以孙中山的起义意图,有许多日本人可能是他的同谋。电报称:“台湾总督已经下令,打电报通知他们可能到达的港口的日本领事。他们或许已经到达中国,即使没有上述电报,万一他们中一些人到达你的地区,你要严密地监视他们的举动,并且作出最大的努力,防止他们的阴谋实行。”[3]10月19日,山县有朋内阁辞职,继任的伊藤博文内阁采取同一态度。

日本政府态度的变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关。

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东亚同文会和日本政府都曾蓄谋乘机侵略中国南方。6月18日,东亚同文会召集干事会。会长近卫笃麿主张“严密审时度势,如有一发可乘之机,自应奋勇前进,以谋帝国之利益”。但他同时又表示,必须“与列国保持协调”,“谛视俄国之动静,乃为明智”。因此干事会一致议决,暂不对中国出兵,以期“养精蓄锐,一旦时

---

①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1000号,1900年9月28日发。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8章。

③ 《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等电》,1900年10月2日收,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机成熟，自当一展鹏翼，占领南方之目的地”[①]。内田良平原计划怂恿孙中山在南方起义，他自己则同时纠集土匪，在华北举事，占领朝鲜，引发日俄战争。但是，当他将这一计划向“幕后谋主”汇报时，“幕后谋主”认为，“日俄冲突不久必将发生，今日如在华北举事，难免引起列强干涉”[②]。正是这些顾虑，促使日本政府放弃了原定夺取厦门、占领福建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并相应地改变了对孙中山起义的态度。



日本警方关于孙中山在日活动的报告（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11 月 10 日，孙中山失望地离开基隆，再赴日本。他在与人谈话时说：“本人对日本政府之行动极为关注。盖以日本在地理上较列国占有优势，并且出动军队最多（指八国联军中的日军——笔者），显示出极大

① 《关于清国亡命者孙逸仙等人动静之报告》，乙秘字第 416 号，1900 年 6 月 19 日发。

②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 848 号，1900 年 8 月 26 日发。

的军事力量,使列国为之震骇。既如此,本人预期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亦将采取同等步骤,在一切事务中俱居于主导地位。果如斯,则本人亦将奋起崛起,与日本政府步调相谐,以期大举谋事。讵料日本政府优柔寡断,此次又有坐视利益为他国所夺之势,为此状况,本人的事业又安得不受挫折!"又说:"本人之事业系于日本,日本既不能主动占居主导地位,则本人之事业即将无可作为。"[①]孙中山当时将全部希望都倾注在日本政府身上,一旦落空,其沮丧心情是不难想象的。

但是,孙中山毕竟是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再赴日本之后,立即着手准备新的起义,11月下旬,他与人谈话称:"本国目前形势,将是举事之大好时机,我同志等亦大有奋发之志,正在稳步前进。"他一面与日商签约,购买250万发弹药,一面努力摸清伊藤博文内阁的态度。他说:"举事之前必须取得一二强国之支援,至少必须取得谅解。现今日本内阁更迭未久,外交方针尚未明确,看来依靠日本尚不如转倚已示谅解之英国为佳;但必须探明举事之际日本政府将取何种态度。"[②]由于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孙中山只能摇摆于英、日两国政府之间。彻底摆脱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段路对孙中山来说是漫长而又遥远的。

附记:本文所引日本外务省未刊档案,大部分为邹念之先生所译,谨此致谢。

原载《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4期

---

① 《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高秘字第1131号,1900年11月15日发。

② 《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的报告》,秘甲字第500号,1900年11月27日发。

孙中山秘密赴沪时的笔谈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着许多孙中山的谈话记录。它们几乎都是日本情报人员收集的，目的在于供政府决策之用。例如《孙中山笔答访问者之一节》即是如此。该文为日本兵库县知事大森钟一上报给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和警视总监的密件。全文如下：

> 前略诚如君言，伊侯不过为政策之诡变，不得止〔已〕而为此反对保全之言，原无唱分割之论，仆闻之略安。仆支那孤愤之士，既恨清廷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联军之进北，守文明之道者，独贵国耳。其他实野蛮之行，比团匪之待外人为尤甚。支那人目击心伤，所以不忍闻分割之论。如各国竟出此策，则曰百世之地，祸尚未有涯也。
>
> 敝国之朝，犹贵国之内阁政府，而延长其期耳。每数十年或数百年而一易。吾国自有史鉴以来，数十余朝，每当易朝，有暂分裂者，有不分裂者，而分裂者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自行分裂尚如此，况为他国所瓜分者乎？故有识之士，甚畏分割也，且更畏外国之分割也。何也？有鉴于清之入关也。清入主支那之际，杀人盈城盈野。余威所播，至今民犹畏之，而不敢言恢复，然今日清政府腐败，自取灭亡。支那之士，方期天王土恢复，所以喜闻保全之论，而恶分割之言也。

以上原为中文。由于是笔答，因而应该视为孙中山的佚作。其中个别文句略显生涩，可能是日本情报人员抄写时有某些错漏。

又，在答客问时尚有言称：

> 刻下正在渡航上海途中，抵沪后，投宿租界，恐将更有不测之虞。

以上原为日文。

1900年6月17日，英、俄、德、法、美、意、奥、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8月2日，侵略军自天津向北京大举进犯。14日，占领北京。西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走。侵略军在中国北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华民族堕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为了拯救祖国，拯救同胞，孙中山以大无畏的精神，于8月22日自日本横滨秘密乘轮前往上海。孙中山此行目的是，利用时机，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康有为等，推容闳为首领，以江苏、两广等南方六省为基础，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北方发展，推翻清朝政府。从所附一段日文看，《笔答》即作于赴上海的轮船上。它表现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慨，也表现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深沉忧虑和对民族独立、统一的强烈渴望。

伊侯，指日本政友会总裁，多次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当时，帝国主义对华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瓜分中国，一派主张"保全中国"，即形式上保持中国的完整。两相比较，后者对中国人民较为有利。因此，孙中山极为关注伊藤博文的主张，明确地表示："喜闻保全之论，而恶分割之言。"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散兵游勇，也有少量中小地主和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在进行反帝斗争时表现出笼统排外的倾向并不奇怪。帝国主义声称他们出兵是为了"讨伐"义和

团,“惩办匪类”,但是,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匪类。

孙中山当时远在日本,只能通过日本和西方的报纸判断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透过这些报纸的歪曲报道,孙中山仍然看出了侵略军的“野蛮之行”,比义和团之待外人“为尤甚”,这是有见地的。

帝国主义之所以由主张“瓜分”到主张“保全”,并不是出于“善念”和“友谊”,而是义和团英勇斗争的结果。所以后来,孙中山称赞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人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原载《人民政协报》,1986 年 6 月 3 日

章太炎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1902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期间,与湖南人周宏业等讨论“革命排满”的宣传方法。章太炎主张:首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南明末年,永历皇帝由云南逃往缅甸,1661年被执送清军,南明政权覆灭,至1902年,已经是第二百四十二个年头。章太炎等人当时认为,南明政权的灭亡也就是中国的灭亡,决定召开一次大规模的纪念会,以震动留学界。此事得到孙中山等人的积极赞同。会议原定在东京上野公园的精养轩举行,因日本警察阻止,临时决定改在横滨补行纪念式。这是中国留日学生的一次重大政治行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纪念会有一份启事,题为《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由章太炎起草。它以古朴的语言,指责满洲贵族入关时的暴虐,号召汉族人民继承明末抗清志士的事业,奋起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它是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是它的版本却歧异镠辖,有加以考辨的必要。

打开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人们即可看到章太炎手书的“亡国纪念会启”手迹影印照片。这份手迹,据冯自由说:那是1927年他写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时,向章太炎征求史料,由章手书赠给他的。但是,当冯自由将手迹和他本人收藏的“印刷旧稿”两相比勘时,却发现手迹已有改动,例如,“支那”易为“中夏”,“延平”易为“大木”,“梨洲”易为“太冲”,删去了“婵嫣相属”四字等。冯自由认为,手迹虽然珍贵,但“究以不失本真为善”,因此,在所著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革命逸史》等书中，仍然采用“印刷旧稿”。多年来，史家们所引用的也都是这份“印刷旧稿”，然而它同样并非本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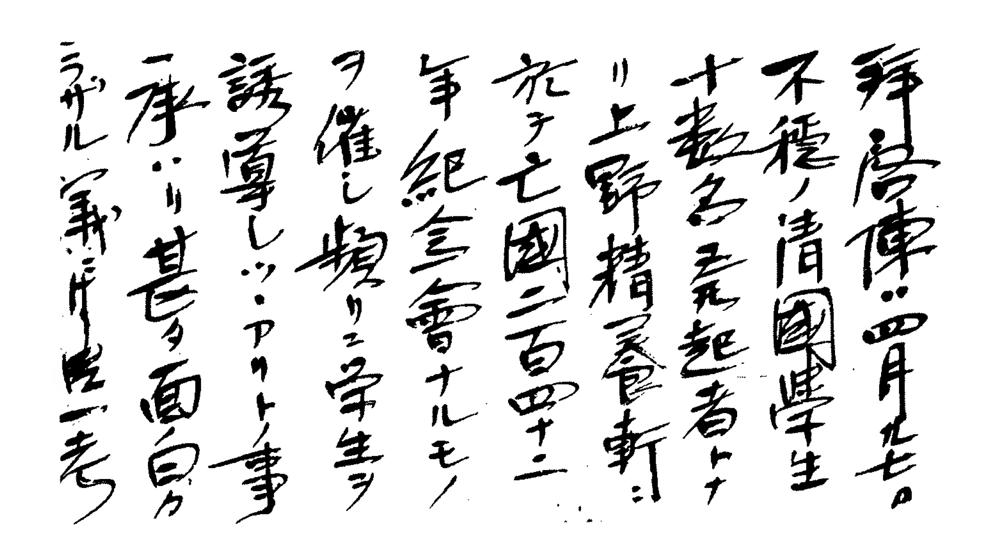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有一份会启，上面盖有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4月20日的邮戳，足证是当时印发的原件，将原件和冯自由所称“印刷旧稿”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多有不同——

甲、文字。“印刷旧稿”开头有一段文字：“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共十五句，原件根本没有；原件开头两句，“处今世而惧亡国，非狂则癖哉”，“印刷旧稿”也没有。其他文字歧异还有十余处之多。

乙、会约。“印刷旧稿”缺，共五条：

> 一、本会无论官、商、士、庶，凡属汉种，皆可入会；和人有赞成者，待以来宾之礼。
>
> 一、本会不取捐资，乐助者听。
>
> 一、本会每岁开设二次，会期临时择定，要以阳历四月、九月为限。
>
> 一、本会此次开会，定期阳历四月二十七号午前十一时，于七日前先行知照，赴会与否，望于接信后三日内示复。
>
> 一、本会本部暂设东京牛込区天神町六十五番地，此次开会于上野精养轩。

这五条会约虽属具体规定，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却颇为重要。它告诉我们，纪念会不是只准备开一次，而是一年两次，年年开下去；除开会地点外，还设有本部接纳会员，具有某种团体的性质。其第四条明确说明：“此次开会，定期阳历四月二十七号”，这一项和日本外务省送交大


拜啓陳ハ四月廿七日
不穏ノ清國學生
十數名發起者トナ
リ上野精養軒ニ
於テ亡國二百四十二
年紀念會ナルモノ
ヲ催シ頻リニ學生ヲ
誘導シツツアリトノ事
承ハリ甚タ面白カ
ラザル義ニ付[illegible]一考

日本官方关于章太炎等举办“亡国纪念会”的通报(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浦警视总监要求禁止开会的函件完全一致。该函称:“四月二十七日,不稳之清国学生十数名发起者,拟于上野精养轩召开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不断诱引学生。”由此可证,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等书将会议日期记载为四月二十六日是错的,以后的所有辛亥革命史著作也都跟着错了。冯书并称,定在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忌日,这一点显然也错了。

丙、发起人。“印刷旧稿”未列发起人。据原件,发起人为“支那遗民”章炳麟、秦鼎彝、周逵、唐蟒、马同、冯懋龙、王熊、冯斯栾、李群、朱楞十人。将这一名单和冯自由著作中提供的名单比较,可以发现:章炳麟、秦鼎彝、冯懋龙(自由)署的是真名,周宏业、马君武、朱菱溪署的是化名。此外,唐蟒、冯斯栾为发起人,而冯著未列入;冯著列入的陈犹龙,则不见于原件。还有一个王熊,不知是王家驹,还是王思诚,有待考证。

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冯自由是“亡国纪念会”的发起人，他提供的史料竟不可靠，由此可见，史学研究方法虽日益纷繁，而考证之学终不可废。

原载《团结报》，1988 年 3 月 8 日、4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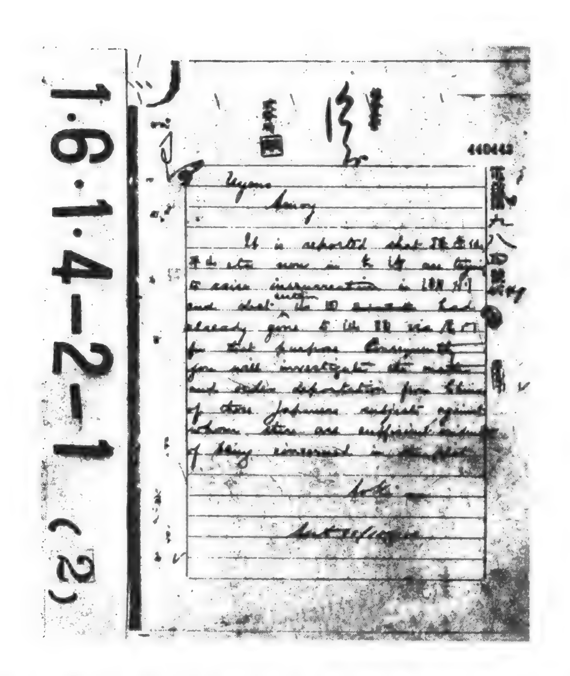
跋日本政府有关惠州起义的电报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本组电报，原藏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号为1·6·1·4-2-1(2)。其中英文手写体八件，日文手写体两件。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积极准备在中国南方发动起义，建立共和政府。9月25日，偕日本人内田良平、山田良政、平山周、尾崎行昌等自日本神户启程赴台湾，28日抵基隆。其后，山田良政转赴汕头，尾崎行昌等赴厦门，孙中山与平山周留台北，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会谈。后藤"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孙中山即在台北建立指挥中心，聘请日本军人参加，并命郑士良于10月8日在广东惠州举义。本组电报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日本政府原计划乘机占领厦门，侵据福建。但在9月底，由于担心欧洲舆论反对，也由于与沙俄的矛盾，放弃了占领厦门的计划，因而也相应地改变了对孙中山起义的态度。过去传统的说法是，山县有朋内阁出于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支持"孙中山起义的，只是继任的伊藤博文内阁才改变了方针。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也曾自述："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者，而予潜渡之计划，乃为破坏。"本组电报说明，孙中山的这一看法并不准确，日本政府态度的转变，在山县有朋内阁辞职前即已开始。



1·6·1·4-2-1 (2)

440442

Uyeno
Amoy
It is reported that [illegible]
[illegible] now in [illegible] are trying
to raise insurrection in [illegible]
and that certain [illegible] had
already gone to [illegible] via [illegible]
for that purpose. Consequently
you will investigate the matter
and order deportation from China
of those Japanese subjects against
whom there are sufficient [illegible]
of being concerned in the [illegible]

日本政府关于惠州起义的电报(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附:日本政府有关惠州起义电报

1.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等电

1900 年 10 月 2 日收　外机第 41 号附件

据报告,被怀疑试图在中国南方举义的流亡者孙逸仙于 9 月 20 日抵达基隆,有许多日本人可能是他的同谋。他们中的著名人物是石川县的吉仓汪圣和福冈县的内田甲。台湾总督已经下令,打电报通知他们可能到达的港口的日本领事。他们或许已经到达中国。即使没有上述电报,万一他们中一些人到达你的地区,你要严密地监视他们的举动,并且作出最大的努力,防止他们的阴谋实行。

2. 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电

1900 年 10 月 11 日　电送第 984 号

厦门　上野

据报告，孙逸仙、平山等人现在台湾，正试图在潮州发动起义。为了这一目的，山田无疑已经由厦门到达汕头。因此，你要调查这件事，并且下令从中国驱逐这些日本臣民，已经有了关于他们牵连于这一阴谋的足够的证据。青木

3. 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电

厦门　1900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9 点 30 分发

下午 1 点收　电受第 2067 号

东京　青木

第 4 号(10 月 11 日)。关于您 10 月 2 日的电报。山田良政、出水茂雄和森冈竹之助以及其中国同伴已于 10 月 10 日从台湾到达，并离开这里去香港。据报告，他们准备去广东。我已经打电报给驻香港领事，监视他们的行动。上野

4. 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电

厦门　1900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6 点 5 分发

13 日上午 1 点 30 分收　电受第 2072 号

东京　青木

第 5 号(10 月 12 日)。尾崎行昌和几个日本人从香港经过台湾，到达厦门，现正停留在这里。据说，他们正在和我第 4 号电报中报告的几个人通信。我正在继续不断地严密地监视他们在本地区的活动。上野

5. 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电①

1900年10月16日发　外机字第41号

本月1日来示所附之另件电文及本月2日机密第14号来示，均已奉悉。关于孙逸仙之阴谋②，兹据山田良政（又名良介，青森县弘前人氏）在本港之友人言称：孙逸仙现在台湾，得知我台湾总督并未放弃其略取华南③之意图。孙氏闻言甚为喜悦，已决定在广东省潮州与惠州之间举事；并派山田良政进行筹备，山田为此即将前来本④港，等等。又闻：孙逸仙等又计划在举事之时，由台湾引日本兵在厦门南方之云霄县铜山港登陆，云云。山田良政其人，身着清国服装，前系南京同文会⑤所设日本语学校之干事。

谨此报闻。此致　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　领事丰岛舍松

6. 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电

1900年10月18日　电送第1010号

厦门　上野

据报告，岛田、玉水、野田等孙逸仙的同谋者即将出发到泉州，在那里实行他们的阴谋。因而，你要按照先前的指示对付他们。青木

---

① 原件为日文。

② 原档为“隐谋”。

③ 原档为“南清に对する事经略”，即掠取我华南权益之意。

④ 原档字迹模糊，曾经涂改，很像“香港”，也像“当港”。译文姑作“当港”辨认，即福州，故译作“本港”。

⑤ 同文会，即东亚同文会。其所设之学校，后改称为东亚同文书院，旨在培养研究中国和在中国活动之专门“人才”，其中有些人后来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

7. 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电

厦门　1900年10月19日上午10点10分发

下午2点收　电受第2114号

东京　青木

第7号。关于您10月18日的电报。岛田和我第5号电报中提到的尾崎已经离开这里去台湾，在厦门没有做任何事情。现在，只有玉水在此地。据说，他打算去香港。据我所知，他们在本地未能实现任何阴谋。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从厦门发出的报告有些夸大，这是有利的（一语不明[①]）。台湾总督应该奉命检查所有去厦门和其他港口的旅客。当某些可疑的人将要离开那里到本港来的时候，打电报给我。我正在这里和汕头附近进行严格的调查，并且将按照指示行动。上野

8. 内务大臣末松谦澄秘电[②]

1900年10月24日发　机密第74号

本月二十日机密第66号来件[③]所述：凡可疑为与孙逸仙一派有关之日本国人前来清国之际，均应由台湾总督府立即以电报告知其所到达地点近处之领事，等情，业已知悉。已行文饬民政长官[④]照办。特此电达，即希知照。内务大臣男爵末松谦澄

---

① 本句为原文所有。

② 原件为日文，未注明此电发往何处何人。

③ 电钦，函钦？原档未明。

④ 日本国内各地之民政长官。

9.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致驻福州领事丰岛舍松和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电[1]

1900年10月25日　电送第1064　1065号

福州　丰岛舍松

上海　小田切万寿之助

如果被怀疑为孙逸仙同谋的几个人经过台湾,出发去您的港口,台湾总督将由此打电报给您。加藤

10.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致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电

1900年10月25日　电送第1063号

厦门　上野

关于您的第7号电报。假如被怀疑为孙逸仙同谋的几个人经过台湾出发去您的港口,台湾总督府将打电报给您。加藤

附记:两件日文电报,承尹俊春译,邹念之先生校,谨致谢意。

原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

① 1900年10月19日,山县有朋内阁辞职,由伊藤博文继任内阁总理大臣,加藤高明出任外务大臣。

《奴才好》不是邹容的作品

奴才好!

奴才好!

勿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人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

这是邹容《革命军》中引用过的一首诗(诗长,不具录)。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邹容的作品。1974 年 4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邹容》一书说:"他又以辛辣的笔触,写了一首《奴才歌》,讽刺不许革命的奴隶哲学。"1975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一书说:"邹容还写了一首乐府《奴才好》","怀着悲愤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孔学在政治上的反动性,痛斥孔孟之道就是奴才之道,它不仅维护了封建主义的统治,而且维护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歌词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尊孔与崇洋之间的关系,并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识"。云云。

这首诗果真是邹容写的吗?在《革命军》中,邹容说:"近人有古乐府一首,名《奴才好》。"这里,说得很清楚,它的作者是一位"近人",而不是邹容自己。

这位“近人”是谁呢？查《奴才好》发表于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第86期，署名“因明子”。“因明子”是蒋智由（观云）的笔名，因此可知《奴才好》是蒋智由的作品。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邹容自贬《革命军》

邹容的《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 年,他又致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价若干。
>
>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
>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20 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较之《革命军》所单纯倡导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进了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邹容声称“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是在 1903 年 12 月 4 日,而孙中山的《复某友人函》则作于同年 12 月 17 日,比

较起来，邹容还要早几天。遗憾的是，邹容很快就瘐死狱中，没有能将它写出来，否则，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又会出现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

原载《团结报》，1988年1月26日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

在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沙皇俄国是贪婪而野心尤大的一个。

还在19世纪,沙俄帝国主义就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了我国东北、西北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00年,它在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的同时,又武装抢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一口吞下黑龙江以南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随之,沙俄政府将一个又一个"密约"强加于中国当局,企图巩固其侵略成果,攫取更大的权益。

沙俄帝国主义的阴谋如果得逞,不仅东北三省要沦为俄国的属地或附庸,势必还将激起国际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瓜分狂潮。"存亡呼吸争此刻!"在东北人民被迫实行武装抗俄、保家卫国的同时,一场以反对签订"密约"、要求收复东北为中心的拒俄运动,在我国广大人民中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

爱国救亡的热烈动员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前后持续四年。中间,因沙俄侵略形势的变化,斗争的焦点在不同时间里也有所变化,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01年反对沙俄迫订条约霸占奉天的斗争;1903年反对沙俄拖延撤兵的斗争;1903年至1905年反对沙俄重占奉天和在东北与日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1900年10月，沙俄侵略军强迫清朝盛京将军增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沙俄要在沈阳设立“总管”一员，奉天将军所办各项“要政”，“该总管应当明晰”。还规定，奉天省城等处应留俄兵驻防，在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解散，武器收缴，营垒拆毁。① 这样，沙俄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要将奉天省交还清朝政府，实际上却在力图把它变为自己武力控制之下的殖民地。1901年初，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规定沙俄有驻兵东北“保护”铁路权，有出兵帮助“剿抚”权，有要求革办中国官吏权，中国不得驻兵东北，不得运人兵器，不得自行造路，等等，全面剥夺了我国对东北的主权。此外，《约款》还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② 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

3月15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汪允中、汪康年、蒋观云等发表演说。与会者严正谴责沙俄的侵略野心，揭示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民“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会议同时要求清朝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③，并于会后向江、鄂两督呈递《公禀》，主张反击沙俄帝国主义侵略。

3月24日，上海爱国人士得悉沙俄政府逼迫清王朝于25日、26日在俄方提出的约款上画押，第二次集会于张园，再度要求清朝政府“始终坚拒”，“勿受恫吓”④。

张园拒俄会议得到了各地群众的热烈响应。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以至东北的群众纷纷来函，捐款、捐物，表示支持。杭州城内贴满了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144卷。

② 杨儒：《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抄》。

③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

④ 同上，1901年3月25日。

声讨沙俄帝国主义的揭帖——《普天同愤》。3 月 28 日，召开演说会，要求筹集“备俄民款”，对俄“公战”[①]。广东香山、澳门以及香港的绅商也举行集会，“聚议拒俄”[②]。在新加坡的华侨则强烈表示，沙俄侵略者的要求“万不可许”[③]。

斗争很快取得初步胜利，清朝驻俄公使拒绝在约款上签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是清朝政府最终不敢签约的重要原因。

1902 年 4 月，清朝政府与沙俄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沙俄侵略军应分期从中国境内撤走。1903 年 4 月，围绕撤兵问题，拒俄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按条约，当时沙俄应撤退在我国金州、牛庄等地的侵略军，但是，沙俄政府不仅没有撤出，反而乘机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

4 月 27 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与会者除谴责沙皇俄国的“吞并”政策外，还指斥推行“亲俄”外交的清朝政府“昏昧狂惑”。会议致电清朝政府外务部，表示对沙俄帝国主义的七项新要求，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通电各国表示：即使清朝政府承认，“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④]。会后，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中国四民总会。4 月 30 日，四民总会集会，上海各界和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学生等 1200 余人参加，蔡元培、马君武等演说。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国土、国权为目的”[⑤]。邹容等 1600 余人先后签名入会。

4 月 29 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激昂奋发，议决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 130 余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 50 余人签名加入本部。拒俄义勇队以古希腊斯巴达人反击波斯入侵，“扼险拒

---

① 《中外日报》，1901 年 4 月 6 日。

② 同上，1901 年 4 月 5 日。

③ 同上，1901 年 4 月 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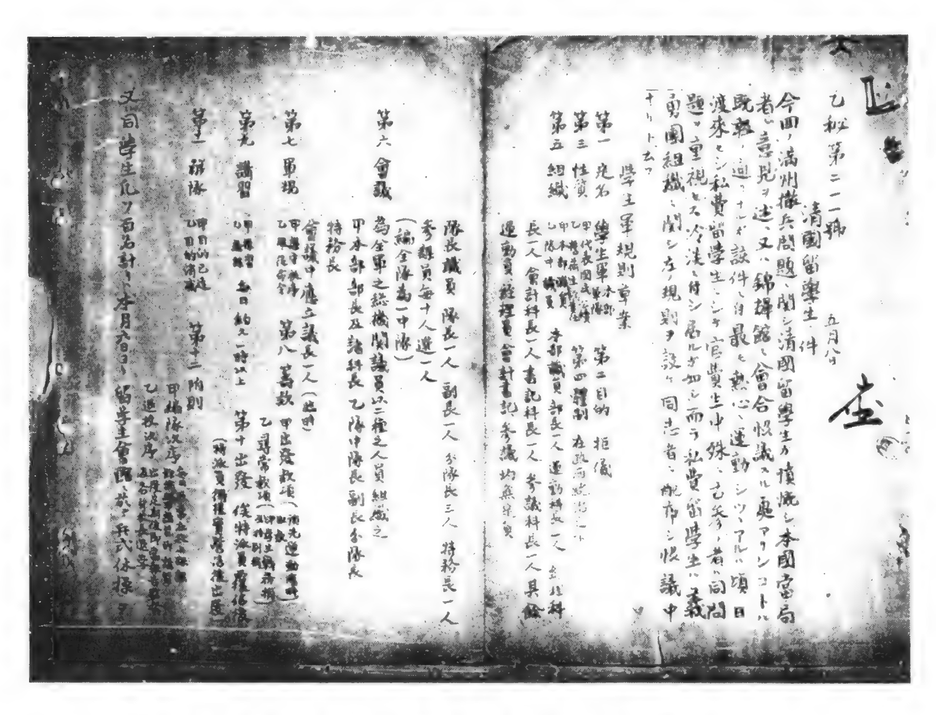
④ 《苏报》，1903 年 4 月 28 日。

⑤ 同上，1903 年 5 月 1 日。国民总会在实际成立时，定名为国民公会。

守”的事迹自励，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①]

年轻的鲁迅当时正在东京留学，他积极参加拒俄运动。锦辉馆大会后，他迅速译作《斯巴达之魂》，勉励中国青年“掷笔而起”，像斯巴达人一样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国。

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11日，由于日本政府的干涉，再次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吴永珊（玉章）、廖仲恺、陶成章、杨昌济等积极捐款支持。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女学生则组织赤十字社，准备随军出征。


乙秘第二一一號
清國留學生ノ件　五月八日
今回ノ滿州撤兵問題ニ關シ清國留學生カ憤慨シ本國當局者ニ意見ヲ述ヘ又ハ錦輝館ニ會合協議スル處アリシコトハ既報ノ通リナルカ該件ニ付最モ熱心ニ運動シツツアルハ頃日渡來セシ私費留學生ニシテ官費生中殊ニ古参ノ者ハ問題ヲ重視セス今後ニ付シ居ルカ如シ而テ私費留學生ハ義勇團組織ニ關シ左ノ規則ヲ設ケ同志者ニ配布シ協議中ナリト云フ

學生軍規則草案
第一 定名 學生軍
第二 目的 拒俄
第三 性質
第四 體制
第五 組織 本部職員 部長一人 運動科長一人 參議科長一人 長一人 會計科長一人 書記科長一人 運動員 經理員 會計 書記 參議 均無定員
隊長職員 隊長一人 副長一人 分隊長三人 特務長一人 參議員每十人選一人（編全隊為一中隊）
第六 會議 為全軍之總機關議員以二種之人員組織之 甲本部部長及諸科長 乙隊中隊長副長分隊長 特務長 會議中應立議長一人
第七 軍規
第八 喜故
第九 講習
第十 出發
第十一 解隊
第十二 附則
又同學生ハ……本月八日ヨリ留學生會館ニ於テ兵式体操ヲ

中国留日学生所组织的学生军规则（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① 《致北洋大臣袁缄》，载《浙江潮》第4期。

运动迅速发展到了北京、湖北、安徽、江西、广东、浙江、直隶、江苏、福建、湖南、河南各地。

4 月 30 日，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会后，向管学大臣和政务处呈递《请代奏拒俄书》，又向各省督抚、各省学堂发出函电，呼吁“发大志愿，结大团结”，“勿将东三省予俄”①！

湖北学生接到京师大学堂学生的函件后，各学堂同时停课，吴禄贞等数百人在曾公祠、三佛阁等处集会。学生们表示，祖国的一草一木也不能让给侵略者。

安徽学生于 5 月 17 日集会于安庆，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准备在此基础上，联络上海爱国学社和东南各省志士，进一步成立国民同盟会。

大半个中国都在动员：江西大学堂组织义勇队，福州成立海滨公会，湖南学生申请领枪备战，广东人士联名抗争，直隶四百余人上书，河南召开演说会……

较之第一阶段，运动的规模和参加的阶层都更为广阔了，爱国绅商、大中学生之外，少年儿童、基督教徒、八旗生员等也都积极投入斗争。为了激励同志舍身救国，有些青年知识分子甚至跳水、跳海，慷慨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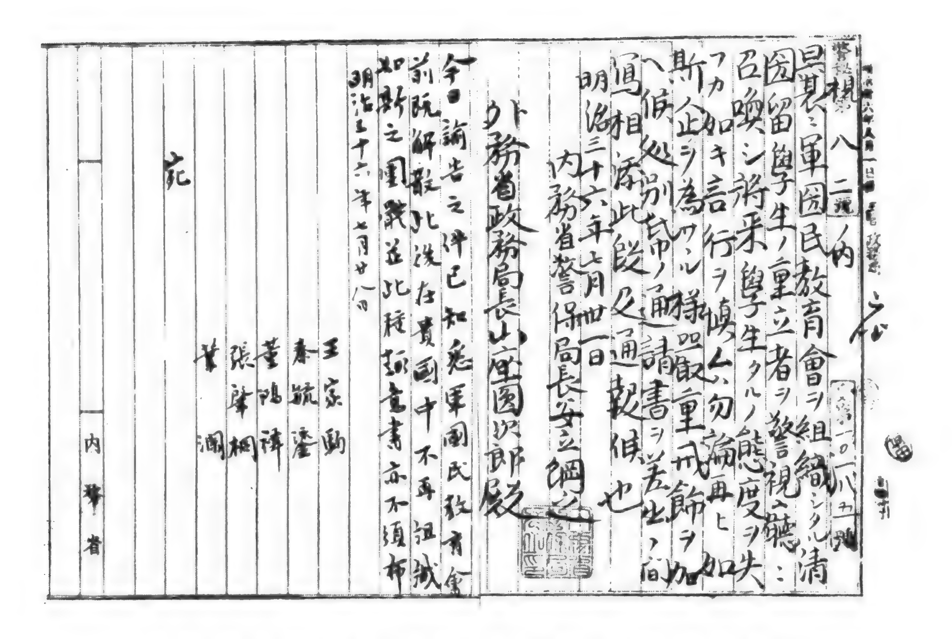
1903 年 9 月，沙俄政府将七项侵略要求合并为五条，重新向清王朝提出。10 月 20 日，沙俄侵略军强行闯入奉天城，升起沙俄旗帜，再次占领奉天，拒俄运动进入第三阶段。

12 月，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②。对俄同志会发刊日报《俄事警闻》，专门报道沙俄侵华消息，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拒俄。1904 年 3 月，日俄战争爆发，对俄同志会改组为争存会，《俄事警闻》也改名为《警钟日报》。11 月，因反对清朝政

---

① 《苏报》，1903 年 5 月 20 日。

② 《俄事警闻》，1903 年 12 月 15 日。


警秘視第八二號ノ内
昇某ニ軍國民教育會ヲ組織シタル清
國留學生ノ重立者ヲ警視廳ニ
召喚シ將来學生タルノ態度ヲ失ハ
ザルカ如キ言行ヲ慎ムベク諭シ再ヒ如
斯企ヲ為サヾル様取重戒飭ヲ加
ヘ候処別紙ノ通請書ヲ差出シ候
間相添此段及通報候也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廿一日
内務省警保局長安立綱之
外務省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殿

今日諭告之件已知悉軍國民教育會
前既解散此後在貴國中不再組織
如斯之團體並此稟報畫書亦不須布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廿一日
王家駒
秦毓鎏
董鴻禕
張肇桐
葉瀾

內務省

军国民教育会遭到日本政府禁止(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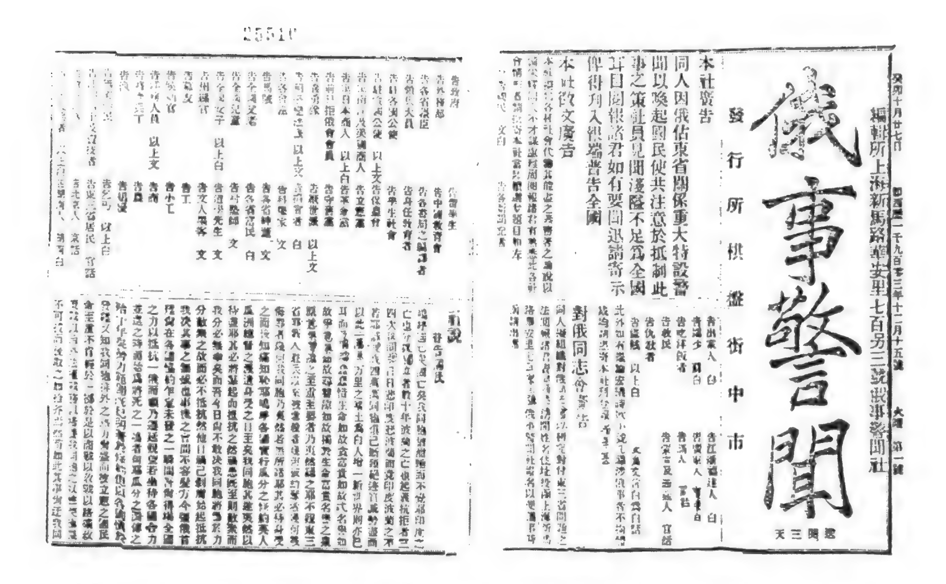
府联俄,再度改组为反对联俄会。

与对俄同志会成立时期相近,上海还出现了对俄同志女会,组织妇女投入拒俄斗争。

由于沙俄侵华机构道胜银行在上海以重息借提钱庄现银,接济东北的俄国侵略军,1904 年 1 月,上海钱业商人集议,决定共同查察勾结沙俄的奸商。同月,有人向上海商人散发传单,建议停止供应在上海的俄国兵船所需煤、菜等物。拒俄斗争从政治领域进入经济领域了。

与上海相呼应,在赵声、章士钊等发动下,南京水师、陆师、高等师范等学堂的学生集会于北极阁,要求编立"民兵",增设武备功课,练习兵操,以备抗俄。

民族危机深深地激动着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心。沪、宁之外,新疆的回族人民表示愿一战强俄;东京中国留学生纷纷停课,集会聚议,筹组


俄事警聞

癸卯十月廿七日

編輯所上海新馬路華安里七百另三號俄事警聞社

西歷一千九百零三年十二月十五號

大清 第一號

發行所棋盤街中市

本社廣告

同人因俄佔東省關係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此事之策社員見聞淺陋不足爲全國耳目閱報諸君如有要聞迅請寄示俾得列入報端普告全國

本社徵文廣告

對俄同志會廣告

社說

蔡元培创办的报纸《俄事警闻》(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

“义勇铁血团”;陈天华于感愤之中写血书寄回湖南,要求湘人预备死战;远在美洲的华商则打电报回国,表示愿承担对沙俄侵略军作战的费用。

这一时期,各地拒俄组织不断涌现。广东有助国拒俄同志议会,哈尔滨有商民自保会,锦州有仇俄会,湖北也有人发起组织拒俄会。其中,以丁开嶂的抗俄铁血会最为突出。

丁开嶂原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1903 年曾参加过上书要求拒俄的活动,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和同学朱锡麟、张榕三人共同出关,组织抗俄武装。朱锡麟成立东亚义勇队,张榕倡办“东三省保卫公所”,组织“关东保卫军”,丁开嶂则创立抗俄铁血会。铁血会联络了活跃于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省的“绿林领袖”,“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伙数万”[1],决心将沙俄侵略军从我国境内赶出去。

---

① 《大陆》,第 2 年第 4 号。

像丁开嶂等人这样直接投入抗俄武装斗争的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但它是这一阶段拒俄运动的一个特色。沙皇俄国侵略行动的加剧起了警醒作用,迫使拒俄运动的先进分子不能再停留在集会、演说、通电等常用的抗议形式上。

这一阶段运动的另一特色,是工人阶级的活跃。

东北工人直接受沙俄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对沙俄帝国主义最仇恨,"无论何事,皆喜与俄人相抗","其心恨俄人实深"。1904 年 2 月,在旅顺沙俄海军工厂工作的 2000 余名中国工人全体罢工。3 月,被沙俄霸占的东北各矿山中国工人也相率罢工。沙俄侵略者以增加工资为饵,诱骗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斗争,"势甚汹汹"①。其中,武山煤矿工人更组织起来攻击沙俄侵略者。不少工人逃离工厂、矿山,投入东北人民的抗俄武装。

1904 年底,沙俄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溃逃上海的阿斯科舰水兵无故杀害上海工人周生友,沙俄帝国主义拒绝交出凶手,上海人民掀起了要求惩凶的斗争。第一商学会举行演说会,对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演出了俄兵杀毙周生友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和《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群力,同盟罢工"。1905 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的各省商董于商务总会集会,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周生友的宁波籍同乡工人则在全市散发传单,定于 15 日开四明公所会议,准备停工罢市。次日,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前聚会。由于清朝政府的破坏和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妥协,这次斗争未能进一步向前发展。清朝政府要人们"静候妥办"②,

---

① 《警钟日报》,1904 年 4 月 6 日。

② 《外务部发商约大臣盛宣怀电》,见《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资产阶级上层要人们“静候上宪商办”[1]，但是，“众商明白者十之一二，工作则无一明白者”[2]。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动摇了，而工人阶级则是不妥协的。周生友事件是拒俄运动的尾声。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事件中简短的表现，显示了自己突出的性格。

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主义在东北侵占的权益因战败而逐渐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取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也由拒俄转入其他中心。

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清朝政府中，慈禧太后、李鸿章等属于亲俄派。他们企图依靠沙俄帝国主义的帮助维持自己腐朽的统治。对于沙俄政府的侵略要求，他们是准备予以满足的。1907年，当拉姆斯道夫将书面约款十二条改头换面，压缩为十一条时，李鸿章就明确表示，可以“照允”[3]，要杨儒“酌量画押，勿误”[4]！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属于亲英、日派。因为背景不同，他们和李鸿章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反对在沙俄政府提出的约款上签字。但是，不管是亲俄派也好，亲英、日派也好，都反对人民自己发动的拒俄运动。

第一阶段，清王朝流亡西安，既自顾不暇，又鞭长莫及，直接出面干预的是在南方的张之洞等人。1901年4月，张之洞电宁、沪当局，攻击

① 《时报》，1904年12月29日。

②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电》，见《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③ 《李傅相来电》，见杨儒：《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抄》。

④ 同上。

张园拒俄会议“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藉端煽众”，嘱刘绅一下令“设法阻止，以消乱萌”[1]。同月，杭州地方当局以“惑人观听”、“有碍时局”为理由出示禁止张贴拒俄揭帖，已经贴出的几百张被撕得精光。[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亲政府的上海《申报》连续发表《密约解》等文，声称约款云云，“类皆传闻无据之词”[3]，攻击拒俄运动的参加者“故为谣诼以骇民人”，“不俟朝旨，独断专行，勾结匪人，擅与友邦开衅”，“罪在必诛，法无可贷”[4]。显然，这是官方准备大肆镇压的前奏。

第二阶段，清朝政府的狰狞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召开拒俄大会的当晚，学堂当局就出示禁止，胡说拒俄不是“学生分内之事”[5]。此后，学堂当局开始在学生中查察“会党”。不久，奉旨会办京师大学堂事宜的张之洞又亲到学堂，警告学生，“学堂以外之事不可以作”[6]。

在安庆，安徽地方当局诬蔑爱国会的活动“摇惑人心”，“有违国家法律”，下令不准演说，不准结社，不准出售与阅读新书新报，违者“指名提究”[7]。安庆知府拘捕了爱国会发起人，封闭了西学堂，安徽大学堂开除了“议论拒俄”的学生十数名。[8]

在上海，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密告江苏巡抚恩寿，说是“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

---

①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见《张文襄公电稿》卷四十五。

② 《集成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上浣。

③ 《申报》，1901 年 3 月 28 日。

④ 同上，1901 年 4 月 23 日。

⑤ 《大公报》，1903 年 5 月 4 日。

⑥ 同上，1903 年 6 月 12 日。

⑦ 同上，1903 年 6 月 13 日。

⑧ 《国民日日报》，1903 年 8 月 23 日。

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①]。恩寿立即要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指名逮捕蔡元培等四人。

在湖北,武昌知府梁鼎芬居然召集停课聚会拒俄的学生,大放厥词,说是:"(尔等)只宜用功写字读书,以图上进。此等不干己之事管它则甚!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人,尔等亦不必干预!"[②]有的学生因为参加了拒俄会议而被梁以"性情浮动"为理由悬牌开除。

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拒俄活动尤其使清王朝惶惶不安。驻日公使蔡钧密电外务部,说是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正"分派会党","纠合同志","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等地,准备起事,云云。[③] 于是,清朝贵族、署理湖广总督端方立即密电沿江沿海及直隶各地"一体严备"[④]。5月底或6月初,清王朝发出了《严拿留学生密谕》,大骂留学生编立义勇队,要求与沙俄侵略军作战的行动"有碍邦交",要蔡钧等"时侦动静",要各地方督抚查拿"行踪诡秘","有革命本心"的归国留学生,"就地正法"[⑤]。6月21日,清王朝外务部根据慈禧太后"严密查拿,随时惩办"的指令,再次密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攻击爱国学生"肆行无忌","猖狂悖谬",要他们务必将这些"败类"查拿到手。[⑥]

各地的拒俄运动几乎无例外地遭到了镇压。南京各学堂颁布条例:禁聚众演说国政时事,禁书信往来中有"编义勇队"、"拒俄"等"骇人听闻"之语。成都的"青年组织"、"学社"一律被通知闭歇。有些地方的

---

① 张篁溪:《苏报案实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② 《苏报》,1903年5月19日。

③ 《大公报》,1903年6月28日。

④ 《中外日报》,1903年6月30日。

⑤ 《苏报》,1903年6月5日。

⑥ 《外务部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电旨》,端方档。

学堂居然在黎明时搜查学生宿舍，将《苏报》等新书新报概付一炬。

清朝政府为什么如此仇视拒俄的爱国者呢？道理很简单。第一，运动打击了侵略者和卖国贼，这就是所谓"擅自与友邦开衅"，"有碍邦交"；第二，人民自己发动斗争，漠视了"神圣"的君主专制，这就是所谓"把持国家政事"[①]，"不俟朝旨，独断专行"。为着"免蹈各国民权之弊"[②]，清廷在对付"革命"的名义下，毫不留情地对拒俄运动予以镇压。

应当指出，拒俄运动确实一开始就有革命党人参加，清廷并不完全是诬指。早在19世纪末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就开始了革命活动，孙中山与兴中会在海外华侨、留学生以及国内进步群众中都有一定影响。革命党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一面参加拒俄，一面也自觉地通过这个运动来扩大其影响。[③] 但是，在运动开始时，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相比，革命派的力量还是微弱的，在国内就更加微弱了；只是在拒俄运动进行的年代里，它的力量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沙俄和清朝政府帮了革命派的大忙，使革命派对人们的启导收到了自己未曾料及的效果。

清朝政府对拒俄运动竭尽禁止、摧残、镇压之能事，严重阻碍了运动的开展，但归根结底，反动统治者所收到的效果恰恰与其主观愿望相反。被空前的民族危机卷入拒俄运动的人们，绝大多数不是革命者，他们对救亡途径的认识很不一样，统治者的"新政"，改良派的"维新"，在他们中间都有市场，许多人甚至甘心情愿去为大清效命疆场。可是，报国之门却被堵塞了。这就不能不激起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迫使人们深思：为什么这个政府拿中国权益去结欢"与国"那么大方，而对爱

① 《致刘制台、盛大臣》，《张文襄公电稿》卷四十五。

② 《大公报》，1903年8月30日。

③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国"子民"倒视若仇敌呢？清朝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进一步暴露了其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这种反动面目的暴露，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有着重大意义。此前，清政府这种面目已经暴露得颇为充分，它伙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腥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但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对义和团的事业缺乏正确理解，因而也就没有能引起他们的切肤之痛。这一次，在强敌入侵之际，手无寸铁的青年学子、名流学者也因爱国遭受不测，知识分子阶层中的震动与愤慨明显地强烈起来。拒俄运动的先进分子很快信服了孙中山及其同志的结论：只有反清革命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正是如此。20 世纪开端，八国联军战争和《辛丑条约》造成的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警醒了中国人民，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提供了不容忽视的重要推动作用。不信，请看运动中群众迅速革命化的进程。

拒俄运动的领袖之一蔡元培，原是清朝的翰林院编修，1901 年以后逐渐趋向激进，1902 年组织中国教育会。但是，到参加拒俄，他至少还不是坚决的反清革命者。1903 年底，他还曾希望团结清朝政府共同抵御沙俄侵略。在他主编的《俄事警闻》上，发表过《告革命党》等文，认为在"盗劫吾物"之际，不应该"不追盗而徒责吾仆通盗之罪"[①]，建议包括清朝统治者在内的满、汉"合起来"，"商议打退俄国的法子，免得我们旗人、汉人通通受罪"[②]。然而，清朝政府背叛了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终于使他成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如黄宗仰，原是常熟清凉寺的和尚，日益紧迫的民族危

---

① 《俄事警闻》，1903 年 12 月 30 日。

② 同上，1903 年 12 月 31 日。

机使他不能安于寺院生活。张园会上，他慷慨陈词；国民公会中，他热情谋划。然而，清朝政府却指名逮捕他，迫使他流亡日本。"要御外侮先革命"[①]，他得出了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结论，于是他"对佛誓发十大愿，大愿逐满不成佛"[②]，跟着孙中山干起革命来了。拒俄运动更把许多青年推向反清革命的前列。后来牺牲于广州"三·二九"之役的方声洞当时逢人便痛论国事，"谓非一刀两断，颠覆满清政府，以建共和，则吾人终无安枕之一日"[③]。吴玉章在回忆当时情况时也说："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④]类似的情况很多，检阅清末革命志士的经历，许多人都是在拒俄运动中开始其政治生涯并投向反清革命的。

舆论界的变化显得更加突出。1903年6月5日，《苏报》揭载清朝政府的《严拿留学生密谕》。紧接着，发表《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文，愤怒地谴责清朝政府"以我土地江山""送人赠友"的卖国行径，指出："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号召"以排满为业"[⑤]，明确地喊出了反清的革命口号。《苏报》原来是一张高唱"保皇立宪之说"的报纸，正是在拒俄运动中，它的主人陈范愤于人民的拒俄要求，"清廷均弗置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因而改倡排满之说"[⑥]，使之变成革命派的重要喉舌。

---

① 《书感》，载《江苏》第6期。

② 《抱撼歌》，载《江苏》第6期。

③ 《方声洞小史》，载《神州日报》，1911年8月2日。"满清政府"四字，原报为"□□政府"。

④ 《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的回忆》，见《吴玉章回忆录》，1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⑤ 《苏报》，1903年6月10日、11日。

⑥ 《陈梦坡事略》，见《革命逸史》初集。

继《苏报》之后，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江苏》、《浙江潮》等杂志的态度也日益明朗。6月25日，《江苏》第4期发表《革命其可免乎》一文，痛斥清朝政府镇压拒俄运动，"目为悖逆，指为不轨"，"移文州郡，传电畿疆，罗织搜索，防若寇贼"的行为。9月21日，该刊第6期《〈支那分割之危机〉译后语》中更加鲜明地表示："满清政府而不欲与俄人战，而不敢与俄人战，乃并不愿他人之与俄人战，乃并欲出其代表者之权限以禁四万万主人翁之与俄人战，则我同胞不可不秣马以先与满清政府战。"

此外，邹容的《革命军》修改、出版于拒俄运动高潮中，陈天华的《警世钟》也写作、出版于这一时期。两书都是宣传反清革命的代表作，其作者也都是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在《复湖南同学诸君子》中，陈天华曾针对清朝政府对留学生拒俄的攻击诬蔑，剖白过参加者的爱国之心。他在信里说，他对清朝政府一见留学生结社爱国，"则遂大惊小怪，屡索而不得其解，我政府之识见如此……此诚可为痛哭流涕者矣"[①]。可以说，《警世钟》就是他"屡索"之后的结果，答案是必须打倒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这两部书和其他许多同类作品集中地出现在这段时间，并且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正是形势急剧变化的反映。

舆论是先声。在《苏报》等明确地喊出反清口号后，一些拒俄组织陆续转变为革命组织。

还在5月份，军国民教育会就曾派出两名特派员到天津去见清朝政府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请他主战，表示愿为前驱。但是，特派员刚到上海，清朝政府军机处就接到上海地方当局的电报，说是："近来爱国党欲假拒俄之说，拟将北上，恐有不轨事宜。"[②]到了天津，连袁世凯的影

① 《苏报》，1903年6月14日。

② 同上，1903年6月26日。

子也见不着，每次都被阻于门外；所能见到的清朝官吏都要他们“从事学问”，不要干预国事。于是，两名特派员只能回到东京。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召集全体大会，由特派员汇报归国之行，秦毓鎏等十五人提出了一份《意见书》，要求将原订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以卖国的满族贵族集团为革命对象。这一意见虽然遭到了湖北留学生、原拒俄义勇队成员王璟芳等的激烈反对，王在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嚷：“大清不可背负”①，但是，《意见书》还是获得了军国民教育会绝大多数会员的赞成，仅有十余人退会。

军国民教育会的变化是中国留日学生转向革命的重要标志，从这以后，“革命思潮遂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②。这里，孙中山的经历是很有意思的。1901年、1902年两年，孙中山在日本，志同道合者寥寥，有人把他视为怪人，甚至把他想象为“江洋大盗”。1903年夏秋间，孙中山自河内抵达日本横滨，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程家柽、杨笃生等拒俄运动的活跃分子纷纷访问他，研究革命进行方针。孙中山极为兴奋，在东京青山创设革命军事学校，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很快，这个誓词就通过《警钟日报》和国内群众见了面。

转变后的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鼓吹(宣传)、暗杀、起义三种进行方法，总部设在东京，上海、保定等地后来都设有支部。它还派出过十二个“运动员”，分赴国内外“筹集经费”，“联络同志”③。

以杨笃生为首的一些人组成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1904年，他们曾潜入北京，谋炸亲俄派头子慈禧。同年冬，清朝退职官僚王之春在上海勾结沙俄领事和军官，运动亲俄，拒俄同志会成员又曾策动万福华枪

---

① 《中外日报》，1903年10月15日。

② 《甲辰马福益长沙之役》，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

③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该会自印本。

击王之春。

黄兴是十二个“运动员”之一。1903 年 11 月，他在长沙与章士钊、秦毓鎏等创立华兴会，确定了由湖南起义，直捣幽燕的策略。

武昌是拒俄运动的又一中心。1903 年曾公祠拒俄大会上，吕大森曾直斥清朝政府“昏聩”①，会后，积极分子们自然形成了花园山秘密机关。次年 5 月，以“革命排满”为宗旨的科学补习所成立，吕大森被推为所长。

江浙地区的光复会也是在拒俄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对俄同志会会长蔡元培是该团的骨干。1904 年，暗杀团改组，正式定名为光复会，对俄同志会并入光复会。

这一时期，还曾出现过安徽武毅会(岳王会)、南京知耻学社、上海福建学生会、福建文明社、江西易知社等若干革命团体。其中一些团体或者与拒俄组织有着渊源关系，或者由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作为骨干。一切都说明了，拒俄运动的高潮正在转变和发展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

不可避免的政治分野

在拒俄运动的第一阶段，主要还是改良派在活动；到了第二阶段，运动发展为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联合行动，革命派对运动进程的影响日益显著。随着运动的深入，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分歧愈益明显，斗争也日趋尖锐。

---

① 《科学补习所始末》，见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1903年4月27日的张园拒俄会，据改良派的报纸说："因有二人演说之词不合众意，众人有上前驳诘者。"[①]又说："有一党人及野蛮浮薄之学生等，专以败坏秩序为事"，"肆意骚扰"[②]。显然，这是指革命派对于改良派的斗争。不久，改良派的机关报《中外日报》发表论说，含沙射影地攻击革命派在拒俄运动中的主张"不合时势"，是什么"人方病寒而投之以治热之药"[③]。针对这种挑衅，激进的《苏报》指出：张园拒俄会是爱国集会，表现了中国人民"国家思想之萌芽"，应该"引而进之"，不应该消极指责。又指出：《中外日报》的态度是一种"保守"思想，其主笔是"素与康、梁为缘者也"[④]。

戊戌变法后，革命派曾企图争取改良派共同反清，改良派中的某些人如梁启超等也曾虚与委蛇，显示出一副要与革命派合作的样子。他们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公开论战，拒俄运动中的斗争是一个环节。冰炭不相容。当时曾有人投函《苏报》，要求双方"晤谈"或"函商"，遭到《苏报》的明确拒绝。[⑤] 在国民公会问题上，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就更加白热化了。最初，国民公会标榜"无所谓派别"，它的报名地点既设在爱国学社，又设在《新民丛报》上海支店，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联盟。然而，在发展进程中，康有为的门徒龙积之和国民公会发起人之一冯镜如把它改名为国民议政会，力图纳入"立宪"运动的轨道。他们竭力宣扬："皇上者中国之皇上"，计划以7月9日为陈请慈禧归政光绪的日子。龙积之等人的企图受到了邹容的坚决抵制，邹容带头痛骂冯镜如，爱国

① 《中外日报》，1903年4月28日。

② 《大公报》，1903年5月5日。

③ 《中外日报》，1903年5月12日、14日。

④ 《苏报》，1903年5月18日。

⑤ 同上，1903年6月2日。

学社学生纷纷脱会，迫使国民议政会无形解散。[①]

感受到革命派的威胁，改良派的枪头就逐渐指向革命派了。这以后，他们也还谈沙俄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主要是为了吓唬清朝政府，同时也吓唬革命派，为其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服务。《中外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政府当求消化乱党之法》的论说，说是革命党兴起的原因就在于：清朝政府任凭沙俄占据东三省，于是革命党就认为政府没有顾惜土地与悯恤人民之心，想造反了。为政府计，应该"锐意维新"，这样，革命党就会"消化"，"普天之下悉是甘雨和风"[②]了。在另一篇题为《革命驳议》的论说里，改良派扬言：一搞革命，就要发生内乱，外国人就会乘虚而入，沙俄以"平乱"为借口侵占东北就是前车之鉴。文章耸人听闻地批判革命派道："奈何欲自启乱机，而勾引外人，使其瓜分吾宇耶？"[③]你想革命吗？一顶卖国主义的帽子就甩过来了。

与改良派针锋相对，革命派指出，小小变法只能起欺骗和装饰作用，解决不了挽救中国危亡的问题。至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也并不可怕，只要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那就可以和侵略者相周旋。即使不幸被强敌所屈服，但黄河伏流，一泻千里，总有消灭帝国主义"殖民政略"的一天。[④] 改良派惧怕帝国主义，不敢革命；革命派不那么怕帝国主义，所以敢于革命。但是，怕根未净，总觉得打起来不是帝国主义的对手，因而不敢坚决反帝。

改良派宣扬光绪"圣明"，清朝政府可以依赖；革命派就以清朝政府丧地辱国、镇压拒俄运动、投降沙俄为例说明其不可依赖。1903 年时

① 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中国灭亡小史》，载《复报》第 10 期。

② 《中外日报》，1903 年 7 月 31 日。

③ 同上，1903 年 6 月 7 日。

④ 《苏报》，1903 年 6 月 12 日、13 日。

章太炎指出:清王朝的"满洲故土"已经被沙俄抢走了,不能把丧失国土的罪魁捧出来当元首。[①] 1904年初,孙中山也指出:东北是清朝的"发祥之地",这样的地方都丢了,发展下去,必然是"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底于尽"。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必须"发奋为雄,大举革命","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针对改良派畏惧帝国主义干涉的懦夫心理,孙中山还指出:"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叩头、乞怜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以清朝政府为例说:"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为最亲昵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②]。

不同人从同一事件中常常会引出不同的结论。沙俄侵夺我国东北,改良派由之引出的是中国不能革命,革命派由之引出的是中国必须革命。

谁掌握真理,谁就将赢得群众。拒俄运动期间,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还只是一次前哨战,但是,胜负却很快就有了分晓。

1904年底,日本《万朝报》译载德国一家报纸的议论,提到一项世界商业统计表已经承认我国长城以北为沙俄的势力范围,因此,引起留学生中的极大骚动。改良派乘机活动,再度企图将拒俄运动引入"立宪"的轨道。

先是由梁启超的一个门徒出面召集四川留学生开会,提出了一份《要求归政意见书》,共六条,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宣布立宪,召还康有为,并决定推张澜为"伏阙上书"的代表。

1905年初,中国留学生就《要求归政意见书》展开大辩论。结果,大多数人反对。福建、安徽、贵州、直隶四省同乡会批评其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江西同乡会批评其为"徒事喧嚣,毫无实际",两广同乡

---

①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太炎文录》卷二。

② 檀香山《隆记报》,转引自《檀山华侨》。

会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了“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广西同乡会则明确宣告:“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①

改良派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辩论预示了《民报》时期革命派对改良派辩论时的大胜。

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

拒俄运动锋芒所向，直指沙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中的亲俄派。同这伙凶恶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特别是要使斗争超出发宣言、提抗议、集会、结社的范围，以武力驱逐侵略者，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

领导这场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精英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们指出:对于沙俄侵略者，“非结合大群不足以御之”②。从何处聚集力量呢？他们向全国各阶层的各种人，上至政府、疆吏、领兵大员，下至术士、游民、乞丐、娼妓，无论男女老少，或者革命党、立宪党、保皇会、守旧派，乃至道学先生、厌世派，都发出或准备发出救亡的呼吁。但是，在这些包容甚广的人群中，主要依仗哪种人的力量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错综复杂，又使他们对此踯躅彷徨。他们之所以同时向如此众多的、相互间格格不入以至敌对的人们发出呼吁，正说明他们心中无数。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寄希望于自己。有人提出:“与其官争于上，不如商争于下”，建议停止对俄的茶丝贸易，“无论如何重价，不准出

① 《大陆》，第 3 年第 2 号。

② 《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载《苏报》，1903 年 4 月 30 日。

售与彼”[①]。主张用自身的力量而不依赖“官争于上”,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悟的表现。但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毕竟太微弱了,这种呼吁如同投向大海的石子,没有激起多大波澜。

另一些人则寄希望于青年学生。他们认为:学生是中国社会的“主人”,为存亡之“关键”,“中国之兴,兴于学生”[②]。邹容于1903年5月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表现最为活跃,最为激进,但是也有人怀疑莘莘学子们的作用,他们问道:以少数学生去和“如虎、如狼、如蛇、如蝎”的沙俄侵略者作战,行吗?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先进的阶级,但是这个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人数很少,经济力量有限,只靠本阶级的群众是做不出很多事来的。资产阶级要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斗争,就必须援引其他阶级的力量。

他们曾经企图依靠清朝的某些督抚。然而,事实证明,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端方们的“拒俄”,不过是因为自身的特殊利害发出的空喊,这流人在镇压拒俄的群众时却是实干的。人们的希望破灭了。《苏报》激烈地批评军国民教育会最初采取的请愿做法是“热昏”,“不识人头,吃煞苦头”。求助于袁世凯之流,不是要“吃煞苦头”吗?[③]

也曾有些人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国家。20世纪初年,英、日、美等国在争夺我国东北问题上和沙俄有激烈的利害冲突,因此,有人主张联合英、日、美共同作战,有人建议请各国“公断”。这当然都是无法做到的。于一筹莫展之际,改良派居然附和美国提出的将东三省辟为各国公共通商口岸的主张,企图利用列强的力量排挤沙俄。

---

①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8日。

② 《苏报》,1903年5月30日。

③ 同上,1903年6月6日。

日俄战争爆发了，不少人声援日方。郑观应等在广州等地捐款组织赤十字社，准备疗治日本伤兵。在革命派中，也有人倡议"编成义兵"，附入日军，去打头阵。由于对沙俄侵略的仇恨，很多人幼稚地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

这种情况也遭到了批评。鲁迅就认为此类人"太无远见"，曾专门写信给蔡元培，提请他办《俄事警闻》时注意。[①] 有人正确地指出，争夺着的双方都同样垂涎于我国的"膏腴绣壤"[②]，"中国不能自立，无论何国，均未可恃"，我们不能"自委弃其国民之责任"而一味求助于人。

不错，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清朝统治集团中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可以也应当利用，但是把获胜的希望寄托于此却是幻想。

尽管改良派不敢得罪清廷，康有为等甚至可笑地把局面的改观悬于光绪重新亲政的空想上，而那种企图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倾向更难于克服，但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上面这些看上去"强大"的力量并不可恃，开始向另外的方面去寻求助力。在运动的第二、第三阶段，革命派参加领导运动之后，他们曾经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力量。

1904年时，有人提出过"民战"的口号。他们指出："民仇俄人，痛入骨髓"，只要能把人民动员起来，那么，掷瓦砾、施坑陷都会是斗争的办法。沙俄侵略军不过20万，东北居民则在千万以上，"以十民杀一俄兵，俄兵立尽矣"[③]。这个口号无疑是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爱国反帝斗争力量。除了把人民动员起来，又靠谁来战胜俄国侵略者呢？不过，要实现"民战"，却非易事。

有人主张动员会党。他们认为：会党具有"刚肠侠骨"，"天不怕，地

---

① 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载《上海文学》，1961年第10号。

② 《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

③ 《警钟日报》，1904年3月5日。

不怕”，只要“统统联络起来”，“莫说是一个俄罗斯，更是十个也不可怕了”①。

当时，东北活跃着无数支抗俄武装。除最著名的“忠义军”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种队伍，由于多武装马队，被清王朝称为“马贼”。“马贼”的成分和政治态度虽然复杂，但参加抗俄的“马贼”，斗争却很英勇。他们毁铁道，割电线，焚烧粮库，劫夺枪支弹药，骚扰、袭击俄军，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一事实吸引了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1904 年 2 月，《警钟日报》发表时评，赞扬“马贼”昭如日月，为“吾民族之代表”，宣称：“吾不能不爱马贼。”

近代中国的新型知识精英总是不耐烦难，希望顺当地利用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由于对会党和“马贼”缺少实际了解，上述议论未免流于理想化，但那种急于获得下层群众响应的心情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也曾直接向工农群众发出呼吁。

我国拒俄运动发生、发展的时候，距巴黎公社成立已经三十余年。此间，国际工人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事实，使得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不得不对我国年轻的无产阶级抱有热切的期望。《俄事警闻》宣称：工人是“世界上第一等有力量的”②。由对俄同志会成员主编的《中国白话报》则热情介绍外国工党的斗争“能够制皇帝、官府的死命”③。他们要求中国工人能“学着外国工人，结成一个大党”，“打退东三省的俄国人，叫各国不来夺我们的地方”④。

主张动员农民的人也有。《俄事警闻》在题为《告农》的社论中说：

---

① 《俄事警闻》，1904 年 1 月 29 日。

② 同上，1904 年 1 月 10 日。

③ 《时事问答》，载《中国白话报》第 5 期。

④ 同上。

俄国夺了东三省，全国人都应该出力，农民"劳苦惯了"，"当兵是顶相宜的"，而且"人数本来多"，只要本领也好了，又明白"道理"，"肯拼命去一打"，"俄国自然打退了"。《俄事警闻》并应许："那时候，你们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①]

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主力，在东北，也是抗击沙俄入侵的主力。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尽管存在着弱点，却无疑是一种"民战"。对义和团，清王朝和改良派都诬之为拳匪。在拒俄运动中，革命派中的某些人却独能作出较为正确的评价。他们赞誉其"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之血诚"，是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②]。

在 20 世纪初年，出现这种赞扬工农，主张发动工农展开反帝斗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生气勃勃，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需要群众的力量，敢于向劳动人民发出呼吁。由于眼界比较宽，革命派感到自己比改良派有力量，他们满怀信心地批判了流行一时的"不战亡，战亦亡"的悲观主义论调。但是，应当指出，即使在这时，他们也并不真正认识劳动人民。如前所述，对工农的呼吁，乃是向社会上类型众多的人发出的呼吁中的一种，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只有工农才是拒俄反帝的最主要的动力。

1903 年，当上海成立"四民公会"时，《浙江潮》第 5 期发表过一篇时评，大意说，中国有一件最可悲痛的事便是，"士"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不能自成一社会，而又与其他社会隔绝，所以，"日日言社会改革，言社会发达而无效"。文章要求该会成为"国民之机关"，"自士社会以待合于其他种种各社会"。这段评论可谓"切中时弊"。然而，拒俄运动中，它始终是空谈，"士"们除了热衷在本阶级群众中活动

---

① 《俄事警闻》，1904 年 12 月 22 日。

② 《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载《江苏》第 2 期。

外，并没有认真去做“合于”其他社会的工作，还是一个孤零零的自居的“首”。当上海工人为周生友案投入拒俄斗争时，《警钟日报》的“士”们只会在报上大谈“工民革命”，指手画脚，但是却没有跑到工人中去做点实际工作。丁开嶂、张榕跑到东北去了，但是，主要依靠的也还是地方上层人士和“马贼”中的上层头目。1903 年的“四民公会”无工无农，是个“二民”公会，实际上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一民”公会。此后的对俄同志会状况也是这样。该会极盛时不到二百人，他们非常懊恼地感慨道：“义勇之军，侦探之队，徒抱虚愿，一无表现，所藉手者，区区《俄事警闻》之报告而已。”①没有人民大众参加，当然只能是这样一个结果。

哪些阶级、阶层、人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谁又是其中的主要动力？这是一切反帝斗争都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拒俄运动中的知识精英们接触到这个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当给以恰当的估价，但是，离解决这个问题的路程还很远。

反帝而不依靠人民，不发动工农群众，必然无所成就，最终仍然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后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拒俄运动也已经预示了这一前景。

反对沙皇奴役的世界人民斗争的一部分

我国的拒俄运动不是孤立的，它是 20 世纪初年反对沙皇奴役的世界人民斗争的一部分。

---

① 《警钟日报》，1904 年 3 月 15 日。

世界人民热烈地同情和支持我国的拒俄斗争。还在1900年12月,列宁就在《火星报》第一号上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论述中国人民反对沙皇侵略的正义性,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奋起斗争,"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响应列宁的号召,布尔什维克揭露了沙俄政府在中国的犯罪政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在传单里写道:"难道俄国人民需要满洲这一块外国的土地吗?"[①]一些在中国的国际友人还积极参加了拒俄运动。例如1903年有德国友人在南京"见中国人即握手,告以中国前途之苦及改变之不可缓","语及东三省事,辄切齿怒目"[②]。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波兰友人曾联络中国劳工,准备起事抗俄。

我国人民也热烈同情和支持世界人民反对沙皇的斗争。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乌克兰、高加索等地爆发罢工斗争。对此,《江苏》杂志发表文章说:"暴动!暴动!俄罗斯果不得不暴动,俄罗斯终不能不演革命之活剧。倒专制旧政体,建共和新政府,为日非远矣。"[③]1905年1月,彼得堡的工人由罢工斗争发展为准备武装起义。消息传到我国,《警钟日报》立即发表《请看俄国之工人》一文,赞美俄国工人"立志之坚"[④]。在当时,沙皇还是个庞然大物,但是,中国拒俄运动分子们相信俄国人民:"斯拉夫民族真好男儿,真不愧为伟大之人民。善于动!善于杀官吏!杀君主!"[⑤]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人民面前,沙皇政府是迟早要完蛋的。

---

① 《史学译丛》,1957年第5期,100页。

② 《朱臻仕》,载《江苏》第7期。

③ 《江苏》第6期。

④ 同上。

⑤ 《警钟日报》,1905年1月26日。

列宁曾经指出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1]在这个监狱里,犹太人所受的压迫极为严重。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尖锐地揭露了一小撮沙俄反动分子对犹太人的虐杀:“或挖其两眼,或断其四肢于板,以刀碎割。小儿则携往最高之处掷下,或则腰斩。”这是怎样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呀!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语重心长地警告人们:“吾悲犹太,吾不能不虑夫将为犹太者。”[2]

波兰曾长期为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所瓜分,沙皇政府在其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在《猛回头》、《新湖南》等小册子中,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谴责了这种统治。对于波兰人民的斗争,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尤其寄以殷切的期望。1904 年 3 月,他们见到了一份波兰义勇军的讨俄檄文,情不自禁地欢呼:“伟哉!波兰之民族!壮哉!波兰之志士。”他们专门写了《波兰之志士》、《读〈波兰义勇军组织主意书〉》等文章,指出:“彼俄国者,裂波兰故土最多,压波兰遗民最酷。擒贼先王,首在覆俄。”文章建议波兰志士利用日俄战争的机会奋起抗俄,乘熊脚被扎的时候“突刃其腹”。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相信,经过斗争,“必有一波兰新国出现于波罗的海之滨”[3]。

此外,对于反对沙皇奴役的芬兰、瑞典、挪威、丹麦、波斯、土耳其等国人民的斗争,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们也都表示了关切,并看成是对我国人民的支持,“此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树我完全独立之旗”之“大机会也”[4]。

1904 年 2 月 5 日,《俄事警闻》发表过《俄祸》一文,中云:

---

①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392 页。

② 《经世文潮》,第 4 期。

③ 《警钟日报》,1904 年 3 月 9 日。

④ 《抗俄铁血会檄文》,载《大陆》第 2 年,第 4 号。

> 若夫俄，则尤虎狼之尤者也。自彼得大帝以来，以吞并与国，囊括全球为志，彼意非使史拉夫人种为全世界之主不止。此非我中国之祸，而全世界之祸。

这段话值得重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①]沙皇推行"囊括全球"的侵略政策，并不是为了使"史拉夫人种为全世界之主"，而是要使俄国的一小撮地主和垄断资本家为"全世界之主"。在这一点上，《俄事警闻》讲得不对。但是，沙俄帝国主义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农奴制残余密切结合着，它把帝国主义的各种最坏因素都集中了起来，而且变本加厉了，因此极富于侵略性，是当时世界的大祸害。《俄事警闻》发出的这一"警闻"又是正确的。中国拒俄运动的活动分子看清了沙皇的侵略野心，明确了自己斗争的意义，就更加鼓舞了自己的斗志。

1901 年至 1905 年的拒俄运动是我国近代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打击了沙皇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面目，表现了我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内外敌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促进了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近代中国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与王学庄合作，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 年第 4 期

---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427 页。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1905年12月8日，日本宇都宫市千手町一家名为手冢屋的旅舍接待了一位中国客人，他自称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名王礼钧，30岁。这位客人除每天买几种东京出版的报纸仔细阅读外，足不出户。不久，受到日本调查人员的注意，经盘问，这位客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实姓名是杨度。就是后来劝袁世凯当皇帝，而后又奇迹般地成了共产党员的杨度。

杨度于1902年离开故乡湘潭，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同年归国。次年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不久，再度赴日，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4年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副干事长，随后又升为干事长，成了鼎鼎大名的留日学生领袖。他为什么要改名换姓，躲到东京以外的一家旅馆里去呢？

原来，留日学生至1905年已增至8000人，革命倾向日趋强烈。为了讨好清政府，日本政府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这年4月，文部省就曾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其中可能有人议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彼等不失学生本分。9月，日本报纸盛传文部省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取缔”，日语，意为管束。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杨度为此曾多次代表留学生会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声明“决不与韩人同等，受此特别之法”。10月初，日本文部省声明，取缔规则一事，纯系讹传。但不料11月2日，文部省突然颁布《关

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对中国留学生提出了种种限制。例如，第一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接受清国人入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介绍书；第四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在许可清国学生转学、退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承认书；第九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要进行管束；第十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曾在他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学，等等。这样，留学生就不能自由入学、转学、退学，不能自由选择宿舍，而学校则可任意以“性行不良”为名，斥退中国学生，剥夺其留学权利。《规程》颁布后，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

11 月 27 日，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杨枢，详细罗列理由，要求取消《规程》中的第九、第十两条。《公禀》指出：这两条“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领衔的是杨度和副干事长范源濂，联署的有庶务干事张继，学务干事蒋方震，书记干事林长民、刘思复，调查干事吴永珊（玉章）、邓家彦，各省分会干事长康宝忠、张耀曾、章士钊等。12 月初，学生情绪更为激烈。路矿速成学堂学生提议，《规程》有辱国体，应全部取消，建议于 3 日在留学生会馆开代表会，与杨度同至公使馆请愿，至期，杨度不到。次日，弘文学院学生倡议罢课。随之，激进学生如秋瑾、宋教仁等，进而要求全体罢学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杨度只主张取消《规程》的第九、第十两条，不赞成全部取消，更不赞成罢课、归国等行为。6 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声称：《规程》并非束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学生们高呼：揍他！揍他！幸赖留学生总会学务干事周家彦等人劝说，杨度才得以幸免。但这次会议仍推举杨度为代表，命他会见杨枢，迫令杨枢和日本文部省交涉，废除《规程》。7 日，杨度曾和各省分会代表 15 人同至公使馆。事后即被裹胁。

当时报纸记载说:“杨稍主持重,急激派疾之益甚,以威力强迫之,使加入□□会,捽之以行,闻凡一日夜不得食、不得息云。未几避去,至今不知所之。”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改名换姓,躲到外地去了。

在调查人员的盘问下,杨度写过一份笔答,今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 仆实性〔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欲〉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

从这份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急激”派已经“急激”到了何种程度,它扭曲地反映出留日学生中正在燃烧的斗争烈火和爱国热情。

原载《团结报》,1988年3月19日

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及其被否定经过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许多著作都提到陈天华有一份《要求救亡意见书》，但史学家们迄未见到。1985年，我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将它找到了。原件为铅印传单，附于警视总监安立纲之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报告之后。①

1905年1月，日本《万朝报》译载德国某报的一篇文章，声称各国商业统计表关于中国领土已不列长城以北，承认其为俄国范围，“此实瓜分政策”云云。这一消息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骚动。四川学生首先集会，有人提出《要求归政意见书》，主张西太后将“大政”归还光绪皇帝，“以一主权”，同时，要求清政府“宣布立宪以定国是”。该意见书提议于1905年2月4日（夏历元旦）致电清政府，陈述意见，并随撰详细呈文，公举代表二三人到北京伏阙上书。② 在这一情况下，陈天华撰写并印刷了《要求救亡意见书》，在留日学生中散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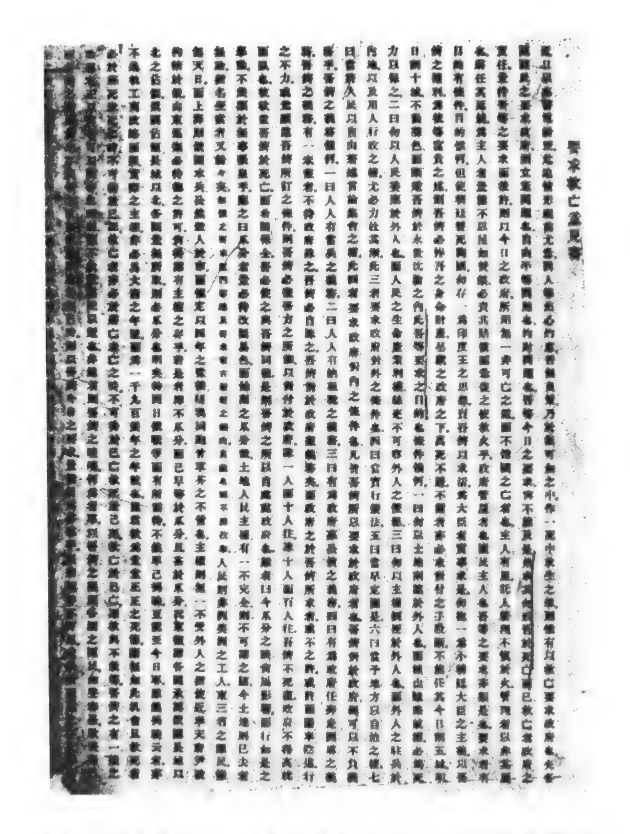
《意见书》全文约三千余字。开宗明义，首先说明当时形势和不得已拟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救亡的苦衷。《意见书》称：

> 近日以来，警电纷至，危迫情形，视前尤急，同人等焦心灼虑，苦无良策，乃于无可如〈何〉之中，作一死中求生之想，则惟有以救亡要求政府也。

---

① 《关于清国留学生行动》，甲秘第13号，明治38年2月2日。

②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载《大陆》第3年第2号。



陈天华的《要求救亡意见书》(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意见书》将清政府譬喻为"管屋者",将国民譬喻为主人,说是:"主人有屋,托人管理,不慎于火。管理者以非其屋也,将任其延烧,为主人者岂能不以屋如焚焰,必责其赔偿而急促之使救火乎?"

关于请愿的目的,《意见书》说明,在于劝止清政府及其大臣们出卖国家权益。它称:

> 目的惟何?但使朝廷誓死殉国,勿存为一印度王之思想,卖吾侪以救活;为大臣者实事求是,勿抱一为小朝廷大臣之主义,以吾侪之权利,为彼等富贵之媒。

当时，印度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国王则成为侵略者卵翼下的儿皇帝。陈天华要求清政府以印度为鉴，不要使中华民族陷入更悲惨的境地。

关于请愿的条件，《意见书》向清政府提出对外条件三项，对内条件四项。对外条件为：1.勿以土地割让于外人，竭死力保护矿山、铁路、航权；2.勿以人民委弃于外人，人民之生命、产业、利权，丝毫不容外人侵犯；3.勿以主权倒授于外人，力杜外人驻兵内地并掌握用人行政之权。对内条件为：1.实行变法；2.早定国是；3.予人民以地方自治之权；4.许人民以自由著述、言论、集会之权。《意见书》同时提出国民义务四项：1.当兵；2.纳租税；3.募公债；4.为政府奔走开导。《意见书》要求清政府履行条件，国民履行义务，双方处于对等地位。它说："吾侪之义务有一未尽者，不待政府诛之，吾侪必自诛之。吾侪对于政府尽义务矣，而政府之于吾侪所求者或不之许，或许而阳奉阴违，行之不力，或竟显违吾侪所订之条件，则吾侪必尽吾力之所能以对付于政府，诛一人而十人往，诛十人而百人往。吾侪不死尽，政府不得高枕而卧也。"

《意见书》的主要篇幅是设为问答，以二人辩难的形式，解释各种疑问，说明请愿活动的必要。最后，《意见书》表示，将以留学生全体名义，在两周内赴北京实行。"有志偕行者请至神田西小川町一之一东新社（陈天华住址——笔者），商订出发，反对者请即函告，否则作为默认。"

《意见书》表现了陈天华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热情。他认为，国家由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组成，有一个要素不具备，就不能称之为国家。《意见书》指出：当时帝国主义者纷纷向清政府索取土地和势力范围；在非洲、美洲的华侨和东三省的难民备受帝国主义虐待；主权无一不被外人掌握。因此，中国"早已等于瓜分，且更甚于瓜分"。《意见书》呼吁中国人民及时设法，拯救国家危亡。它说："救死者必于将死未死之时，不可待于已死；救亡者亦必于将亡未亡之时，不可待于已亡。"这

些地方，和陈天华的名著《猛回头》、《警世钟》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却有了显著的变化。原先，陈天华指斥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认为“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主张以暴力将其推翻，“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①]；而现在则希望以和平请愿的方式促使清政府豁然警醒，外拒强敌，内行变法。两相对比，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写作《意见书》之前，陈天华曾会见梁启超，二人多次通信，《意见书》反映出改良派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意见书》末段，陈天华设想有一个革命者出来质询：“吾侪平日之所主张，非革命乎？今乃欲倚赖于政府，何其进退失据也?”对此，《意见书》回答道：

> 政府之将以土地、人民、主权三者与外人，一弹指间也；而吾子之革命，旦夕可举乎？吾恐议论未定，而条约上之效力发生，已尽中华之所有权移转于他人手矣，则何如要求政府，与之更始以围〔图〕存乎？

这段话可以看成是陈天华对自己改变主张的解释。在陈天华看来，革命不会很快发生，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危亡在即，只能以请愿的形式阻止清政府卖国，这样会便捷得多。

然而，陈天华毕竟不同于改良派，他对于和平请愿的作用并不十分夸大，对清政府能否改弦更张也并不抱很多幻想。《意见书》说：

> 吾侪之要求，所以使政府应付外人之要求外，而亦留一二以应

① 参见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36、59、6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 吾侪之要求也。盖使彼惟虞外人之一方面，而不虞国民之方面，则必至举吾侪尽售之于外人，以保固其印度王、小朝廷大臣之名位不止。今吾侪乃预先警告之，吾侪虽被售，而必不使安固其印度王、小朝廷大臣之名位，是亦侥幸望其勿售也。

这里说得很清楚，和平请愿的目的只是“侥幸望其勿售”。有些地方，《意见书》又说：

> 至于警告而不听，则吾侪自必有继续之行为，决非仅如公车上书之故事也。各国民党之对于政府也，必先提出要求之条件，要求而不纳，然后有示威之举动，而无不如此者。吾侪躐等以为之，则政府不知吾等意向所在，而国民亦不知吾等之宗旨为何，纵掷数人之头颅亦不过等诸无意识之作为，而吾侪之主义，终难暴白于天下。惟先将主义标出，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一出于公，而不杂以一毫之私，使政府有所择取，使国民有所依然，于将来或不至全无影响。此吾侪今日之苦心也，政府之无可望则久已知之矣。

这里，陈天华明确宣布，清政府“无可望”，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因此，斗争方式不能仅限于“公车上书”一类故事，而是要将“吾侪之主义”表白于天下，“可平和则平和，当激烈则激烈”，可见，陈天华并没有封死通向革命的道路。

在《意见书》中，陈天华还说：“吾侪之欲以救亡要求政府也，非谓如是即可以救亡也，乃欲以求吾致死之所也。政府能与吾侪共致死于外人，则外人乃吾侪致死之所也；政府必欲以吾侪送之于外人，则政府乃吾侪致死之所也。”这里，陈天华那种不惜一切，敢于与内外敌人拼死战斗的精神又表现出来了。

《意见书》散发后，立即受到了湖南留学生的强烈反对。1905 年 1 月 27 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彭希明、徐运奎来，谈最久。时陈星台将有北京之行，运奎谋与余极力反对其说，余允之。"[①]28 日，宋教仁应彭希明之邀，至刘揆一处，与黄兴、章士钊等会商，决定召开同乡会干涉。当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又写道："时陈星台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余等皆反对其说。"[②]29 日，在湘西学会例会上，宋教仁演说"瓜分问题"，激烈地反对向清政府请愿，主张各省独立自治。当日到会者 50 余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0 日，在锦辉馆召开湖南同乡会，与会 200 人，一致决议反对陈天华的"要求政府之说"，赞成宋教仁的"全省独立自治"主张。[③] 2 月 1 日，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举行"特别谈判"，宋教仁批评陈天华"受保皇党之运动"，双方"辩难良久"，陈天华因受日本警署传唤离去。[④] 在警署时，日本当局通知陈天华，禁止散发《要求救亡意见书》。[⑤] 2 月 2 日，宋教仁得到黄兴的通知："陈星台事，已干涉其不作。"[⑥]

与此同时，东京留日学生就向清政府请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广西同乡会认为，"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⑦]。

福建、安徽、贵州、直隶四省同乡会公函称："此次提议上书政府一

---

①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512～514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关于清国留学生行动》,甲秘第 13 号,明治 38 年 2 月 2 日。

⑥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512～514 页。

⑦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载《大陆》第 3 年第 2 号。

事，公认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请置勿议。”①

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大会讨论结果，反对请愿者占十分之九。②

这种情况，显示出在东京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日益成为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黄兴、宋教仁的帮助下，陈天华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再度焕发革命精神，重新执笔为革命作宣传，写下了《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名篇。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①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载《大陆》第 3 年第 2 号。

② 同上。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1905年，同盟会成立，实现了各派反满力量的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营垒出现了某种团结、兴旺的景象，革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思想上，和改良派的论战正在胜利进行，军事上，萍、浏、醴起义之后，各地革命党人跃跃欲动，一个武装起义的高潮正在酝酿。但是，好景不常，1907年夏，同盟会发生严重分裂。此后，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光复会的重建。

当革命正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统一的司令部时，同盟会却陷于分崩离析的涣散状态。

对于这种情况，曾经有人主要以地域、宗派观念来说明问题，以为是广东派与湖南派、江浙派之争；又有人以为是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和光复会的"一民主义"，即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地主阶级反满派之争；这些解释，都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张继、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

革命进程中总难免有光明与阴暗两面。辛亥革命之后，当年献身于革命的先行者热衷于阐扬功烈，而对于这一进程中的不光彩的方面，大都不愿涉及，或语焉不详。因此，在讨论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时，清理这一事件的过程是首要的工作。

1907年初，孙中山与黄兴曾因国旗图式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

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象”，必须迅速毁弃。[①] 争论中，黄兴坚决毁弃青天白日旗的主张使孙中山很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②]这样，黄兴也因而激动起来，他发誓要退出同盟会。

情感冲动常常驱使人走向歧途。冷静下来之后，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他致书胡汉民说：“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③]

尽管国旗风波没有使孙黄关系破裂，但是，却在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投下了阴影。宋教仁本来就认为孙中山“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当他得知此事后，就更增加了不满，从而萌发了“早自为计”的念头。[④] 3月1日，他向孙中山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同月23日，偕白逾桓等离开东京赴奉天运动绿林武装。

对孙中山的不满使宋教仁以后一度参加了倒孙的行列，但在当时，还仅限于两人间；去奉天之后，宋教仁仍然使用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的名义进行活动。[⑤] 因此，在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中，国旗图式问题只是一个小序曲。

对同盟会分裂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问题。

清朝政府镇压了萍、浏、醴起义之后，感到对革命力量不可忽视，追寻“祸本”，认为出于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因此，通过驻日公使杨枢等

---

①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

② 《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③ 《胡汉民自传》，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三)，394页。

④ 《宋教仁日记》，1907年2月28日。

⑤ 王以贞：《记与钝初赴满洲联络马军革命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出面交涉，要求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①] 日本西园寺内阁对此采取两面政策，即一面向清朝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又力争不得罪中国革命党人。日本政府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等对孙中山说：清廷要求日本把孙中山抓起来，日本政府考虑不抓，但孙中山必须迅速离日，否则不能保证其安全。[②] 同时，日本政府并资助五千元[③]，另一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资助一万元，作为孙中山离日的经费。当时，孙中山因急需一笔款子去中国南方运动，以便趁热打铁，适应萍、浏、醴起义所带动的革命高涨形势，便接受了这两笔资助。

除赠款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内田良平出面为孙中山饯行。2 月 25 日，内田良平在赤阪区三河屋设宴，应邀者有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刘师培、汪东、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等人。[④] 3 月 5 日，孙中山偕胡汉民及日本人萱野长知等南下。事后数日，西园寺内阁才通知清朝政府，已经驱逐孙中山出境。清朝政府立即大肆宣扬，炫为外交上的胜利。

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孙中山是满意的。他觉得，“各国政策无论如何文明，其对于与国必重于对民党，但日本政府两方面皆存好意，庶几平等相待”，“殷勤备至”[⑤]。他完全没想到，此事却在同盟会中激起了巨大的风波。

铃木久五郎资助一万元一事章太炎是知道的，孙中山曾从中提取二千元交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⑥]，章太炎嫌少，认为一万元应全部留

---

① 《时报》，丁未一月二十七日。

② 樊光：《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补充》，上海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③ 日本政府资助款数，说法不一，此用刘揆一说，见《黄兴传记》。

④ 《宫崎滔天年谱》，见《宫崎滔天全集》（五），687 页。

⑤ 《致檀香山同志书》，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函札》，122～123 页，1944。

⑥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下，但对日本政府资助五千元一事，章太炎等则一无所知。孙中山离日后，这一情况为参加同盟会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探悉，首先和中介人宫崎寅藏等吵了起来。接着，张继、章太炎、刘师培、谭人凤、田桐等也得知了这一情况，并传闻孙中山临行时的宴会就是一去不复返的保证，云云。[1] 张继等认为孙中山"受贿"，"被收买"，"有损同盟会的威信"，便闹了起来，张继破口大骂，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2]。章太炎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他以为孙中山在香港，便把照片和批语寄去，以羞辱孙中山。[3] 可能为此事他还写过声讨性的檄文。[4] 刚到日本不久的刘师培也同声附和。[5] 他们一致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在这一事件中，北一辉起了挑动和扩大矛盾的作用。他原是日本新潟佐渡地方一个酿酒业主的儿子，因家庭破产而倾向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1906 年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一书。同年 11 月加入宫崎寅藏、和田三郎等组成的《革命评论》社。不久，又经宫崎介绍，加入同盟会。他认为孙中山是西欧主义者，因而，憎恶孙中山，接近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在其所著《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他自述说："当时所发生之内讧，诸友皆以发生于不肖入党数月之后，因而归罪于不肖之行动。然而不肖方以彼等各自之色彩逐步趋向鲜明为快，深希彼等

---

① 谭人凤：《牌词》，载《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3 期。

②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昭和 15 年改订 6 版，48 页，东京。

③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见张永福编：《南洋与创立民国》。

④ 参见刘师培：《上端方书》，载《建国月刊》第 12 卷第 4 期。

⑤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三)，4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各自贯彻其思想之所向，因此敢于置不肖一身之毁誉于不顾也。”[①]从这段叙述不难看出，北一辉当时并不以同盟会的团结为重，而是强烈期望分歧加大。他又说：“以孙君英美化之超国家观视之，当其被逐时，日本政府赠予之数千金，未尝不可视为对亡命客所给予之国际怜悯，然以太炎国粹主义之自尊心视之，则深以孙君率留学生离去而不示威为憾，且认为孙君实不应密收金钱，如丧家狗之被逐，太炎之所以逼使孙君辞去总理之理由，亦可使人理解者也。”[②]《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写于1914年，虽然事隔已久，但偏袒章太炎等人的感情仍然很强烈。

平心而论，双方都有其不当之处。

从孙中山一方看，他对西园寺内阁的两面政策缺乏认识，这是事实。但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活动基地，日本政府并未采取明显的敌视态度，因此，自然不应采取率领留学生“示威”一类轻率的做法。孙中山处理不当的地方是：在接受日本政府赠款问题上没有和大家商量，并说明有关情况。

从张继等一方看，他们反对孙中山接受西园寺内阁的赠款可能不无道理，但是，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南下起义，他们视此为“受贿”是错误的，由此大吵大闹，提出革孙中山的命，要求撤换其总理职务尤其错误。章太炎的做法更是一种人身侮辱，是只图一时痛快，不顾后果，严重伤害同志关系的行为。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东京的倒孙风潮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又传来了黄冈、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这是孙中山离日后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它的失败使同盟会的内部矛盾犹如火上浇油，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等催逼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大会　免孙

① 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47页。

② 《支那革命外史》，48页。

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黄冈、七女湖起义急需，当时，孙黄二人正在筹划于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①]，因此，力排众议。张继于盛怒之下，和刘揆一扭打起来。与此同时，刘师培则进一步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他自己想当同盟会领导人，并企图援引北一辉与和田三郎为本部干事，也遭到刘揆一的拒绝，因此，北一辉也对刘动了武。[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 6 月 17 日，为筹备在广东钦、廉二府同时起义，孙中山派萱野长知赴日购械。在宫崎寅藏协助下，共购得村田式快枪两千支，每支带弹六百发，计划运至白龙港起岸，供革命军使用。村田式在日本已经落后，在中国尚不失为先进武器。但章太炎却认为不能使用，吵吵嚷嚷地说：“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③]当时，宋教仁已被张继从奉天叫回东京[④]，他支持章太炎，并联络了同盟会本部的一些人，以《民报》社名义用明码打电报给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⑤]。因而，购械计划搁浅。

在倒孙风潮中，陶成章支持张继、章太炎等。据当时人回忆说：“其时党人购买枪械靠日本浪人介绍代购”，“章太炎先生与陶公均主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黄二人但求其多而价廉，认为械多可张大声势”，“陶于争论时坚持尤力，因与孙黄失和，我彼时耳闻其事，曾于日比

---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289 页。

② 陶冶公：《中国同盟会原始党报〈民报〉的历史和我在报社服务的一些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③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

④ 李根源：《雪生年录》卷一。

⑤ 冯自由：《吊章太炎先生》，载《制言》第 25 期。

谷昌口医院访陶时有'大家不要争夺领袖'的话，陶闻言即谓：'年轻人不要胡说'，但言辞之中却嫌孙先生武断"①。这里所说的"争夺领袖"虽被陶成章斥为"胡说"，但证以上引其他史事，当是事实。

倒孙风潮中支持张继、章太炎等的还有谭人凤、田桐、白逾桓等，但他们的表现不那样突出，以后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钦廉起义由孙中山亲自策划。他联络了当地抗捐的民团，联络了在清军中任职的同盟会会员赵声和郭人漳，并派黄兴和王和顺归国领导，原以为只要武器一到，立即可以组成一支"声势甚大"的军队，然后收两广，出长江，汇合南京、武昌的新军，形成破竹之势，"革命可收完全之效果也"②。及至王和顺攻克防城，武器不到，孙中山自觉失信于起义同志和当地团绅，极为恼火，便由胡汉民出面致函同盟会本部，"力责之"，表示要执行党中纪律。不久，又派林文回东京，禁制章太炎和宋教仁，令其以后不得再干预军事问题。③ 9月，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谴责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不顾公义"，"破坏团体"，"侵入内部，几致全局为之瓦解"。他将运动日本各方面的任务交给了宫崎一人，表示"不特平山、北、和田数子，不可使之闻知"，连同盟会本部及《民报》社中人，亦不必与之商议。④ 在同盟会的内部分歧中，北一辉等起了恶劣的作用，孙中山完全应该采取断然措施。但是，专任宫崎一人，却危险地表现了抛开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社的意向。

由于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混乱状态日益严重，刘揆一写信告知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要求冯、

---

① 许织民：《从陶成章先生被害说起》，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油印本。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8章，见《总理全集·方略》，68页。

③ 《胡汉民自传》，见《革命文献》(三)，399页。

④ 《为防城起义望筹画接济饷械致宫崎寅藏》，见《总理全集·函札》，91页。

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对此,孙中山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1]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职,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太炎承认不是之时。[2] 刘揆一要孙中山“引咎”,意在以孙中山的高姿态来平息越来越盛的倒孙风潮,但这是一种息事宁人的糊涂做法,孙中山对此表示拒绝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来分辨是非,增强团结,而是等待“事实”的解决,要求同盟会本部及章太炎“承认不是”,这就不仅将分歧的种子保留了下来,而且以感情代替了理智。

孙中山致张继函手迹(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289 页。

② 《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吴稚晖原藏。

在孙中山复函刘揆一的同时，黄兴也复函称："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①]孙中山是当时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黄兴以其正确态度维护了孙中山的威信，也维护了同盟会的团结。但是，他也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消除矛盾。

由于黄兴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东京的倒孙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了，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这年 7 月 6 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清吏在审讯时问及行刺是否为孙文指使，徐锡麟答道："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②]在同盟会成立后，徐锡麟始终拒绝加入同盟会，他与孙中山"宗旨不同"的情况早已存在，但是，"不配使我行刺"云云，显然是出于倒孙风潮的影响，它反映了光复会领导人对孙中山远非一般的不满。

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不乏借题发挥的例子，倒孙风潮可以说就是如此。它借助于几个具体问题爆发出来，其中隐藏的是深刻的思想分歧。

倒孙风潮的主力是张继、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他们当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正在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

20 世纪初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日本已

---

① 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289 页。

② 《徐锡麟供》，见陶成章：《浙案纪略》下卷，《辛亥革命》(三)，81 页。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充分表现出来，罢工斗争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活跃阶段。1901年，在片山潜领导下，建立了社会民主党。1903年，幸德秋水组织平民社，宣传"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但是，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还很幼稚。片山潜说："尽管在我们中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和讨论，尽管我们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经典著作，但是我们仍然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之中，不善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跟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稀奇古怪的杂拌。"[①]1907年，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在第二国际影响下，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定议会斗争，宣扬无政府主义，主张除"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外，别无其他革命的途径。前者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后者组织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日本社会党开始分裂后不久，张继、章太炎等便和硬派发生接触并接受其影响。

1906年，张继根据幸德秋水的日译本，转译了马拉泰斯塔的《无政府主义》一书，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1907年春，他和章太炎通过北一辉的关系结识了幸德秋水，深受其影响。在幸德秋水的遗物中，保存有章太炎、张继一封求教的手札，中云："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弃。三月二十六日。"[②]此后，双方来往日益密切。陶冶公回忆说："（我们）参加了日本原始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为首组织的

① 片山潜：《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载《共产国际》第7～8期，1933年俄文版，84页。

② 石母田正：《续历史与民族的发现》，193页，东京，1969。

時評

祝日本社會黨之分裂

扶弱

自社會黨分硬軟二派其別派之中復有傾向無政府主義者蓋聚多數之人同奉一主義其進者必進而益上保守者必退而益下如德國社會黨當二十餘年之前已分二部一持革命態度一持老成態度及八百八十八年老成派中遂有政府黨之發生與之立異者別成反對派英法二國亦然近日義大利社會黨亦有分裂之勢此均社會黨派由合而分之證也然各派既離本派而獨立則其所持主義必較舊派為進步如日本近日社會黨分裂之事是也自日本社會新聞發行於東京為社會主義中央機關片山潛氏西川光次郎氏經營之時大阪平民社亦刊發平民新聞森近運平氏經營之然兩派發刊之詞一主激烈一主溫和及別子暴動之事起復一主階級鬥爭一主資本家與勞動者之調和兩派不同自此始及六月十六日堺利彥氏演說于社會新聞社陳述歐州社會黨之分派以社會新聞一派當軟派以巳當硬派以幸德

時評

日本社会党分裂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

（1907 年，采自《天义》第 8、9、10 合册）

座谈会”，“经常以旅行玩山游水为名，到东京郊外一些地方秘密开会”①。不仅如此，幸德秋水等有时还深入中国留学生宿舍，大谈特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② 这样，在中国留日学生和革命者中，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对于这一派别，幸德秋水描

---

① 陶冶公：《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的影响》，未刊稿。

② 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五），147 页。

述说:"亡命的革命党中多数青年,则已不满足于以往搞的驱逐鞑虏,复我中华,创立宪政,创立共和政体等运动,而进一步主张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其中最进步的人则热心倡导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或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把几万册杂志、小册子陆续秘密输入其国内。""对于当前的国会、选举、商业、经济,都根本不信任,他们对当前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都表示绝望,而另外要谋求人民幸福之途。"①

1907 年 4 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撰文,提倡中国的革命家与日本的革命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② 章太炎首先响应幸德秋水的倡议,开始与印度流亡在东京的革命者筹组亚洲和亲会。和亲会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宗旨,主张凡亚洲人,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可入会。③ 中国方面参加者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等数十人,日本方面参加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等。和亲会约章体现了某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例如它规定"无会长、干事之职,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在上之人"的传统主张。6 月,刘师培通过他的妻子何震出面创办《天义报》,声称其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④。同月,正当倒孙风潮大起的时候,张继和刘师培共同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其广告称:"近日以来,社会主义盛于欧美,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

---

① 《病中漫谈》,载《高知新闻》,明治 41 年(1908 年)1 月 1 日。

② 《幸德传次郎遗文集》(三),121 页。

③ 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未刊稿,陶冶公原藏。

④ 《天义》广告,载《民报》第 15 号。

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因此，他们要研究“社会主义”。[1]这份广告实际上是另树一帜的宣言书，它应是刘师培改组同盟会本部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的产物。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社会主义讲习会”于8月31日召开成立会。会上，刘师培表明了和孙中山完全不同的政治纲领。他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据他说，如果“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那就“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其结果必将是“中国人民愈无自由，愈无幸福，较之今日，尤为苦困”[2]。“建立民国”是孙中山为同盟会规定的重要任务，刘师培这里所指责的“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显然是针对孙中山和同盟会而言。它表明，刘师培等决心和孙中山分道扬镳了。幸德秋水参加了成立会，在演说中，他声言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两派，“平和派属马克思，激烈派则属巴枯宁”；又表示：“中日两国，地域相近”，“两国国民，均可相互扶助”，“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行”[3]。

最初，“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活动一次，后来改为每月活动两次。在讲习会上发表演说，中国方面有张继、刘师培、章太炎、陶成章、何震、汪公权、景定成、乔义生等；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宫崎民藏等。

章太炎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曾先后作过《国家论》、《人之根性恶》等讲演。1907年12月，又曾提议派张继去青岛举办讲习会。当时，山东同盟会会员邀请章太炎等派人去青岛办学，章回信说：“鄙意学堂不当骤办，盖此事既须经费，讲师又不易求，不如专在学会讲社会主义为

---

① 《天义》，第2卷。

②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载《天义》第6卷。

③ 《幸德秋水演说词》，载《新世纪》第25号。

妙。溥泉可至青岛一游，与同人开讲社会主义一两礼拜。”[①]张继所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是无政府主义。同一时期，章太炎在为张继所译《无政府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也说：“若能循《齐物》之眇义，任夔蚿之各适，一人百族，势不相侵，井上食李之夫，犬儒裸形之学，旷绝人间，老死自得，无宜强相陵逼，引入区中，庶几吹万不同，使其自已，斯盖马氏所未逮欤？”[②]章太炎这里所说的“马氏”，就是意大利老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在章太炎看来，无政府主义虽然赶不上庄子的《齐物论》，但它还是实现人类平等、救护贫民的好药方：“然其批捣政家，锄犁驵侩，振泰风以播尘埃，鼓雷霆以破积坚，堕高堙卑，邱夷渊实，荡复满盈之器，大庇无告之民，岂弟首途，必自兹始。虽有大智，孰能异其说耶？谅知大戟荛花，是时为帝者也。”[③]

章太炎之外，陶成章也是讲习会的积极分子。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记载说：“(丁未)冬，在清风亭，偕张继等演说，提倡社会主义。”[④]这里所说的清风亭，正是社会主义讲习会集会的常用地点。

社会主义讲习会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刘师培还为中译本写了个序。他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为“不易之说”[⑤]，“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⑥]。但是，刘师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还远远不够。其一，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作为手段之一的议会斗争，这在他看来，就是导致第二国际“利用国会政策，陷

---

① 《致陈干书》，章太炎佚稿。

② 《民报》第 20 号。

③ 同上。

④ 抄件。张篁溪曾将之篡改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

⑤ 刘师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载《天义》第 6～19 卷。

⑥ 齐民社同人：《〈社会主义经济论〉中译识语》，载《天义》第 16～19 卷。

身卑猥”的根由。[①] 其二，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在推翻了旧制度之后，还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在他看来，就是使人还要成为国家的奴隶，“均背于平等之旨”[②]。

“社会主义讲习会”推崇蒲鲁东、巴枯宁、施蒂纳尔、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也推崇极端仇视资本主义文明、“否定政治”的托尔斯泰主义。

在他们看来，巴枯宁堪称“近世之英杰”[③]，施蒂纳尔的学说“最为高尚”[④]，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最为圆满”，“悉以科学为根据”[⑤]。托尔斯泰主义被称为“消极无政府主义”，“足箴中国新党之迷”[⑥]。他们不要政府，不要国家，不要政治，不要军队，不要法律，幻想立即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

章太炎的思想和刘师培等略有不同。他认为不能立即废除一切政府，而必须设新政府以为“无政府之阶”，同时，他又认为不能以“无政府”为最高理想，而应该“高蹈”尽善尽美的“太虚”，即除“无政府”之外，还要“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⑦]。在章太炎这一时期的思想里，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是密切结合着的。

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20 世纪初年，中国近代工业还很微弱，无产阶级还处在幼年阶段，“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拒绝接受，有其历史必然性。

---

① 刘师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序》，载《天义》第 6～19 卷。

② 刘师培：《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载《天义》第 6 卷。

③ 《巴枯宁学术要旨》，载《天义》第 1 卷。

④ 自由：《斯撒纳尔无政府主义述略》，载《天义》第 8～10 卷。

⑤ 刘师培：《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载《天义》第 11～12 卷。

⑥ 《俄杜尔斯托〈致支那人〉节译识语》，载《天义》第 11～12 卷。

⑦ 《五无论》，载《民报》第 106 期。

如果连马克思主义都还被认为革命性不够，那么，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就更不在话下。“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和孙中山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1. 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矛头指向对外卖国投降的清朝政府，它包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内容。但是，不可否认，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存有某种幻想。他长年奔走世界各地，固然是为了发动华侨，但也是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民报》六大主义即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①]。对于日本政府，他尤其寄以希望。章太炎等人则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绝不可能赞助中国革命，也反对向帝国主义国家争取任何形式的援助。对《民报》六大主义中的上述条文，章太炎解释道：“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②]他声言：“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③]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之所以使章太炎等那样激动，其原因盖在此。

应该承认，在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上，章太炎等优于孙中山，但是，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他们的对华政策（包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在不丧失原则的条件下，革命党人并非不可以接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某种形式的“援助”或“支持”。

2. 在对民主立宪的态度上。孙中山指责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主张通过“政治革命”以建立“民主立宪政体”[④]。《同盟会宣言》

---

① 《民报》第1号封里。

② 《答祐民》，载《民报》第22号。

③ 同上。

④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见《孙中山选集》（上），75页，人民出版社，1956。

规定："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①]这是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最完整的表述。孙中山认为这种政体于中国"最为相宜"。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则不然。他们不仅反对君主立宪，而且也反对民主立宪。章太炎说："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②]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他大声疾呼："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③]陶成章也说："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④]在当时，他们尤为激烈地反对代议制度，章太炎指责议院为国家"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的工具，把"议士"和政府、官吏一起视为"天下之最下流者"[⑤]。刘师培则指责议会政策为万恶之源，认为"凡以议会政策为目的者，无论出何党派，决无有利平民之一日"[⑥]。

20 世纪初年，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选举制度弊端百出。"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比之封建专制制度来，仍然是个大进步。

3. 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贫富悬殊现象，因此，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外，特别提出了民生主义。孙

---

① 《孙中山选集》(上)，69 页。

② 《官制索隐》，载《民报》第 14 号。

③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事》，载《天义》第 8～10 卷。

④ 《龙华会章程》。该章程自署为甲辰年(1904 年)作，实系有意倒填，应为 1907 年冬至 1908 年春夏间之作。关于此，笔者另有考证，见本书《〈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⑤ 《官制索隐》，载《民报》第 14 号。

⑥ 《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载《天义》第 15 卷。

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核定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加的地价归国家所有，“为国民所共享”①，《民报》称之为“土地国有”。孙中山主观上企图以此来防止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弊端，而实际上，它只限制了地主阶级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土地买卖适合于现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列宁曾称之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②。

《民报》时期，孙中山还没有提出“节制资本”的口号，但《同盟会宣言》中有“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③一语，《民报》在和《新民丛报》辩论时，曾特别指出，国民经济命脉不能“归一二私人所垄断”④，要求将邮政、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诸事业收归国家所有。可见，孙中山等反对的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切资本主义。

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不同，章太炎主张“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⑤；陶成章主张“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⑥。刘师培则主张通过“农人革命”以没收地主的土地，按口均分，“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⑦。他尖锐地抨击同盟会的“土地财产国有之说”，指责其为“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所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⑧。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刘师培反对任何政权机构来干预土地问题，而

---

① 《同盟会宣言》，见《孙中山选集》(上)，69页。

②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427页。

③ 《同盟会宣言》，见《孙中山选集》(上)，69页。

④ 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载《民报》第4号。

⑤ 《五无论》，载《民报》第16号。

⑥ 《龙华会章程》。

⑦ 《悲佃篇》，载《民报》第15号，参见《怪汉译〈俄国第二次议会提议之土地本法案及施行法案〉序》，载《天义》第16～19卷。

⑧ 《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载《天义》第5卷。

主张诉诸农民群众完全自发的行动。

刘师培等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这自然较孙中山和同盟会为急进，但其目的在于维护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他们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刘师培主张“杀尽资本家”[1]，称实业为“民生之蠹”。据他说：工业日进，机械日新，那么，小民的生活也就愈加困难。[2]章太炎认为，小艇如果可乘，就不必去造轮舰；躬耕如果可以足食，就不必去搞什么机械。[3]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他甚至公然主张人类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4]。

4. 在革命策略上，孙中山主张发动会党、新军以进行武装起义。1895 年，孙中山即在广州举行了武装反清的最初尝试。1906 年之后，他又积极筹备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边境发动起义。整个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政府这一点上，孙中山始终坚定如一。

刘师培等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1907 年，张继译出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的《总同盟罢工》。该书提倡“非军备主义”，主张以“直接行动”——全社会的总同盟罢工作为“工人阶级反抗掠夺者的不二法门”[5]。刘师培、章太炎均曾为之作序。刘序认为，如果罗列的策略能够在中国推行起来，就会出现“握政之人，丧其所依”的局面，革命就大功告成了。他批评孙中山发动会党以进行武装起义的策略为“罔恤民劳”[6]。章序的观点与刘序大体相近。他天真地设想：只要全体劳动者发动起来，“一市之间，闭门七日”，那么，不仅统治者的“馈饷役使”无人供给，

---

① 畏公（刘师培）：《女子劳动问题》，载《天义》第 5 卷。

② 《异哉中国妇人会》，载《天义》第 2 卷，参见志达：《政府奖励实业》，载《天义》第 5 卷。

③ 《〈无政府主义〉序》，载《民报》第 20 号。

④ 《朱希祖日记》，1908 年 3 月 20 日，稿本。

⑤ 《总同盟罢工》，见《工人宝鉴》。

⑥ 《天义》第 8～10 卷。

而且连军队也将无法发挥作用,“虽有利器,且缩不前”[1]了。这一时期,在东京的一些集会上,章太炎、刘师培、张继三人曾密切配合,多次宣扬过总同盟罢工。例如1907年11月,留日中国学生因收回苏杭甬路权事在东京集会,即首由章太炎建议运动省城罢市、罢工,次由刘师培声称“惟罢市、罢工尚为有益”,末由张继“申明无政府主义罢工之说”[2]。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中,陶成章这一时期是主张武装起义的,但和孙中山在南方边境发动不同,他主张在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一带发动。为此,他于1908年春夏间积极组织五省革命协会。

双方在思想观点和斗争策略方面的分歧大体如上,它们是导致同盟会分裂的真正原因。关于此,日本人竹内善朔说:“到了明治40年(1907年),张继、刘光汉[3](当时都在二十四五岁左右)等优秀青年才受到社会思想的刺激,因而改变了过去指望通过‘大陆浪人’取得日本朝野较著声望的政治家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援助的那种想法,转而希望自己去掌握科学的、哲学的、条理清楚的革命原理,用以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据我看来,他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才开始面向社会主义,换言之,不依靠外力而要自力更生的这种愿望促使他们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研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恐怕正是孙文和章炳麟及其他青年革命党员之间发生裂痕的原因所在。北一辉写的《支那革命外史》一书中也曾提到,这大概是明治40年孙逸仙从日本政府(?)某机关得到五千日元(当时我们听说是由犬养一派人从中斡旋的)后离开日本的原因。《民报》社的人们都指责这件事,说孙文被收买了;其实,我们当时都有

---

① 《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

② 《党人拒款之运动》,载《神州日报》,1907年11月24日;参见《留学界拒款之运动》,载《神州日报》,1907年12月4日。

③ 刘光汉即刘师培。

这样一种感觉:孙文看来,对于当时留日青年中的这种思想变化情况,继续在日本呆下去也无能为力了。因此可以说,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之间构成了发生内讧的原因。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话,这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派别问题如出一辙。可以说,思想的成长引起了他们之间的分裂,而且其中又掺杂了感情活动。"[①]竹内善朔是幸德派的金曜讲演会成员,同盟会分裂的目击者,他的这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的观点中除谬误的成分外,也有若干合理的成分,但是,极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把它们扭曲了。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这一阶级经常在"左"和"右"两极滚动。列宁指出:小资产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②]。"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亲身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亲眼看见了或听到了日本、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各种罪恶,因此,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绝望。刘师培等认为,与其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还不如保持封建主义。刘师培声称:"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代议之制度,较之官吏之专制,其害尤深"[③]。章太炎也表示,如果没有均配土田、官立工场、限制财产相续、解散议员等四条作为保证,那么,"勿论君民立宪,皆不如专制之为

① 《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日本评论社《中国研究》(五),1948年9月。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第31卷,14页。

③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载《天义》第8～10卷。

愈"[1]。他说:"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2],"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3]。这就从"左"边滑到"右"边去了。

1907年冬,由于悲观失望,章太炎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他先是通过清朝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绋昌向张之洞谋求路费,未成,又连续给短期归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五封信,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4] 他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到上海后,刘师培立即写信向端方自首。次年1月,张继因参加幸德派的第二十次金曜讲演会,被日本警察追捕,辗转逃往法国。[5] 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就失去了一员干将。其后,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改出《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继续高唱无政府主义,暗中则为清朝政府做侦探。4月,章太炎与刘师培、何震、汪公权之间因事吵翻,章太炎从刘、何的住处搬回《民报》社。6月,发表《排满平议》,明确表示和无政府主义决裂,宣称"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是亦无当者也"[6]。这样,"社会主义讲习会"又失去了一员干将。此后,刘师培夫妇逐渐受到东京中国革命党人的冷落。在此期间,刘师培、陶成章之间也发生不和。这年11月,刘氏夫妇回到上海。为了制造混乱,挑拨关系,将章太炎要他们和端方等联系的五封信影印寄给了黄兴等人。黄兴当时"一笑置之"[7],但以后却从这五封信引发出了一场轩然大波。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本来就相当复杂,由于出现了刘师培一流内奸,它就更加复杂化了。

---

① 《五无论》,载《民报》第16号。

② 《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载《民报》第17号。

③ 《与马良书》,载《民报》第19号。

④ 《党人》,载《新世纪》第1117号。

⑤ 《金曜讲演的大迫害》,载《熊本评论》,明治41年(1908年)2月5日。

⑥ 《民报》第21号。

⑦ 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见《辛亥革命》(二),447页。

第二次倒孙风潮

同盟会中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反映出革命派内部政治、思想上的深刻矛盾。但是，除个别人与之稍有辩驳外，并没有形成一场是非明辨的论战。

从孙中山一面看，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认识不足。曾经有人提醒他：无政府主义“其性质与同盟会之民生主义迥殊”，但孙中山却回答说：“无政府论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①

从“社会主义讲习会”一面看，由于张继出走，章太炎、陶成章和刘师培之间不睦，这个派别也已处于涣散状态，无法继续活动，更无力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同盟会进行新的攻击。除刘师培外，无政府主义的旗号也逐渐收了起来。

自1908年下半年起，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焦点转为经费问题。

章太炎等人在东京掀起的风潮严重地伤害了孙中山的感情，自此，他将全部心血和热情都浇注到了南洋方面。1907年8月，孙中山积极支持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创办《中兴日报》，使之成为宣传革命和与改良派论战的新阵地。他不仅亲自为该报撰稿，过问编辑、财务、招股等事，而且多次表示，《中兴报》的文章议论“颇惬人心”②，“于大局甚为有

①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见《革命逸史》第3集。

② 《到暹罗前后致邓择如等函》，见《国父全书》，412页，台北版。

关”[1]，维持《中兴报》乃“吾党在南洋之极急务”[2]，要求南洋各地同志积极支持。

在此同时，孙中山又积极整顿南洋各地同盟会，并酝酿将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3] 1908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订立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委胡汉民为支部长，统一领导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以期互相联络，“协力相扶，同心共济”[4]。通信办法规定：各团体间至少每两个月互相通信一次，住址有移换时，须即时通知南洋支部，如有新团体成立，即由南洋支部发信通知。这样，南洋支部实际上形成为一个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和南洋相反，东京同盟会总部愈来愈涣散，《民报》的问题也愈来愈多。

《民报》在归章太炎编辑后，逐渐倾向于谈国粹，说佛理。孙中山、胡汉民离日后，原主要撰稿人朱执信、汪精卫等也陆续离日，《民报》谈佛理的文章逐渐增多。1908年2月印行的第1号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缘起说》。有读者批评其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5]。这种不满当然不会是个别的，因此，销量锐减，“印刷房饭之费，不足自资”[6]，窘迫得开不了伙。章太炎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7] 其后，章太炎曾写过五六封信，打过三四次电报，呼吁南洋方面接济，据

---

① 《赴欧洲前致邓择如等各函》，见《总理全集·函札》，50页。

② 《致黄甲元嘱筹款维持〈中兴报〉函》，见《国父全书》，408页。

③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见《革命逸史》第3集；参见《致张继函》，孙中山佚稿。

④ 《为规定南洋各处团体通信办法致邓择如函》，见《总理全集·函札》，46页。

⑤ 转引自章太炎：《答梦庵》，载《民报》第21号。

⑥ 章太炎：《伪〈民报〉检举状》，载《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

⑦ 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载《制言》第41期。

说,“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①。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陶成章准备亲往南洋招股。对此,孙中山及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均加劝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且多非资本家”,“必无效果”,建议在东京另筹。② 陶成章没有听取这一意见,于1908年8月南行。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为《民报》募捐外,还要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到南洋后,陶成章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据有关人士回忆:“孙中山四处张罗,无法筹措,乃出其手表等物,嘱往变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发生误会,与孙中山“争持不休”③。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五万元,以便“回浙办事”。对此,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④。陶成章要求为他写介绍函去各地募捐,孙中山同意了。⑤

“南洋经济恐慌”并非完全是孙中山的托词。自1907年黄冈之役起,至1908年5月河口之役止,孙中山共在南方边境发动了六次起义,用去近二十万元,南洋华侨中有力捐款的同盟会会员大都已成强弩之末;加上河口之役后,六七百名起义战士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至新加坡,又需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经济更形拮据。10月16日孙中山致檀香山同志函云:“党中财政日困,虽香港一隅,或得

---

① 章太炎:《伪〈民报〉检举状》,载《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

② 南洋归客:《驳诋毁孙中山者》,载《民立报》,1912年11月6日。

③ 郑螺生:《华侨革命之前因后果》,见黄警顽:《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

④ 《由欧抵美前后致王子匡与留此同志各函》,见《国父全书》,417页。

⑤ 《华侨革命史》,见《陈新政遗集》下。

檀埠同志之接济，而他方则无法可设也。”[①]信中所言，应是事实。

由于在经费上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积极支持，陶成章决计“独自经营”[②]。他制定了章程，开始以浙江同盟会分会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进行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说明：“本光复会，由来已久。乙巳夏，由总会长蔡、湖南分会长黄，从舆论众望，请孙中山先生为会长，开会日本东京，改名同盟会，而以本会附属之。但该时浙江内地，势力异常扩张，章程发布已久，更改为难，故内地暂从旧名。然重要事务员，均任同盟会职事，故又名浙江同盟会分会。”又称：本会“以浙江为根基”，“以江、浙、皖、赣、闽五省为本会办事区域”[③]。这一章程突出地夸张光复会的作用。它绝口不提兴中会，把成立在前的华兴会说成是光复会的湖南分会，把光复会说成是同盟会的母体，并将“办事区域”扩大到浙江以外的东南各省，显然，都是在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作准备。

南洋是同盟会的根据地。从兴中会起，孙中山就在南洋活动，当地华侨对同盟会是熟悉的，光复会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陶成章还不得不仰仗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威望。筹饷章程中，陶成章特别声明“本会既为同盟会分会，故本章程订定后，移知东京总部及南洋支部”，所得款数“亦移知东京总会及星洲分会”[④]。但是，陶成章的募捐活动却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11月，陶成章到缅甸仰光，在《光华日报》上发表记述秋瑾、徐锡麟起义的《浙案纪略》以为宣传，临行时募得千元。12月6日，到槟榔屿，该地办事人声称，按章程，必须孙

---

① 《致檀香山同志请尽力筹款函》，见《国父全书》，411页。

②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

③ 《凭单》，见徐市隐：《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第3节。

④ 同上。

中山之人来运动方可，仅邀集三四人，认捐三百元。1909 年 1 月 23 日，到坝罗，正值《中兴报》代表到埠演说，言“《中兴报》事紧要”，并声言：“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因此，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①] 至当年 4 月底，各地认捐总数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兑现。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设法播弄”，开始攻击孙中山。他在致李燮和函中说：“弟自去岁南来，迄今已历九月，所希望之目的，全然未达。”又说：“弟本不说中山坏事，盖犹为团体起见，不得不稍留余地，至是逼弟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已。”[②]其间，陶成章曾向孙中山索取介绍函至各地收款，为孙中山拒绝。[③]

光复会的传统活动地点在江、浙，陶成章在南洋“独自经营”，明显地造成了和南洋支部争夺群众和影响的对垒局面。如果说，东京的倒孙风潮表现为对个人的不满，“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建立表现为思想上的分歧，这以后就进一步发展为组织上的对立了。

离开坝罗后，陶成章活动于勿里洞、吧城、谏义里、文岛等地（均为今印度尼西亚属地），酝酿新的倒孙风潮。

还在 1909 年 5 月间，陶成章就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④] 8 月，陶成章到槟港，结合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声言孙中山在“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谎骗

① 《致铁仙》，己酉三月九日，陶成章手札，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藏，下同。

② 同上。

③ 《华侨革命史》，见《陈新政遗集》（下）。

④ 汪精卫：《致蓝瑞元、黄蔡凤书》，见《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三），591 页，台北版。

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及于南洋各埠矣”。《罪状》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无尽”，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并表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共提出要求九条，其主要者为：

1. 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2. 另订章程，发布南洋各机关，令其直接东京总会。嘱令南洋支部章程一概作废。

3. 公举办事二人，前往南洋各埠演说，收拾人心，揭破孙文诡谋，使其无立足之地。

4. 再开《民报》机关。

5. 兼于《民报》社内，附设旬报，凡《中兴报》之所至，亦踪寻之而往。

陶成章、李燮和等声称，只要开除了孙文，发表《罪状》，“事必大有可为，无论将次者开办不至蒙害，即令既破败者，热心之人尚多，犹堪收效在桑榆也”。此外，《罪状》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丰汇银行贮款二十万元；其兄在九龙起造屋宇，用款不足，孙中山电汇款项助建云云。[①] 其后，陶成章便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在东京的“倒孙风潮”之后，孙中山即不大过问同盟会本部和《民报》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是，《罪状》大部分属于诬陷。它得到了少数江浙人的支持，却遭到了黄兴等的坚决拒绝。黄兴一面向陶成章作调停、劝说，一面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申辩。

---

① 《神州日报》，1912年11月2日。

代论

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

此传单用石版印成由爪哇友人寄来照刊报端者其中(删)语本报不敢增减一字

[illegible]

陶成章等宣布孙中山"罪状"（采自新加坡大学图书馆）

黄兴的调停、劝说、申辩都没能打动陶成章。在公布《罪状》的要求被拒绝后，陶成章便决定自行发表。他在致胡国梁函中表示："与中山已不两立"，"不若由二三人出面发表之，从此分为两歧罢了"[①]。其后，便由陈威涛、魏兰将《罪状》油印百余份，寄给了南洋各报。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陶成章等把孙中山视为敌人，不顾大局，不顾影响，恶意诬陷，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

陶成章等人的行动迅速影响了章太炎。在公布《孙文罪状》的同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再次参加了对孙中山的攻击。

《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1909年秋，黄兴在林文等帮助下筹备恢复。因为对章太炎主持时的《民报》不满，黄兴邀汪精卫到东京任编辑；为了避免日本政府干涉，托名以巴黎《新世纪》为发行所。

恢复《民报》本来是陶成章等在《孙文罪状》中提出来的"善后办法"，但是，他坚持不能替孙中山"虚张声势"，必须以革除其总理职务为先决条件。[②] 自然，这也遭到了黄兴的拒绝。因此，他便支持章太炎出面反对。章太炎由于多年困苦维持《民报》，一旦恢复，却被排斥在外，因此，大动肝火。他指责续刊《民报》为伪《民报》，在《检举状》中攻击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并主观武断地说："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什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乾没可知已。"[③]没有任何根据，一个想当然的"可知已"就定了孙中山"乾没"巨资的案！

对孙中山的公开诽谤为保皇派提供了炮弹。不久，《南洋总汇新报》发表了《伪〈民报〉检举状》。其后，保皇派大规模地开展了对孙中山

---

① 《致若愚》，1909年9月24日，陶成章手札。

②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见《黄克强先生全集》，台北版。

③ 《南洋总汇新报》，1909年11月6日。

的攻击，各种秽词如水般泼来。他们辱骂孙中山为“马骗”、“棍骗”，诬蔑其“假借革命名目，以为衣食饭碗之计”，说是：“孙汶腔中，何尝有一滴爱国之血，眼中何尝有半点爱国之泪，心中何尝有分毫爱国之思，不过口头禅焉耳！”[①]

和陶成章、章太炎相呼应，当时在法国的张继则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他“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②]。

这样，就出现了第二次倒孙风潮。

敌人的辱骂、镇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同营垒人的反诬和倒戈。长期以来，孙中山把实际领导起义的责任交给黄兴等人，而以在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为己任。陶、章这两份材料的公布对孙中山工作所造成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破坏孙中山赴美募捐，陶成章等甚至冒名作信，将攻击材料寄发美洲各华文日报，10 月 22 日孙中山与王子匡函云：“近接美洲来信，谓有人托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大加诋毁于弟，不留余地，该处人心颇为所惑云。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③]但他毫不灰心，一面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上撰写长文，“加以公道之评判”[④]，一面对张继严正指出：“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他并愤愤地说：“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认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去两年，两广、云南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⑤]

经历种种挫折而革命之志不挠，这是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

---

① 介民：《敬告捐助革命军饷者》，载加拿大《日新报》，1911 年 4 月 26 日。

② 转引自孙中山《致张继函》，吴稚晖原藏，未刊稿。

③ 《由欧抵美前后致王子匡与留此同志各函》，见《国父全书》，417 页。

④ 《在欧将去美国时致伦敦吴敬恒函》，见《总理全集·函札》，106 页。

⑤ 《致张继函》，吴稚晖原藏，未刊稿。

突出优点,但是,因章太炎等少数人而迁怒于同盟会,仍然是以感情代替了理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东京同盟会会员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国内各地同盟会分会也无人领导,在这方面,孙中山不无责任。

1910 年 2 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在誓词中将同盟会会员改称中华革命党党员,开始实现其酝酿已久的打算。同年秋,抵达槟榔屿后,又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①] 但由于同盟会已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事实上难以执行,不久也就作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陶成章对孙中山的攻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东京方面,黄兴等决定不和章太炎计较,只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宣布章为"神经症之人"。他要孙中山"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②]。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函知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毒,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之成功。[③]

安南方面,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云南、广西起义的情况,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一一予以驳斥。[④]

南洋方面,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⑤],派人调查,发现孙中山在九龙的家除几间旧房外,别无所有;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自己盖了草房子在那里种地。于是,将实情公布,真相大白。[⑥]

多年来,同盟会在其内部分歧中,既无同志式的讨论,又无思想上

---

① 冯自由:《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见《革命逸史》第 3 集。

② 《为陶成章诬谤事致孙中山函》,见《黄克强先生全集》。

③ 《为孙中山受谤致各同志望同心协助函》,见《黄克强先生全集》。

④ 胡汉民:《致南洋同志书》,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 1 册。

⑤ 《华侨革命史》,见《陈新政遗集》(下)。

⑥ 胡汉民述:《南洋与中国革命》。

的必要交锋。现在交锋了，这对于澄清真相、维护孙中山的威望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交锋无助于填平双方感情上的巨大鸿沟。

在倒孙风潮的掀起者中间，刘师培的叛徒面目此时已经暴露。1908年冬，刘师培回上海后即出卖了同盟会会员张恭，不久，又投入端方幕中。1909年8月，端方由两江调直隶，报上发表了随员名单，刘师培赫然在内。在此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思考，和刘师培一度关系极为密切的章太炎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对孙中山如此攻击不遗余力呢？在未经冷静分析的情况下，东京革命党人公布了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五函，指责章太炎为端方侦探。11月30日，《中兴日报》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及《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等文。12月，孙中山得悉保皇派报纸发表了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认为章太炎"破坏党事之心已不留余地"，要求吴稚晖将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五函的笔迹照片寄给他，"以证明太炎之所为，庶足以破其言之效力"[①]。不久，香港《中国日报》、巴黎《新世纪》、旧金山《美洲少年报》先后发表了这五封信，《中国日报》声称章太炎受端方委任，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新世纪》指责章太炎以"万金出卖一革命"[②]。

将章氏五函的问题一下子提到如此的高度，当然也严重伤害了章太炎的感情。刚愎自负又极易冲动的章太炎对此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第二次倒孙风潮中，思想分歧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双方的关系则由彼此猜忌、怨憎发展为互相敌视和进行势不两立的攻击，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① 《致吴敬恒请于〈新世纪〉评论〈日华新报〉破坏党事谬论各函》，见《总理全集·函札》，110页。

② 《党人》，载《新世纪》，117页。

光复会的重建与倒退

陶成章到东京作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争取黄兴，开除孙中山，另推同盟会总理，掌握同盟会的领导权；另一手是取消对同盟会形式上的附属关系，公开分裂，重建光复会山头。

在开除孙中山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陶成章便按第二手行事。他多次与李燮和、胡国梁等通函，声称同盟会东京总会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整顿"①，必须"另行组织新机关"②。他说："何妨另开局面乎？前次之事，终算一场大晦气罢了！"③在此同时，又积极争取章太炎，以光复会成立在先来打动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④章太炎长期对孙中山不满，他的性格又一向是任情孤注，不考虑利害得失，对此自然表示同意。

1910 年 2 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日本东京，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章梓任庶务员，沈家康任书记员。⑤ 不久，新加坡、文岛等地陆续建立分会。由于基本群众在南洋，因此，光复会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以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执行员，下各地分会墨守成规，形成了所谓"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的局面。⑥

后期光复会收容了同盟会包括原华兴会内对孙中山不满的分子，

---

① 《致若愚、铁仙》，陶成章手札。

② 同上。

③ 《致亦逵、柱中》，陶成章手札。

④ 《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⑤ 《致柱中、若愚、彝宗、福生、文庆、佐新》，陶成章手札。

⑥ 章太炎：《致临时大总统书》，载《大共和日报》，1912 年 1 月 28 日。

以同盟会的反对派面目出现，但是，比起同盟会，它在不少方面都倒退了。

章太炎是后期光复会中唯一的理论家。这一时期，他思想中的封建主义成分进一步增加。3 月 10 日，他和陶成章在东京一起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缘起》中说：“恨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同人有忧之，爰设一报”，借以“明正道，辟邪词”①。中国是个封建古国，清王朝是个实行高度封建专制主义的王朝，因此，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欧学”，即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文化，仍然可以发挥其进步作用，但是，《教育今语杂志》却视为“邪词”，要“辟”。在此之前，续刊《民报》正在介绍卢梭的《民约论》，《教育今语杂志》的出版可以说唱的是对台戏。同年由章太炎编辑的《学林》也一样充满了国粹气。该刊《缘起》说：“世人多急〈利〉近功，以古学不足治，惟异化之务”，它号召“一二耆儒故老”起来挽救即将“坠入粪壤”的“文武之道”②。这里所说的“异化”，指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热潮，所谓“文武之道”，指的是长期成为中国人民精神枷锁的封建文化。在该刊第 2 期上，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秦政记》，歌颂“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的“天子”，说是“人主独贵者，政亦独制”。同期发表的《非黄》则抨击“尚贤”、“任众”的民主政治，说是“诚听法，虽专任，与武断莫比；诚尚贤，虽任众，与武断奚分”。如果说，1908 年章太炎发表《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政体，必不如专制为善”时，还曾经特别提出了一个“恢廓民权”的方案，那么，这一时期，他已经更多地神往于“王者一人秉权于上”的法家封建专制主义了。

---

① 《教育今语杂志》，第 1 册。

② 《学林》，第 1 期。

陶成章是后期光复会的组织者和实际领导人。这一时期，他的活动逐渐向改良主义方向靠近。

前文指出，当张继等迷信“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时，陶成章仍然主张进行武装起义，但是，光复会重建时，他却抛弃了自己的主张。在《致石哥》函中，他说：“夫我辈之目的，在一举覆清，若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实属有害而无益。”又说：“如不用暗杀，则用地方起兵，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1]和人民群众缺乏充分的联系，实行单纯的军事冒险，这是同盟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弱点，但是，这些起义毕竟打击了清朝统治，锻炼了革命者，教育了群众，不能称为“有害无益”，更不能称为“祸莫大焉”，至于所谓“必引外国人之干涉”云云，更是被革命派痛驳过的改良派论调。

当时，国内各省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他们武装反清的总目标一致，只在策略上互有歧异：“有欲向云贵以进取者，有欲向两广以进取者，有欲向江浙以进取者，有欲向两湖以进取者，有欲向山东、河南以进取者，有欲向中央革命者。”[2]这本来并不难统一，对于上述各种力量，陶成章一概采取排斥态度，他说：“如此纷纷之热心人各欲乞此总会以求运动整顿，其将奈之何哉！当是时也，不与则名不正，言不顺；欲与则无款以给之，即令有稍稍之款，与其一不与其二不可也，与其先不与其后不可也。全力助他人，未见他人之能集事，本己之方针，且先乱矣。秦末之项羽，隋末之李密，其失败皆因此也。”[3]在陶成章看来，多一些人革命反而会造成麻烦，唯此一家最好，因此，他给光复会规定了“必不汲汲扩

---

① 陶成章手札。

② 《致石哥》，陶成章手札。

③ 同上。

张”的关门主义方针。[①]《浙案纪略》中，陶成章说：“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这可以说是陶成章的夫子自道。

一不靠武装起义，二不靠全国各地的革命力量，陶成章靠什么“一举覆清”呢？他靠的是暗杀活动。光复会重建后，他曾建议集款数千金或万金，专办此事，以振动华侨，扩大影响。[②] 甚至，他想入非非地提出了一个实行“中央革命”的妓院方略：收罗一批美女，在北京开设妓院，诱惑满族亲贵，席间放毒，一网打尽。[③]

弱者和穷途窘促的人常常盼望奇迹，妓院方略的提出，说明了陶成章和同盟会分裂后，既软弱无力，又穷途窘促。

当然，生活中出现奇迹的可能并不大，这一点，陶成章完全明白。因此，他为后期光复会规定的方针是“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察学生之有志者联络之”[④]。据他说，如果能得到两三个有资本的学生的赞成，就于愿已足。光复会重建后，陶成章立即和章太炎编辑《教育今语杂志》，目的在此；随之，他在东京埋头编写小学历史、地理教科书，目的也在此。1911 年初，他又曾计划到南洋找一个寺院住下，专力编撰教科书。《致柱哥》函云：“盖弟近立定主意，不为虚耗金钱之事，更不为无益之举，而虚耗其精神，实事求是，以图渐进，不为躐等。”[⑤]

“虚耗金钱”、“无益之举”云云，指的都是武装起义；“渐进”云云，指的就是教育；“不为躐等”云云，完全是改良派的爬行哲学。和刘师培、章太炎一样，陶成章也经历了一个从“左”到“右”的转化。

---

① 《致石哥》，陶成章手札。

② 同上。

③ 魏兰：《陶焕聊先生行述》。

④ 《致石哥》，陶成章手札。

⑤ 《致柱哥》，同上。

反革命的暴力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虽然存在着种种弱点，但是，历史证明了，使清朝皇帝滚下龙座的还是武昌新军手中的枪炮，而不是陶成章的“教育根本”论。

在经费问题上，后期光复会也逐渐效法改良派。

同盟会解决经费问题靠在华侨中募捐，这使他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还能联系群众。后期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主张靠经商，他说：“历观万事，皆与财政相为因果，然财政之道，非自行筹划无由，此商业之所以不得不速为经营。”[①]为此，他和李燮和等积极筹办商业公司，计划经营教科书籍、图画、科学仪器、体操、音乐用具、学校用品、衣衫、牙粉、肥皂等；并计划把《教育今语杂志》改变为广告机关。[②] 这一套，都是流亡海外的改良派的做法。

由于分裂不得人心，光复会重建后不久即在各方面陷入困境。

首先是对孙中山的攻击不得不停下来。本来，陶成章已经编印好了《布告同志书》，“直言孙文种种之非”。由于舆论，包括光复会内部的强烈反对，仅散发了九册，就不得不宣布“余皆不寄了”[③]。

其次是陶成章视为“吾辈面目所存”的《教育今语杂志》停刊。陶成章原以为该刊发行后会“普及南方各地”，结果只售出了不到三百本，大部分搁置在代派所无人问津[④]，已销之款又迟迟收不到，因而“亏折甚巨”[⑤]，“真正困难万分”[⑥]。

再次是筹款门路均已断绝。据陶成章说：内地可筹之处，久已筹之

---

① 陶成章函札残页，1910 年。

② 同上。

③ 《致铁仙》，陶成章手札。

④ 《致福哥》，同上。

⑤ 《致彝宗、若愚、柱中、文庆》，同上。

⑥ 《致铁仙、若愚》，同上。

一空；东京万无可筹[1]；南洋呢，所筹之款又不见寄来，气得他准备发表声明，将不再向南洋各地募捐。[2]

此外，商业活动也进行得极不顺利。陶成章《致柱中》函云："祈老哥善自珍重，勿以经商目的之不能遽遂，多生烦懑，致生理有碍也。"[3]

按照计划，陶成章还准备创办《光复报》与《光复杂志》，但都因找不到作文之人而告吹。据陶成章说：章太炎虽有几个弟子，但多半是为了学成后往内地当教员，"非特不肯作文，且亦不能请其作文"，其中虽有一二稍有志者，但"皆欲独善其身"，不愿意介入。章太炎本人呢？"乃其不肯作文何！"章太炎反对创办《光复报》和《光复杂志》。[4] 这一时期，陶、章之间可能也产生了某种矛盾。

革命需要团结，陶成章无忌惮的分裂行为使他陷入了四面楚歌中。在东京，他觉得"实在难以过日"[5]；回南洋吧，当地同盟会会员反对分裂的呼声很高，"风潮方作，来反遭忌"[6]。一直踌躇到 1911 年 4 月，他才从东京回到南洋，已经是广州起义的前夜了。

在筹备广州起义过程中，黄兴电邀李燮和、王文庆、陈方度等参加，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7]，主动向光复会伸出了合作之手。李燮和等积极响应。1910 年 10 月，李燮和受槟港同志委托，参加了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的发难会议。会后随即回槟港传达，动员华侨捐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筹得一万七千余元，由李燮和、陈方度带给了黄兴。不

---

① 《致铁仙、若愚》，陶成章手札。

② 《致若愚、铁仙》，同上。

③ 《致柱中》，同上。

④ 《致福哥》，同上。

⑤ 《致石哥》，同上。

⑥ 《致柱中、若愚》，同上。

⑦ 冯自由：《光复军司令李燮和》，见《革命逸史》第 2 集。

久，胡国梁、柳聘农也带着募得的五千元赶到香港，向统筹部报到，一起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①]

与此同时，陶成章也应李燮和、王文庆电召，到达香港，表示出和同盟会合作的意向。这样，在经过了长期的分裂之后，同盟、光复矛盾重重的关系出现了转机。但不幸的是，这一转机很快就消失了。

广州起义失败后，赵声极为悲愤。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赵声腹痛剧作，延医诊治，知为盲肠炎，经割治无效，于5月18日逝世。赵声先是光复会员，后加入同盟会，是在双方会员中都具有威望的革命者。对赵声之死，陶成章疑为胡汉民所毒，进一步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其后，陶成章回到上海，在嵩山路沈宅开会时与陈其美发生冲突，陈掏枪欲打陶成章。数日后，陶匆匆离开上海，再返南洋。于是，旧矛盾之外又加上了新矛盾，同盟、光复之间的关系又增添了新的复杂因素，它埋下了辛亥革命后两会继续摩擦、龃龉、对立的种子。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同盟会的分裂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是一系列政治、思想、策略分歧和人事纠纷发展的结果，既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早已暴露无遗，因此，在这一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满、怀疑以至绝望的情绪。同时，中国又是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在国际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抬头的情况下，同盟会中有人接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中国同盟会的分裂发生于日本社会党的分裂之后，张继、刘师培诸人的行为不少是对后者的模仿。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问题上向同盟会提出了挑战。由于中国民族资产

① 胡国梁:《辛亥广州起义别纪》，载《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

阶级的阶级局限和其由娘肚子里带出来的特殊软弱性，它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对改良派的论战中已经被证明了不是很有力的理论武器；在回应“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挑战上，当然更加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社会主义讲习会”诸人自身同样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在书面上、口头上，他们可以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发出极端革命的豪言壮语，沉溺于“无政府革命”的狂热幻想，然而，却提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中有些人很快向“右”转，倒向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或颓唐，或倒退，或动摇，或叛变投降。

同盟会的分裂渊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思想分歧逐渐被掩盖起来，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和山头主义逐渐上升，旧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结合在一起，引发出新的攻击。终于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

克服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需要以大局为重的广阔胸襟和高度的组织观念，而这，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要推翻这两个敌人，不仅需要强大的阶级力量，也需要号令一致、步伐一致的战斗。当领导这一革命的司令部——同盟会处于思想分歧、组织涣散的状态时，历史就已经决定了这次革命必然是一次巨大的小产。

与王学庄合作，原载《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龙华会章程》[①]因为主张土地公有，很受史家注目。《章程》说："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不少论著都乐于引证和评论这段文字，但是，《章程》本身需要加以考订的若干问题，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并从而得到正确解决。

认真读过《龙华会章程》的人，都会发觉其中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它的标题上大书着"龙华会"字样，而《会规十条》中的《命名》条却说："我们的会，就叫做革命协会。"龙华会是浙江哥老会的一个支派，陶成章《浙案纪略》载有它的始末；关于革命协会，该书也有记载，云："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另订一新章，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镕铸而一之，定其名曰革命协会。"[②]如果《章程》属革命协会，应为1908年事，但《檄文》之末却明白写着"甲辰正月朔日"，即1904年2月16日，恰当龙华会兴盛之时。那么，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到底是1908年革命协会的章程，还是1904年龙华会的章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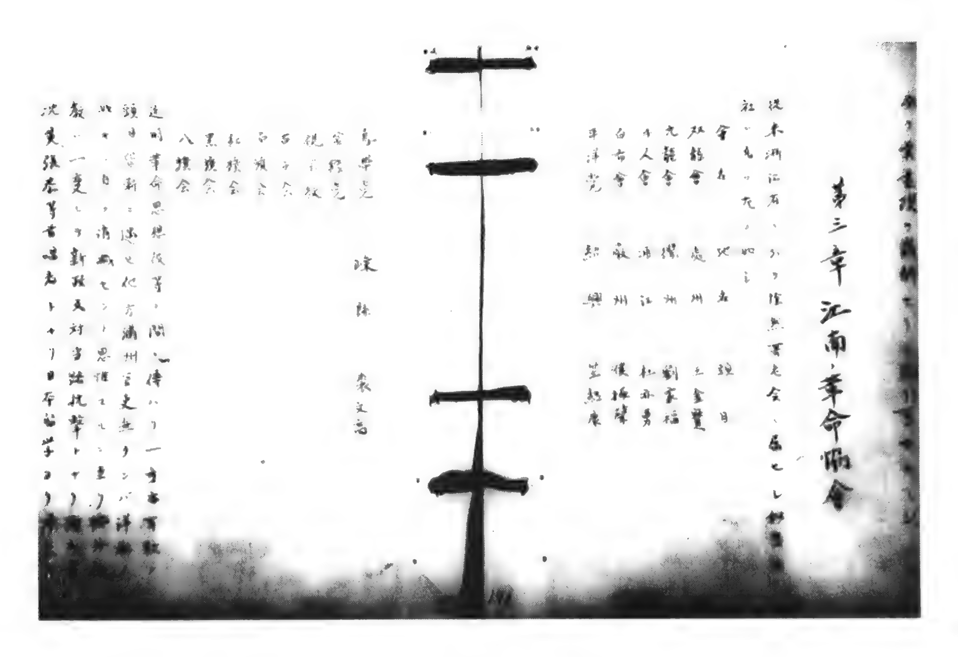
最能说明现今章程主属问题的证据，首先在《章程》自身。

第一，《章程》正文说明了会名叫"革命协会"。它说："我们的会，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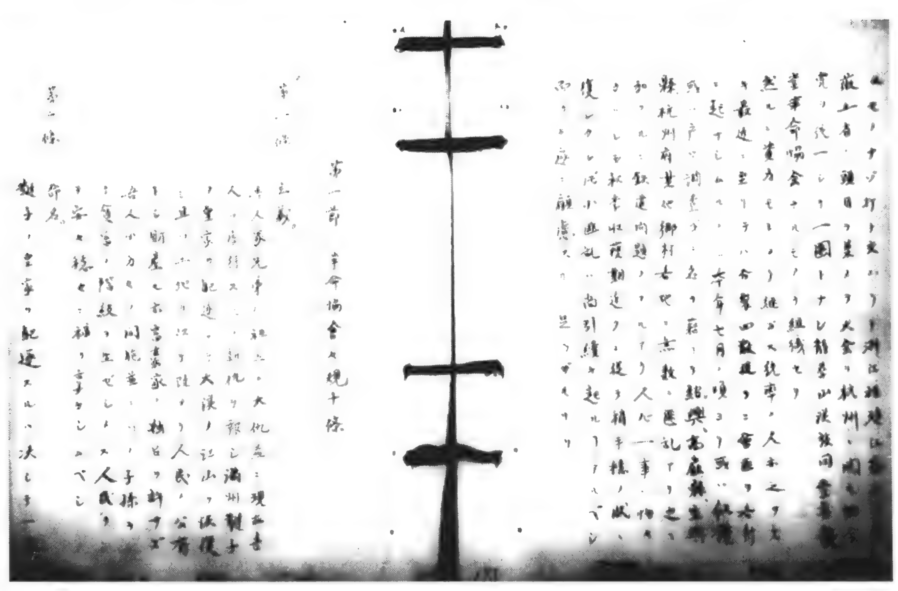
① 《龙华会章程》共七个部分，即《檄文》、《会规十条》、《约章五条》、《入会仪式》、《祭文》、《入会规矩之次序》和《附录》，全文见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该书商务印书馆译本初版于1912年5月。1954年《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选辑》增订本和1957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凡引用此书者，不再注明)，都在《龙华会章程》的总题下，选收了《檄文》和《会规十条》两部分。

② 《浙案纪略》，全文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三)。



第三章 江南革命協会

会名	地名	頭目
双龍会	処州	王金宝
九龍会	衢州	劉家福
千人会	浦江	杜承勇
白布会	厳州	濮振声
平洋党	紹興	竺紹康



第一節 革命協会々規十條

第一條

第二條

江南革命协会章程(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叫做革命协会；山名，就叫做一统龙华山；堂名呢，就叫做汉族同登普渡堂。"它还有"我们这个革命协会"、"我们这个协会"等语。特别是《檄文》部分，开宗明义就问："怎样叫做革命?"接着答："革命就是造反"，并详加诠释、发挥。它为何首先在"革命"一词上大做文章呢？理由显而易见，就是因为该团体系以"革命"二字命名的缘故。

第二，《章程》约束的对象是一批而不是某个会党团体。《会规十条》说："现在所设的官职，同洪家、潘家的旧官职是一式一样的。"《入会规矩之次序》说："大都督、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时，各照各会各教各党的老规矩。"可见，它约束的对象包括着洪家(红帮)、潘家(青帮)这哥老会的两大派，包括着各教各会各党。这种情况，龙华会是无法办到的。

第三，《章程》变更了会党旧有的章制。《章程》虽称它的官职、制度与各会党是一样的，但实际却有增损，名称都有所变更。这些变更当然是为了将各会党统一在协会内。其中最突出的变更是入会式。哥老会崇敬五祖、桃园结义、梁山泊和瓦岗寨，它的开山式与入会式是"场中正面坛上，设五祖、关圣等神"。龙华会是终南会的一支，终南会票布的中央即标明"关圣帝君之位"。《章程》则规定："凡进我们这个协会的规矩，最好是在岳庙里"，无论在何处，均须"设立公案，写少保忠武王岳爷爷的神位一个"，配以杨再兴、牛皋、施全。以对岳飞的崇拜代替对关羽的崇拜，明显不同于包括龙华会在内的任何一个会党团体。

第四，《章程》规定的活动范围与《浙案纪略》所载革命协会活动范围相同。《附录》说，拟将各股力量分为五省十路，这五省恰好是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

以上四点表明，现今之《龙华会章程》正是"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镕铸而一之"的"新章"，亦即革命协会的章程。

确认《章程》属革命协会，除它自身外，其他方面也并不乏明证。

1910 年，日本侦探山口升奉派来中国调查革命党、保皇党和会党等各方面情况，回国后写过一份题为《清国形势与秘密结社》[①]的报告书，其第三卷《中清地方》的第三章即为《江南的革命协会》。该章内分五节：《会规十条》、《约章五条》、《入会式》、《新中国军政署职官表》、《五省十路》。《章程》被删节、合并或分割，纳入相应的节内。这一材料说明，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在当时确实是被称做革命协会章程的。



千載有公 繼武義斬 免吞胡虜
咸被八披 覺羅不滅 公日不眠
黃炎遺胄 都四億千 慾藉公靈
逐彼腥膻 国命可復 祀公配天
尚饗

第一誓 誠心入會，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誅地滅。
第二誓 入会以後，協力同心，不敢畏縮，如有畏縮，雷殛火燒。
第三誓 會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
第四誓 崇族懸義，聞命必到，如有不到，命喪五殤。
第五誓 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

岳爺爺英靈聖者。

江南革命协会的入会祭文及誓词（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MT109，北京图书馆藏。

用山口报告书作证明也有其弱点，它没有著录《檄文》。好在《檄文》与《章程》其他部分的联系是紧密的。它开篇就阐发了会名的含义，篇末还署明发布者为“新中国军政省”，即出自革命协会的中枢机关。仅此两点，就表明《檄文》不能与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山口引用《章程》是为充实情报，不是为保存文献，他不引《檄文》，并不能动摇《檄文》在全篇中的地位。

不过，《章程》的主属问题至此并未最终解决。会名“龙华”，发布于“甲辰”，都是《章程》自己标明的，多数论者对此深信不疑。既是1908年的革命协会章程，为何又标上“龙华会”和“甲辰”年呢？个别企图解决《章程》主属问题的论者也在此踯躅不前[①]，因此，要彻底解决《章程》的主属问题，就不能绕过文件自身设置的难关。

其实，《章程》到底产生于何时的问题并不难解决。每一种历史文件都必然留有它产生的那个时间的痕迹，《龙华会章程》也不会例外。关于这点，可以考察《檄文》的内容。

《檄文》说：

> 然而也有一种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列位要晓得“立宪”二字怎么样解法。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却好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

① 此前，魏建猷同志《龙华会和〈龙华会章程〉》一文曾指出关于《章程》主属问题的矛盾。他认为它“可能是革命协会的章程”，但又说其拟定“不迟于1903年”（《文汇报》，1961年10月5日）。赵金钰同志则根据山口报告书断言《章程》自《会规十条》以下为1908年革命协会章程，而《檄文》仍是1904年龙华会文件，它们是时间不同的“两个不同组织的两个不相关联的文件”（《关于〈龙华会章程〉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

这段谈立宪的话,既揭露了搞立宪骗局的清朝政府,也谴责了企望清廷的立宪派和某些外国人。立宪主张在国内抬头,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时。“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之曰: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及至日胜俄败,“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①。这年,有孙宝琦、张之洞、魏光焘、岑春煊奏请清廷立宪。1905年,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载泽等回国后即奏请宣布立宪。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所谓“仿行”,意即照外国样子办。《檄文》既涉及清廷的假立宪,它怎么可能写成于动议立宪之前的“甲辰正月朔日”呢?在预备立宪的名义下,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中央官制,更定了几个部的名称,并增设资政院及审计院,集权于满洲亲贵。次年,开始改变地方官制,7月,颁布外官制,收回了各省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这一切,不正是《檄文》所谴责的“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国的样子,实在是把权柄集在皇帝同几个大官身上”吗?因此,它的写作时间,只能在清朝政府开始实行内外官制改革之后。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口口声声拍满洲人马屁的外国人,同着几个亡心昧理的中国人,居然想望满洲立宪”等语,也是有事实可稽的。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拥护立宪,梁启超、蒋智由等邀犬养毅等八名日本人参加。犬养在会上说:“诸君如以巩固独立、保全领土为前提而研究之,结果不认革命为必要,如立宪党之主张也,则不革命亦可。”②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平刚等冲击会场,打跑了梁启超,张继登台演说。这个犬养,起初表示同情革命派,现又食言而肥,因而,激起革命党人不满,张继曾严词诘问。事后,章太炎又

① 《立宪纪闻》,载《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

② 《立宪党与革命党》,载《政论》第3号,1907年12月。

作《政闻社社员大会破坏状》[1]记其事，并发长论批驳犬养。《檄文》所云，应是隐指其事。

《檄文》又说：

> 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于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将来天下各国，定归还要革命。……虽然成功以后，或是因为万不得已，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虽不定，然而不能传子传孙呢！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也未可知。

这段话一般地反对立宪，无论其为君主为共和，而主张"定为无政府"，显系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它所说的共和立宪，亦即民主共和，这乃是当时革命派的基本政治主张。处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看到欧美各国"贫富不均"，"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社会革命"是决不能免的"，但他认为在中国可以采用"平均地权"的办法加以预防；对共和立宪，则始终坚信。共和立宪作为救国之道，在同盟会成立前后，除受封建统治阶级和改良派攻击外，革命派内部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到了 1907 年，这个主张才开始在内部受到一些人的起劲反对，这些人拥护或倾向无政府主义，自成一个小派别。他们说："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民主，不必论其为立宪为共和，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2]又说："政府之可鄙厌，宁独专制，

---

① 《民报》第 17 号，1907 年 10 月 25 日。

② 《政府者万恶之源也》，载《天义》第 3 期，1907 年 7 月 10 日。

虽民主立宪，犹将拨而去之。”[①]张继在锦辉馆持以批驳犬养毅的，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观点。[②]《檄文》所宣传的，也正是这个派别的观点。同盟会内这个无政府主义派别的出现，是以 1907 年 6 月刘师培、何震发刊《天义》报和张继、刘师培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为标志的。《檄文》的草拟，当然也不会早于这个时间。

檄文还说：

> 单只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分驻扎旗兵，监守着我们。还要我们辛苦田地种出来，养活他们。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归给他们，那狗屁的上谕，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

这里提到的“狗屁上谕”所指为何？稽之文献，甲辰正月之前没有内容相似的上谕，而在 1907 年秋，倒有一通《旗丁改筹生计谕》，中云：

>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其本无马厂、庄田，暨有厂田而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每年约按旗丁十分之一，或十数分之一，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旗

① 章太炎：《官制索隐》，载《民报》第 14 号，1907 年 6 月 8 日。

② 景定成：《罪案》。

丁归农之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期于化除畛域，共作国民，用副朝廷一视同仁之至意[①]。

细究两者，该谕提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派旗兵各地驻防，“绥靖疆域”，《檄文》就指责清朝“为防我们汉人造反，便各处要紧的省分驻扎旗兵”。该谕要求各地方官为驻防旗丁授田购买土地，《檄文》就指责其“近来又想出新鲜法子，要想夺我们的各省田地”。该谕有“时价分购”，旗丁归农后“一切与齐民无异”，“化除畛域，共作国民”，“一视同仁”的说法，《檄文》就指责其“反说是‘满汉平等，时价估买’”。两相比较，可见《檄文》所抨击的“狗屁上谕”，正是这通《旗丁改筹生计谕》。革命党人对这通上谕是很注意的，曾经在《民报》上揭露其反动实质。[②]

以上三处所涉及的时事，均集中于1907年的夏秋，这说明了《檄文》不可能产生于1904年初，《章程》自署的“甲辰正月朔日”，纯系倒填。《旗丁改筹生计谕》颁布于1907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檄文》称之为“近来”之事，可见《檄文》应写于此后不久的1907年冬或1908年春。陶成章说，革命协会“新章”的制定在1908年春夏间，《檄文》自身显示的写作时间是与之相符的。这一点，也是《章程》即革命协会章程的有力证明。

至此，可以进而讨论《章程》标明的会名问题了。“龙华会”亦名“龙华山”，会主沈英(荣卿)，副会主张恭、周华昌，原是终南会骨干。后来终南会首领或死或走，他们便另立了龙华会，时间约在1902年。1904年夏秋间，在浙江联络会党的魏兰结识沈英、张恭，继又引陶成章前往，以发动龙华会响应夏历十月初十日的华兴会长沙起义。此后，龙华会

① 《德宗实录》第五七八卷。

② 《预备立宪之满洲》，载《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25日。

成了光复会联系的一支重要的会党力量。秋瑾组织光复会,“恃以为大本营者,即此会也”。但是,龙华会在光复军失败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后再没有恢复过活动。

龙华会与反清革命运动的关系虽很密切,但从前文举出的例证看,现今的《章程》并不是它的章程,而是多个会党联合的章程。那么,这样一个章程为什么又标上龙华会的名称呢?不妨看两段材料。

山口报告书说:

> 于是,陶成章、沈英、张恭等首倡者即联合归国留日学生等,纠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在杭州召开大会,统一各会党结为一团,建立一个名为龙华山汉族同登普渡堂革命协会的组织。

《中国秘密社会史》说:

> 于是,有陶成章、沈英、张恭等,倡议于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之头目,开一大会,打作一团,名龙华会。

比较之下,两条材料,译笔虽异,内容文字却基本相同,这至少可以估计它们是出自同一个原始资料。唯一较大差别,仅在于会名。但通过这一对比,就可以明确问题所在了。第一,平山所说的“龙华会”,虽有浙江龙华会首沈英、张恭介入,但按其内容,却正是山口说的革命协会,而非浙江龙华会。《龙华会章程》系这段文字的附录,它理应是革命协会章程,当无疑义。第二,关于会名,山口报告书显然是照所据原始资料移录的,记载的是全名,而《中国秘密社会史》却由于作者方面的原因,不顾会党名称有会名、山名、堂名的区别,给变成了“龙华会”。误植的

会名和倒填的时间,不经考察,被轻易地联系在一起,便酿成一件疑案。

附带还可以指出,山口、平山都没有说明革命协会倡议的时间,其原因可能在于无法解决《章程》自署时间和协会实际倡议时间的冲突,只好回避了事。山口不著录《檄文》,很可能也出于此因。

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下一个结论:现今之《龙华会章程》,实即1908年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协会章程。《章程》自署年月是有意倒填的。

《龙华会章程探微》的第一部分,与王学庄合作,原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一

辛亥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桩轰动一时的公案，即章太炎与清朝两江总督端方的关系问题。

1909 年冬到 1910 年初，在陶成章、李燮和、章太炎等发动对孙中山的攻击之后，香港《中国日报》、巴黎《新世纪》等报刊先后公布过章太炎给刘师培、何震夫妇的五封信。据此，《新世纪》断言章太炎已经被端方收买："此即太炎先生得金之清单。玩'摊年过久'一语，必指十年八年而言，又玩'岁不过千余元'一语，即可推其总数，大约万金。万金出卖一革命，至为便宜。"[①]《中国日报》则进一步宣称："据最近布告，言章与直督（端方后由两江调直隶——笔者）幕员刘光汉和好如初，且受端方委托，担任解散革命党及充常驻东京之侦探员。"到清朝灭亡后的 1912 年，章太炎倒向袁世凯方面，同盟会会员主持的上海《民权报》便重新发表了这五封信中的四封，认为是"以万金出卖革命党之一篇大罪案"[②]。该报说："本报攻击章者，在昔则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

---

① 《党人》，载《新世纪》第 117 号。

② 《章炳麟之丑史》，载《民权报》，1912 年 5 月 4 日。

革命黨の早替り

雜誌民報の主幹なりし章炳麟氏ハ今回革命黨との關係を斷ち僧侶となりて北京政府の爲めに盡力すべく張之洞氏に對し湖北出身の密偵某を經て右運動費を請求せりとの報あり

日本《万朝报》所登章太炎“背叛革命”的消息

（采自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黄，排斥同盟会。”①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到底怎样呢？搞清楚这一问题，对于研究章太炎、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以至辛亥革命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为了便于考察并方便读者，现将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的五封信及何震所加注解节录如下：

致何震函一（以下简称函一，余类推）云：“近想安抵沪上”，“所托诸事，务望尽力”。末署：“兄麟顿首。”

何震注解说：“此信无甚关系，惟观‘所托诸事，务望尽力’二言，则凡运动张之洞诸事，皆包括其中矣。”

① 《正告〈神州报〉》，载《民权报》，1912年5月7日。

致何震函二云："闻妹将赴金陵，想近日已在途也。……刘、卞二处消息何如？幸告。"末署："兄麟顿首。阳十一月二十五日。"

何震注解说："刘、卞二处。刘即□□□姊，系章下狱后，刘允月贴二十金，至今未交者也。卞即前长崎领事卞綍昌，张之洞之女婿。彼于去岁八月致函张之洞，誓言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且言中国革命决难成功，若赠以巨金，则彼往印度为僧。书为申叔所见，始知彼与官场有往来。及我返国，彼知吾兄何誉生与前长崎领事卞綍昌亲善，彼为张婿，故嘱我往长崎访之，使再致书于之洞。"

函三云："四、六君鉴：二十九日接得手示，知四弟在船甚苦。……四弟既不往宁，在沪交涉亦善。前书言恐有枝节，愚意可密致杨仁山书，令其转圜。"末署："毛一顿首。十二月三十日。"

何震注："四君、四弟，均刘申叔也。六君即何震也。毛一，章自称也。……杨仁山者，池州杨文会也，以通佛学闻，南京官场多敬之，故彼欲嘱何致书于彼，请其向江督为彼乞恩。"

函四云："黄、叶亦无他语，惟已明知四弟到沪，在外喧传，黄更知兄欲出家。前数日有周尊者，自上海来信云：'闻黄抱香语，公欲出家。'则此事已稍漏泄矣。运动之事，想二子无不周知。"

何震注："黄者，湖北人黄抱香也；叶为黄友，浙江人，忘其名。黄见章不做《民报》，将疑彼无心革命，在东京对人宣言，故彼畏之甚，疑其尽知彼事。又叶为邻人，知申叔返沪，故信中言'运动之事，想二子无不周知'也。"

函五云："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赖，亦无如何，以留学官费证之可见。要之不以意气相期，尽力磋磨，亦无益也。弟若转圜，当要以先付三分之二，不则二分取一，如

或未能，当面回复。此则当令六弟任之。"末署："兄毛一白。阳三十日。"

何震注："此信最有关系。何接彼第四信，复致书于彼，故为疑问之词，谓'将付领巨款欤，抑至印后按月支款欤？请示明，以便开交涉'。彼乃以此函相答，反对按月支款之说。章甫者，端方也。"

要考察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首先要考察这五封信的真伪。

二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五封信是假的。笔者认为，何震的注解虽未可全信，但这些信却是真的。

不妨先就这五封信的本身作一番考察。

五函署有月日，未标年份，它们是哪一年写作的呢？何震注云"黄见章不做《民报》"，《新世纪》也说："彼时乃忽辞《民报》编辑之任，即在作此五书之时。"按，章太炎确曾一度辞去过《民报》编辑人的职务，《民报》第18期《启事》云："本社总编辑人章君炳麟因脑病忽作，不能用心，顷已辞职，今仍请张君继续接续主持。"该期印刷于1907年12月24日，显然，五信即作于这一日期前后的一段时间内。

信的年份明确了，对它的考察就方便了。

首先，应该检查一下收信人的行止与信的时间、内容有无冲突。

刘师培夫妇是1907年2月去日本的。当年12月前后，他们是否离开过日本呢？这年12月4日，苏曼殊在上海致刘三书云："顷须俟剑妹（何震号志剑——笔者）来，方能定日东行。剑妹十五日回乡，云一周

可返，今逾半月未来，殊悒悒。”[1]可见当时何震不仅已从日本回到上海，而且又从上海回了“乡”。同信又云：“申公有意明春返居沪渎。”可见刘师培当时还在日本。不过，刘师培不是到次年才返沪的，据柳亚子回忆，1907 年冬天，他就曾在沪与刘氏夫妇及其他友人聚饮，并留有当时作的诗和摄的相片。[2] 到 1908 年 2 月 26 日，苏曼殊在日本致刘三书云：“申叔伉俪西来。”[3]可见刘继何之后，于 1907 年冬也回国了，到次年 2 月，又一起再到日本。上述五函中，前二函单独写给何震，后三函写给刘、何二人，其所署月、日，均与何震、刘师培当时的行程、活动状况相吻合。

其次，应该考察一下五信的基本事实。

何震在注中说，“赠以巨金”，章太炎就到印度为僧。函四中，章太炎也有“黄更知兄（章氏自称——笔者）欲出家”之语。这一时期，章太炎是否有过类似的念头呢？

1907 年 6 月 28 日苏曼殊致刘三书云：“衲今后决意与太炎先生同谒梵土，但行期尚不能定。”[4]

同年 11 月 28 日苏曼殊致刘三书又云：“前太炎有信来，命曼随行，南入印度，现路费未足，未能预定行期。”[5]

同年章太炎赠苏曼殊照片题词云：“当于戊申（1908 年）孟夏，披剃入山。”[6]

---

① 《苏曼殊全集》第 1 集，199 页，北新书局，1931。

② 《南社纪略》，8 页，开华书局，1940。

③ 《苏曼殊全集》第 1 集，202 页。

④ 同上书，335 页。

⑤ 同上书，197 页。

⑥ 《越风》第 18 期。文中云，该相片是其“三十九岁所造影象”。章生于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十九岁生日应在 1907 年 1 月中旬，故应作于是年。

1916年章太炎《致许寿裳书》回忆云："梵土旧多同志，自在江户，已有西游之约。"①

章氏弟子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云："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②

综上可见，章太炎在1907年确曾计划去印度做和尚，并为缺乏路费所苦。

1906年章太炎到日本后，逐渐和孙中山发生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深刻分歧。1907年上半年，这种分歧通过孙中山离日时接受日本政府赠款和钦、廉起义购买日械等问题尖锐地爆发了出来，黄侃所谓"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应指此。想去印度做和尚，也应在这个时候。这一时期，章太炎自称"震旦优婆塞"③，以示其皈依佛门之意，也是一个旁证。

章太炎是否曾通过刘师培夫妇从端方那里取得去印度当和尚的费用呢？

在刘师培秘密写给端方的一封信中有关于章太炎的一段话，原文如下：

>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彼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

---

① 《制言》第25期。当时章太炎再次准备去印度学佛，"以维摩君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

② 《制言》第41期。

③ 《梵文典序》，载《天义报》第6卷。优婆塞，梵语。《涅槃经》："归依于佛者，真名优婆塞。"

> 即偶有讲演，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于有负于明公。惟此事宜露于外，则革命党人或对彼潜加暗害，所谓爱之者害之也。《论语》有言："君子成人之美。"尚祈明公之力践此言也。①

该信向端方表示"大恨往日革命之非"，并献"弭乱之策"，实际上是一封叛徒的自首书。通过这封信，刘师培和端方勾搭成功，成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内奸。

这封自首书与章氏五函有其相通之处。

第一，此信提及章氏"近且辞《民报》编辑"，可知写于1907年12月或稍后，正是刘师培从日本回到上海之际。章氏函三写于是年12月30日，中云："四弟（刘师培）既不往宁，在沪交涉亦善。"时、地、人、事均合。

第二，章氏五函系托刘氏夫妇向端方谋求在印度为僧款项，此信向端方明白地将此问题提出了。特殊之处仅在于刘的"交涉"是以替端方策划并为章太炎乞怜的方式提出的。这样提出问题，很符合其叛徒身份。他既替端方物色到一个理想的策反对象，也等于自己献上一份可观的觐礼，还替老朋友办了事。

第三，章在函四中警告刘、何："此事已稍漏泄矣！"此信也警告端方："此事宜露于外，则革命党人或对彼潜加暗害，所谓爱之者害之也。"秘密进行以保全章太炎的态度是一致的。

---

① 天津《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建国月刊》第12卷第4期。

第四，争执的付款方式是同一个。此信向端方提出的“按月支给”，正是章太炎在函五中极力予以反对的付款办法。据何震注，何接第四函后，先写信问章“将付领巨款欤，抑至印后按月支款欤？请示明，以便开交涉”。于是函五才反对按月支款，要求刘去“转圜”，争取先付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

此信与章氏五函为什么有这些重要的相通之处呢？合理的解答应该是，它们是同一桩事在不同场合留下的文件。不然，就不容易解释此信中的这种情况：刘师培向端方比较真实地介绍了章太炎与孙中山的矛盾，却抹杀了章当时的革命活动，所谓想“消弭种族革命”，文章“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讲演“亦系党人迫彼使为”等，均非事实。这种曲笔，无非是要让端方相信对章太炎可以“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痛快地拿出钱来。如果刘师培心中无底，一旦端方给了钱，章拒不接受，甚至予以揭露，那么，内奸的面目不就要暴露了吗？显然，他敢于预支章“决不至于有负于明公”的保票，就是因为他是受章太炎的委托来“交涉”的。这封自首书的存在，证明了章太炎确曾通过刘师培向端方处活动，同时也证明了章氏五函是真的。

这封自首书是1934年偶然发现的，据有关线索判断，它是从端方家中流散出来的。事后不久公布的章氏五函容易招人怀疑，这封自首书的真实性却不好轻易否定。刘师培虽然号称“才子”，他也不可能在编造假信之前，就预先递一份与之呼应的信给端方，并使之留传下来，以便在后人讨论此段公案时继续作伪。

其他方面的材料，也有力地证明了章氏确曾向端方谋款。

1909年10月，当东京的革命党人因章太炎和刘师培的来往而指责其为“侦探”时，据陶成章说，章太炎“已有《辩书》一纸，将以付印”，这份《辩书》到底付印了没有，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其内容从陶成章稍后的《致柱中、若愚》手札中却不难窥知。陶成章说：“太炎作和尚之意实

有，至侦探，断断无之。彼居东京，每日讲学，所出入者止学堂，何有官场特派员？昭昭在人耳目，诬妄太炎先生无益也。”柱中就是李燮和，在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中和章太炎、陶成章是站在一起的。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连自己人都发生怀疑，说明对方提出的证据相当有分量，以致陶成章不得不出面保证：“至侦探，断断无之”，而于“作和尚之意”，不能不承认“实有”；至于与之密切相连的通过刘师培夫妇向端方谋款一事呢，则未置一词，不加否定，实际上采取了承认的态度。陶成章当时在东京与章太炎朝夕相处，立场完全一致，他对李燮和的上述说明当然也反映了章太炎的态度。它表明，如果章太炎确有一份《辩书》的话，所“辩”者也只是并非“侦探”，而没有否定通过刘师培夫妇向端方谋款这一事实。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前文谈到，1912 年上海《民权报》大骂章太炎时，曾重新发表章太炎致刘氏夫妇五函中的四函。事隔一日，5 月 5 日，上海《民声日报》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说明情况称：

> 初，日人有汉字统一会之设，而张之洞亦赞成之。章氏曾为一文，揭诸《民报》，盛致讥评张氏之意。张氏于文学极自熹，闻章氏非之，思所以自解者，令其婿卞某托刘申叔代达殷勤，谓每年愿致千金，而章氏多所要索，卞某不敢应，以语端方。端方固惎章甚，以为可以术致章氏归国而后除之。章氏知其狙诈，则愈为谰言相弄。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

该文认为，《民权报》所发表的章氏四函“并无卖党之证”，“谓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则诚有之，夫以术取清吏之财者，革命党中宁止一章氏，要之非穷凶极恶，罪在不赦者也”。该文明显地替章氏辩护，但承认“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则诚有之”。《民声日报》是一家拥护袁世凯、吹捧章太

炎的报馆。它的主笔黄侃1908年以后成为章太炎的弟子,处处以维护乃师尊严为己任。上海《天铎报》发表过对章"不敬"的文字,黄侃便把该报主笔之一的柳亚子找去,"铁青面孔"责问,要柳脱离该报。[①] 试想,如果章太炎根本没有通过刘师培和端方发生过关系,黄侃怎么能让本报"记者"作出这种答辩来呢?这个"记者"不是别人,应该就是极端熟悉章太炎东京生活的黄侃自己。

上海《神州日报》也是一家拥袁捧章的报馆。它的主笔之一汪允中和章太炎同为俞樾门生。对于《民权报》刊载的章氏函件,它同样不敢否认,5月6日该报社论说:"其事之有无,姑不置辩。"又说什么"小德出入,尽人难免",意思是这只是"小德"!5月8日,该报又发表文章说:"夫章原书中有一字涉及党人事实否?如以设法取人金钱即指为卖党之证,盖党人流离奔走时,其设法自济者多矣,某报可谓其人皆卖党乎?"这篇文章进而承认了事实,但"小德"问题也没有了,而是"设法自济"。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致刘师培、何震五函是章太炎的亲笔。曼华《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说:"刘申叔夫妇,以居东京备受党人冷淡,亦相偕遄返国门,投效于满吏端方。申叔抵沪时,且遗书黄廑午、林广尘、汤公介等,诋章枚叔曾致函端午桥,由刘妻何震转交,要挟巨款二万,即舍革命而不言,往印度为僧以终其身云。内并附章氏关于此事之手书真迹照片,廑午等一笑置之。"[②]此文是根据汤增璧的回忆写成的,汤增璧即汤公介,他是《民报》社职员,章太炎的友人。这段回忆虽有其失真之处,但关于章氏手书照片的说法应是可信的。刘师培散发的这份真迹照片,正是日后《中国日报》等报刊揭露章太炎的依据。1909年12月,因为美洲华侨受了陶、章攻击孙中山的影响,对孙中山的感情

---

① 《南社纪略》,47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二),446~447页。

“大不善”，为了廓清影响，顺利开展在美的筹饷活动，孙中山曾写信给吴稚晖，要他将“刘光汉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与弟用，以证明太炎之所为，庶足以破其言之效力”①。随后，这份真迹照片就影印刊登在美国《美洲少年报》上。

1912年，当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听说袁世凯要委任章太炎任“国史院长”时，曾发表通电说：

> 章炳麟前乞充满奴端方侦探，泄漏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尚存本处。今闻拟委国史院长，如此重大事件，付诸佥壬之手，势必颠倒是非，摇惑万世，誓不承认。②

可见，这份“笔迹照片”辛亥革命后还保存着。

章太炎不是谦谦君子，他不会容忍任何人对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可是对于这件事，除了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份《辩书》外，他没有作过任何公开解释。这种异样的沉默只能说明其中有难以否认的事实。

基于以上种种理由，笔者肯定章太炎致刘师培、何震的五封信是真的。

三

那么，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到底怎样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上述五函真伪问题的考证中实际上已可窥见其

---

① 《总理全集》第3册，《函札》，111页，成才近芬书屋，1944年7月版。

② 《民权报》，1912年5月11日。

大概:章太炎确曾通过刘师培、何震夫妇跟端方联系,联系的中心问题是要端方给章太炎以去印度做和尚的经费,而章将从此脱离革命。刘师培在叛降端方时,向端方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章、端之间联络交涉。章氏致刘氏夫妇的信,就是这种活动的记录。

在脱离革命去印为僧的背后是否还有更隐秘的政治交易?作这种指责的人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笔者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从章太炎的思想和性格看,他也绝对不会干这种事。但是,没有这点,并不能否定章太炎向端方运动经费是一个难辞其咎的错误。端方是镇压革命最力的满洲贵族之一,革命派恨之入骨。章太炎在和孙中山闹翻之后,去和这样一个人物发生关系,无怪乎事实公开后舆论大哗了。

这里,必须进一步考察的是章、端之间关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

1912 年 9 月 8 日,北京《民主报》刊出该社职员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与章太炎很熟的革命党人[①],文中说:章"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运动,每月得其乾修二百两"。这条材料值得重视。前文提到,端方"资助"章太炎赴印度为僧的钱应怎样付给,刘师培提出的方案是"按月支给",而章太炎不同意,认为按月支给不可靠,钱也太少,必须在总数中"先付三分之二,不则二分取一"。这条材料所说的每月二百两银子,显然是一种折中方案,它既维持了"按月支给"的付款原则,又将实数提高到章氏所不愿意的"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的一倍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章太炎曾否接受了这份"乾修",按作者文章,章太炎是接受了的。但是,这一方案并没有解决去印度的路费问题,章太炎并非谋衣谋食者流,显然不会接受。作者所述,当系出于传闻。

此后,这种关系有无进展?因为得不到直接材料,只能从别的方面

---

① 此人在东京曾见章太炎以脸盆"遥击"黄兴,又曾遇黄侃于途,"道太炎近事,为之咨嗟,太息不置"。

考察。章、端之间以刘师培做中间人，章、刘关系可以反映出这个问题。1908年2月，即章太炎写了第五函的次月，刘师培、何震即回到东京。刘师培返日后，一面继续以“革命”的高姿态大唱无政府主义“高调”，一面暗中做侦探，向端方密报革命党人动态。这时，章太炎与刘、何关系很好，与两人同住于麴田区饭田町，同在名为研究“社会主义”，而实为宣扬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上做演说。但是，不过两个月，章就与两人大吵特吵起来，只好搬回《民报》社，自此，刘、何与章反目成仇，何震表弟汪公权甚至宣布要和章太炎“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们之间为什么突然决裂呢？双方事后都没说明真实原因和细节，我们不能妄测这次冲突与章、端关系有关。但可以肯定，处于这种境况，由于失去中间人，章、端关系也就无法继续和发展下去了。

不过，事态并未到此为止。1908年4月27日，广州《国民报》刊出一则题为《章炳麟出家》的“活剧曲”，中云：

> （同志扫板唱）章炳麟抛却了、平生抱负。（慢板）眼见得汉人中、少个帮扶。披袈裟，坐蒲团，不顾宗祖。纵不念、众同胞，该念妻孥。况且是、我支那、蹉跎国步。望同志，抱热心，休作浮屠。
>
> （章炳麟中板唱）……因此上，除却了三千苦恼，逼着我请个高僧来到东京披剃头毛。我非是、主持厌世遁入空门爱栖净土，我国人莫予肯谷故把禅逃，从今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入沙门，参佛祖做贝叶工夫。

这篇戏文的史料价值，在于它反映出章氏出家消息传播之广，及革命党人对此的态度。戏文批评章“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态度是善意的、诚恳的。对此，章太炎没有反应。紧接着，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又刊出了一则《炳麟启事》：

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章炳麟白。

这里，除了去印度一节外，脱离革命和出家似乎都将实行了。但是，章太炎却在6月9日出版的《民报》第21期刊登《特别广告》，予以否认：

仆于阳历五月二十四日赴云南独立大会，仆归后即不见印章一方，篆书：章炳麟印。知是侦探乘间窃去，以后得仆书者，当审视笔迹，方可作准。

再，近有人散布匿名揭帖，伪造仆与锡良之电报，又有人冒名作信，在上海《神州日报》登《炳麟启事》一则。其散布匿名揭帖者，查得是山西宁武县人，其冒名告白，尚待调查，合并声明。

这则《广告》戳穿了前述《启事》是伪造的。它的伪造者是谁呢？这则《广告》中提到了“散布匿名揭帖”的是“山西宁武县人”。当时，在东京的“山西宁武县人”中，确有人信奉无政府主义，与章太炎不睦，并与刘师培关系密切。章太炎声明已经“查得”，但没有点名。至于“冒名告白”的作者，章氏只表示“尚待调查”，没有公布结果。实际上，也只有刘师培一伙才会干这种勾当。

这是因为：章太炎找刘、何替他跟端方拉关系，使刘师培、端方都觉得有油水可捞，因而刘替章打了保票，狡猾的端方虽不肯将巨款轻易付人，也还是出了高价，可是，章太炎居然食言——虽然在那里醉心佛学，

梦想“扶掖圣教”，请了一个名叫密尸逻的印度人在那里教梵文[1]，但是，并没有去印度，而且，仍然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倡导“排满”。这样，刘师培当然无法向他的主子交代了。情急无奈，只有不择手段，伪造一个启事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来，好让端方看到，说明他刘师培已经完成了任务。

总之，在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关系破裂以后，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也就无法存在了。1908 年 10 月，日本政府在封禁《民报》的同时，也封禁了刘师培的《天义报》和《衡报》。11 月，刘师培回国，继续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上海招摇撞骗。此后不久，他即将章氏五函由何震加注说明后寄给黄兴等人。这一事实，说明端、刘的策反计划已经彻底破产，只能利用这五封信搞臭章太炎，在革命党人内部制造猜疑和矛盾。

章、端关系曾达到何种程度，如何结局，至此已比较了然了。前引《民声日报》的文章说：“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这应该是可信的。

末了，附带谈一谈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情况的形成当然与章太炎此举本身的严重性分不开，同时，也和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加剧有关。

在刘师培回国后不久，《民报》社发生纵火案。紧接着，又发生毒茶案。纵火、下毒的主犯都是刘师培的同伙汪公权。1908 年 12 月，江、浙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划起义，刘师培将这一情况密报端方，党人张恭被捕，刘师培一伙的叛徒身份因而逐渐暴露。此后，刘即投入端方幕中任“文案”。1909 年 8 月，端方调赴直隶，上海报纸发表了随员名单，其中就有刘师培。这样，刘师培的叛徒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在此之后一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联络少数人，发布了一份所谓《七省同盟会员意见

---

① 杨仁山：《等不等观杂录》卷八。

书》，诬陷孙中山吞蚀华侨巨款，借革命肥家，陶并亲自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同年10月，《民报》秘密在日本筹备复刊，章太炎又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陶、章二人肆意破坏团结，声势咄咄逼人，迫使孙中山、黄兴等不得不回击，以挽回影响。尽管陶成章是组织和发动这场攻击的祸首，章太炎却因旧日声名及其同孙中山的长期矛盾而风头最健。于是，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被正式提出来了。

双方的激烈情绪是可以想见的。在抨击章太炎时，像吴稚晖那样断言章已经出卖革命，显然夹有个人恩怨；他人断言章背离革命，沦为侦探，不是意气用事，便是由于情况不明。章太炎和刘师培有过那样一段极为密切的关系，又有这样五封信，当时，人们无法弄清全部情况，把章、端关系估计得更复杂些并不奇怪。在我们考察这桩历史公案时，对于双方过头的话，都应根据可靠史实予以订正。

关于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笔者已在《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中予以讨论。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同盟会内部日常事务和人事上的冲突是由于在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上存在分歧而引起的。但是在斗争开展之时，这种分歧并没有被提出来展开应有的思想斗争，反而被个人的攻击所掩盖。这种现象也是当时革命派政治上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们在观察同盟会内部的斗争时，不应被一些热闹事件所迷惑，忽略了背后的主要分歧，也不能认为这些事件都不值一提，把它与背后的分歧看成截然两回事。这样，都无法掌握同盟会内部斗争的全貌。

原载《南开学报》，1978年第6期

〔附记〕本文发表后，有人赞成，有人怀疑。1979年，曾业英同志发现了章太炎复浙江统一党支部的一封信，为本文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其

争遂息。今录章函如下：

浙江统一党支部鉴：电悉。同盟南北诸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而端遂欲致之鼓山（福建）、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对敌之言，自有开合张弛，同盟会人遂云仆作侦探，然则黄兴出洋留学，亦端方特与官费，其侦探耶非耶？同盟会业成而〈归〉者，亦多仕宦，或为将弁、幕府之属，其侦探耶非耶？诬人之言，以〔心〕所不可。《天铎》、《民权》诸报，市井丑谈，未脱南洋、美洲口吻，夫何足致辩哉！肃此敬复。章炳麟白。

《越铎日报》，1912年6月6日

附: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1908 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太炎“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尚,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刘师培所见,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绋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与刘师培的妻子何震有亲戚关系。章太炎要求何震通过卞绋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款三万元,两万作为自己赴印度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赴长崎时,卞绋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要她与卞绋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信告诉章太炎说:“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脑病忽作,不能用心”,辞去《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刘师培,要求经由卞、杨转示官场。信中,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声言“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

根据有关史料和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刘师培的这封举报信大体属实。1907 年,同盟会东京总部发生严重分裂之后,章太炎确曾一度想去印度做和尚;为此,他也确曾企图通过刘、何向张之洞和端方谋款。只是,刘师培没有将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和盘托出,而且隐瞒了他写这封信时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大凡激烈得出奇的人堕落起来也常常出奇。刘师培、何震都曾是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风头十足的人物。1907 年春夏，他们忽而宣传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贿赂”，要求打倒孙中山，改选同盟会总理，忽而觉得孙中山号召的民主革命不够彻底，提倡“无政府革命”。但是，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何震回国和端方拉上了关系；紧接着刘师培也跟着回国，向端方自首。他们给端方的见面礼之一，就是提供了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想去印度做和尚的情报。在《上端方书》中，刘师培说：

>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彼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以后，决不至于有负于明公。

端方见到此信后，当然很高兴。能够将章太炎从革命队伍中拉出来，岂不是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不过，此事终于没有办成。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领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他在复刘师培信中说：“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指端方——笔者）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赖，亦无如何。”其二是端方不愿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这一点当然不

能为章太炎所接受。

交易没有成功，刘师培夫妇于1908年春又回到东京。章太炎不了解他们向端方自首的秘密，仍然友好相处，三人同住在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这场争吵的原因和经过目前还不能很了然，只知道章太炎在《日华新报》上撰文揭露了刘氏夫妇，刘氏夫妇则将章太炎的"劣迹及往来书信"汇编成册，准备公布。其后，刘师培夫妇曾聘请日本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为人劝阻后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将章痛打了一顿。

1908年11月，刘、何二人再次回到上海，旋即出卖了同盟会会员张恭。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同盟会总部，揭露刘已堕落为"侦探"，而刘师培则反唇相讥，写信大骂章太炎。为了在革命党中制造猜疑和纠纷，并向当时主持同盟会东京总部的黄兴等人写了上述举报信。

黄兴接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人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宗旨不定"，决议以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但同时认为章太炎向端方谋款，属于"私德"，其性质为"误入歧途"，决定严守秘密，不予宣布，希望章太炎能有"反省"回头的一日。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属于对抗性矛盾，章太炎因同盟会内部矛盾而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谋款，想去印度做和尚，此举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也还不能视为"叛党"，黄兴的判断和处理大体上是正确的，有水平的。由于他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

原载《团结报》，1989年9月12日

附：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前文谈到，刘师培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此事就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1909 年 9 月，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三种十二项，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当时，孙中山正派汪精卫到东京复刊《民报》，没有让章太炎与闻其事，章太炎一怒之下，散发了名为《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不仅攻击复刊的《民报》为“伪”，而且大肆攻击孙中山经济上贪污、政治上卖国。《检举状》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作贼耳。”这下子，乱子就闹大了。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发布对革命党人的威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1 月 6 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全文刊登了《检举状》，改题为《请看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编者以无限轻蔑的口吻表示：“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

开始时，黄兴仍然比较冷静，他在《民报》第 26 号上刊登了一份告白，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没有采取其他动作。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的部分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决定公布刘师培的举报信。1909 年 11 月，举报信以《刘光汉致黄某

手简》为题在神户《日华新报》刊出，该报不仅加了“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之铁证”的大字标题，而且加了按语，按语说：

> 革命党章炳麟到东以来，主持《民报》，颇为该党所欢迎。本报亦以其国学大家，殊器重之，是以章氏来函，无不为之宣布。初谓章炳麟倡言道德者，必不作欺人语也。顷得革命党刘光汉(现在北洋总督衙门充当幕友)致该党黄某一函，披阅一过，令人发指。章氏日言道德，而其个人之道德则如是！呜呼！章氏休矣！己不正而欲正人，一何可笑之甚耶！说者谓章刊“伪《民报》”传单，为图归国地步。本社已得章炳麟背叛该党之亲笔函六纸，当付手民，刊成铜版，刊登报端，以告东京学界，毋再以章先生为道德家。

这份按语不仅指责章太炎“叛党”，而且全面否定章太炎的品格，暗示章太炎将离日返国，投顺清政府，问题被说得比刘师培的“举报”还要严重。这一时期，黄兴也致函章太炎，责以“晚节不终”，提高了批判调子。

11 月下旬，同盟会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以“东京访函”名义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一文，进一步宣称：“章近致书直督幕中刘光汉，重申前约，愿和好如初。目前刘已派委员到东京，与章交涉革党事，谓端午帅令其解散革党，事成许以重利，现章已允尽力担任云。”按此文的说法，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就不只是为了取得做和尚的路费，而是发展为因重利而出卖革命了。同日，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布章太炎已接受端方委任，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该文指责章太炎为“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这样，章太炎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了。

除了和端方的关系外，章太炎和清朝贵族良弼、铁良的关系也被提出来了。《公益报》发表的“粤中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章太炎“内资

竖子良弼，以夤缘于铁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情节，但问题也是够吓人的。

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时，孙中山正在英国。11 月，他到达美国，得知有关情况，曾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杂志上下一“公评”。12 月，他得悉《检举状》已在保皇党的报纸上发表，更为恼火，致函吴稚晖说：“如此则太炎欲破坏党势之心已不留余地，想不日美洲各保党报必有照登，不可不有以抵之。”为了抵消章太炎《检举状》的不良影响，孙中山要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其后，这些照片就经孙中山之手发表在《美洲少年报》上。1910 年 1 月 22 日，吴稚晖在《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章炳麟之得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至此，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就从日本、香港、南洋传到了美洲和欧洲，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重要新闻。这大概是当初刘师培写“举报信”时所始料未及的。

如前述，章太炎为当和尚而向端方谋款，确是事实，但是，所谓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得金出卖革命”云云，均属无稽之谈。它可以喧腾一时，但终究不能取信于人。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它就逐渐沉寂下来了。

原载《团结报》，1989 年 9 月 16 日

附:刘师培举报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在1909年末至1910年初喧腾了一阵子,其后就沉寂了。不想到了民国初年,旧事重提,再度喧腾起来。

首先重提此事的是夏重民。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建都之争。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了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出来,主张建都南京,而章太炎则主张迁就袁世凯的意见,建都北京。1912年2月29日,夏重民以重公为笔名,在上海《天铎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咄咄侦探,亦有谈国事之资格乎》,该文说:"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所说的"某社长",当然是指曾经担任过《民报》社长的章太炎。同日,夏重民并在该报发表致旅津商人崔文藻书,内称:"章某运动当端方侦探亲笔迹,弟等前已拍诸照片,至今尚存敝处。如公等不信,请来沪一看,方知余言之不谬。"

紧接着,《中华民报》于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国之文妖》,指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假手于卞绋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端方,同受虏廷之馈遗",自此,"冷高人之齿,而寒志士之心"。

继《天铎报》、《中华民报》之后,戴季陶也在《民权报》上著文,由指责章太炎而发展为大揭章太炎的"老底",并与《民声日报》、《神州日报》展开笔战,从而形成了又一次反章热潮。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对同盟会持反对态度,而对袁世凯的印象却相当不坏。1912年3月,他组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的统一党,4月下旬到

达北京，昏头昏脑地发表了若干攻击孙中山、黄兴的言论，并为袁世凯出了一些主意。5月2日，戴季陶发表文章，指责章太炎"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3日，拥护章太炎的上海《民声日报》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赞扬章太炎"尽忠民党"，"为民国魁垒耆硕之儒"。4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刊出《章炳麟之丑史》一文，该文引录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四函，作为章"以万金出卖革命"的罪证。5日，《民声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该文说明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等人的关系是：

> 初，日人有汉字统一会之设，而张之洞亦赞成之。章氏曾为一文，揭诸《民报》，盛致讥评张氏之意。张氏于文学极自熹，闻章氏非之，思所以自解者，令其婿卞某托刘申叔代达殷勤，谓每年愿致千金，而章氏多所要索，卞某不敢应，以语端方。端方固惎章甚，以为可以术致章氏归国后除之。章氏知其狙诈，则愈为谰言相弄。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

该文认为，《民权报》所发表的章氏四函"并无卖党之证"，"谓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则诚有之，夫以术取清吏之财者，革命党中宁止一章氏，要之非穷凶极恶，罪在不赦者也"。当时，章门弟子黄侃任《民声日报》主笔，此文可能即出于黄侃之手。

为章太炎辩解的还有《神州日报》。5月6日，该报发表《正告同业》一文，批评戴季陶和《民权报》。该文说：

> 章炳麟者，实革命之先觉，文学之泰斗也。今某报亦痛骂之，并揭其往昔之隐事，其事之有无，姑不置辩，而某报犷悍之言，实不免有伤忠厚。

该文并称："昔之主张革命者，唯一之目的是在革命，小德出入，尽人难免。"

戴季陶不理会《民声日报》和《神州日报》的解释与反批评，于6日、7日连续发表《非民声之〈民声报〉》及《正告〈神州报〉》两文答辩。他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宣称："本报攻击章者，在昔则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黄，排斥同盟会，何能谓为小德？"

正当双方激烈笔战的时候，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国史院长，主修民国史，于是，又引起了同盟会广东支部的愤慨。该部发表通电说："章炳麟前乞充满奴端方侦探，泄漏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尚存本处。今闻拟委国史院长，如此重大事件，付诸佥壬之手，势必颠倒是非，摇撼万世，誓不承认。"

大概是这一类的文章、电报多了，而且都言之凿凿，因此，连章太炎自己的统一党党员也怀疑起来，浙江统一党支部就曾致电章太炎询问，6月6日，绍兴《越铎日报》刊出了章太炎的复电，电称：

同盟南北诸报皆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实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道其原委。仆自抵东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后，不敢请通，私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

此电承认了为去印度做和尚而向张之洞、端方谋款的事实，也说明了终于不成的原因："端遂欲致之鼓山(福建)、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至于所谓"侦探"云云，章太炎愤愤地指出：这是"诬人之言"。

章太炎的这封复电，除了在和刘师培的关系上有所隐讳外，关键之点大体说清楚了，但是，由于《越铎日报》是小地方的报纸，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到这封电报。

1912 年 9 月 28 日，北京《民主报》上又出现了一篇题为《讨民贼章太炎》的文章，指责章太炎有七条罪状：其一是"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亲笔手札，千金赏酬，久已揭载报章，摄之影片，真凭实据，人所共知"；其二是"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之运动，每月得其乾修二百两"。当月 12 日，黄兴、陈其美人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参加，但章太炎不仅不参加，而且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攻击黄兴、陈其美为"匪目"，因此，《民主报》便反唇相讥了。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确有若干不妥之处，加以批评是可以的，但是动辄揭"老底"，扣以一顶"端方侦探"的帽子，也未必妥当。如果说，在章太炎散发《伪〈民报〉检举状》的时候，把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想得严重一点，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经历了三四年之后，仍然危言耸听，靠一顶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帽子"来搞臭章太炎，那就真的"有伤忠厚"了。

原载《团结报》，1989 年 10 月 3 日

何震揭发章太炎
——北美访报录

1907年至1910年之间，同盟会内部发生矛盾，陶成章、章太炎等对孙中山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同盟会中的拥孙派则进行反击。当时日本、巴黎、新加坡、旧金山的许多中文报刊都卷入了这场分歧。多年来，我在海内外已经找到了许多资料，并在《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等文中作过分析。但是，美洲方面的资料却一直没有找到。1990年我访问美国时，特别留意查找，行程中安排了斯坦福大学一站，目的之一便是搜寻有关资料。

果然，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找到了当年革命党人创办的《美洲少年报》，虽然只剩下了寥寥几张，但是，却从中发现了何震为揭发章太炎写给吴稚晖的一封信，总算填补了空白。

原函如下：

稚晖先生大鉴：久慕大名，恨未晤面，以聆教诲，怅甚！留法同人发起《新世纪》，久为敝等所崇拜。不意日京民报社之章炳麟，因与先生有隙，即加诋毁，又因恨《新世纪》之故，并憾及留法之人，以及法国各学派。于此次张君溥泉如法，彼即虚造伪言，甚至欲将渠入狱，一月引渡清国，险恶如此，罪当如何！而东方无知之革命党受其影响，亦排斥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故贵报于东方不克发达，而观19期《民报》，载有答先生书一篇，痛加宣布。其言虚实，鄙人

固不能知，但彼暧昧之历史，则知之甚晰。试陈之以备参考。

章炳麟，一名绛，字太炎，又字枚叔，别号末底、西狩、载角，浙江余杭人。幼婴羊疯疾（今尚缺二门牙），甫应县试，其疾大作，遂纳粟为国子生，且从伯兄习制艺，冀应乡举。则其革命思想，非具于壮年之前，且非蓄排满主义，始以应试为耻，彰彰明矣（此事彼家族及炳麟亲对吾言）！彼又受张之洞之召，供其役使。又皖人吴保初为故提督吴长庆子，彼在沪常主其家，则又非疾视官场者比。且彼庚子年偕保皇党上书李鸿章（此书由章起稿），又致书张之洞及江南道员俞明震，多以变法冀清廷（今此稿犹存），并明震复言，将此面呈老帅，老帅大悦云（即刘坤一）。去岁曾受铁良二百金（系由国事侦探程家柽经手，刘林生言），又去年九月上张之洞书，与伸〔申〕旧谊，逢迎其国学，末言若助以巨金，则彼于政治问题，不复闻问，并谢辞《民报》编辑（此言系下婢名□□所发）。余甚多，不克枚举。今已用针笔板照相法付印，俟成即寄上。外附《民报》19 期答先生原函寄上。是端已为同志中一友人披过。如合尊意，留登贵报。

余容续布。即颂自由幸福并祝《新世纪》无政府万岁！

Chin 上

西 4 月 21 日

本函仅署西 4 月 21 日。根据信中有关史实，知为 1908 年 4 月 21 日。何震，字志剑，江苏仪征人。刘师培之妻。1907 年随刘赴日，迅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创办《天义报》，提倡“女子革命”，是个大出风头的时髦女性。同年冬，与刘师培先后回国，双双为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收买，成为隐藏在革命党人中的内奸。1908 年初，二人回到日本，即在革命党人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并企图策反章太炎。章太炎一度和刘师

培夫妇关系很好，三人曾同住一处，1908 年 4 月间闹翻，大吵之后继之以大打出手，于是，何震便企图搞臭章太炎，写信给吴稚晖便是其中的一招。不过，函中事实有真有假，必须仔细鉴别。

1903 年 2 月，吴稚晖等利用上海《苏报》宣传革命。同年“苏报案”发生，吴稚晖赴英国留学。1907 年 6 月，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提倡世界语。此前不久，章太炎曾在日本《革命评论》第 10 号发表《邹容传》，指斥“苏报案”发生时，吴稚晖向清朝官吏告密。1908 年 1 月 4 日，吴在巴黎《新世纪》第 28 号发表致章太炎函，要求章说明立言根据。同月 31 日，章太炎在《民报》第 19 号发表《复吴敬恒书》，坚持认为吴曾向清吏告密，同函并称：“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问素心，应亦惭惶无地，计穷词屈，乃复效讼棍行径，以为造膝密谈，非人所晓，汹汹然驰书诘问。足下虽诘问，仆岂无以答足下哉！”何函所称“19 期《民报》，载有答先生书一篇，痛加宣布”，指此。何震写信给吴稚晖，目的是利用矛盾，煽动吴对章的恶感。张溥泉，指张继，当时亦为无政府主义者。1908 年 1 月，因参加日本无政府主义幸德秋水派的活动，被日警追捕，辗转逃亡法国。章太炎后来一度对张继很反感，但何函所称“彼即虚造伪言，甚至欲将渠入狱，一月引渡清国”云云，并非事实。

章太炎自幼奉父命学作八股文。1883 年，章太炎 16 岁的时候，赴县应童子试，癫痫症突然发作，没有终场就退出了。何震函说章“其革命思想，非具于壮年之前”，是事实。1896 年 8 月，章太炎曾致函谭献，希望他向张之洞推荐自己。1898 年春，张之洞聘请章太炎为《正学报》主笔，因意见不合，章太炎在武昌仅一个月即离去。何震函说章太炎“又受张之洞之召，供其役使”，虽然后一句话不确，但前一句话是事实。其他所述，如上书李鸿章，“以变法冀清廷”等，也均是事实，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为章太炎病。孙中山不是也曾上书李鸿章吗？

何震这封信中可以引人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所谓“去岁曾受铁

良二百金”问题。何震声称，此事“系由国事侦探程家柽经手，刘林生言”。铁良(1863—1938)，字宝臣，清朝贵族。初为直隶总督荣禄幕僚，后任户部、兵部侍郎，继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1910 年调任江宁将军。程家柽(1872—1914)，字韵荪，安徽休宁人。1899 年赴日留学。1905 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授，并在清肃王善耆门下为幕客，借机进行革命活动。刘林生，即刘揆一，孙中山离日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负责人。1907 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清朝贵族铁良、善耆、端方等“各自设法向党人施展金钱政策，使为己用”①。当时，程受善耆委托，向东京同盟会总部提供赞助三万元。刘征求各干事意见，众论不一。一部分干事接受了赠款，引起同盟会内部纠纷。事后，章太炎表态说：“此款如用途正当，收受无碍，惜未开会解决，致贻同志以口实。”②所谓章太炎接收铁良赠款问题，当系由此引申而来。

另一事是所谓“去年九月上张之洞书，与伸〔申〕旧谊”问题。1907 年春，章太炎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有所了解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同时又因和孙中山的矛盾，对同盟会也悲观失望，想到印度做和尚，借机了解印度革命党人的经验，但因缺乏路费，便于同年 9 月写信向张之洞借钱，条件是：“若助以巨金，则彼于政治问题，不复闻问，并谢辞《民报》编辑。”12 月 24 日，章太炎在《民报》第 18 号发表启事，宣称：“本社总编辑人章君炳麟因脑病忽作，不能用心，顷已辞职。”算是履行了部分条件。关于向张之洞借钱一事，后来章太炎本人承认说：“张于革命党素无恶感，不得已告贷焉。”③因此，何震所述此事属实。不过，

① 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见《革命逸史》第 2 集，214 页。

② 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见《革命逸史》第 5 集，228 页。

③ 《复浙江统一党支部》，载《越铎日报》，1912 年 6 月 6 日。

应该指出的是，在若干重要情节上何震有隐瞒。章太炎给张之洞的信并非通过邮寄而是由何震转交张之洞的女婿卞绰昌，其后，又由何牵线，和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洽谈。这些，何震都不敢按本来情况讲。所谓“此言系下婢名□□所发”云云，完全在撒谎。

何函又说：“今已用针笔板照相法付印，俟成即寄上。”后来，何震确曾将章太炎的有关信件寄给了吴稚晖。吴稚晖收到何震此函及“用针笔板照相法付印”的有关资料后，没有发表，曾致函刘师培、何震二人劝解。1909 年 10 月，同盟会内部矛盾再起。陶成章上书同盟会总部，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为黄兴拒绝，便刊发名为《孙文罪状》的小册子。章太炎则因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东京续办停刊多时的《民报》，而自己被撇到一边，便以“原《民报》社长章炳麟的名义”散发题为《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指责孙中山贪污巨款，卖国卖友。于是，吴稚晖便在《新世纪》第 118 号发表了何震寄给他的“用针笔板照相法付印”的五封信，作为章太炎出卖革命的证据。同时吴又将何震上函寄给了《美洲少年报》，并且加注云：

此章与刘夫妇交恶时，刘妻何震知弟与章不睦，突如其来，寄弟此书。当时弟劝刘、何，彼此同党，不必倾轧，故未照何书登过一字。然彼所谓“谢辞《民报》编辑”，换用陶成章名，尚明明在《民报》上，彼之对《民报》，感情如此，今复老着面皮，自称原《民报》主任，真亏他做得出！

当时章太炎向张之洞、端方借钱的情节已被说成是“背叛革命党”，充当“满洲鹰犬”、侦探，因此《美洲少年报》的编者在何函后面加了个跋，跋云：

> 俄国革命之盛，得力于大文豪之文学鼓吹，今中国革命党之所谓大文豪，卑鄙如此，蠢劣如此，此中国所以为中国欤！读竟掷笔三叹。

末署："庚戌正月初三寅刻编辑人观心室主记于敬虎堂，以志感喟。"但是，当时何震为端方收买，充当内奸的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因此，在见报之前，"观心室主"又加了一个跋，跋云：

> 此乃端方侦探刘光汉之妻何震寄巴黎《新世纪》吴稚晖君之原函也，吴君转到本报，以叹息之。兹特照登，以示天下，见汉奸之当诛，与慕浮华者之不足共事也。

何震企图搞臭章太炎，一时间，人妖颠倒，黑白难明，但是，何震自己还是很快就暴露了真面目。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
——南洋访报录

1909年10月，同盟会本部在东京筹备续刊《民报》，以汪精卫为总编辑人，将原《民报》社长章太炎排除在外，章太炎愤而作《伪〈民报〉检举状》，对孙中山等进行攻击，引起《中国日报》、《公益报》、《中兴报》、《星洲晨报》、《新世纪》等报刊的反击，从而形成为同盟会分裂过程中的一大事件。对此，笔者已作过分析[①]，本文拟在旧作的基础上，依据新发现的资料，作进一步的阐述和探讨。

同盟会内部矛盾的加深和争夺《民报》的斗争

《民报》是在和改良派论战、宣传革命思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刊物。按其编辑方针和内容，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撰稿者主要为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后期撰稿者主要为章太炎、刘师培、汤增璧等。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下令禁止第24号发行，《民报》出版中断。在东京中国革命党人讨论续刊时，章太炎由于为支撑《民报》而吃尽苦头，又由于和黄兴、宋教仁之间发生分歧等多方面的原因，愤而当众宣布，辞去社长职务，并声明“不再与闻《民报》之事”[②]。此后，革命党人虽有意将续

---

① 见本书《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② 《本报谨白》，载《民报》第26号。

刊问题付诸实施，但印刷发行地点、经费、编辑人选等都发生困难，章太炎的位置也不好安排，因此，迟迟不能获得进展。1909年夏，革命党人得到了“香港某君”的资助，决定以巴黎《新世纪》杂志社为掩护，仍在日本秘密印刷发行《民报》，黄兴等“共举”汪精卫为总编辑人。这样，有关困难逐一解决，停顿近一年的《民报》有了续刊希望。但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当时正在进一步加深，此事遭到了陶成章的强烈反对。

1907年春，孙中山离日南下，准备在中国南方边境发动起义，因缺乏经费，曾接受过日本政府的赠款，陶成章、章太炎等不明真相，在部分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发动了第一次“倒孙风潮”，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由于黄兴、刘揆一等人的抵制，这一风潮逐渐平息。1909年春，陶成章因在南洋筹款收效不大，和孙中山及同盟会南洋支部矛盾日深，酝酿发动第二次“倒孙风潮”。同年秋，他在陈威涛的支持下[①]，联络李燮和等起草了《孙文罪状》，大肆攻击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三种十二项。陶成章的目的仍然是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争夺同盟会的领导，包括《民报》的编辑、出版权。《罪状》指责孙中山为了个人目的，企图扼杀《民报》。它说：“《民报》名誉，为南洋各埠所顶礼，孙文之出名，亦即由此而来。今彼名既成立，复有《中兴报》之鼓吹，但《中兴报》不得目为南洋全体之机关，实系彼一人之机关而已。然使东京而有《民报》在也，是则加于《中兴报》及《中国日报》之上，南洋华侨人心，势必有所分驰，不得便其私图。故于去岁陶君《民报》收单寄交之后，彼即托言筹款困难，并不发布，至《中兴报》之股，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极言本报大有关系，我同志不可

---

① 陈威涛：原名陈依陶，曾任《中兴日报》书记，因账目糊涂，滥支公款，被《中兴日报》登报革退。自此，即与陶成章结合，并改名“恶逸”，表示憎恶孙逸仙。有关情况，见德如：《呜呼跳梁之小丑》，载《中兴报》，1910年1月3日。

不出力协助、维持等之言。此去岁秋冬二季时之事也。"[①]《罪状》又说：孙中山不仅要使得东京没有《民报》，而且要使得南洋各埠除《中国日报》及《中兴日报》之外，不再有中国的其他报章。"何则？中国各报均零星载有内地革命之事，使华侨见之，知我革党非仅彼一人专有矣。"[②]《罪状》以此作为孙中山"蒙蔽同志"的第一大罪。它附列善后办法九条，其第四条为："再开《民报》机关，通信各埠，以系海内之望。"第五条为："兼于《民报》社内，附设旬报，凡《中兴报》之所至，亦踪寻之而往，以为扩张势力之举，且以限止孙文谎骗之伎俩也。"[③]这里，陶成章、李燮和把续刊《民报》的目的说得很清楚，除了所谓"系海内之望"外，一是为了和《中兴报》分庭抗礼，一是为了攻击孙中山，"限止孙文谎骗之伎俩"。

《中兴报》初名《中兴日报》，1907 年 8 月 20 日创刊于新加坡，第一任主编为田桐，是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机关报。它创刊之后，继承前期《民报》方针，和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新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原《民报》主力胡汉民、汪精卫及革命党人林文、居正等先后抵新，参加辩论。和章太炎主持的后期《民报》比起来，它显得泼辣、锐利得多。其间，孙中山曾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三篇文章，批驳保皇党谬论。1908 年 9 月，陶成章也曾发表《规保皇党之欲为圣人英雄者》等四篇文章。章太炎的著作《新方言》、陶成章的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兴日报》均曾发表告白，积极宣传。因此，它既不是孙中山一派的派报，更不是孙中山一人的私报。陶成章等

---

① 《孙文罪状》，载《南洋总汇新报》，1909 年 11 月 11 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下同。

② 同上。

③ 《南洋总汇新报》刊登的《孙文罪状》没有"善后办法"，此据 1912 年 11 月 2 日上海《神州日报》所登《孙文罪状》补。

攻击《中兴报》，目的在另树一帜。后来，南洋华侨曾驳斥道："夫《中兴报》为有限公司，全是华侨资本，虽为开通民智起见，仍含营业性质，吾同人亦有附股者，何硬指为孙君所办？试问《中兴报》之宗旨，果为何等？自负革命功首，而必踪其迹而破败之？"[①]这后一个问题提得是好的。革命刊物之间本应互相配合，彼此支持，为什么要"踪其迹而破败之"呢？

1909 年 8 月下旬，陶成章带着《孙文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不久，汪精卫也到达东京。陶成章敏锐地感到，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续刊《民报》。他致书李燮和等说："精卫此次之来，一为辩护中山，二则因南洋反对日多，欲再来东京窃此总会及《民报》之名，以牢笼南洋。盖东京总会无人过问，故彼欲图此以济其私。"他声明，《民报》的编辑权"不由众议而自窃取者，无论何人"，"决不承认"[②]。继而表示，《民报》专为孙中山一人"虚张声势"，非先革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不能办报。[③] 这样，陶成章争夺《民报》、另树一帜的企图就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陶成章的要求遭到了黄兴的坚决拒绝。在此期间，《民报》续刊的筹备工作开始，事为支持陶成章的章太炎得知，立即起草《伪〈民报〉检举状》，对孙中山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攻击。由于它以"原《民报》社长章炳麟白"的名义并以传单形式散发，因而，迅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

① 庇捞华商同人：《复泗厘歪也再寄匿名谤书者》，载《中兴报》1908 年 12 月 8 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下同。

② 《致若愚、柱中》，见《陶成章信札》，14～15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③ 《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台湾，1973 年增订版。

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

《伪〈民报〉检举状》是章太炎盛怒之下的产物。它反映了陶成章对章太炎的影响，也反映了章太炎长期积郁的对孙中山的不满，还反映了章太炎思想性格中的弱点：主观、武断、感情用事。

(一)指责续刊《民报》为伪。章太炎说："《民报》于去年阳历十月，出至二十四期，即被日本政府封禁。时鄙人实为社长，躬自对簿。延至今日，突有伪《民报》出现，主之者为汪兆铭，即汪精卫，假托恢复之名，阴行欺诈之实。"[①]汪精卫是前《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为什么他主编的《民报》就是"伪"呢？章太炎的理由是：《民报》被封禁时，自己是社长，曾在法庭上代表《民报》和日本政府打官司。

(二)指责汪精卫、胡汉民"标榜"孙中山。章太炎说："(鄙人)出狱以后，主任《民报》，几及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者也。惟汪精卫、胡汉民之徒，眼孔如豆，甘为孙文腹心，词锋所及，多涉标榜。"《民报》前期，汪精卫、胡汉民曾在他们的文章中，阐述了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章太炎对此看不惯。他以"主任《民报》"三年，"未有一语专为孙文"自夸，正说明他和孙中山的思想之间有扞格难合之处。

(三)指责孙中山不接济《民报》的经济困难，"背本忘初，见危不振"。章太炎说：《民报》经费多次支绌。第一次在 1908 年春天，由于萍、浏、醴起义后，《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量减半，因此不仅付不出印刷费和房租，而且《民报》社连伙食都开不出，人迹杳无。其间，章太炎

① 《南洋总汇新报》，1909 年 11 月 6 日。下引《检举状》原文，出处均同此，不一一注明。

曾致书南洋，要求孙中山接济，或派胡汉民、汪精卫东渡，但“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第二次在1908年秋，章太炎印制股票数百份，托陶成章带到南洋募捐，但孙中山“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第三次在《民报》被封后，准备迁地出版，同时，诉讼失败，日本政府判令交纳罚金一百五十元，章太炎交纳不出，亲身跑到警察署，准备坐牢，以苦役代罚金，幸得友人资助告免。章太炎愤愤地说：“夫身当其事者，亲受诟辱则如此；从旁相助者，竭蹶营谋则如彼；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民报》经费困难是事实，章太炎辛苦支撑《民报》也是事实，但说孙中山“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则是主观臆想。

（四）指责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以营私。章太炎说：“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士乐与援引。……四五年中，名誉转大，一二奋激之士，过自谦挹，奖成威柄，推为盟长，同人又作《民报》以表意见……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南洋有党与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藉同志拥戴之号，乘时自利，聚敛万端。”章太炎提出的主要事实有两项。一为1907年春，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事，章太炎斥之为“密受外贿”。一为钦州、廉州、镇南关、河口等地军费开支事。据章太炎统计，1907年孙中山南行，四处筹款，不下三四十万，但开销只有四万不到。他说：“镇南关、河口二役，军械至少，钦、廉亦未有大宗军火，先后所购之铳，仅二百余支，此外则机关铳四门，更无余器（此皆黄兴口说）。计其价值，不盈三万，所余款项，竟在何处？若云已悉散之会党，由今核实，则关仁甫之攻河口也，所领薪水，但及三千，许雪秋亦得三千，梁秀春二千而已。先后所散，略及万金，是则其说亦伪

矣。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什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乾没可知已。”在所有指责里，这一条最有损于孙中山的形象，因而也最使孙中山感到恼火和委屈。在《致吴稚晖函》中，他曾自述因投身革命而使家庭破产的事实：“两年前家兄在檀已报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钱已尽，则以恒产作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完，又将为地主所逐。”并说：“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于天下也。”①

（五）指责孙中山卖国卖友。章太炎说：“云南本中国之土，而欲赠送法人。”又说：“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这一条指责很厉害，但由于过分无稽，因而人们并不大相信。

（六）劝阻华侨为续刊《民报》捐款。章太炎说：“今告诸君，今之《民报》非即昔之《民报》。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文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力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这一条是釜底抽薪，目的在断绝续刊《民报》的经费来源。

透过凹凸镜看世界，一切都改变了样子。在章太炎的笔下，孙中山这个伟大的革命家成了贪财黩货的江湖骗子，他的行为一无可取。章太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作贼耳！”章

---

① 《国父全书》，418～419页，台北，1963年第3版。

太炎的这份《检举状》先在东京《日华新报》上发表。11 月 6 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全文刊出，改题为《请看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同月 11 日、27 日、29 日，又分三天刊出了李燮和等的《孙文罪状》。编者以无限轻蔑的口吻在跋语中说："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浼。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钱财，如是焉而已。"[①]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保皇党一直利用这两份"罪状"作为进攻革命党人的炮弹。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编印反动小册子《国贼孙文》，也从中撷取了不少材料。

代論

請看章炳麟宣佈孫汶罪狀書

〔西歷十月十八號由東京寄〕

保皇派报纸所登章太炎攻击孙中山的传单（采自新加坡大学图书馆）

① 《南洋总汇新报》，1909 年 11 月 29 日。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散发和流布对革命党人的威信是个巨大的打击，也给同盟会的募捐活动制造了巨大困难。最初，黄兴持克制态度，仅在《民报》第 26 号刊登告白，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并不准备展开辩论。① 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部分革命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决定拿出杀手锏来回击。

刘师培《致黄兴书》的公布

1907 年夏历八月，章太炎因和孙中山矛盾日深，对同盟会也日益不满，准备去印度做和尚，因缺乏路费，曾通过刘师培之妻何震与长崎领事、张之洞的女婿卞绋昌联系，企图向张之洞谋款，但没有接上关系。后又通过何震、刘师培与端方联系，企图从端方手中取得路费。1907 年冬，何、刘二人先后返国，暗中向端方自首，章太炎为谋款事，曾给二人写过若干封信。次年春，刘、何二人返回日本后，与章太炎之间的关系破裂。章太炎曾在《日华新报》上揭露过何震。作为报复，刘、何拟延聘律师起诉，后又拟将章太炎的有关信件汇印公布，但都没有实行，仅去《民报》社将章太炎"痛殴"了一顿。同年冬，刘、何二人返国。到上海后，为了在革命党人中挑拨离间，刘师培即给黄兴写信，揭露章太炎要他们向张之洞、端方谋款的经过。信中说：

---

① 《民报》第 26 号告白。

> 彼于去秋(指 1907 年秋——笔者)之后,与仆同居,仆因平日所学,与彼相同,言奇析疑,遂成莫逆。然太炎当此之时,已无心于革命,欲往印度为僧;又以无款之故,欲向官场运动。乃作函于张之洞,辞多猥鄙,乃其稿藏于书中,猝为仆见。彼亦不复自讳,宣言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亦当今急务。且与仆相商,言今长崎领事卞绰昌,为张之婿,于何震为戚属,可将致张之函稿(此为第二函)托卞转致,向张索款三万,以二万助彼旅费,以一万归仆,为印书之资。时震适以事返国,并为彼向余杭家索款(得洋八百元),道经长崎,登岸访卞。适卞已于前数日卸职,乘轮返国,此事遂成画饼。然太炎心仍未已,复作函于震,使之向金陵刘姓索款,并向卞绰昌及池州杨仁山谋,使以此事干江督端方,复令仆返沪,共商此事。然仆等均知此事不易成,至沪以后,乃告以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冀寝其谋。而彼仍作函相促,并于《民报》登告白,言近罹脑疾,不克用心,并将此报寄至沪上,嘱仆等由卞、杨转示官场,仆等一笑置之。此报旋赠高某。①

信中所言章太炎情况,证以其他资料,大体属实。所言自身态度,例如"冀寝其谋"、"一笑置之"等,都在说谎。事实上,刘、何二人企图以策反章太炎作为向端方自首的见面礼,对"谋款"事是很积极的。由于刘师培这时还在伪装革命党,他不得不隐瞒了有关事实。信中,刘师培附寄章太炎的有关书信照片六纸,并说:"此六函外,尚有数函,因回国时,已在东京印照片,尚未完成,俟该照相馆将此片寄沪后,再为寄上,今印成者仅六片,故先寄上。"

黄兴等接到刘师培此信后,曾开会研究过,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

① 原载《日华新报》,转引自《星洲晨报》,1910 年 1 月 15 日,新加坡大学图书馆藏。

宗旨不定，稍涅即淄”，决议此后凡有关秘密事情，不与商量，同时，为了给章太炎的回头留有余地，决定“讳莫如深，不予公布”[①]。《伪〈民报〉检举状》发布后，东京部分中国革命党人决定公布有关资料，作为对章太炎的回击。《日华新报》的编者原来是支持章太炎的，在获睹有关资料后，立即转变态度，以《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之铁证》为题发表了刘师培致黄兴书。按语说：“革命党章炳麟到东以来，主持《民报》，颇为该党所欢迎。本报亦以其国学大家，殊器重之，是以章氏来函，无不为之宣布。初谓章炳麟倡言道德者，必不作欺人语也。顷得革命党刘光汉（现在北洋总督衙门充当幕友）致该党黄某一函，披阅一过，令人发指。章氏日言道德，而其个人之道德则如是！呜呼！章氏休矣！己不正而欲正人，一何可笑之甚耶！说者谓章刊‘伪《民报》’传单，为图归国地步。本社已得章炳麟背叛该党之亲笔函六纸，当付手民，刊成铜版，刊登报端，以告东京学界，毋再以章先生为道德家。”[②]刘师培致黄兴书及章太炎六函的发表成为革命党人向章太炎反攻的有力炮弹，笔战日益激烈。

11月下旬，香港《中国日报》以“东京访函”名义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一文，详细地叙述了二人之间的离合关系。该文进一步宣称：“章近致书直督幕中刘光汉，重申前约，愿和好如初，目前刘已派委员到东京，与章交涉革党事，谓端午帅令其解散革党，事成许以重利，现章已允尽担任云。”[③]按此文的说法，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就不只是为了取得做和尚的路费，而是发展为因“重利”而出卖革命了。同日，《中国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布章炳麟

---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原载香港《公益报》，此据《中兴报》1909年12月2日转载该文引。

② 《星洲晨报》，1910年1月18日。

③ 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

事件

章炳麟背叛革命黨之鐵証

《日华新报》所登章太炎“背叛革命”的消息(采自新加坡大学图书馆)

已经“叛党”,成了“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该文说:“夫《民报》社长一职,乃由革命本部委任,岂章可据为子孙万世之事业乎?端方之赏金黄光耀目,章或可牺牲同志之生命以图之耳,若《民报》原有之名字,则不容汉奸辈盗窃之也。”①这样,革命党人就找到了排除章太炎于《民报》之外的充足理由。

此后,同盟会系统的报纸在反击章太炎时,大都采用《中国日报》的调子,指斥章太炎为端方侦探,有的并提出章太炎和清陆军部尚书铁良也有暧昧关系。这些反击,抵消了章太炎散发《检举状》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却中了刘师培的反间计,扩大了同盟会内部的裂痕,也

① 转引自《中兴报》,1909 年 11 月 30 日。

给章太炎加上了诬妄不实之词。章太炎和铁良的关系，完全出于刘师培一流内奸的捏造[①]；他和端方的关系，也仅止于谋款。"侦探"云云，均属子虚。

全盘否定章太炎的《民报》编辑工作

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离日后，《民报》在大部分时间内由章太炎主持。《中国日报》等除在政治上指责章太炎"叛党"外，也对章太炎的《民报》编辑工作进行了指责。这些指责，反映了《检举状》公布后孙中山一派人的愤激情绪，也反映了他们对章太炎长期积郁的不满。

（一）指责章太炎不参加对《新民丛报》的论战。《中国日报》说："章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以来，与保皇党之关系未尝断绝，《新民丛报》之《儒术真论》即章手笔。当《民报》与《新民丛报》笔战之时，战斗皆精卫、汉民、悬解（朱执信）、寄生（汪东）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②]在革命派中，章太炎是最早批判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人，但是在《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时，章太炎确实不大积极，他觉得胡汉民、汪精卫的文章"辞近诟谇"[③]，当梁启超通过徐佛苏出面建议停止辩驳的时候，章太炎主张"许其调和"[④]。

（二）指责章太炎提倡佛学，背离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和《民报》的

---

① 参见本书《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铁良，章太炎发表于《民报》第 21 号的告白作锡良。

② 《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转引自《中兴报》，1909 年 11 月 30 日。下引《中国日报》文章，除注明者外，篇名、出处均同此，不一一注明。

③ 《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④ 《宋教仁日记》，1907 年 1 月 11 日，323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六大主义”。《中国日报》说：“章炳麟以其一知半解、干燥无味之佛学论，占据《民报》全册之大部，一若以《民报》为其私有佛学之机关报也者。……由是各地阅者以《民报》主张佛学甚于本来之六大主义，多辞退不阅。”《公益报》也说：“足下弗悟，甫执文权，即叛《民报》本来宗旨之六大主义……所主张阐发民族、民权、民生之大问题者，足下偏摭拾一二佛经，为佛氏传教。”[①]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发表过不少推崇佛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既表现了章太炎改造佛学，寻求一种新的世界观，使之为民主革命服务的积极企图，也表现了他所受到的佛学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而从根本上说，佛学是精神鸦片，它虽有某些精华，但却包裹在艰深烦琐的教义中。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革命党人的精神武器。章太炎撇开卢梭《民约论》等一类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也撇开业已为革命党人所接受的孙中山三大主义，在《民报》上大肆推崇佛学，这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也脱离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当时，四川革命党人铁铮（即雷铁厓）就曾指出，佛学是“迂缓之学”，“上智之士犹穷年累月而不得，而况欲使普通之一般国民皆能明之以振起其气概”[②]！日本人梦庵也针对章太炎的《大乘佛教缘起说》指出：“此《缘起说》足以济度恶劣政府乎？足以建设共和乎？佛教之平和思想，死于千载之上，曷得抱亡骸为维持新世界、新真正之平和之具？”“《民报》之作此佛报者，抑出于何意乎？《民报》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也。”[③]应该承认，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但章太炎性格执拗，对于佛学的嗜好也太深，先后发表《答铁铮》、《答梦庵》二文，继续坚持必须大力宣扬佛学，这就使革命党人很失望。应该说，孙中山等之所以热情扶助

---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转引自《中兴报》，1909 年 12 月 2 日。

② 《中国已亡之铁案说》，载《鹃声》复刊第 1 号。

③ 《呓语》，载《东亚月报》第 2 号。

《中兴报》，而对《民报》态度消极，这是一条重要原因；续刊《民报》时之所以排除章太炎，这也是一条重要原因。关于后者，《公益报》曾明白宣示："顾同人之光复《民报》，志在发挥公理，非求泄发私怨也；志在宣扬民意，非求传播佛声也。故《民报》光复，不能使足下与闻，亦不欲以狂妄之夫再尸要地，以碍同志团体之进行也。"①

（三）指责章太炎提倡无神论，攻击基督教。《中国日报》说："基督教素重人权自由主义，故内外同胞之主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者，以基督教徒为多，乃章炳麟创为无神论，以排斥耶苏之道，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苏之机关报，摇惑人心，莫此为甚。"②革命派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在当时，它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近代，殖民主义者曾利用它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章太炎批判基督教，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中国日报》注意了团结基督教徒投入民主革命，但是却看不到章太炎批判基督教的积极意义，也看不到章太炎提倡无神论的积极意义（虽然章太炎的无神论并不彻底），这在理论上是短视浅见的。

（四）指责章太炎批判《新世纪》，伤害同志感情。《中国日报》说："法国《新世纪》与《民报》同属革命党之机关报，原应同心戮力，以谋国事，乃章炳麟以个人私怨，竟借《民报》为攻城之具，日向《新世纪》宣战，第24号有《规新世纪》之文，占全册之半，伤害同志之感情，徒贻外人之笑柄。"③辛亥革命前中国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有两个：一为东京的《天义报》，创办人为刘师培、何震；一为巴黎的《新世纪》，创办人为吴稚

---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2月2日。

② 《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转引自《中兴报》，1909年11月30日。

③ 同上。

晖、李石曾、张静江。两个杂志各有特点。前者和国粹主义纠结难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后者则对国粹主义持批判态度，反对封建文化的色彩较浓。章太炎受过刘师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对《新世纪》则始终深恶痛绝；在和刘师培决裂之后，即以《新世纪》为靶子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他先后发表过《排满平议》、《四惑论》、《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这些文章，并没有抓住要害，但他公开宣布“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1]，总反映了思想上一个方面的进步。

章太炎对《新世纪》的批判也有缺点。还在中国教育会时期，章太炎和吴稚晖之间就因事不和，章太炎到日本后，又听人说吴稚晖在《苏报》案中曾向清吏俞明震告密，因此，多次在《民报》上发表指责吴稚晖的公开信。这些指责，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某些地方却给人以骂大街的印象。其次，《新世纪》当时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翼，他们公开声明：“种族革命党与社会革命党今日之作用同，而其主义不同，然此不同者，固无碍其同为革命党也，无碍其协力以图最近之革命也。”[2]因此，对《新世纪》可以批判，但必须掌握一定的火候，有所节制。在《台湾人与〈新世纪〉记者》一文中，章太炎说：“《新世纪》记者阳托名于无政府而阴羡西方琛丽”，“此曹无耻，复倍蓰于立宪党人”，“犹槟榔屿之少女，聚歌沙丘以求新牡，昨者方为甲者所掠，而有今日，复愿为乙者、丙者所掠”[3]。这些地方，从内容到语言都显得过火了。

（五）指责章太炎“挑动日人之恶感情”，导致《民报》停刊。《中国日报》说：“《民报》出版以来，日政府绝不干涉，乃章炳麟倡言恢复台湾、朝鲜之议，又鼓吹暗杀，以挑动日人之恶感情，遂致有停止发行之命令。

---

① 《排满平议》，载《民报》第 21 号。

② 真：《与友人论种族革命党及社会革命党》，载《新世纪》第 8 号。

③ 《民报》第 22 号。

使章当日立论如第12号以前，则《民报》至今犹存也。"[①]《公益报》也说："所主张中日国民联合者，足下明知社会党为当时日本内阁所忌，乃必发挥社会主义，撄其忌以种封禁之祸因。"[②]日本政府禁止《民报》第24号发行的原因很复杂，既和清政府的多次交涉有关，也和日本内阁更迭、政策改变相连。西园寺内阁时代，采取一种"法兰西宽大政策"，结社、言论、出版都相对自由，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迅速。1908年7月，西园寺内阁被撤换，更替上台的桂太郎内阁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严厉镇压政策。《民报》虽因鼓吹暗杀的部分言论和日本社会党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直接行动"派相呼应，为桂太郎内阁所忌，但是，把《民报》出版中断的原因归结为章太炎的过激言论所致，仍然是简单的、片面的。

章太炎的《民报》编辑工作有功绩，也有严重的过失。《中国日报》等完全抹杀前者，而将后者夸大，把章太炎说成《民报》罪人，这是极不恰当的。在双方都感情冲动而充满敌意的时候，对于彼此的是非功过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此外，革命党人在评论中还接触到了章太炎的性格问题。《公益报》说："足下复骄恣溢盈，竟成跋扈，托有神经病，为鱼肉侪辈，蛮气一发，动肆用武，致与无赖伍。年来若张继、黄兴二君，皆于谈次间，足下无头无脑即以老拳相向。自余东京同志，无故受足下之野蛮意气者，大不乏人。"[③]以学识渊博长于弄文的书生，却经常"无头无脑"对同志"以老拳相向"，《公益报》的指责似乎和人们印象中的章太炎不类，但这是有旁证的。1912年，有人回忆说："迨后清廷肆虐，委托日本政府停止

---

① 《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

② 意公：《与章炳麟书》。

③ 同上。

《民报》出版，于是太炎搁笔，饭碗为碎。当时克强先生拟运动日廷取消停止出版，卒以经费匮乏，亦罔效。太炎则贫如乞儿，夜不得食，乃日迫克强先生，一言不合，辄以盥器遥击，克强先生额为之破，卒含笑谢之。"[①]一方是盛怒而以脸盆"遥击"，一方是"额为之破"而"含笑"道歉，两人的性格鲜明如见。

章太炎的这种性格特点使他很难与别人共事。《公益报》说："同志宽洪包容，均付之一笑……然因是而冷同志之心，何止千百。昔日东京同志，皆节提所费，踊跃资助《民报》者，感情既淡，而《民报》经济界之情形，亦受其影响。"[②]这里说章太炎的粗暴举动冷了"千百"同志之心，固有夸大，但是，它不利于革命党人之间的团结则是显然的。

历史是通过人的活动体现的，创造历史的是具有各种各样鲜明性格的人们，因此，对历史发生作用的就不仅有经济、政治、思想诸因素，有时，也有个人性格的原因，虽然，它并不起决定作用。

同盟会系统各报对《检举状》的辩驳

《伪〈民报〉检举状》大多是不实无根之词，为了廓清影响，说明真相，同盟会系统的各报不得不逐条地进行辩驳。

（一）关于续刊《民报》的真伪问题。革命党人指出：《民报》为革命党人所创立，并非个人私产；当《民报》肇始时，章太炎还在狱中；要判断续刊《民报》的真伪，关键要看它的主持者是否是革命党人，宗旨有无改变，而不在于章太炎是否出任社长。《中兴报》说："若谓章为社长则真，

① 快：《参看17号〈新纪元报〉》，载北京《民主报》，1912年9月18日。

② 意公：《与章炳麟书》。

非章为社长则伪,是则章为《民报》之商标矣!"[①]《公益报》表示:章太炎主持编辑的《民报》如果还存在,依旧"发私怨,砌佛言"的话,那么,称之为"真佛报"、"伪《民报》"也是可以的;相反,续刊《民报》如能"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奉申宣扬,以饷我同胞",那么,即使主持者不是汪精卫,也是真《民报》。[②] 黄兴则特别说明了章太炎"当众辞职"的经过,并叙述了汪精卫和《民报》的关系:"自第一期以来,至第十三期,每期皆有汪君之文字,久为读者所同知。自第十四期以后,汪君因事不能兼任撰述。今被举为总编辑人,当必有以副读者诸君之望也。"[③]革命党人的这些言论,比较有力地阐述了续刊《民报》的合法性,驳斥了所谓"伪《民报》"的说法。

(二)关于汪精卫、胡汉民"标榜"孙中山问题。由于章太炎在《检举状》中说过:"辛丑、壬寅之间,孙文寄寓横滨,漂泊无聊,始与握手而加之奖励者,即鄙人与长沙秦力山耳。"因此,革命党人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兴报》反问章太炎道:你这不也是"眼光如豆","愿与孙君为腹心"吗?为什么要嘲笑汪、胡二人呢?该报声明:"中国之革命,孙君为首发难,历尽艰难,其才识学问,及办事资格,同志中未有能出孙君之右者,故为同志推戴,举为盟长,而革命事业之发达,未始非孙君抱持之坚,毅力之长,有以致之也。"[④]这一段话,正确地评价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作用,说明了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推戴"并非出于盲目。

(三)关于孙中山不接济《民报》经费困难问题。革命党人主要强调军情紧急,经费同样困难,首先要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公益报》答复章

---

①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载《中兴报》,1909年12月6日。

② 意公:《与章炳麟书》。

③ 《本报谨白》,载《民报》第26号。

④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太炎说："河口、南关、钦廉之役相继迭兴，军队中人，睚遑离局，足下乃于此匆遽时间，假《民报》待需之名，为书乞援，求以三四千金相济。自足下视之，或以为平情，然当夫军书旁午之间，饷需浩繁之际，撑持未暇，焉能兼顾其他！"①《中兴报》则表示：近年革命党人创办的报馆日渐增多，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如章太炎所说"朝治文章，暮营经费"的编辑人并不在少数，解决报馆的经济困难，要靠主任的运动，如果大家都向孙中山要求接济，那么，"吾恐孙君虽有点金之术，亦不能供给各报之要求"②。

同盟会创立初期，所需要支持的只有一个《民报》，经费上自然不感到十分拮据。1907 年孙中山南行，在广东、广西、云南边境边疆发动多次起义，开支突然浩大起来。镇南关起义期间，孙中山曾向法国一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国代募军债。钦、廉、上思起义期间，清军黎天才部曾准备归顺革命军，但孙中山却付不出奖赏的花红。这以后，由于张永福、陈楚楠等几个富有的华侨同盟会员濒临破产，孙中山更经常为经费不足所窘。1908 年 11 月 20 日，他在致邓泽如等函中说："时局可为，惜财力不足赴之于目前，想兄等亦为扼腕而叹。"③不仅《中兴报》经常有停刊危险，孙中山自己也有"断粮"之忧。④ 因此，革命党人所作的辩解是事实。但是，他们忽略了双方思想分歧所起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称赞《中兴报》"文章议论，颇惬人心"⑤，如果《民报》办得符合孙中山的理想，显然，他在解决其经济困难上是会积极得多的。

---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

②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③ 《国父全书》，412 页。

④ 《为〈中兴报〉集股等事致邓泽如函》云："现在本坡百务交迫，各同志皆陷于穷境，多有自顾不暇之势，故弟处已绝粮矣。"见《国父全书》，415 页。

⑤ 《国父全书》，413 页。

（四）关于孙中山乾没巨款，借革命以营私问题。革命党人主要采取反质法，要求章太炎交代出情况来源和具体数字、存贮地点。《公益报》说："足下又言孙氏丁未南行，集资三四十万。试问某埠得收若干，某人捐助若干，足下能述其故否耶？""所谓身拥厚资者，此金钱究存贮于何处？足下又能述其故否？"[①]这些问题，章太炎当然答不出。革命党人就此进一步指出：章太炎并非同盟会"实行部"人员，不了解军事进行和组织的实际情况。《公益报》说："足下且未知军事组织之实情，从何知军事组织之真状，不意足下欲欺饰人心，遂敢妄谈军事也。"[②]革命党人的这些辩解，由于对经费收支缺乏必要的说明，因此说服力并不大。只有当南洋革命党人具体调查了孙家因革命而破产的状况后，章太炎的指责才得到了有力的驳斥和澄清。

（五）关于孙中山卖国卖友问题。《公益报》指出："若云以云南赠送法人，则尤令人窃笑。无论孙氏无此事，亦无此权。"该报问道：河口起义失败后，大批义军战士被解送出境，不少"破弃身家事业"资助起义的华侨同盟会会员被勒令出境，如果孙中山和法国人之间有什么"私盟"的话，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③] 黄兴发表声明，指责章太炎挑拨他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是"造孽"[④]。《中兴报》主编何德如则撰文说明：关仁甫在河口起义后到达新加坡，曾在《中兴报》居住数月，在返回香港时，同盟会会员纷纷资助；关仁甫感念同志情谊，曾到何德如寓所辞行。章太炎所说孙中山密告英吏，诬指关仁甫为大盗一事大谬特谬，完全是"以耳代目"，把流言当做事实的结果。[⑤] 革命党人指出：立言贵在"有

---

① 意公：《与章炳麟书》。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本报告白》，载《新世纪》第 116 号。

⑤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据”,章太炎如果继任《民报》编辑人,“遇事不察,言出不择,贸贸然而宣之于报纸”[①],必然会损害《民报》的信誉。革命党人的这些批评,接触到了章太炎性格和思想方法上的弱点。

在逐条辩驳之外,革命党人也对章太炎不顾全大局、不考虑影响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中国革命距成功之日尚远,“此正吾人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时”,“稍知自爱而能为大局计者,必不出此”[②]。革命党人的上述辩驳和批评所持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这就发挥了澄清视听,维护同盟会和孙中山威信的有益作用。

在续刊《民报》所引起的争论中,章太炎轻率地散发《伪〈民报〉检举状》,促使矛盾尖锐化,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它也反映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工作中的缺点。

如果同盟会能有一种制度,使它的领导人之间能够经常就重大的问题交流思想,统一看法,那么,分歧也许不至于愈来愈大。

如果同盟会的经费收支能在高级领导人之间公开,那么,章太炎显然不会怀疑孙中山“乾没”巨款。

如果在《民报》经费困难时,同盟会领导人能给予更多一点的关怀和温暖,那么,章太炎胸中就必然不会有那样多的不满和牢骚。

如果在续刊《民报》时不对章太炎完全封锁消息,那么,他也许不至于突然爆发出那样巨大的愤怒。

这些地方,说明了同盟会缺乏正确的组织原则,也缺乏统一思想、克服分歧的正确方针。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 年第 2 期

---

① 德如:《责章炳麟与发匿名书者》。

② 同上。

清政府乞求日本驱逐孙中山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建立组织，宣传并策划革命，清政府如坐针毡，曾多次乞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份清政府外务部致驻日使馆的电报，全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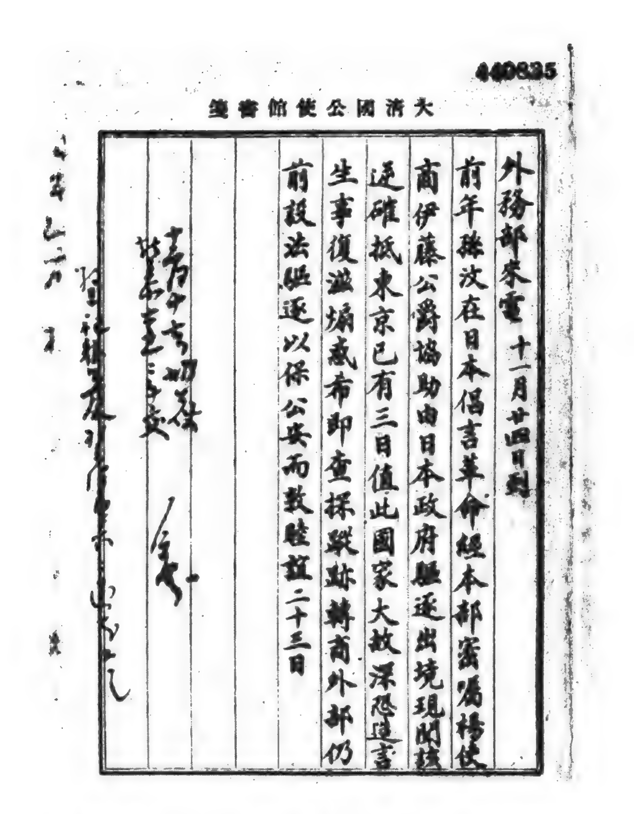
外务部来电

（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孙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经本部密嘱杨使，商伊藤公爵协助，由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现闻该逆确抵东京，已有三日。值此国家大故，深恐造言生事，复滋煽惑，希即查探踪迹，转商外部，仍前设法驱逐，以保公安，而敦睦谊。（二十三日）

电文中提到"值此国家大故"，知此电发于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时在1908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孙汶，即孙文。写作"孙汶"，有轻蔑之意，暗喻为海盗。

1906年，孙中山与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革命方略》，发布《军政府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十一个文件。12月，同盟会会员蔡绍南、魏宗铨等发动萍浏醴起义。1907年2月，庆亲王奕劻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外务部也密电驻日公使杨枢，要他直接和伊藤博文商量。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两面政策，既不愿拒绝清政府，也不愿得罪孙中山，于是，采纳了内田良平的建议，要求孙



大清國公使館書箋

外務部來電 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孫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經本部密囑楊使商伊藤公爵協助由日本政府驅逐出境現聞該逆確抵東京已有三日值此國家大故深恐造言生事復滋煽惑希即查探蹤跡轉商外部仍前設法驅逐以保公安而敦睦誼二十三日

清廷致驻日公使馆电(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中山自动离境,并资助了一笔款子。1907 年 3 月 4 日,孙中山离日,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河内。日本政府即通告清政府,已经“驱逐”云云。本电开头一段所言,即指这一段历史。

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去后,革命党人觉得是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动。而清政府则恐慌异常,颇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本电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打给驻日公使胡惟德的。电文要求胡惟德“查探”孙中山的“踪迹”,和日本外务省商量,“仍前设法驱逐”。胡惟德接电后,当然遵命惟谨,于是此电便留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

过了一些日子，清政府外务部又打电报给驻日使馆。全文为：

外务部来电

顷密探得孙汶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又闻其约梁启超同赴大阪等情。尊处有无所闻？希即切商日政府协助查禁，并照前议，如果有在大阪运动踪迹，务令出境。电复。外务部。（二十日）

在不长的时间内，清政府连续两次发电，乞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境，可见其所得"恐孙症"之深。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正在南洋活动，并准备远行欧洲，为起义筹措经费，连到日本的打算都没有。所谓"确抵东京，已有三日"，"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云云，纯属子虚。而且，所谓"约梁启超同赴大阪"云云，也完全不可能。孙中山在 1903 年就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怎么会和梁启超携手合作呢？上述"密报"，大概是它的饭桶密探们为了邀功而编造的。清政府竟根据这种"密报"指令其公使和日本政府交涉，其昏庸糊涂程度令人可笑而又可叹。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的这种交涉并非徒劳。1910 年 6 月，孙中山自檀香山赴日本，准备召集同盟会骨干议事。事前曾托东京方面的朋友向日本政府打通关节，但在横滨上岸时，却仍然被"水上警长"发现，着令离境。孙中山不得不化名潜赴东京，并于同月 25 日匆匆离日。

原载《团结报》，1988 年 1 月 2 日，略有修改。

读孙中山致纽约银行家佚札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上海《天铎报》连载过一篇译文，题为《真革命始祖》，称誉孙中山多年来苦心孤诣，领导中国革命的功绩。[1] 该文原载美国《纽约泰晤士报》，说明系伦敦通讯员来函。其中引录了孙中山致纽约财团的两封信，迄今为止，各本孙中山集均未收，现介绍如下，并略加考订。

第一函的收信人是纽约某银行的一位职员，孙中山在伦敦一家著名的俱乐部里认识了他，企图通过他向纽约资本家借款50万英镑，作为在中国发动起义的经费。二人原已约定了在纽约会面商谈的具体日期，但孙中山因延迟行程失约。过了一段时候，孙中山到达纽约，便发函致歉，重申前议。全文为：

> 前在英京某俱乐部，与阁下订期，在纽约会面，借为事延阻，不克践约，无任歉仄。所议借款兴办中国政治事业一节，今有盘谷华商银行一家、米厂三家、星加坡殷商数人，及巫来由矿商三人，均允担保。计以上各华商之产业，共值美金二十兆，现在只需英金五十万镑，便敷接济。一经起事，即可占据两富省，便当组织临时政府，至时当可向外国再借巨款，以竟全功。今请鼎力斡旋，运动资本家，商借债款，以济军用。事如可图，请示知办法。资本家需如何章程，方肯借款，当不难磋商也。企候复示。孙逸仙上。

---

[1] 见该报1911年11月15日至23日。

据《真革命始祖》一文介绍，纽约各银行读到孙中山的上述信件后，研究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状况，通过纽约某华人商店复函，要求孙中山将信中所称"愿担保借款"的南洋华商店号、姓名详细开列，以便调查。据称："一经查实，如所云不虚，五十万镑之款，不难凑集"，云云。当时，孙中山已因事离开纽约。两个月后重返，读到纽约财团的复函，便写了第二封信，说明革命党人的力量分布，同时附了一份通告世界各国的文件。该函全文为：

启复者：承问各件，今请详复如下。首先请言海陆两军。中国近日所组织之新军，查江南各省新兵，无论将校士卒，均为吾党同志。一经起义，扬子一带，计有新军四镇，必投吾党麾下。武昌、南京两城，为吾党最得力之地，曾已商议停妥，一旦粤东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时揭竿响应。至于京师所有之七镇新军，俱系袁世凯经手操练，自袁氏革职之后，此种新军已渐渐消减其忠爱清廷之心矣。吾党虽未尝与此项新兵联络，但彼等断不允为满清政府牺牲其生命，此吾敢必也。此外东三省又有新军一镇，亦为吾党所统带，一旦起事，彼必率其兵士，合攻北京。综前而论，中国共有新军十二镇，入吾党掌握者已有五镇，余七镇均守中立。至若海军，今与吾党虽尚未连合，然而海军将校水兵，多为吾党同志。

次请言各行省之志愿。中国南部各省随时皆愿起事。试观对于澳门划界事件，南省之舆论可见一斑矣！且吾党中人，多为两粤及湖南兵士，该三省之兵素以强劲称于中国者也。

兹将吾党布告于天下各国之通告书述录于下，以供青鉴焉。

以上二函均未注明年月，但据信中所述时事及孙中山的行踪，可以较为准确地考订它的时间。

第二函提到的时事有两件。一为袁世凯被清政府革职，其时在1909年1月。一为“澳门划界事件”，其时在1909年下半年。澳门一向是我国领土，明朝嘉靖年间被葡萄牙殖民者强租，清朝光绪年间又被强占。但葡萄牙殖民者仍不满足，不断扩张界址，向外蚕食，经常发生纠纷。从1909年7月15日起，至同年11月16日止，中葡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九次“勘界”谈判，均无结果。葡萄牙殖民者的恶劣态度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舆论哗然。“在国内则有各种勘界维持会与界务委员会，国外则有华侨公会、商会，函电交驰，请清政府力争失地，且责政府对于会议情形，秘而不宣，为祸国殃民之举。”[①]孙中山从这一事件里又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要纽约财团的资本家们注意这一情况，函中称：“中国南部各省随时皆愿起事。试观对于澳门划界事件，南省之舆论可见一斑矣！”可知此函必作于澳门划界谈判期间或失败以后不久。

从1907年起，孙中山先后在中国南方组织了黄冈、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河口六次起义，其经费主要依靠南洋华侨的支援，不时感到拮据。1908年冬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孙中山企图乘机组织起义，更感到财力困难。次年春，他接到欧洲一位“名商”来函，决计西行筹款。4月20日，他致函缅甸侨商、同盟分会会长庄银安等称：“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时机，殊堪痛惜！此方暂时既无法可设，弟不能不思图远举，欲往运动于欧美之大资本家。”[②]6月下旬，孙中山抵达巴黎。8月7日，抵达伦敦。10月29日有一函致南洋同盟会员云：

① 黄培坤：《澳门界务争持考》，稿本。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411页。

在英京亦找得一路，惟现尚未有眉目，故未敢详报。此路之件条〔条件〕甚属便宜，利息亦照通常算法，并不要求特别之利权，惟须吾党各埠同志出名担保一事耳。英路之介绍人现往美国，弟到美时当与他再商，如得实音，当另行详报。但关于出名担保一节，弟已思得一法，想当可行，俟得实音，则并奉闻，以请大教。①

本函所述："在英京找得一路"，"须吾党各埠同志出名担保"，"英路之介绍人现往美国，弟到美时当与他再商"等，均与前引第一函相合。孙中山1909年由伦敦抵达纽约的时间是11月8日，由此可进一步确定，第一函当即作于此后的一段时期内。12月16日，孙中山离开纽约，赴波士顿宣传革命和募捐，24日返回，第二函当即作于此时。《真革命始祖》一文称，此函为两月后孙中山返回纽约时所复，这一点可能是该文作者搞错了。

第二函附有一份《民国军政府告各友邦书》，内称："我中华民族之与满洲政府开战，欲逃离胡虏毒轭，推翻无道之专制，组织共和政体以代之。今者为益固各友道〔邦〕交谊，保世界和平，增人群幸福起见，特将宗旨明白宣布。"这显然就是1906年集体制订的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只是由于经过转译，文字上有所不同。将两个文本对校，可以发现，原来所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七项条件已经有所变动。例如原第一条为："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现第一条为："各国与满政府今日以前所订之约仍然有效，至期满为止。"除将"中国"改为"满政府"外，增加了"至期满为止"等几个字。又如原第三条为："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现第三条为："满政府以前长租与各国之租界，皆以礼相待。"原条件全部承认侵略者的"既得权利"，现条件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424页。

则大为缩小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由于既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又祈求其援助,不可能采取强硬的反帝立场。但是,孙中山毕竟是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力图挽回失去的权利。两个文本不同正说明了这一点。

1910 年 3 月,孙中山曾在洛杉矶与美国人荷马李、布思会谈,企图向纽约财团贷款 350 万美元。此事的中介人是容闳。上述贷款 50 万英镑的中介人是纽约某银行的职员。看来,孙中山曾通过两个渠道和纽约财团联系。后来,孙中山选择了荷马李、布思的渠道,前一个渠道就放弃了。《真革命始祖》一文说:"该银行自接孙氏之信后,孙氏未再向该银行商议借款,或谓孙氏已在中国或美国筹足军饷,或谓孙氏或有不测之事,盖清政府悬赏英金一万镑捕拿孙氏也。"作者显然不了解后来事情发展的状况。

《真革命始祖》一文还披露过孙中山的其他言论,反映了他振兴中华的热切愿望,如:

> 孙氏又常对人自明其宗旨,谓一生目的,不外推翻满洲篡位之民贼,使中国重发奇光,注重自由、平权、人道主义,拟组织军政府,以为先导。其言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应改为共和国,选总统以自治,其人同享人道、幸福、平权、自由,不背社会主义。畜奴仆、吸鸦片等害,一一除去之,则不出三年,中国之气象自焕然一新矣!

关于对外关系,该文说:

> 孙又言:革军宗旨,不过欲光复中华,并无仇外之意,凡我友邦,万勿误会云。

不笼统地排外，这是正确的，但是，将侵略中国的列强一律视为“友邦”，这又是他思想中软弱和模糊的地方。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跋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几次谈话

——读日本外务省档案

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第六次访问檀香山，一直逗留到5月30日。在此期间，曾对记者发表过几次谈话，陆续刊登在当地英文报纸上。它们引起了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上野专一的注意，立即作为机密第22号、24号、29号文件，寄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现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号为1·6·1·4-2-1(4)。

孙中山的这些谈话表现了他巨大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激情，也反映了他对当时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策略考虑。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清政府即将垮台，革命即将爆发，中国最终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他认真地研究了土耳其革命的经验，对清政府正在建立的新军寄以希望，认为只要在新军中做好鼓动工作，它将成为推动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后来武昌起义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孙中山此时的观点。当然，这些谈话也反映出孙中山思想中的若干弱点，如，将满族看做外国人，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人民自发斗争的积极作用缺乏认识等。

附[①]:孙中山在檀香山的几次谈话

中国将发生内部冲突

满洲政府摇摇欲坠,自称是改革者

孙逸仙博士,海岛的孩子,中国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正在檀香山。他上周从美国乘高丽号到达,应邀来此向夏威夷华人报告中国的政治事态。

人们将记住,孙博士是领导人中的一个,为了抓住他,满洲政府正提供一笔很大的赏金。虽然当第一次悬赏的时候,他正在中国,但他从未被抓住过。现在他仍然被满洲政府通缉。这天早晨,他被访问时说,他将再次去中国,使自己熟悉那里的情况。问他是否害怕被抓住,孙博士坦率地微笑说,他决心去做他认为对中国人民和国家有好处的事情。

在访问过程中,孙博士作出了下列陈述:

"只要现在的满洲政府继续存在,中国就没有希望。明智的、爱国的中国人打算推翻现在的外国政府——我指的是满洲政府——并且建

① 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意味着民有,民享,民治。"

"满洲政府的所有官职都可以用钱购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些为其所追求的官职付出最高价钱的人,能如愿以偿。"

"现在,正酝酿一场革命以推翻满洲政府。他们意识到,进行得愈快,愈有益于人民。期待的革命即将爆发,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明智的、有思想的中国人支持这一变动,因为他们不能永远生活在现政体的腐败制度之下。"

"政府显然害怕在中国爆发革命起义,答应人民建立一个立宪政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政体,它并不真正打算给予人民一个为大众喜爱的立宪政府,却极力抵制革命运动。"

"这是真实的,有一个明智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在策划中国的革命运动。每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都支持这一变动。"

中国军队的强大

"中国军队今天相当强大,但是,它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卫它的领土。中国的军队有三十六镇,其中的十五个镇已经按照现代的军事制度组成。人们实际上认为,他们赞成革命的主张。士兵们被在外国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统率。他们掌握现代军事知识。"

"正像土耳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中国在时势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将被这支军队革命化。"

"自从中国军事部门的这十五个镇组成以来,在中国全境内已经爆发了好几次革命。最近的一次,几星期以前发生于广州。由于同情这一运动的人民没有准备,革命党人被政府的力量打败了。"

中国将要成为共和国

"中国应该建立共和国。"博士继续说,"一旦共和政体建立起来,中国将焕然一新,政府事务将得到正确的管理,最终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我充分相信,革命运动将成功。"

"如果发生革命,满洲政府呼吁列强干涉时,你们革命党人怎么办?"记者问。

"我认为,实际上全世界赞成中国的现代化。"博士回答,"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是和平与贸易。"他继续说,"文明国家需要中国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应当承认,中国人中较好的阶级赞成这样做,但是,不幸的是,它经常被满洲政府干扰。"

"现在的政府不能维持中国的秩序,也不能抵御外来的攻击,保护自己。这是世界和平受到扰乱的原因,也是某些强国为了最终解决远东问题正在倡议瓜分中国的理由之一。"

"如果中国人民全体站起来,推翻现在的满洲政府,使局势秩序井然,它的行动可能得到世界列强的赞同。在进行过程中,中国人民无论如何必须与世界列强的政策一致。"

"我的看法是,列强帮助现在的政府将没有任何益处,任何国家,没有某种利益,却愿和满洲政府这样衰老而腐败的君主政体站在一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国外受教育

"正在国外受教育的大多数年轻中国学生是被地方政府派遣的。除了那些正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学生以外,中央政府没有为他们做过什

么事情。长时间以来，中央政府试图干涉年轻有为的海外留学生，但是，迫于正在中国形成的公众舆论，中央政府撤回了对这些海外留学生的异议。这实际上表示它无能为力。”

根据孙逸仙博士的意见，这一点是明显的，侨居国外的中国人正在慢慢地领会改造中国的思想。他们生活在繁荣与和平的国家，因此，他们不能认识中国的困苦。

从另一方面，那些生活在中国的人正渴望看到这一天，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进步的国家之一。

孙逸仙博士是一个海岛的孩子，出生于依华（Ewa）[①]，生活在茂宜岛上的姑剌（Kula，Maui）。他是孙眉先生的弟弟。从前，孙眉是茂宜著名的商人和牧场主。目前，他正在中国访问。据说，他愿永久在那里定居。

孙博士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公立学校毕业后，他进入了意奥兰尼学院。

上星期日的演讲

在当地华人的强烈请求下，他在中国剧院报告了中国的政治情况。结束演说时，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呼。

应夏威夷华人的邀请，孙博士上星期一乘高丽号太平洋邮船到达这里。在返回美国之前，准备在这里停留几个星期。在美国，他正在行医。他是中国香港一所医学院的毕业生。

发表于1910年4月8日檀香山《晚间公报》（*Evening Bulletin*）。

---

① 1904年3月，孙中山由檀香山赴美国大陆，因美国政府排华，孙中山为易于入境，便编造情况，设法签领了檀香山出生证。此处所述，即据该出生证。

头颅标有赏格的檀香山人

攻占城市的革命领袖回到故乡，又一次义和团起义孙逸仙博士叙述他怀抱的希望，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

他的头颅标有近三十万元赏格，为北京满洲政府所畏惧，视为汉族中的强力人物，没有一个保镖却周游世界的中国激进的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博士，两周以前到达檀香山，正在这里和他的拥护者秘密会谈，并且再一次拜访亲戚们。孙逸仙博士出生并受教育于檀香山，意奥兰尼学院因这个世界知名人物曾在这里求学而引为自豪。

这个著名的革命家经常把檀香山作为他的指挥部，他的党的坚强的理事会也设在这里。① 法院方面判定他是美国公民。

几个月之前，当孙博士在中国南部领导革命时，北京政府出洋六万五千元购买他的头颅。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的总督们为了提供更充足的赏金而将价格提高到近三十万元。尽管清政府以巨金悬赏，不论死活，孙逸仙博士不但仍然在没有一个保镖的情况下周游世界，而且经常在中国，特别在南部，作为造反的中国人的领袖，和政府军战斗。

改变的时机

孙博士相信，彻底改变庞大的中华帝国政体的时机已近成熟。他

---

① 兴中会并无理事会一类组织，此处记述有误。

判定，并且明确地指出，满洲王朝正在削弱，在几年——很有限的几年内，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汉族将要奋起，将满洲人赶出帝国。在王朝宝座的废墟上，孙博士希望看到，建立一个共和政体。

“你是否相信，中国人能在政体方面实行这样一个激进的政策——从一个皇帝到一个总统？”他被询问。

“中国人认为，满洲人是篡位者，我们的征服者。”孙博士回答，“满洲人从来未能臣服中国人，但是后者因为某些原因也从来未能站起来并推翻他们。如果向他们指示推翻这些外国人——满洲人的方法，我相信他们将会接受任何一种提供给他们的新政体，如果它是中国人的政府。”

战争准备

《自由新闻》编辑部设在楼上狭小的后部，这是一家中文日报。那里，卢信挥动着编辑之笔，为了追随孙博士的夏威夷华人的利益，经营着一个激进的革命宣传机构。孙逸仙，这个著名的革命家，昨天晚上谈到了他追求多年的希望和理想。大约两周以来，孙中山秘密地在檀香山生活，准备再次访问中国。他现在相信，这次旅行将载入史册，它将引起所有列强的关注。

六年以前，孙博士坐在另一家编辑部里，为《广告者》(*Advertiser*)的读者叙述过他的希望和某些计划。在以往的六年里，孙博士不断地以他的教育方法在帝国的中国人之间工作，不论何时何地尽可能地削弱满洲政府的根基。

昨天晚上，他以平静的语言谈到，他相信，运动正开始削弱满洲王朝，就像水珠滴在石头上一样，逐渐地磨穿它。

孙博士可以被有些人称之为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不过，他是注重实际的。他提到土耳其的少年土耳其运动，并且说，他在中国领导的运

动在精神和计划方面和它完全相同。这一运动，导致推翻阿布都·哈米德（Abdul Hamid）①，并且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它没有倒台的苏丹一度拥有的专制弊病。

又一次义和团起义

"你的党对满洲政权有威胁吗？"他被询问。

"有。不过，超过摄政王想象的更大危险来自王朝自身的弊病。"孙博士说。

"又要发生一次义和团起义。"这是他的惊人的叙述，"正如第一次起义时，帝国的军队援助排外运动一样，现在的政府将是起义的幕后操纵者。满洲人经常反对外国人——欧洲人和美洲人。中国人也反对外国人，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外国人仅仅意味着满洲人，而不是欧洲人和美洲人。"

"满洲王朝相信，当煽动对欧洲人和美洲人的敌对情绪时，它将使自己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现在，满洲政府正在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且将它置于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它计划立即在全国扩展三十六个镇，包括武装部队的所有军种。这意味着近百万人，同时，它计划在六年内拥有三百万现役军人。"

"但是，"孙博士眯缝着眼睛微笑说，"这支军队不可能全是满洲人。他们可以任命许多满洲军官，但是，军队的大部分将是中国人。当满洲王朝指望使用这支军队去使政府为人民接受时，这支军队能够颠覆篡位者并压碎他们。在我看来，这样的事即将发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不会睡觉。只要一种思想感情在中国军队中鼓动起来，它将使这支巨大的武装力量去反对政府而不是为它服务。无论如何，义和团起

---

① 指阿布都·哈米德二世，土耳其皇帝，1876～1909年在位。

义可能已经开始,这场攻击如果不是由于满洲政府的直接煽动,它也将是一种诡计,满洲政府利用它,将攻击矛头指向那里的外国人。"

需要一个共和国

"当篡位者被赶走并被压倒的时候,我赞成中国建立共和政体,赞成选举人民的总统,赞成在这个伟大国家的发展中进行根本变革。"

"我已经在进行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吗?是的。主要是在中国南部,紧靠中法边境。[①] 我们的部队常常与政府军交战。我们已经投身于战斗中。是的,我和部队在一起。但是,我们没有力量保持赢得的土地,因为财力有限,获得武器很困难。"

占领两个城市

博士没有叙述过去的详情,但是,大约三年前来自中国的电报说明,在攻占两个城市时,孙博士的部队在武器装备方面是成功的。

有一次,孙博士的计划被他的一个部下出卖了,博士逃到澳门。藏在水泥桶中的武器被当局没收了。一份发给孙博士的电报谈到了这些装载英国脏东西的桶。一个党员泄露了这些"脏东西"的秘密。当这些水泥桶被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易于用于战争目的的手斧、匕首和别的工具。

在伦敦被逮捕

几年以前,当孙博士从檀香山经由伦敦前往中国时,被中国驻伦敦

---

① 指中越边境,当时越南受法国统治。

大使馆非法地拘禁了。但是，当事情开始成为国际异议的一部分时，他就被释放了。他的护照一再被没收，经常为了安全而被迫逃亡。在日本，他经常在那里设立指挥部。他被中国特务跟踪。在中国，孙博士把生命捏在手里。但是，他说，他比较安全，因为，各个城市的官吏虽然可以知道他的存在，却不能突破保卫他的中国人的强固的警戒线。人民的感情在他一边。

"帝国政府的庞大军队将援助还是阻止你的运动?"

"我相信，它将有益于我们。我们很高兴，他们正在建立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因为我们能以这种感情在军队中工作。当伟大的高潮来临时，军队将成为我们的军队。"

"至于摄政王周围的官员，现在主要是他的亲属。摄政王解除才智出众的中国人的职务，排挤他们，将满洲贵族提拔到高位上。他们中的一个，他的兄弟载涛上星期为了一项使命经过这里，另一个八月将要经过这里。他派遣他们出使，为了让中国人感到，他关注国家的现代化。"

发表于1910年4月21日檀香山《广告者》(*Advertiser*)。

政府支持的暴徒

孙博士说，湖南暴动是排外阴谋的一部分，不过，是不成熟的

中国革命党的首脑孙逸仙博士正在檀香山，和党的成员会谈。几个星期以前，他为《广告者》写作，反复说明，帝国支持对在华的外国人

的攻击，这已从长沙暴动[①]得到证实。

孙博士说，在那个时候，他期待着比1900年规模更大的又一次义和团起义。他预言，这一次起义将要得到拥有三十六镇强大正规军的满洲王朝的支持。接着他宣告，政府正在实施巨大的军事计划。当它变成强大有力之时，当统治者相信，他们可以依靠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时，另一次义和团起义的时机就成熟了。

但是，正如孙博士所断言，长沙暴动是不成熟的。它虽然是王朝未来计划的一部分，而实际上几乎是一次独立的起义。只是由于它太仓促，没能得到帝国阴谋家的支持。

"我仍然断言，中国将要发生另一次直接指向外国人的起义，它将比十年以前的起义更可怕。"孙博士昨天说，"这些起义或暴动直接指向外国人，甚至连我们革命党人都成了目标，我们已有三个学生被杀。不久以前，他们中的几个被烧死。我们这些进步分子，如同外国人一样，已经被包括在攻击范围中。它向我指示，这一切在义和团起义中仅仅是最初的行动。"

"满洲核准组建的中国新军包括三十六镇，每一镇由一万二千个步兵，加上正在训练的骑兵、炮兵，总计一万五千人。两镇三万人组成一个军团。这支军队将由大约一百万武装的现役和后备人员组成。"

"至于我自己的计划，我可能在三周左右离开这里，去美国太平洋海岸照料我们党的事务，然后再次去中国旅行。"

发表于1910年5月26日檀香山《广告者》(*Advertiser*)。

原载《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

① 指1910年4月长沙饥民暴动。事件中，饥民纵火焚烧或捣毁了巡抚衙门、教堂、学堂及洋货店等。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

1911年初，我国边疆地区警报频传：1月3日，英国派兵侵占我国云南西北边境要地片马；2月，英法合办的隆兴公司强索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而陈兵滇边；同月，沙俄借修订《伊犁条约》及所属《改订陆路通商条约》之机，企图攫取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的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在中国全境的治外法权。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标志着中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于是，由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掀起了一场以拒英、拒法、拒俄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的前奏，在舆论、组织、武装等方面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关于这一运动，日本学者小岛淑男以留日学生与国民会为中心进行了多年研究，其成果已结集为专书。[①] 但是国内迄今还没有专著讨论这一问题，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对此也很少涉及。本文将从更广阔的角度审视这一运动，并着重考察同盟会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斗争策略。

云南谘议局的"保界"呼吁与各地立宪派的响应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端于云南谘议局的呼吁。

1月28日，云南谘议局致电全国报馆："英人派兵据我片马，势将

① 《留日学生の辛亥革命》，日本东京青木书店，1989。

北进，扼蜀、藏咽喉，窥长江流域，大局危甚。拟先文明对待，不卖英货，请转各商协力进行。"[①]同时，又上书云贵总督李经羲，要求他一面与政府协力争议，一面在腾越、思茅等地编练重兵，以备不时之用。[②] 2月7日，云南绅商在谘议局开会，议决成立中国保界会。该会决定：第一，联合全国各报馆、各宣讲所，分别著论演说，号召人民起而斗争；联合各省志士仁人，上书外务部，请与英人严正交涉，并以此案发交海牙和平会裁判。第二，在买卖货物、乘载轮船、雇作佣工等方面对英国进行限制，同时奖励并补助自设工厂和轮船公司。宣言要求全国及海外华人在各自驻地普遍设立保界会，并特别声明："我国现值积弱，只宜用文明之抵制，不可为野蛮之举动。"[③]2月11日，商会集会，决定抵制英货，以当月23日为"不卖英货日期"，"过期如有再买卖英货者，即公同议罚"[④]。

云南谘议局的呼吁迅速得到各省谘议局的响应。贵州谘议局复电称："英据片马，先以不卖英货抵制，各界协议，表同情，并电政府力拒。"陕西谘议局复电称："非人自为兵，无以救亡"，建议以3月9日为期，联络各省谘议局，同时致电资政院，奏请就地开办团练。[⑤] 当时，俄国政府企图借修订《伊犁条约》扩大侵略权益的阴谋已经暴露，因此，各谘议局除通电拒英外，又大力呼吁拒俄。江宁谘议局议长张謇致电全国各谘议局，提议联合各局议长，上书清政府，表示"俄旧约万不可徇"[⑥]。3月11日，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长篇文章，指责"俄人之阴险狡诈"和清

---

① 《民立报》，1911年2月4日。

② 《申报》，1911年3月2日。

③ 《云南保界会之宣言书》，载《帝国日报》，1911年3月7日、8日。

④ 《千钧一发之云南》，载《帝国日报》，1911年3月13日。

⑤ 以上引文均见于1911年3月13日《帝国日报》。

⑥ 《议长之救亡电》，载《民立报》，1911年3月2日。

政府的"畏葸无能"[1]，要求各方人士联电政府力争。20日，福建谘议局在得到山西、江西等省谘议局的支持后，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要求召开资政院临时大会，以民气为外交后盾。

在各省立宪派的鼓噪声中，资政院在京议员联名上书总裁溥伦，认为"修订中俄商约一事，实关系西北大局"，要求溥伦根据院章，奏请召开临时会议，但溥伦置之不答。[2] 议员们赴溥伦住宅求见，溥伦又闭门不纳。尽管如此，清政府仍然认为溥伦等压制议员不力，于3月22日下令撤去溥伦、沈家本的资政院正副总裁职务。其间，议员们不肯死心，再次上书，说明各省谘议局纷纷申请开会，不可置之不理。[3] 书上后，清政府的内阁大员们连看也不想看，"温谕阻拒"[4]。

新的民族危机也使海外的立宪派不能安坐，企图借此发动第五次国会请愿运动。2月下旬，在美国的中华帝国宪政会致电国内各团体，声称："敌迫，国会迟必亡，速五请。"[5]但是，国内立宪派由于对清政府镇压四次国会请愿运动的记忆犹新，不愿再行自找没趣，因此帝国宪政会的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当时，立宪派的兴趣在于提前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按规定，该会会期应在夏历六月(7月)，现因召开资政院临时会无望，遂由福建谘议局提议提前召开联合会。5月12日，该会在北京开幕，到会的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及资政院议员共63人，以谭延闿为主席、汤化龙为审查长。会上，代表们普遍提议编练民兵，保卫边疆，反映出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愤懑、绝望，以及忧患意识的加深和自保要求的增强。据该会整

---

① 《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2日。

② 《资政临时会小产》，载《民立报》，1911年3月21日。

③ 《还说什么临时会》，载《神州日报》，1911年3月27日。

④ 《民立报》，1911年5月17日。

⑤ 《申报》，1911年2月24日。

理的资料，在全部27个议题中，与编练民兵或救亡相关的议题即达14个。[①] 讨论中，代表们一致同意，编练民兵，主要用于对外，宗旨在于救亡；在定名上，代表们上书都察院，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均采“国民皆兵”主义，要求各省、厅、州、县会同自治团体，选择土著而有职业者编练“备补兵”，“取民兵之意，而变通练军之法”，同时，号召各省谘议局议员协同各团体，组织体育社，召选学生学习步兵操法、射击教范等科目，以“提倡尚武精神，补助军事教育”[②]。

联合会开会期间，云南籍资政院议员顾视高、张之霖提出片马一案，汤化龙认为：“上奏亦无效，不如作为我辈攻击政府之资料。”[③]此后，片马问题即成为立宪派射向皇族内阁的有力子弹。6月13日，联合会致电各省谘议局等称：“片马交涉，政府主延宕、退让两说，丧权误国，请径电内阁，力争重勘。”[④]6月18日，云南谘议局议长段宇清及资政院议员李增到京出席联合会。段称：“仍恳诸公念片马非云南之片马，乃全国之片马，片马失，则云南失，云南失，则中国不保。”[⑤]24日，联合会通过由湖北省谘议局副议长张国溶起草的《通告全国人民书》，全面抨击皇族内阁的内外政策。当时，清政府曾准备同意英国前驻腾越领事烈敦的要求，“永远租借片马”。对此，通告书评论说：“夫永远租借实割让土地之变名词。”[⑥]26日，联合会又上书外务部，要求将片马问题提交内阁，请另派大臣重行勘界，以固国防。

皇族内阁准备租让片马的消息激起了云南各界的强烈愤怒。8

---

①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6～7页。

② 同上，71、95页。

③ 同上，50页。

④ 《片马事往来电》，载《民立报》，1911年7月15日。

⑤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58页。

⑥ 同上，101～102页。

月，云南谘议局再次致电各省谘议局，呼吁采取联合行动："片马案，阁议永租，请协力电争，力争重勘。"①9 月又电内阁称："片马让租，民情愤激，恳勿退让，中国幸甚！并请从速解决，再迟恐为祸愈烈。"②当时，保界会一类组织遍布云南各地，"会员之泣血断指，誓以死争者前后相继"③。据时在云南的清军第 38 协统领曲同丰报告，"每接见绅耆，彼无不谆谆以片马为词"，"中心愤懑，词意遂多不平"④。这种种迹象表明，与立宪派的愿望相反，一场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留日中国国民会的成立及其与使馆的冲突

留日学界一向是近代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1911 年 2 月 25 日，豫晋秦陇协会于中国留学生会馆集会，筹议行动办法。次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遍发传单，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 1200 余人。会上同盟会会员邹资州、刘揆一、陈策三人提议："对于中俄条约，俄国殊属无理，此事万一政府含糊答应，于吾国北省殊有损害。吾辈当竭力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谘议局，拒绝此约，且须运动各省谘议局成独立机关，组织国民军，以防外敌。"⑤会议决议在一星期内成立救亡机关，向内地及欧美、南洋华侨发送警告书及电报，同时成立国民军，请驻日公使汪大燮代电政府，要求拒俄。会后，河南留学生、同盟会会员刘基炎提议到

---

① 《片马之争》，载《民立报》，1911 年 8 月 15 日。

② 《民立报》，1911 年 9 月 29 日。

③ 《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84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曲同丰上陆军部呈》，秘字第 258 号。

⑤ 《东京留学生大会》，载《时报》，1911 年 3 月 11 日。

使馆要求赞助经费,得到热烈赞同。于是,他被推为总队长,率领全体人员列队向使馆进发。

汪大燮慑于学生的浩大声势,表示赞助国民军,并认捐日币1000元。当时参加游行的自费生及官费生纷纷认捐,谈妥官费生每人认捐10元,由使署预支,以后月扣2元,并由汪大燮签字为信。

27日,留学生总会召开临时各省职员会。会后,以留东全体学生名义向上海《民立报》及二十一省谘议局发电:"俄侵伊犁,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若稍退步,全国沦亡。政府无望,已集全力,捐现金两万余,设立救国机关。"电报要求各省谘议局,"开临时会,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①。同时,又致电爪哇中国会馆,要求南洋各埠华侨"协力进行"②。

3月5日,留日各省同乡会约八十名代表集会,在熊越山主持下达成了"武力救国"的一致意见。③ 会议决定不用"国民军"名义,而称中国国民会,推举同盟会会员李肇甫、傅梦豪、陈策、袁麟阁四人为章程起草员。8月,国民会全体职员集会,通过《留日中国国民会草纲》,确定该会宗旨为"以提倡国民军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④。同时决定各省于12日前推举代表二人组成演说团,共为五团,分往二十一省演说,宣传救亡。13日,又以留日全体学生名义公布《中国危亡警告书》,陈述俄、英、法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说明治标之法是"要求政府严拒俄人之请",治本之法是"联合各省速创国民军",本中之本是"革政治、励教育、兴实业"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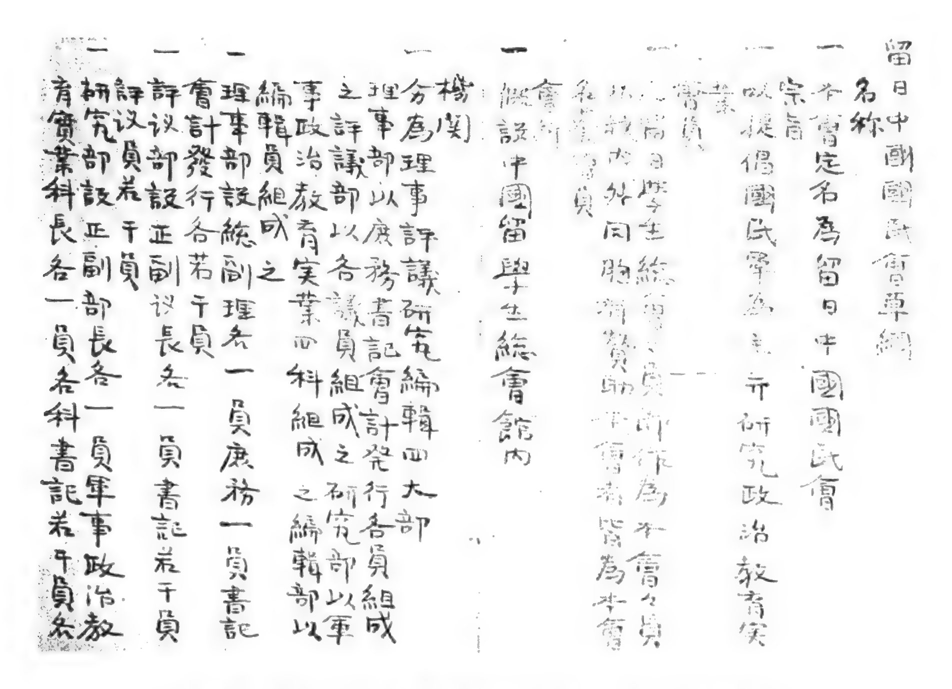
① 《民立报》,1911年3月1日。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各省代表者会合ノ件》,1911年3月12日。

③ 《留学生爱国大会补记》,载《民立报》,1911年3月12日。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



留日中國國民會章綱

一 名称

本會定名為留日中國國民會

一 宗旨

以提倡國民軍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實業

一 會員

留日學生總會會員所作為本會會員

凡內外同胞捐資助本會者皆為本會名譽會員

一 會所

假設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內

一 機関

分為理事評議研究編輯四大部

理事部以庶務書記會計發行各員組成之

評議部以各議員組成之

研究部以軍事政治教育實業四科組成之

編輯部以編輯員組成之

一 理事部設總副理各一員庶務一員書記會計發行各若干員

一 評議部設正副議長各一員書記若干員評議員若干員

一 研究部設正副部長各一員軍事政治教育實業科長各一員各科書記若干員各

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中国国民会(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当中国国民会组建之际，留日女学生也建立了专门的爱国组织。3 月 5 日，同盟会会员林演存、刘其超、康群英及朱光凤四人发起召开留日女界全体大会，到会者百余人。会议选举唐群英为会长。

驻日使馆虽然答应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并不准备兑现。3 月 13 日，留日学生代表赴使馆领取官费生捐款，并要求会见汪大燮，但汪大燮拒而不见。会计课长吴某称：如欲领款，非各人签名捺印不可。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办到的条件，因为留日学生分散在 100 多个学校里，南到长崎，北至北海道，不可能人人办理这一手续。学生代表据理力争也没有结果。15 日，留学生召开评议会，报告 13 日交涉结果，并决定再次向使馆交涉，但汪大燮已先期避走横滨。参赞吴兆麟称：原允垫付的经费由公使做主，已不能付给。于是，48 名代表即决定模仿北京国会请愿团在庆亲王门前长立一夜的例子，在公使馆静坐，直至天明。

3月16日，各校留学生闻讯赶来的已达五六百人，当即在使馆内集会，群情激愤，有人主张昼夜死守，“不得款勿归”，有人主张“自由行动”，但始终没有扰乱行为。[①] 汪大燮不得已，委托横滨总领事传言，要求学生推举少数代表次日在横滨相见。学生们对此表示同意，并于晚8时撤离使馆。

3月16日下午，国民会理事长李肇甫、干事熊越山、职员马伯援（同盟会会员）、颜振兹四人赴横滨领事馆见汪大燮。汪称：“此次举动非尔等所应为。”学生答以“留东全体，同此忠忾，非某等一二人私意”。汪继称：“派代表回国一事，须查明所派之人及演说内容，始能决定。”他还建议将国民会改为爱国会，并再次强调，官费捐款必须每人盖印，要求李肇甫等将国民会办法详细录呈，次日至使馆相见。[②]

李肇甫等向汪大燮告退后即得悉，当日下午3点，使馆指责熊越山等“挟众要求，彻夜不散，殊属无理取闹”，要求学生们“笃志饬修，确循绳尺”[③]。使馆态度的变化根源于清政府的强硬立场。当日，学部致电使馆，声称“学生干预政治，例禁綦严”，“倘有抗拒情事，仍应从严究办”[④]。外务部也致电汪大燮，严词指责其处理不当，声称倘再听任学生等“轻佻跋扈”，将予以革职处分。[⑤] 18日，汪大燮接见李肇甫、熊越山、马伯援三人，出示外务部及学部电报，要求解散国民会。同日，留学生监督处发表禁止国民会布告，声称“此中情形，必系贪人败类，借题生事”[⑥]。

① 《留日中国国民会临时哀告内外同胞意见书》，载《神州日报》，1911年4月6日—14日。

② 《留东国民会始末记》，载《民立报》，1911年3月30日。

③ 《留日中国国民会近况》，载《神州日报》，1911年3月30日。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ノ行动》，明治44年（1911年）3月21日。

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国国民会总会ノ件》，明治44年（1911年）3月23日。

⑥ 《留日中国国民会近况》，载《神州日报》，1911年3月31日。

留日学生召开救亡大会公启(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3 月 19 日,中国国民会全体职员开会。有人提议开大会与使馆宣战,熊越山力主以慎重态度处理各事,李肇甫称:公使既不接受我等要求,强迫亦迥非本会宗旨,今后除依赖各人出资,讲究活动方法外,别无他法。① 最后决议:(1)募集自由捐;(2)根据金额数量,组织演说团赴各省演讲;(3)派代表赴东三省、云南、上海三处;(4)在上海创办日报,作为总机关,联络各省谘议局及公共团体,力图救亡。散会时到会诸人重签姓名,相互勉励说:"凡我中国男儿,当有决心,无论前途有如何危

① 《中国国民会总会ノ件》。

险障碍，吾辈必毅然行之。”[①]

4 月 6 日，发布《留日中国国民临时哀告内外同胞意见书》，详述成立经过及与使署交涉情形，批驳对该会的种种谣诼和误解。《意见书》放弃了组织“国民军”的提法，声称国民会的宗旨在于“兴团练，办体育”，“人以武力来，我不可不以武力应”，要求清政府“许民间以讲武之路”[②]。同日，又发布了经修订的《中国国民会章程》，宣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资格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诸大端”[③]。18 日，归国代表、同盟会会员黄嘉梁（云南）、萧德明（四川）、蒋洗凡（山东）、金树汾（东三省）、王葆真（直隶）、傅梦豪（浙江）六人由东京启程，分赴云南、东三省及上海，国内外运动开始合流。

第一批代表归国之后，留日学界只平静了几天，一个新的高潮又出现了。

4 月上旬，上海《时报》、《民立报》陆续刊载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列强派大员在巴黎集会，商议瓜分中国。这则消息来源不明，很可能是革命党人为鼓舞民气而有意编造的。果然，留日学界忧心如焚，寝食不安，由拒英、拒法、拒俄发展为全面反对瓜分的爱国运动。23 日，留日学生总会、留日学生国民会再次召开大会。在会上，云南留学生赵某指责清政府为“外人之走狗”。直隶学生王某说：“有一言告满族兄弟，今日中国处此瓜分时代，满人也要亡了，汉人也要亡了，满汉皆亡，争持什么呀！”他表示：“今日要救国，第一是泯除满汉。”[④]会议作出 11 项决议，其主要者为：(1)清政府禁止国民会，当以不纳税相抗；(2)发动中国

---

① 《留东国民会始末记》，载《民立报》，1911 年 3 月 30 日。

② 《神州日报》，1911 年 4 月 6 日—14 日。

③ 《民立报》，1911 年 4 月 24 日。

④ 同上，1911 年 5 月 4 日。

劳动者反抗政府；(3)不言满汉二字，以免侵犯满汉一致之权利；(4)再次派遣代表归国，联络各省谘议局，协力工作；(5)向世界各国华商团体募集国民会之基本金。[1] 显然，与会者正确地认识到，在瓜分危机面前，满汉民族有着一致的利益，因而能将“满族兄弟”和清政府加以区分，对“满族兄弟”，强调“一致之权利”；对清政府，强调发动中国劳动者“反抗”。这是正确的决策。

会议前后，各省同乡会陆续选出归国代表约 57 人。他们归国后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运动。

除留日学生外，留德、留美学生也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忱。2 月 21 日，留德学会致电京沪各报，声称：“俄以兵要约，掠地、侵权，时势危急，各国亦不直俄，望速筹救亡，并迫求政府力抗。”[2]3 月 3 日，再电上海《神州日报》等，指责“当局昏庸误国”[3]。与此同时，欧美留学生也摆脱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影响，于 4 月初致电上海《民立报》及各省谘议局称：“俄约败，瓜分著，速鼓民气，倡民捐，练民兵，为国效死。”[4]从而表明他们和留日学界以及国内运动发展相一致了。5 月，由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学生会发起，成立军国民期成会，提倡尚武。29 日，十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芝加哥召开会议，议决改名为爱国会，以“保全主权，联络友国”[5]为主旨。

清末时，云南有一批学生在越南求学，当他们得悉法军陈兵滇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清政府，要求迅速调拨北洋新军迎敌。其后，又刊发小册子，报告法国处心积虑地准备侵略云南的情况，作者沉痛地问道：

---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大会》，明治 44 年(1911 年)4 月 23 日。

② 《柏林华学生公电》，载《时报》，1911 年 2 月 22 日。

③ 《留德学会电》，载《神州日报》，1911 年 4 月 2 日。

④ 《留美学生公电》，载《民立报》，1911 年 4 月 4 日。

⑤ 《美洲通信》，载《民立报》，1911 年 8 月 23 日、9 月 2 日。

"行将被人宰杀，被人淫辱，被人芟薙，被人掠夺"，"我父老思此，其能忍乎"[①]？建议就地征兵，编练新军，以便保卫乡邦。

三大洲的中国留学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以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很少见到的事例。

民族资产阶级的奋起与国民总会的成立

继留日学生之后，上海各界奋起响应。其中，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尤为活跃。

2月26日留日学生全体大会召开后，云南留学生、同盟会云南分会会长杨大铸及会员王九龄即束装归国。3月5日，到达上海，至《民立报》社会晤宋教仁。旋即发布《通告书》，力陈保卫片马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人不欲为亡国民，则必预备死战"，"我国人欲死战，则必先练民兵"[②]。9日，马良、王河屏等人响应云南谘议局的号召，发起组织中国保界会上海分会，并称此举欲"联四百兆有用之身"，"以为政府后盾"[③]。11日，分会在张园集会，到会者约千人，会议公推豆米业资本家、沪南商会委员、同盟会会员叶惠钧为临时议长，同盟会会员朱少屏、王九龄、沈缦云和女医生张竹君等相继发表演说。银行家、工业资本家沈缦云称："前保矿会、保路会等都无实力，以致未能收效。此次应准备实力，庶几收获巨效。"[④]会后，马良再次发表公告，宣布改名为国界调查会。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云南警告》。

② 《滇代表通告书》，载《帝国日报》，1911年3月14日、15日。

③ 《时报》，1911年3月10日。

④ 《中国保界大会记事》，载《时报》，1911年3月12日。

3 月 12 日，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沈缦云、王一亭（银行家、工业家、同盟会会员）、虞洽卿（轮船公司创办人、银行家、工业家）、胡寄梅（钱商）、周豹元、叶惠钧、顾馨一（银行、面粉业投资者）、袁恒之（布商）等联合发表致南北商团启事，声言："西北风云迫在眉睫，同人等现拟组织义勇队，以筹对付之策。"①当日召开大会，到会者千数百人。沈缦云提议，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俟各处商团成立，再行组织义勇队，以达"人自为兵"之目的。宋教仁在会上阐述了片马事件及《伊犁条约》修约诸问题的由来，认为"小之关乎一地，大之关乎全国，亡灭瓜分之祸，悉系此焉"②。会后，即以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为全国商团事务所，一面分函各省商团，一面接受工商各界报名。至 3 月 19 日，工、商、学、绅各界报名者达二百余人。

商余学会是上海商界最早响应的团体。3 月 17 日，它通告招收 16 岁以上青年进行兵学、徒手、器械、枪操等各种训练。培养"商战人材"，"建立商团基础"③。

与组织商团同时，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朱家骅等发起组织敢死团，并于 3 月 3 日发表公启，宣称："外患日迫，强邻胁我以兵，处此危急之秋，非有死士起而捐躯，毁家纾难，断难救祖国危亡。"④至 4 月 20 日前后，报名男女共 150 人。该团以朱家骅为团长，团址设于张静江的通义银行内。它得到了同盟会会员陈其美、戴季陶、于右任、宋教仁、范光启等人的积极支持。

为资助商团，夏月珊、潘月樵等艺人在新舞台演出《国民爱国》新

① 《上海南北商团均鉴》，载《神州日报》，1911 年 3 月 12 日。

② 《记全国商团联合会》，载《神州日报》，1911 年 3 月 13 日。

③ 《神州日报》，1911 年 3 月 17 日。

④ 《全国同胞公鉴》，载《神州日报》，1911 年 3 月 13 日。

剧，将所得戏资均作为全国商团联合会经费。演出中，观众感泣，争先向台上掷捐。沈缦云即席发表演说称："今日并不愿来观新舞台之《国民爱国》，实愿来观诸君之爱国。"[①]4 月 9 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开会欢迎新会友，选举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副会长，名誉正会长暂缺。张瑞兰在会上发表演说："四民之中，士农工三者均无团，惟吾商团发起联合会，可知商在民中，最为热心有志者。"[②]会后公布简章，规定商团须由各省商会发起，全国凡人烟稠密、商业荟萃之区均应组织商团；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设事务所，各府厅州县等设分事务所。[③]

商团最初只是商民维护地方治安的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表明这个阶级已经不满足于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正在准备以武装力量保卫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

受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的影响，4 月 23 日，朱伯为等在西园开会，组织中国学界联合会。到会者七百余人。沈缦云代表全国商团联合会致词，他说："当今时代，当固结团体，一手保守自己，一手抵御外侮，则列强不能侵人。"刚刚归国的留东国民会代表傅梦豪、黄嘉梁也在会上力陈外患日亟，建议各省普遍成立民团，加速准备武装。[④]

傅梦豪等到沪后，立即展开活动。4 月 26 日，他们举行招待会，上海知识界及商界头面人物沈敦和、王一亭、沈缦云、杨千里、陈其美、包天笑、朱少屏等二十余人出席。傅梦豪在答词中表示："愿联合各界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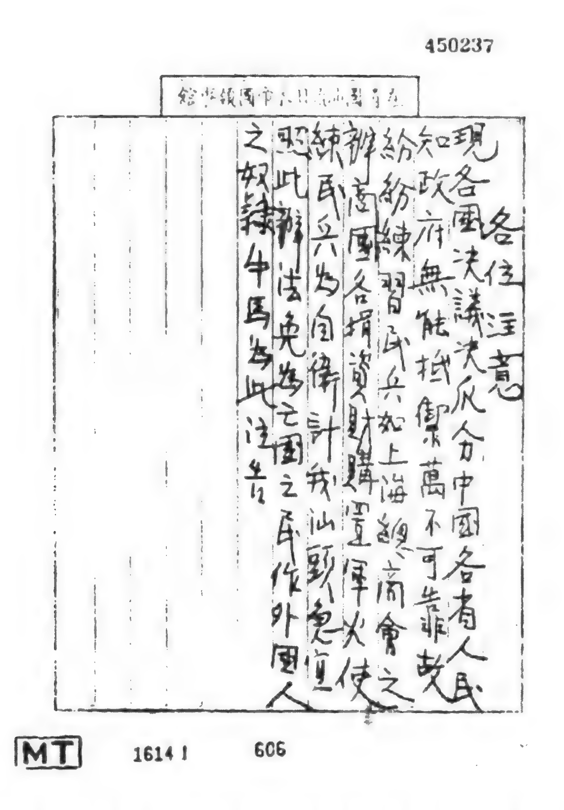
---

① 《丽丽所观剧记》，载《民立报》，1911 年 3 月 21 日—22 日。

② 《商团之风云大会》，载《民立报》，1911 年 4 月 10 日。

③ 《全国商团联合会缘起》，载《民立报》，1911 年 4 月 12—17 日。

④ 《全国学界联合会记事》，载《民立报》，1911 年 4 月 24 日。



各位注意

現各國決議決瓜分中國各省人民知政府無能抵禦萬不可靠非故紛紛練習民兵如上海總商會之辦商團各捐資財購置軍火使練民兵為自衛計我汕頭急宜取此辦法免為亡國之民作外國人之奴隸牛馬為此注告

汕头各界号召练习民兵、举办商团的传单(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成一大团体,作总机关,以激发全国。”①

5 月 7 日,由上海日报公会、嘉定旅沪同乡会、全国商团联合会、福建学生会、全国学界联合会、湖北旅沪同乡会、中国精武体操会、云贵旅沪同乡会、江西旅沪学会、四川旅沪同乡会共十团体发起召开欢迎国民会代表的大会。会上,傅梦豪再次提出:“全国团体总机关之设,为我人不可刻缓之任务。”②11 日,傅梦豪及山东归国代表蒋洗凡邀请上海各团体

① 《国民会代表记事》,载《民立报》,1911 年 4 月 27 日。

② 《欢迎国民会代表》,载《民立报》,1911 年 5 月 9 日。

及报馆记者集会，讨论成立事务所。6月11日，上海各界四千人在张园召开大会，宣布中国国民总会成立，以沈缦云为正会长，马相伯为副会长，叶惠钧为坐办。15日发表宣言，声称："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应尽义务为宗旨。"[①]次日，又布告全国，要求各地迅速设立分会。为了支持国民总会，留日中国国民会并派同盟会员章梓到上海工作。

自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上海商团发展迅速。书业、参药业、豆米业、珠玉业、水果业及闸北、沪南、回教等商团纷纷成立并开操。根据7月26日叶惠钧在沪南商团体育研究社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当时上海商团已发展到2000人之多，是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了。[②]

全国商团联合会成立后，福建、南昌、营口等地陆续建立商团，通州商团还派人到上海联络。《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上海为通商之大埠，上海商学界之举动，国人恒取为模范。今沪商既有义勇队之组织，全国商学界必竞相效法，将来我国民兵之基础，或因是以立，未可知也。"[③]作者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是，如果引导得法，商团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更大发展并非没有可能。

清政府的禁阻与运动向各省的扩展

运动首先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不安。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照会外务部，声称京外各报，登载中俄交涉

① 《民立报》，1911年6月15日。

② 《商团体育开幕记》，载《光华日报》，1911年8月19日。

③ 宣（林白水）：《论上海华商组织义勇队事》，载《时报》，1911年3月10日。

事,“肆意诋毁,摇惑人心,请设法抑止”[1]。同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也照会外务部,反对中国人民普练民团。照会说:“近来奉吉各处商民,啸聚日多,日夜操练,名为防匪,实系排外,若不即时查禁,恐又肇拳匪之祸,务请设法解散,以遏乱萌。”[2]

清政府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3 月 1 日,外务部致电各省督抚,指责外间报纸关于片马、伊犁的交涉“言多失实”,又指责留日学生的举动“摇惑人心,牵动全局”,要求各省督抚“解释谣言,严密防范,勿任酿成事端”[3]。同时,汪大燮也密电外务部,声称东京留学生“其势汹汹,不可复遏,诚恐激成暴动,关系大局,请转致学部、陆军部设法预防”[4]。其后,清政府学部、陆军部、政务处纷纷致电各省督抚,要求“切实查禁”,“严加防范”,甚至声色俱厉地表示:“嗣后倘有前项情事,惟各该主管是问。”[5]在清政府的严词督责下,各省督抚及有关官吏纷纷照办。

首先是控制舆论。早在 2 月下旬,两广总督张鸣岐就根据清政府新近公布的报律,出示禁止各报登载中英、中俄、蒙藏交涉各事,违者罚款,或将记者监禁六个月。[6] 3 月初,汉口某报登载留日学生来电,湖广总督瑞澂立命巡警道传谕各报馆,不准刊登有关函件,违者按律究罚。[7]

其次是禁止开会集议。瑞澂称:“边务交涉,朝廷自有主持,岂容无

---

① 《呜呼中国人之言论自由权》,载《帝国日报》,1911 年 3 月 16 日。

② 《国民军乎拳匪乎》,载《神州日报》,1911 年 3 月 18 日。

③ 《外务部致各督抚英人进兵片马事报传失实请解释电》,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一九。

④ 《汪大燮电告外务部》,载《时报》,1911 年 3 月 13 日。

⑤ 《电报中之国民军》,载《民立报》,1911 年 4 月 13 日。

⑥ 《时报》,1911 年 2 月 23 日。

⑦ 《瑞督饬禁组织国民军》,载《时报》,1911 年 3 月 10 日。

知学生开会干预。"[①]陆军部要求各省陆军学堂严禁学生与闻。保定陆军学堂有几个学生试图开会,竟被诬以"将据火药库作乱"[②]而遭逮捕。

清政府尤为恐怖的是结社。当时,清政府虽已颁布结社律,但那不过是一种装饰。保界会向清政府申请立案时,清政府即以"国家政事不准干预"为理由,通电各省禁止。[③] 对于敢死团,清政府更为惶恐,密电江督,"严查团内主名,速行驱散"[④]。4 月 27 日黄花岗起义后,驻日使馆向清政府报告,"广东革党起事,确系国民会主谋",要求拿办归国代表,于是,皇族内阁立即电令各省严防国民会会员至内地"煽惑",并查禁国民军。[⑤] 但是,这些禁令并未起多大作用,运动还是在一些省份内得到了发展。

东北　留日中国国民会派赴东三省的代表王葆真(卓山)、金树芬(鼎勋)于 4 月下旬抵达奉天后,即从事公开和秘密两方面的活动。公开活动有:会见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联络谘议局、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团体,组织体育会及国民会奉天总会,同时又注意团结满族、蒙古族爱国人士。他们还在旗籍人士广铁生、关天生的积极支持下,创办《国民报》。秘密活动有:会见陈干、商震、刘艺舟等同盟会骨干,决定分头联络同志,促进革命运动。[⑥] 9 月 14 日,国民会吉林分会成立,以蒙古族人士庆山、杨梦龄为会长,满族人士松毓为副会长,金树芬为干事长。[⑦]

福建　3 月中旬,福州城乡大量出现速办团练的传单,陈述英、法、

---

① 《瑞督饬禁组织国民军》,载《时报》,1911 年 3 月 10 日。

② 《保定消息》,载《神州日报》,1911 年 3 月 22 日。

③ 《保界会又将查禁》,载《民立报》,1911 年 3 月 22 日。

④ 《敢死团消息》,载《神州日报》,1911 年 3 月 26 日。

⑤ 《民立报》,1911 年 5 月 12 日;《光华日报》,1911 年 7 月 4 日。

⑥ 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五),398～401 页。

⑦ 《吉林通讯》,载《民立报》,1911 年 9 月 18 日、29 日。

俄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声称“在今日欲求自保之道，莫如筹办乡团”。传单还要求“乡乡有团，人人能兵”，“由一乡而一县，由一县而一府，由一府而一省”，形成乡团的大联合。22 日，福建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仿照上海办法，筹办福州商团公会，规定每一商号至少须出一人入会操练。① 26 日，闽县城镇自治联合会提议市区组织商团，近郊组织体操会，乡村组织农团。② 4 月 7 日，上海福建学生会急电福州《建言报》，声称各国在巴黎密议瓜分中国，要求故乡父老“速办民团，图死抗”。此后，《建言报》连续发表《呜呼福建》、《再告我福建同胞》等文章，号召福建人民行动起来，拯救福建。③ 5 月上旬，留日国民会代表孙容居等 30 人及福建旅沪同乡会、学生会代表等结伴归闽，访问谘议局议长及常驻议员。22 日，谘议局、教育总会、商会、实业协会等团体集会，议决用个人名义签禀呈递闽督，请求速办民团。

在各方倡议下，厦门体育会、建宁府体育会、福州商团、霞浦团练筹备会、福建团练期成会等先后成立。

浙江　6 月上旬，留日学生代表俞景朗、詹麟来、吴玉、李砥、李复真及旅沪同乡代表许开甫等回浙，访问谘议局议长沈钧儒。15 日，在法学协会集会，决定组织全浙国民尚武分会，推沈钧儒起草章程。该会发起人除沈钧儒外，还有同盟会会员陈训正（布雷）、许炳堃、褚辅成及地方知名人士经亨颐等。④ 30 日，该会召开成立大会，以徐班侯为会长，褚辅成为副会长；上海国民总会代表章梓、陈其美自沪莅会，以示支持。

---

① 以上引文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时局ニ関スル神州民间运动模样报告ノ件》，明治 44 年（1911 年）3 月 31 日。

② 《闽人报告之风云》，载《民立报》，1911 年 3 月 31 日。

③ 《建言报》剪报，见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677 - 688。

④ 《浙江国民会又盛》，载《民立报》，1911 年 6 月 11 日。

全浙国民尚武分会要求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学团、商团、工团、农团。成立会后，俞景朗、李砥、吴玉、陈训正等分赴绍兴、台州、湖州、衢州、宁波、嘉兴、严州、金华、嘉善、石门等地活动，陆续建起了一部分国民尚武分会和民团。

运动发展得较为顺利的还有山东、江苏等省。留日山东国民分会所派代表丁惟汾、颜仲文于6月1日抵达济南，遍访绅学各界，先后在谘议局、教育总会等处召开谈话会，决定成立山东国民分会。江苏由于工商业、教育业较为发达，因此，无锡、南通、苏州、宜兴、江都、丹徒、丹阳等地普遍建立了国民分会、商业体操会、体育会、商团体育会一类组织。此外，运动在云南、广西、广东、湖北、直隶等省也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国内反帝运动的发展。3月份，秘鲁侨商何贺民等致电粤商自治会称：秘报盛传瓜分中国，侨民震悼，迄速电复，并分呈各界。[①] 同月，横滨华侨致电北京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声称“列强无理要求，南北进兵据扰”，要求“筹策对待救亡”[②]。5月28日，横滨富商张泽广、缪菊辰、邓浩辉等人发起召开在日华侨大会，邀请李肇甫、马伯援、夏重民等参加，呼吁创设国民军，并募集经费。侨商们表示：“能救中国者，吾辈愿生死供养之。”[③]同月下旬，泗水华侨散布传单，主张“有力者出力，有财者出财，联合各省民团，倾覆恶劣政府”[④]。6月初，泗水书报社发起筹集救亡捐，以之作为国民军的后盾。[⑤] 不少华侨表示：“区区军费，当竭力相助。”

---

① 《秘鲁华侨来电》，载《时报》，1911年3月6日。

② 《横滨公电》，载《时报》，1911年3月5日。

③ 《华侨创设国民军》，载《光华日报》，1911年6月27日。

④ 《民族思想之发达》，载《光华日报》，1911年5月26日。

⑤ 《光华日报》，1911年6月7日、7月8日。

上述事实说明，只要帝国主义的侵略存在，只要清政府坚持媚外卖国政策，那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就必然是不可阻遏的。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之后不久，保路运动又以更大的规模爆发，并且迅速演变为推翻清王朝的全国性武装起义。

同盟会在运动中的作用及其斗争策略

同盟会领导层在 1907 年春夏之后，即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孙中山长期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灰心失望，并一度产生过抛弃同盟会，另建新党的打算。[①] 这种情况到 1910 年冬才有所改变。当年 6 月，孙中山经檀香山到日本后，陆续会见了同盟会骨干。11 月，又命刘揆一复兴同盟会本部。自刘揆一被推为庶务，一批新人进入本部后，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出现了转机。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专注于发动武装起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忽视合法斗争，忽视群众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当 1911 年拒英、拒法、拒俄运动发生、发展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一心一意为筹备中的武装起义募集经费。他既对国内情形隔膜，又怀疑群众热情的持久性。曾经有人向他汇报上海敢死团的情况，但他却丝毫不感兴趣，声称："上海之发生团体向无能坚持长久者，料此团亦不能免蹈此弊。"[②]当然，不能认为孙中山的批评完全没有道理，但也必须指出，孙中山不懂得将群众的热情鼓舞起来，使之坚持下去，正是革命政党的任务；军事起义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波起浪涌，相互促进。和孙

① 参阅本书《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②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521 页，中华书局，1981。

中山一样，黄兴也未能对运动给予应有的关注。如曾经有人建议，革命党应利用人们反对英军占领片马的爱国情绪，在云南发动起义，但黄兴由于顾虑会引起国际纠纷，决意将起义改在广州发动。① 起义失败后，他为复仇主义情绪所支配，力主以个人之力进行暗杀，仍然忽视对运动的领导或指导。

尽管如此，熊越山、李肇甫、刘揆一、宋教仁、陈其美、沈缦云、叶惠钧、刘基炎、陈策、夏重民、孙竹丹、傅梦豪、黄嘉梁、杨大铸、蒋洗凡、萧德明、王葆真、袁麟阁、陈训正、褚辅成等一批同盟会会员仍然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运动。他们不仅在各类组织、各类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且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团结盟友，表现出一定的斗争艺术。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虽然衰朽不堪，但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活动仍然十分坚决。2 月 26 日的留学生大会，决议成立国民军，其后改名国民会，废弃组织国民军的提法，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因为既名之为"军"，则不仅在日本无法活动，而且在清政府统治下也无法活动。运动中，同盟会没有公开出面，而是通过国民会这一群众性组织进行活动。部分激进分子曾经主张抛弃国民会，"以破竹之势与满洲政府肉搏"②。但是，这一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们力争不提出激烈的口号，不超出合法斗争所许可的范围，一切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以"留日全体学生公启"名义发出的《中国危亡警告书》特意加上"圣上御极"，"两朝圣后，忧国爱民"一类的保护性字眼，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们还力图说明："国民会唯一之目的在救国，国为大家共有，则救之之道须大家努力。"③此外，《哀告同胞书》声明国

① 《黄毓英传》，载《南社》第 10 集。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留学生各省代表者会合ノ件》。

③ 《国民会代表记事》，载《民立报》，1911 年 4 月 27 日。

民会不提倡革命，归国代表的活动也规定为不得宣传革命。所有这些，都便于争取广大的同情者，并使清政府的镇压失去有力的借口。归国代表们之所以能在国内开展某些活动，这是原因之一。

同盟会的本部设于海外，其活动方式一般为在海外策划，在边疆或沿海地区发动起义。这种“输入式”的革命便于从海外获得武器和军饷，其缺点是难于和国内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缺少立足生根之地。留日国民会决定将中国国民总会设于上海，在各地设立分会，这就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国外转入国内，从边疆转入腹地，从而有利于国内革命运动和群众运动的发展。后来，同盟会中部总会将本部设于上海，在各地设分会，显然也是出于同一考虑。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前期着重利用会党。会党虽和社会下层联系密切，但散漫、落后，易于见利忘义，所以同盟会后期转而依靠新军。新军掌握现代武器，组织性、纪律性强，但因其处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动不易。在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同盟会会员们号召发展商团、民团以至体育会一类组织，这就开辟了新的武装力量的源泉。商团、民团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地方自保性的武装组织，既为清政府所允许，也易于为各界所接受。在筹建过程中，同盟会会员们又特别说明，其目的在于“为政府之后援”，“为国家宣力”，努力以合法的外衣包裹不合法的内容，这就便于为起义积蓄力量。事实证明，在武昌起义后的各地光复中，上海、福建等地的商团、民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谘议局的议员们一般主张君主立宪，维护清王朝，在政治路线上和革命派对立。但是，立宪派又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挽救民族危机，和革命派有一致之处。运动中，同盟会会员们没有把立宪派和谘议局看成敌对势力，而是以之为盟友，利用谘议局进行工作。2月26日的留学生全体大会的三个发起人中间，夏重民是同盟会会员，胡源汇则是立宪派。会议决定发动各省谘议局参加抗争。3月3日，云南谘议

局即复电赞同，声称双方的救亡办法“名异实同”[①]。其后，留日国民会和各省谘议局之间函电往来，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归国代表们一般也都和谘议局联系，在谘议局的赞同下，或以谘议局的名义组织各项活动。谘议局和绅、商、学各界联系密切，又是清政府承认的机构，这就为同盟会会员们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运动中，同盟会会员们还注意争取地方督抚如赵尔巽、增韫等人的支持，从而取得了公开活动的条件。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前，这一阶级在各项政治活动中日益活跃。留日国民会注意联络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各地商界人士，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微弱，仅仅依靠这一阶级绝不足以成事。4 月 23 日留学生全体大会上，同盟会会员夏重民提议发动劳动者反抗清政府，会议并就此作出了相应决议，这就找到了推翻旧制度的真正强大动力。遗憾的是，革命党人始终未能贯彻这一决议，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他们始终找不到动员和组织劳动者的有效办法。

在运动中，某些同盟会会员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主张。例如刘揆一于 3 月下旬发表的《汉、满、蒙、回、藏民党联络意见书》[②]，主张“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党”。意见书克服了革命党人中长期存在的狭隘种族主义思想，强调各民族人民在反对瓜分问题上的一致性。意见书说：“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意见书提出

---

① 《云南公电》，载《时报》，1911 年 3 月 5 日。

② 该文最初名为《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创立意见书》，以传单形式散发，1911 年 3 月 21 日、22 日在《民立报》连载时改名为《汉、满、蒙、回、藏民党联络意见书》。

了在各族人民之间“通其气谊”、“通其学业”等计划，认为这样“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①]。这是革命党人在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

《民立报》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宣传机关。宋教仁、于右任、范光启等人在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字，宣扬爱国主义，为运动推波助澜，其中，以宋教仁的作品最为突出。他先后发表《滇西之祸源篇》、《二百年来之俄患》、《承化寺说》、《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俄人何足畏哉》、《讨俄横议》等文，从世界大势、边疆地理、对外交涉等方面立论，说明“对英划界”、“对俄改约”，是“近日存亡攸关”的大问题。他指责清政府“聋聩成性”、“冥顽不灵”，不知“国际政局推移变化之理”，号召国民“急起直追，以自为计”[②]。他和陈其美等一起，在联络上海资产阶级、推动商团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在宣扬和实行革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自1907 年以后，它的弱点、缺点也已充分暴露，到了不能不变的地步。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中，参加国民会领导的同盟会会员的上述做法就体现了这种转变；稍后，宋教仁等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为了进行这种转变。但是，形势不等人，在同盟会尚未完成这种转变的时候，武昌起义的炮声就响起来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 年第 5 期

---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MT16141，512－513。

② 《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载《民立报》，1911 年 3 月 16 日。按，《宋教仁集》对此文及《俄人何足畏哉》均失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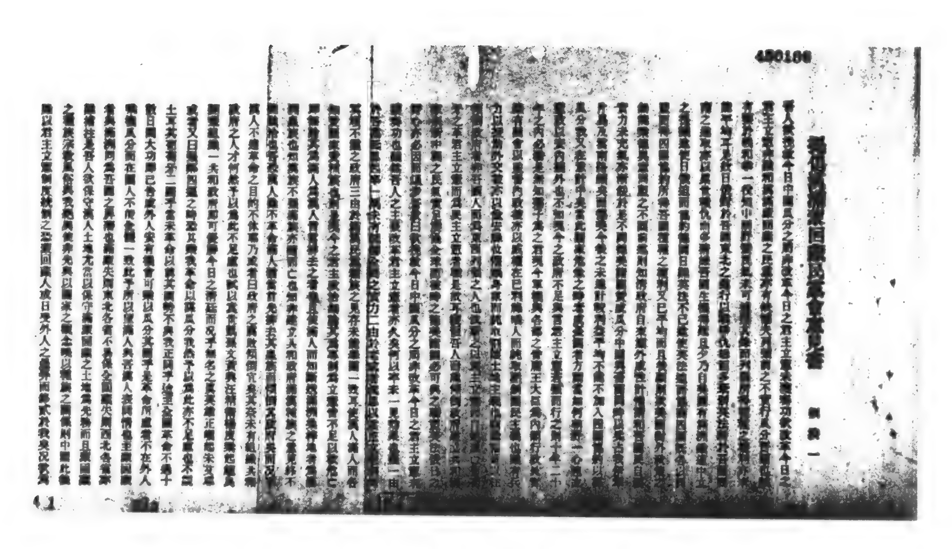
附：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排满革命”，由于满洲贵族集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顽固地拒绝改革，因此，这一口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颇有“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之概。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却出现了“联满革命”的主张，其代表作是同盟会会员刘揆一的《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创立意见书》，这是个迄今尚未有人论及，但却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件。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1903 年留学日本。1904 年在长沙与黄兴等共同发起组织华兴会，1907 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干事，代行总理职务。1911 年 3 月，因反对俄国侵略伊犁、英国侵占片马，东京留学生带头掀起反帝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刘揆一以传单形式散发了这一文件，原件现存日本外务省档案馆。

该文一开始就说明主旨：“吾人欲挽救今日中国瓜分之局，非改革今日之君主立宪未获奏功；欲改革今日之君主立宪，非融和汉、满、蒙、回、藏之民党亦有缺憾。”接着，该文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危急形势，认为中国只有实行共和，才能挽救危亡，与列强并立于世界。该文说：

> 浸假吾人而能倾倒政府，建立共和国家，则新中国之民气，实足震慑全球，而彼时之德、美诸国，必可与之联盟，英、法、俄、日之野心，亦必因而退步。



刘揆一的《意见书》(采自日本外交史料馆)

但是,为什么革命党人长期奋斗而不见效果呢?该文认为,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满汉民党种族之见存,未能举国一致”。该文说:

> 使汉人、满人而各知爱国家、爱种族也,则是现今之君主政治,无论其为专制,为立宪,皆不足以救危亡,即无论其为满人,为汉人,皆当排去之者也;且使满人而知断送满洲桑梓地者为满洲皇族也,知汉族不强满族亦随而亡也,知非建立共和政府,满汉种族之意见终不能融洽也,吾恐汉人虽不革命,满人犹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矣。

刘揆一不是阶级论者,他不懂得阶级分析。但他能将一般“满人”和“满洲皇族”区分开来,认为汉满两族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满洲皇族”的卖国政策不仅违背了“汉人”的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满人”的利益,“满人”应当“首先排去其皇族而倾倒其政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深刻

而正确的见解。

刘揆一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危机面前，不仅满汉之间，其他各族之间也应该团结一致，他说：

> 满、蒙失，则东北各省不易保全；回、藏失，则西北各省亦难措捂，是吾人欲保守汉人土地，尤当以保守满、蒙、回、藏之土地为先务。

他建议，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广泛展开交流，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包含各民族的革命政党——“汉、满、蒙、回、藏民党会”，共同进行革命。文章说：

> 为今之计，刻不容缓，先择蒙、回、藏人之有知识者，与吾汉人及满人通其气谊，通其学业，然后多殖汉人、满人于蒙、回、藏地，以改良其政俗；多移蒙、回、藏人于腹地，以联络其声援，庶内可倾倒政府，而建设共和国家，外可巩固边疆，而抵抗东西强敌，此予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之大意也。

文章完全没有早期革命党人那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情绪。主张“联满”、“联蒙”、“联回”、“联藏”，把中国各族人民都看成是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力量，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也是这一文献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价值所在。

原载《团结报》，1988 年 2 月 9 日

何天炯谈“三·二九”起义

——读宫崎滔天家藏书札

关于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的情况，黄兴和胡汉民在事后曾致书南洋华侨，作过详细报告，有关文献已为历史学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封何天炯致宫崎滔天的信札，也是谈“三·二九”起义的。此信作于1911年5月19日，今存东京宫崎滔天故居，尚未发表过。

何天炯，广东兴宁人，同盟会会员，“三·二九”起义的参加者。该函称：

> 此回失败最大原因，在胡飞卿一人。伊为人私心太重，复意气用事，且误用侦探陈某，委以绝大之任务。事发之时，胡复偷生怕死，伊所招募死士一百人，临时无一人在故也。其次之罪，则为姚雨平（嘉应州人），临事仓皇，皆由平日所办之事半真半假，致事变之时，克强独力难持。

胡飞卿，即胡毅生，胡汉民之弟，“三·二九”起义前任储备课长，负责购办并运送武器军械，他将此事委托给在香港开设头发公司的陈镜波，开始运子弹，均顺利运到，因此愈得信任。但不料陈是清政府的侦探，清政府由此得知起义准备情况，作了戒备。三月二十七日（4月25日），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调清军二营入城，加强市内的防守力量。胡毅生、陈炯明二人因而提议改缓起义日期，并且遣散了原定由胡毅生率领的一百多人的队伍。姚雨平原任调度课长，负责在清军中进

行策反，他曾向黄兴报告，清军吴宗禹部有不少革命同志，可以依靠，起义有成功把握。但起义时，大部分无反应。本函称姚“平日所办之事半真半假”，指此。

该函又称：

> 然幸克强所部，人人奋勇向前，致满兵伤亡，三倍我党（我军伤亡及事后被擒者约千人以上）。林时爽君脑部中枪，死于督署门前。东京田野方所住之同志，共死五人，深可伤也。克强君手负伤，三指切断，不日可以全愈矣。但此事乞阁下暂时保密，以刻下满洲政府以为克强已死，今若骤然发布，则东京侦探必告知满廷故也。赵声君于昨日病死，皆由事败后血热气郁，致生肠疾亡。呜呼！吾党又弱一个矣。

起义原定十路同时发动，但因留在广州的革命党人已大为减少，临时改为四路：黄兴攻两广总督衙门；姚雨平攻小北门，迎接城外新军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守大南门。但届时姚、陈、胡三路都没有发动，只有黄兴一路孤军奋战。林时爽，即林文，他热烈支持黄兴的起义计划，曾慷慨表示：“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在撤出总督衙门时，因向清军喊话，中弹牺牲。黄兴则在右手被击断三指后，仍然以断指射击，率队冲杀。其他人也都表现得十分英勇。本函所述个别情节，如伤亡及事后被擒人数虽不准确，但称“克强所部，人人奋勇”，则是事实。该函继称：

> 此回事虽失败，然不失名誉，故将来对外洋同志，仍可筹款。惟克强此刻，十分愤激，深恨同志之误事，故欲不预闻大局之事，而行个人实行之事，故刻下同人多方劝慰，尚未气平耳。

"三·二九"起义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先后从南洋、美洲等地募得经费十余万元,黄兴之所以明知条件不利而坚持起义,其原因就在于不愿失信于慷慨捐输的爱国侨胞。"三·二九"起义中,革命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必死的决心如期发难,保持了信誉,因此,何天炯对以后的"筹款"工作,仍持乐观态度。当时,黄兴在香港闭门谢客,准备牺牲个人生命,行刺李准,为烈士复仇,同志纷纷劝阻,有人并表示,愿代替黄兴行事。本函称:"同志多方劝慰",虽仅寥寥一语,但却反映出当时革命党人之间高尚而温暖的情谊。

函末附笔称:

> 吴君永珊及熊君月珊俱于昨日出帆,向贵国进行,届时情形必能面述。

吴永珊,即吴玉章,也是"三·二九"起义的参加者。这一附笔对研究吴玉章的生平活动当不无裨益。

原载《团结报》,1988年3月29日

为有炮声动地来

——清末报纸对武昌起义的反应

1911年，黄鹤楼侧一声炮响，立即震动了中国大地，各报纷纷以之为头条新闻发表消息和评论。由于办报人的观点、态度、识见彼此相异，因此，对这次起义的反应也就各不相同。近百年的时间过去了，重新检读当时的报纸，会获得不少饶有意味的启迪。

《民立报》

1910年10月11日创刊于上海。前身是《民呼报》、《民吁报》。创办人为于右任。它是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宣传机关。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该报在第二版专电栏内共刊出起义消息11条，兹录其主要者如下：

〇十九日武昌兵变，闻有革党乘势起事，武汉间交通已断。（二十日汉口电）

〇省城变起，闻因十八晚有党人三名，身服陆军制服，被统带疑有不轨，捕解督署，立时正法，军队及党人之在城内者遂即起事，以炸弹抛掷督署。闻督署及财政局、电报局均已被毁。护卫兵出而弹压，相搏甚猛烈。瑞督已不知所往。（同上）

〇武昌乱事，党人宣布并不排斥外人。各国军舰停泊汉口，共

有五艘，均未行动。各教士、旅客亦无惊恐者。（同上）

〇十九日汉口俄租界中先发见炸弹忽然爆烈，即查有革党起事谋画，此信即传至武昌，严行搜捕，连拿三十余人，半系兵士，且将中三人正法，因激成大变，不可制止。正在轰闹之时，忽报有人以炸弹三枚抛掷督署，各衙及电局同时起火，闻武昌城外营房亦皆被焚。（同上）

根据武汉地区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大会的决定，起义原定10月6日（中秋节）举行，由于湖广总督瑞澂已有戒备，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改期于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起事。但10月9日（八月十八日）中午，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多人牵连被捕。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晨，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被害。当晚，工程第八营响起了第一枪，起义全面爆发。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起义军攻占督署，瑞澂逃往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往汉口，《民立报》的上述报道虽然简略，但除少数情节有误外，大体正确。

10月13日，于右任以骚心为笔名撰写了《长江上游之血水》的短论。文云：

秋风起兮马肥，兵刃接兮血飞。蜀鹃啼血兮鬼哭神愁，黄鹤楼头兮忽竖革命旗。噫！长江上下游，七、八月间真多事哉！吾其歌乎？吾其哭乎！

又云：

呜呼！蜀江潮接汉江潮，波浪弥天矣！吾昨日登吴淞江口，而

俯视长江，滚滚者皆血水也。此三日间天地为之变色矣！噫！

革命党者，万恶政府下之产儿，故有倒行逆施之政府，欲求天下不乱而不得。何也？制造革命党也。

天乎！天乎！谁为祸首，使天下糜烂至此，政府尚不自罪！

武昌起义使于右任喜悦万分，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也仿佛可以看到他那颗怦然跳动的心。但是，上海当时还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于右任的这篇文章又有写得含蓄的一面。它主要指责清政府，而没有直接表示支持革命。

14日，《民立报》刊出署名渔父（宋教仁）的社论《交战时之中立论》，欢呼“外国竟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矣，竟为革命军守中立矣”，同时，刊出黎元洪小照，支持革命的态度更趋明朗化。不仅如此，它还在专电栏刊出伦敦、东京两地“关于中国变乱的要电”。《泰晤士报》称：“中国全国人民皆深藏反对不良政治之志，此次流血，实于中国救亡之前途大有裨益。”东京各报称：“此次湖北革命军举事之得机，进行敏捷，并称其严行军律，不扰害外人生命财产，保护人民治安，深合文明举动，其程度实在土耳其、墨西哥之上。”在“中国变乱”的标题下，借外报之口宣传武昌起义的正义爱国性质和“文明”程度之高，具见编者的匠心与苦心。

《时报》

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为狄葆贤，该报最初接受康有为、梁启超资助，但言论并不尽为康梁所满意。从主要方面看，它是

江浙立宪派的喉舌。武昌起义，对于该报来说，颇有事出意料之感。因为10月11日，它还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湖北当局“疑心生鬼，庸人自扰”，但是起义竟然发生了。10月12日，该报发表了一组“专电”，其主要者为：

〇湖北革命党联合第八镇新军，昨晚（十九夜）起事，向督署围攻，抛掷炸弹，全署被毁。瑞督保卫队保护出城，不致遇难，现移驻楚豫兵轮。（二十日午刻汉口专电）

〇先是革党在武汉密谋举事，数月前勾通军队，输运军械，种种布置，本定于四月间与广州同时响应，嗣因广州失败，鄂防严密，故暂静状。此次川乱，鄂军纷调入川，省城空虚，故乘机起事。初定十五日，继又改期十八，拟围攻督署，旋为英、法、德领事侦悉，密向瑞督告变，十八日下午遂下令闭城搜拿，先在小朝街拿获三十余人，内有女党二名，并搜出炸弹多枚，讯明首要三人，先行正法。次日仍闭城查搜，革党见谋已泄，故即于是日下午起事。（二十日戌刻汉口专电）

《时报》是大报馆，它在汉口有记者，所以能从10月11日午刻至戌刻不断发电。它所发的消息，也大体正确。

当日，该报发表了署名“冷”的时评——《意料之外》，文云：

德法不交战而意土交战，出人意料之外；湘粤不抗路而四川抗路，出人意料之外；成都不失守而武昌失守，尤出人意料之外；广州不失守而武昌失守，更出人意料之外。呜呼，自今以往，出人意料之事，岂第止此哉！然而政府则犹梦梦！

冷，即《时报》主笔陈冷血。他的这篇时评写出了武昌起义给予人们的巨大震动，作者并预言，“出人意料之事”将不断发生，表现了一个报人的特殊敏感。次日，作者再次发表题为《黄兴与荫昌》的时评，文云：

> 武昌失守，汉阳又危，革命军既有兵队，又有军械，与政府俨然有对峙之势矣，而政府亦以对峙相待，命陆军大臣统近畿军队乘车而下，相见于江汉之间。是役也，南北战欤？人民与政府战欤？革命与专制战欤？其胜其败，势将大异。

本文以提问的形式指出了战争的性质，并且预言它的胜败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大局。

作为江浙立宪派的喉舌，《时报》不赞成武昌起义。10 月 13 日，它曾发表社论，要求清政府惩办主张铁路国有的盛宣怀等人以挽回民心，消弭革命。但是，江浙立宪派在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均遭镇压，特别是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之后，又有同情革命的一面，因此该报 10 月 14 日起特辟专栏，报道武昌和各地起义情况，透露了这个政治派别向革命转化的趋势。

《申报》

1872 年创刊于上海，最初创办人为外商，1906 年归席子佩所有，它的政治态度较保守。10 月 12 日，该报在专电栏以《武昌失守》为题发表了一组电讯，其主要者为：

○鄂垣节前即传革党起事，初定16日，因严防未得逞，旋改18日，又为密探侦悉，捕获革党20余人，起出炸药数十箱。党人知事败，19日即约同新军仓猝起事，城中兵单遂失守。

○鄂省城内新军全行叛变，前日调防督署之马步工兵各一队，于轰攻督署时倒戈而起，与署内防兵力战，旋将防兵击逃，署亦焚毁。

○革党轰攻各署，传系黄兴为首，各党人均猛勇力前，虽死弗却。

《申报》所发消息，虽然是客观报道，但"未得逞"、"全行叛变"等字样仍然表达了该报的立场。值得指出的是，该报有闻必发，并不纯以编者喜恶决定去取。有些消息，如"各党人均猛勇力前，虽死弗却"，倒正确地反映了革命党人的英勇无畏精神。

该报当日尚有《记本埠惊闻武昌失守情形》一文，陈述该报对该消息由怀疑到相信的经过，颇堪一读。中云：该报10月11日上午11点接湖北省访员来电，仅"武昌失守"四字。该报不敢发表。下午上海"纷纷传说"，该报"以此事关系甚巨"，发电湖北访员询问详情，但汉口商电已禁阻不通。当晚12点，该报又接到湖北访员来电数则，这才相信消息确实。文末该报编辑感慨说：

呜呼！川乱未已，鄂乱又起，何今日祸变之多耶！夫春间粤乱犹在沿海，此次川乱偏于西隅，今则革党势力已蔓延于长江流域矣！其情形之危，更非川、粤乱可比。因纪昨日本埠纷扰情形于此，愿当道者速有以救平之也。

《申报》虽然反对革命，但是该报还是有眼光的。它看出此次事变发生

在中国腹心地区，因此远非“粤乱”、“川乱”可比。当然，它完全没有想到，“当道者”再也无法“敉平”了。10 月 13 日，该报以《武昌革命》为题，发表署名“无名”的评论说：

> 省城陷，总督走，督署毁，张彪伤，武昌之革命已成为一发难收之势，此其事为革命党举事以来最为成功之事。

本文不称“叛变”，而称“革命”，显示了作者对革命党人有一定的理解和同情。自 1895 年广州之役以来，革命党的多次军事行动都失败了，武昌起义一开始就气势不凡，因此，作者誉为“革命党举事以来最为成功之事”。文章接着分析四川和广东、湖南等地的情况，认为必将联袂而起。文章说：“满地乱机，如散炸药，今复动以武昌之变，安有不受燃而火发者！”这一估计，迅速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13 日，《申报》在专电栏内刊载了革命党人一通告示的“大旨”，文称：

> 凡有藏匿官员或伤害外人，或欺侮商民，或阻碍商务，或屠杀人民，或焚击汉口外国义勇军者，均须枭首；凡有接济革党粮食、军火，或保护汉口外国租界及外国教堂，或以敌人行动报告革党者，均有酬赏。下署黄帝 4609 年 8 月某日。

这通告示译自外文，所以已经失去原文风格，但它却是通过新闻媒介最早公之于世的湖北革命党人文件。

《大公报》

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为满族人英敛之。该报主张爱国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共和。10月13日，该报在“要闻”栏内，以《武昌革党起事之警电》为题，发表了瑞澂致内阁、军谘部、陆军部请代奏的电报，在“谕旨”栏内发表了摄政王代拟的“上谕”，指责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致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命其“戴罪图功”。同日发表署名无妄的《闻评》说：

> 粤乱甫平，川乱旋起；川乱未已，鄂乱又生。乱机之伏，几如遍地火星，随处可以触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其今日之谓欤！

《大公报》的政治态度也较保守，因此，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一概被其视为“乱”，但它指出当时中国的形势：“几如遍地火星，随处可以触发”，这和《申报》的估计如出一辙，说明有识者已经普遍感到了一场风暴的来临。

14日，该报以《武昌乱事近闻一束》为题刊发了一组消息，其较重要者有：

> ○兹闻当工程营兵变时，张彪督队开枪，其将士竟无应者。
>
> ○又闻汉口昨日又有警报到京，略谓汉阳兵队又与匪党联合，铁工各厂已被占据，该匪党竟敢照会驻汉各领事并张贴告示，谓不害商民，不扰外人，违令者斩。

〇又闻此次谋乱之鄂军，实系步队二标、炮队一标、工队一队，共有六千人。现马队、辎重队恐难免怂恿通气。叛军占据省垣后，兵械、仓栈、工厂，均在握中，叛军炮队，炮数略有一百余尊，其中内一营系山炮，故枪械子弹极为丰富。

〇又闻革命领袖即籍隶湖南之黄兴。黄兴者，革命中最激烈之人物，粤滇举事皆其主谋。本年攻击粤督衙署，败后逃至新嘉坡，募捐军饷，再到上海，来往沪汉之间专务鼓励同志、党员。

在上述各项消息中，除一处称"革党"外，其他均移"革匪"、"匪党"，可见该报的政治立场，亦可见北方高压的严重。值得指出的是该报将黄兴视为武昌起义的领导者，除了因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声名显赫外，也和武昌文学社、共进会的负责人长期埋头苦干不为人知有关。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迅速决定命正在永平秋操的第四镇统制王遇甲率二、四两镇新军各一部星夜赴援，命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指挥各军扑灭起义，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开赴武汉江面配合。《大公报》不赞成清政府的这些"以杀示威"的做法，于同日发表文章，要求清政府"幡然悔悟，实力改革，与国民相见以诚"，认为这样才可以"夺去革命之标帜，而弥天大祸可或挽回"。

当日《大公报》有《京师戒严之所闻》一文，可见清政府张皇失措的状况。文称：

日昨政府以武昌失守，革党势甚汹涌，京师不得不先事预防，业经拟定数则：(一)责成民政、邮传两部对于京汉、京奉等火车，须严行取缔侦查。(一)责成邮部对于外省到京电报信件如稍可疑即予扣留。(一)责成民部通饬各区警兵一律荷枪守望，遇有形迹可疑之人须严加盘问。(一)责成学部严密调查此次游学生以及各省

到京复试学生身家履历，试毕即行出京，各回本籍。(一)责成军咨府、陆军部对于驻扎近畿陆军严防暴动。以上各条办法，当即分饬遵办。

《盛京时报》

1906年10月18日创刊于奉天(今沈阳)。创办人为日本人中山岛真雄。10月14日，该报在"中外要电"栏内刊出了有关消息。一为《武昌叛乱志详》，文称：

据汉口来电，19日傍晚，革命党约300人潜伏武昌，突袭督署，并随处纵火，督署及藩司署均被烬。瑞莘帅及岑西林均逃汉口，或谓瑞莘帅避难军舰。湖北新军勾通革党，经瑞督调遣，抗不应命。军营秩序坏乱，统制张彪闻为部下兵弁之所枪毙。

一为《武昌叛乱续报》，发表消息十三则，均来自上海，兹录其数则：

〇湖北新军之叛乱者计炮队二营、步队一营及工程、辎重等队，尚有官军仍留武昌者，现已一并加入革命军矣。

〇督署已被焚去，藩司亦被捣毁，所有库藏尽为匪党劫夺，现省城全为革军之所占据。

〇革命军先锋计5000人，现向汉阳猛攻。占据汉阳铁工厂，而汉阳遂失守。

在上述各条消息中，除一处称“匪党”外，其余均称“革命军”，当与消息来源有关。

该报当日中外要电中还有一条《孙文在沪消息》，文云：“传闻革命领袖孙文潜在上海，现拟在某处相机起事(上海)。”消息虽不准确，但却说明了孙中山的影响。

除报道有关消息外，该报第一版以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论武昌失守事》的论说。论文首先说明武昌失守，并非“兵变”，而是革命党“混迹于各军队中，因而乘机以起事”；接着说明，革党的势力有增无减，失败一次，增加一次，绝不可能一扑即灭。论文的主旨在督促清政府真正实行立宪，它说：

> 革命之势方弥漫若是，求所以消弭之者，盖惟促宪政之进行，须不复蒙饰假面具以欺惑人民，则亦其要事也。若事事求胜乎吾民，一切措施，又率反吾民之所欲，则人民倾向于革命之意思多，少数之效忠尽顺，又复何能为狂澜之挽也乎？

该文要求清政府“不复蒙饰假面具以欺惑人民”，可见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云云，早已信用扫地，没有什么人当真了！

《正宗爱国报》

1906年11月16日创刊于北京。创办人为丁国珍。该报以尊君、尊孔、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为宗旨，“净用白话”。由于处在清王朝的辇毂之地，因而对武昌起义的报道极其谨慎。10月12日，它在

"电奏"栏内刊登了瑞澂10月10日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的电报，在"宫门抄"、"电旨"栏内刊登了10月11日的"上谕"。除此之外，别无反应。10月13日，它在《国事要闻》栏内刊发了题为《武昌失守之警闻》的报道，文云：

本报昨天所登湖广总督电奏，闻系19日午前所发，枢府察阅来电，有"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等语，深为庆幸。故20日上谕，慰勉甚厚。不料是日忽得武昌失守消息，谓19日下午，武昌突有大帮匪徒，扑攻省城各署，所有驻省工程营、辎重队等新军，率皆叛附匪党。总督瑞澂，经警队保护出署，当晚即乘兵船，逃往汉口。

又一消息。昨日上午，枢府接到鄂督自汉口来电，系19日晚发，报告此事情形甚详，末言身在疆吏，不敢以一死塞责，不得已暂驻汉口，拟收集散军，力图恢复。惟现仅警队百余名可资心腹，此外新军，不敢谓人人通匪，亦不敢谓人人可用，迄速调派北洋劲旅数营来汉，藉供调遣等语。

上述报道，基本上根据清政府方面的官方文件，但是"大帮匪徒"、"率皆叛附匪党"云云，却相当真实地反映出革命党人的巨大声势，瑞澂所称"仅警队百余名可资心腹"等语更突出地反映了这位总督的狼狈处境。

同日，该报还在《本京要闻》栏内以《警厅注重治安》为题报道云：

内外厅丞因武昌革党暴动，京城地区亟应先事预防，以保治安，日昨特颁紧急训令，通饬各警区一律遵守，志其大略于下：(一)各区巡警一律带枪守望，应用枪子，有无缺少，随时禀请颁给。(一)各区添设马巡，严密梭缉。(一)各区界内王大臣府等添设守

> 卫。(一)各府等出入随从,均须悬挂腰牌,巡警得以随时稽查。(一)添派马巡,应给薪水一律加倍。

此项报道亦可见当日清政府张皇失措的情形。

在此之后,该报关于武昌起义的报道突然中断,其原因在于清政府下令"暂缓登载"。10月15日该报刊登"示谕"云:

> 外城巡警总厅本月22日奉民政部扎开,准陆军部咨开,闻查鄂省近有匪徒滋事,意图倡乱,现已派兵剿办,京师五方杂处,诚恐无知愚民散布谣言,希冀煽惑,应即严加防范,以镇人心,相应咨行查照,预为防范,为希传知在京各报馆,关于此次鄂省匪徒倡乱情事,暂缓登载等因到部,扎饬遵照,仰即遵照,暂缓登载可也。切切此谕。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清政府的"上谕"、"电奏"等官方文件已经首先泄露了秘密。当时,邮电、新闻等行业又已经粗具规模,巡警总厅的老爷们以为一纸"示谕"就可以遮住天下人的耳目,真是愚蠢得可以。革命的雷霆之声岂是捂得住的呢!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1991年第10期,后连载于《团结报》,1991年10月19日、23日、30日、11月2日、9日。

汤化龙密电辨讹

一

汤化龙是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曾任湖北谘议局议长、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总参议、秘书、政事部长等职。多年来，不少史学著作都把他定为两面派，是一项重大反革命密谋的参与者。[①] 其根据是：他一面参加湖北军政府，表示拥护革命，另一面又串联多人，秘密打电报给清政府，表示尽忠，阴谋推翻革命政权。由于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对汤化龙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关系到对清末立宪派的认识，也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分析湖北军政府的内部斗争，因而，不得不作一番认真的考察。

汤化龙等密电清廷一事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开始流传，但见之于文字记载则较晚，胡祖舜《六十谈往》一书说：

> 据其文案之同乡人林某，于民国二十八年，在四川北碚东阳镇语余及李翊东曰："当日逢时、连甲，曾密集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武

① 见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18页，三联书店，1957；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188页，人民出版社，1962；章开沅：《武昌起义》，78页，中华书局，1964；王来棣：《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143页。

> 昌谦记土庄经理李国镛(号玉珊,沔阳人,人咸呼为李老板者),并自称黎元洪代表之蔡登高(自称南洋某中学投效者)、张振标(张彪弁目)等(时此数人已附革命军,出入于军政府),开会数次,意图剿灭革命军,曾联电清廷请兵,谓元洪系胁迫而出,其电文即由化龙起草。"此其密谋,世人鲜有知者。①

这一段记载很具体,涉及者除汤化龙外,还有清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湖北布政使连甲、鸦片商李国镛、黎元洪代表蔡登高、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弁目张振标等,共六人。情况的提供者则是柯逢时文案的同乡林某,是他亲自对胡祖舜和李翊东讲的。胡祖舜并说:蔡登高、张振标利用在黎元洪身边伺候的机会,暗中勾结原工程第八营后队排长、军政府卫队司令方定国,阴谋叛乱。10月14日傍晚,有大汉持灯来,以纸条匆匆交给方定国,方阅后立即撕碎咽下。事为当时任军政府叙赏长的李翊东发觉,即时逮捕方定国。经审问,供出与蔡登高、张振标同谋。结果,三人被枪决。连甲因事败,央求林某带领,于10月16日夜自武昌汉阳门缒城逃出。②

李翊东是和胡祖舜同时听林某谈话的人。他回忆说:

> 柯逢时(土膏捐局督办大臣)与黎元洪暗通消息,阴谋反动,如果事情成功,由柯代黎向清政府讲情;如果事情失败,由黎庇护柯逢时。当时汤化龙(谘议局议长)、连甲(藩台)、马吉樟(臬台)几个人在柯家聚会,由汤代连甲拟电稿,大意是:鄂军变,总督不知去向,请速派大军南下,并另委总督。此电由林敬之(解放后在重庆

① 《六十谈往》,1944年,29页。

② 同上。

行医)发出,又由连甲乘夜越城到河南请兵。[①]

这一段回忆与胡祖舜的记述大体相同,不少地方进一步具体化了。如:有了聚议地点——柯逢时家;参与密谋的又多了一个人——提法使马吉樟;汤化龙起草的电报有了具体内容;文案的同乡林某名叫敬之,电报就是他发出的。李翊东还有另一段回忆,又进一步补充了若干细节:电报是打给清政府军机处的,"化龙主稿,逢时领衔",电文为:"鄂军变,督抚、统制不知下落,黎元洪暂带鄂军,请速派大军南下,以平此变。"除电报外,还有一个条陈,要求清政府大赦党人,以汉人为总督,请以陈夔龙复任,总督湖广,黎元洪升统制等。李翊东并指出,连甲躲在柯逢时家,是半夜改装易服,由林静〔敬〕之引导,自平湖门缒城而出的。[②]

在胡祖舜、李翊东之外,章裕昆也谈及此事。他说:

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当起义之夕,匿不敢出;至二十日知瑞澂、张彪已逃,革命军占领武昌并拥出黎元洪,遂乘机而与革命党周旋。又虑其不稳,乃于军事未定之际潜往六省烟膏督办署,向督办柯逢时借用密电码,电告清廷,谓湖北全军兵变,化龙决不从逆云云。首鼠两端,可耻孰甚![③]

---

① 《座谈辛亥首义》,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一),1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② 《武昌首义纪事》,见《辛亥首义回忆录》(四),39页,1961。

③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45页,1955年4月第二次印刷本。该书1952年第1次印刷本没有这一段记载。1964年,章裕昆在《有关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史料片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中放弃了这一简略的记载,改用胡祖舜说。但他故弄玄虚,声称是根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材料写的。笔者查阅过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全部实录馆材料,发现章裕昆实际上是根据居正《梅川日记》写的,而居正又是听胡祖舜说的。

章裕昆的这段记载较为简略，只补充了一个细节，密电码是向柯逢时借用的。

上述记载，虽有相互龃龉之处，有些情节也有明显的破绽，例如：李国镛作为一个鸦片商人，有什么必要邀请他到会？张振标只是张彪的弁目，又有什么资格能和"大人物"们并列？但有关人士言之凿凿，因此，不少研究辛亥革命的史家均深信不疑，视为可靠的史料。但是，笔者经过考察，觉得有关说法纯系讹传，并不可信。

二

胡祖舜、李翊东的回忆都涉及连甲。在传说中，他是柯宅反革命密谋的核心人物，密电的联名者，又是越城请兵的使者。他在武昌起义之后的活动日程是怎样的呢？

连甲10月21日《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云：

> 窃连甲自八月初一日到湖北藩司任，至十九日（10月10日——笔者）即遭兵变，守库护勇，仅念八名，督率竭力守御。匪用大炮轰毁头二门，幸大堂先备有土袋垛积，得以隐身抵御，枪毙悍匪多人。奈子弹告罄，电话又断，相持至晓，藩署攻破，不得已避至署后土膏大臣柯逢时宅，探得瑞督院（指湖广总督瑞澂——笔者）已登兵轮，当恐印信有失，交与柯逢时敬谨收存，追出城外，奔赴兵轮，协图恢复。蒙瑞督院饬委，督办粮台。①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这封电报告诉我们，10 月 10 日夜革命党人起义之后，连甲曾督率士兵守护布政使衙门和仓库，一直打到 11 日早晨，衙门被攻破，随即躲到近旁的柯逢时家。在那里，打听到总督瑞澂已经逃到长江兵轮上，连甲即将布政使的大印交给柯逢时保存，然后追出城外，奔赴瑞澂乘坐的兵轮，被委任为"粮台"，督办粮草军需。电报没有说清逃离武昌的具体时间，但这是可以查考的。《欧阳萼致袁世凯书》云：

> 方伯困在危城，二十日之夕，始由柯绅逢时令其乔装，遣人护送潜出。①

方伯，明、清时代对布政使的美称，这里即指连甲。二十日，即阳历 10 月 11 日。信中说，连甲是听了柯逢时的话，"乔装"打扮，被人护送偷偷出城的。这与胡祖舜、李翊东所说，连甲半夜改装易服，由林敬之带领，缒城而出是一致的。

又，《瑞澂等报告武昌失守请派援兵电》云：

> 湖北布政使连甲、提学司王寿彭、交涉使施炳燮、巡警道王履康，均已微服出城。②

微服，也就是"乔装"的意思。本电发于 10 月 12 日。两相印照，可证连甲在 10 月 11 日夜已经逃离武昌。胡祖舜定为 10 月 16 日是错误的。如果汤化龙、柯逢时、连甲、李国镛、马吉樟、蔡登高、张振标等确有一次聚会，那么，只能在 11 日晨至当夜连甲缒城而出之前。这一天上午，汤

---

① 《近代史资料》，1954 年第 1 期，78 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1 辑，170 页。

化龙先是在家中接待来邀的革命党人代表，后是应邀至谘议局讨论推举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的问题，下午，仍在谘议局讨论各项进行策略[①]，根本没有时间到柯逢时家参与密谋。如果是在当夜，汤化龙是有时间了，但一下子串联六七个人也很不容易。武昌起义的枪声刚刚停息，柯逢时们要摸清彼此的政治态度需要时间，当天晚上就召集这样的反革命黑会，怎么可能呢？而且，军政府刚刚成立半天，黎元洪就能与柯逢时“暗通消息”，并有一“代表”蔡登高参加会议，这也是很难想象的。

在10月11日至12日之间，连甲确有一封电报打给清朝政府，全文云：

> 内阁王爷中堂钧鉴：鄂垣内外兵士倒戈，甲只身困守，命悬须臾。盼救。火速。连甲。[②]

文内说：“只身困守，命悬须臾”，既不是在布政使衙门督率士兵拒守时的口气，也不可能是逃离武昌之后的产物。连甲在布政使衙门被攻破后就逃到了柯逢时家，显然，这是在柯宅惶急无措时草拟的。本电未署发报日期，清政府的收报日期是10月12日。护送连甲出城的林敬之曾自述发过一封密电，那么，本电的发出者应该就是他。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的署名人只有一个连甲，足证所谓六七人密谋并联电，“化龙主稿，逢时领衔”之说，完全不可靠。而且，这样一份小小的电报，连

① 向讦谟《治国日记》云：“(10月11日)午后，偕同学等在谘议局院内齐集休启，谟同傅、李二人至局，与汤议长济武(即汤化龙——笔者)、胡义员于笏、李君玉山、蔡同学国桢会议我军进行策略。”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甲又有什么必要借手于他人呢?

上引《瑞澂等报告武昌失守请派援兵电》又云:

> 刻由匪党与湖北谘议局公推原派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首,并由议员为之主谋,安民告示即用鄂省大都督称,并悬白旗,上书兴汉灭满,悬赏拿官字样。[①]

此电特别说明,黎元洪系"匪党与湖北谘议局公推","并由议员为之主谋"。瑞澂发这封电报时,连甲已经"微服出城",并且显然已经到了瑞澂身边,他当然会向瑞澂报告自己在武昌的活动情况。如果作为谘议局议长,又参加了"公推"黎元洪的军政府成立会的汤化龙确曾和连甲有过密谋,并联名发电,那么,瑞澂这里怎么会狠咬"谘议局"及其"议员"们一口呢?

连甲后来还有一份呈文递给受清廷之命主持湖北军务的袁世凯,内容、文字与前引《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大体相同,自述在柯宅的一段则较为详细,中云:

> 相持至黎明,藩署始被攻破。复拟赴督署,为乱兵所阻。绕至统捐大臣柯逢时宅,正在悬赏募人通信。适探瑞督已登兵轮,柯大臣即嘱趋赴舟次,同谋恢复。又恐印信有失,交由柯大臣敬谨收存。连甲间道出城,奔赴兵轮,禀商一切。[②]

---

①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169页。部分文字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件校正。

② 转引自《袁世凯致内阁请奏电》,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这份材料说明了，在连甲逃到柯宅之后，柯逢时先是“悬赏募人通信”，后又探得“瑞督已登兵轮”，再又嘱连甲“趋赴舟次，同谋恢复”，二人之间确有密谋。但是，这份呈文连同前引《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都绝口未提召集汤化龙、李国镛、马吉樟、蔡登高、张振标密谋并联名发电事，这当然不会是疏忽。第一，有汤化龙这样身份的人物打入湖北军政府，这是最重要的军事情报；第二，连甲是管理湖北财政、民政的大吏，“库储失陷，究属罪有应得”[①]，如果确有其事，他当然会向清政府和袁世凯报告，借以邀功抵罪。试看他在电文中如何自述“竭力守御”、“枪毙悍匪多人”即可以明白其心理。但是，在柯宅的经历，却只提了柯逢时一人。这就说明，在10月11日上午至当夜，根本不曾有过传说中的那样一次反革命密谋会。至于所谓“开会数次”，更加不可能。以后，连甲即受瑞澂委托，“督办粮台”，也不曾潜入武昌，和柯逢时、汤化龙等有过什么串联。

三

至此，连甲、汤化龙之间不曾有过什么密谋，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还存在着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汤化龙、柯逢时、李国镛等人之间有过密谋，而误传为连甲在内呢？这就必须进一步考察汤化龙等人在革命前后的情况和政治态度了。

作为君主立宪派，汤化龙不赞成革命。但是，人是会变化的。汤化龙原是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在维护川、粤、汉路权上和清政府存在着

---

① 连甲：《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电》。

尖锐的矛盾。1909年11月，他在汉口联络绅、商、军、学各界组织商办铁路协会，和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行为进行斗争。当时人回忆说：在湖北铁路协会成立大会上，汤化龙曾历数时政的腐败，特别严厉抨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认为邮传部把张之洞费了很大力气收回来的川、粤、汉铁路建筑权重又送给外人，无非是想在借款时攫取巨额回扣，是媚外肥私，丧权卖国。他号召湖北全体同胞踊跃筹集筑路款项，抵制外债，争回路权，以救亡图存。① 1910年11月，立宪派所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清政府发布上谕称："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②这样，国会请愿代表团便被迫解散，立宪派分子对清政府的愤懑增加了。汤化龙与四川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等在北京密议："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③此后，汤化龙开始向革命派靠拢。1911年春，文学社革命党人刘尧澂通过李廉方介绍，曾经和汤化龙有过一次晤谈。其间，刘、李二人谈起，有人去武胜关"察看"，缺乏路费。汤化龙听说，立即资助二十元。④ 刘尧澂的身份，汤化龙不会不清楚；去军事要地武胜关"察看"什么，汤化龙也不会不明白。他拿出的钱数虽不多，但却表现了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同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6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汤化龙于入京前，在汉口车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

---

① 李建侯：《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则》，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80页。

② 《宣统政纪》，卷四五，4～5页。

③ 参见《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314～315页，台北版；伍宪子：《中国民主立宪政党党史》，16页，香港版。

④ 参见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5页；《前文学社同人公启》，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五)，4页。

说。此后，联合会曾两次上书清政府，反对皇族内阁，都遭到清政府的呵斥。这样，汤化龙等和清朝贵族分享政权的幻梦最后破灭。在此同时，保路运动发生，蒲殿俊一度表示："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他派出代表与湖南、湖北、广东各省谘议局联系，声言："四川准备已甚充足，以袍哥（约同于湖南之红帮）、棒客（约同于湖南之黑帮）为基础，人数众多，遍布全川。将来举义时，尚求各省协助，以祈早日成功。"[①]9月7日，蒲殿俊等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汤化龙等对清政府的愤懑就更为强烈。有人回忆说：

> 川汉铁路问题发生……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因与其平日最亲信的胡瑞霖、阮毓崧等在时象晋家商议（都是谘议局议员）数次，时受其子功玖（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影响，思想较为进步，主张革命爆发，我们应该参加，不应该避开。汤计乃决。[②]

这里所反映的情况完全符合汤化龙的思想发展逻辑，说明在武昌起义前，汤化龙已经有了附和或参加革命的准备。10月11日，他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会上说："对于革命，鄙人素表赞成。"[③]这里固然有对自己的美化，但也不完全是违心之言。

武昌起义之后，汤化龙主要做了下述工作：

1. 参与创立和支持湖北军政府。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邀汤化龙到谘议局开会，建议他出任都督。汤化龙考虑到时局未定，犹豫

---

① 粟戡时：《湘路案》，见《辛亥革命》（四），551～552页。

② 彭伯勋：《我所知道的汤化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③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36页。

过，也心动过，“未有绝对拒绝意”[①]，但他考虑到清政府必定迅速派兵来鄂，进攻起义军，因而建议首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同时表示：“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画，兄弟无不尽力帮忙。”[②]这些意见，应该说是认真的、积极的。下午会议结束前，胡瑞霖发言对起义军的严明纪律表示钦佩，自动声言：“诸同志如需用款项，谘议局可先垫借五万元。”[③]当晚，胡瑞霖即送来大银宝一百四十九个，小银锭十五个。[④] 胡瑞霖与汤化龙是儿女亲家，多年来政治活动的老搭档。他的这一举动自然是征得汤化龙同意的结果。此外，汤化龙还控制着汉口各团体联合会，该会拥有一支商团性质的武装，配备着两千条毛瑟枪。在光复和保卫汉口的战斗中，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出钱、出粮、出人，发挥了很大作用。[⑤] 这显然也与汤化龙的态度有关。

2. 以谘议局名义通电全国。电文说：“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连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民意，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溥仪竖子黄口，摄政愚谬昏庸。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又说：“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势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汉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⑥]该电主要谴责清政府的

---

①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103 页。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36 页。

③ 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二），169 页。

④ 向讦谟：《治国日记》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

⑤ 朱正斋、李猿公：《清末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的组织、发展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⑥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101 页；参见《李国镛起义日记》，3 页。

假立宪和皇族内阁，确系请愿运动失败之后立宪派心理的表现。应该承认，这份电报在动员各省谘议局人士附和革命上是起了作用的。

3. 演说鼓动。除 10 月 11 日下午军政府成立会外，汤化龙还在谘议局台阶上发表过一次演说，略云："本局为国民代表，原有兴复责任。既经诸君推举，事已成局，自当尽死报命，成则共图勋名，败则生灵涂炭。我汉人从此扬眉吐气，在此一举；我汉人万劫不复，亦在此一举。"[①]当时，有一个在武昌的清朝官僚记载说："汤化龙等到处演说，以'某省已陷，某军同党，第六镇(指吴禄贞所率队伍——笔者)来已备欢迎'等语，借维众心。"[②]可见，汤化龙发表演说还不止一两次，他对鼓舞和安定人心是重视的。

4. 对外宣布政策。10 月 13 日，美国领事访问湖北军政府，汤化龙随同黎元洪接见。美国领事问及拟采何种政体，汤化龙明确答复："共和。"[③]

5. 动员海军起义。10 月 12 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抵鄂。萨是黎元洪的老师，汤化龙曾建议以黎的名义致书萨镇冰，动员海军起义。[④] 11 月，萨镇冰率舰队东下，汤化龙的弟弟、海军高级参谋汤芗铭等在九江起义。九江军政府向武昌请示，湖北军政府即派革命党人李作栋带着汤化龙的私函前去联系。[⑤] 不久，汤芗铭即率舰队航返武昌，参加对清军的作战。

---

① 《时报》，辛亥年八月二十八日；部分文字据《各省独立史别裁》(1912 年 4 月版)校正。

② 王孝绳：《辛亥武昌兵变旅行记》，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204 页。

③ 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④ 《李钦事略》："请黎都督以师生之谊劝其投诚，都督然之，请化龙议书一件，钦持书偕胡鄂公往投。"见湖北省博物馆藏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三)110 号；朱峙三：《历变记》，稿本同此说；胡鄂公《武昌起义三十五日记》则云："化龙请黎公致函萨镇冰及各舰舰长，黎公允之，予遂推荐秘书草拟信稿。"见《辛亥武昌首义史编》，996 页，台北版。

⑤ 李春萱(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二)，206 页。

6. 反对谭延闿任湖南都督。10月31日，湖南发生兵变，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杀，立宪派头子、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出任都督。11月1日，湖北军政府接得湖南另举都督的来电，当时，还不知道焦、陈已经被杀，黄兴、宋教仁都反对舍焦达峰而另举他人。汤化龙虽和谭延闿是国会请愿运动中的老伙伴，但他也不以谭出任都督为然。他说："军事紧急之秋，一省都督，不宜文士，当用武人。"当黎元洪表示"吾辈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时，汤化龙和黄兴、宋教仁一起离开了会场。①

7. 参与制定《鄂州约法》。《鄂州约法》是按照共和国理想制定的第一个地方法律。它的执笔是宋教仁，但汤化龙曾参加讨论，"相与赞赏"②。

汤化龙在湖北军政府任职期间也犯过严重错误。其一为排斥革命党人。参加军政府工作的革命党人大多为新军士兵和青年学生，政治上不成熟，缺乏经验。因此，军政府一度出现过较严重的忙乱现象。汤化龙借机对军政府进行改组，大量任用原立宪派，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击。其二，在和袁世凯议和过程中态度有某种动摇。汉口被清军冯国璋部攻陷后，袁世凯派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到武昌议和。汤化龙曾为黎元洪起草过一份给袁世凯的复函，中称："嗣又奉读条件，谆谆以立宪为言，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③这里，在是否必须实行共和政体上语意模棱，但在反对清政府这一点上，态度仍是坚决明确的。

---

① 《武昌革命真史》正编，225～226页。

② 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③ 《黎元洪等致袁世凯书》，载《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73页。所据原件，据字迹判断，认为是汤化龙所写。

综上所述，在武昌起义前夕，汤化龙已经对清政府绝望，有了参加或附和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义之后，他有过犹豫，但从总的方面看，对这场革命的到来是欢迎的、支持的。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密电清廷，参与反革命的串联。

"密电"案还牵涉到李国镛。在有些史学家的著作中，他也是个坏人。但事实是，他虽属立宪派，但却早与吴禄贞等革命党人有来往，曾受到地方绅士控告，称他"借办学之名，内部宗旨恐不纯正"[①]。湖北地区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开办时，他都曾捐款支持。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1965 年章裕昆发函向张难先调查，其子张彻生答复说：

> 四月二十一日信已念给家父听了，说所询李国镛之捐财资援革命事，因渠个性慷慨，出财资助日知会与科学补习所是事实。在我出狱时，他还送我一点钱的。[②]

1907 年初，清政府封禁日知会，张难先是和刘静庵等一起被捕的九个革命党人之一，后被保释出狱。李国镛对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内情不一定很了解，但他在张难先出狱后，仍然肯于资助，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进步倾向的人，而不是一个维护清朝政府统治的狂热分子。李国镛曾经写过一本《起义日记》，叙述他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以后赞成革命的情况，虽不无自我夸耀之处，但和其他史料对勘，不少事情还是可信的。这样的人，当然也不会参与推翻湖北军政府的串联。

有些回忆还提到马吉樟。他是清朝官吏，但其人昏庸愚怯。武昌起义后，他先是穿好服装顶戴，坐在提法使大堂上，说是等革命党人来

---

① 《李国镛起义日记》，2 页。

② 湖北省博物馆藏，(三)555 号。

杀，“庶得殉节”[1]，随即又派人打听向民军的“投降手续”[2]。显然，也不会参与密谋。

至于蔡登高和张振标，根据现有资料看，他们确实和清方有勾结，也有阴谋，但既与汤化龙、黎元洪无关，也与柯逢时、连甲没有牵连，他们是清军第八旗统制张彪派来的。关于此，李翊东回忆说：

> 廿一晚（10月12日），有一大汉手持灯笼，仓皇奔至方定国前处，递一纸条。方阅后即撕，咽口内，该大汉转身欲逃……翊东乃令将该汉抓住，讯知其为旗兵，并供出同谋者有江〔张〕振标、蔡登高等十余人……翊东以方定国通敌证实，遂将方之徽章、军刀及手枪摘下，押入邢伯谦同志军装处办公室。当场又下令将江〔张〕振标、蔡登高及某（姓名忘之）等三人拿获。比即讯知，江〔张〕系张彪马弁，蔡登高皆张派来之侦探。[3]

李翊东是破案人和主审人，此文写于1930年，是他关于这件事的最早回忆，还没有受到“密电”说的影响，应该是可信的。

前引材料已经证明，柯逢时是反对革命的。但他原来是个连办洋务也反对的顽固分子。[4] 后来出任江西、广西巡抚，八省膏捐局督办大臣等职。“性刻薄，善聚敛”，名声不好。[5] 他和汤化龙政治上并不是一

---

① 黄中恺：《辛壬回忆录》，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

② 同上。

③ 《书吴醒汉武昌三日记后》，手稿，上海图书馆藏。

④ 1899年，西太后召见柯逢时，问他：“洋务该如何办？”柯逢时答道：“洋务可不必办。近来办洋务之人未必有心国家，总要取心术纯正者办理为是。”见《柯逢时日记》，湖北省博物馆藏稿本。

⑤ 胡祖舜：《六十谈往》，28页。

派,平时交往也不多。武昌起义后不久,他们就能推心置腹,冒险作反革命的串联,这是与情理不合的。[①] 附带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柯逢时的态度也有了某些变化。10 月 21 日,他出任"守中立"的武昌保安社社长,只求"保安"身家了。

综合上述各点考察,笔者认为,所传汤化龙"密电"一案不足凭信。

四

现在,须进一步考察"密电"说的由来。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完全荒诞的谣言是不会有市场的。某些讹传之所以能扩散,常常是因为它确有某些真实或似乎合理的成分,有特定的背景,结果,以讹传讹,加进去的想象、猜测愈来愈多,距离事实真相也就愈来愈远了。

笔者认为,汤化龙"密电"案就是这样一种讹传。

如前所述,连甲在 11 日躲到柯逢时家中,二人之间确有密谋,连甲给清政府发有密电,他是在改装之后由柯逢时派林敬之送出武昌的。这是事实。

武昌起义之后,柯逢时也给清政府发过电报。《时报》记载说:"闻柯逢时有电至京,纠参鄂督瑞澂辜恩溺职,非明正典刑,不足以折服人心。"[②]

汤化龙也确实起草过给清政府的电报。湖北军政府首任交通部部

---

① 居正《梅川日记》提到的"密电"案参与者还有陈夔龙,其实,陈于 1909 年已自湖广调任直隶总督,一直未离任。

② 《时报》,辛亥年九月四日。

长李作栋回忆说:“(汤化龙)为了表示心无别意,说柯逢时家中有与清廷军机处通电的‘辰密’电码,建议我们利用这个密码,借瑞澂名义向各省发电求援,在电文中夸大革命军声势,以造成清方的混乱。我们赞成这个意见,就由我与陈雨苍两人到柯家取出密码,由汤化龙拟电稿,由夏维崧送往汉口俄领事馆发出,对俄领事只说这是民军方面的密电。”[①]当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李钦则说:“当获武昌电局送皖抚朱家宝询鄂中革命情形致瑞澂密电一通,钦率人向柯逢时索取密码,当即据来电以瑞澂名义复去,力述革命党势焰甚盛,请即派兵助剿。”[②]李钦的这段叙述比较简略,但他补充了一个细节,即是由安徽巡抚朱家宝询问鄂中情形的来电引起的。除李作栋、李钦外,李廉方也从汤化龙、胡瑞霖处听说过这件事。他又补充了几个细节:电文内容大意为,瑞澂声言“退驻兵舰,死守待援”;夏维崧向俄领事商洽发报,是冒充瑞澂委托等。[③]

武昌起义初期,各省还处在清政府控制下,要扩散武昌起义的影响,对清朝统治者和各省官吏进行攻心战,汤化龙所提建议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于此亦可见汤化龙倾向革命的苦心。据当时在清军谘府任副使的哈汉章说:清廷从俄国公使馆接得转来的电报后,大为惊慌,立即召开御前会议,竟商量如何退往热河的问题。[④]

李作栋、李钦、李廉方都是当事的革命党人,所述自亦可信。此外,现存文献材料也可以提供一点证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未刊档案中,有河南巡抚宝棻 10 月 4 日的一封电报,中云:

① 《座谈辛亥首义》,见《辛亥首义回忆录》(一),14 页。

② 《李钦事略》,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湖北省博物馆藏,(三)110 号。

③ 《辛亥武昌首义纪》,105～106 页。

④ 《座谈辛亥首义》,见《辛亥首义回忆录》(一),14～15 页。

> 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度支部、邮传部、各省制台、抚台鉴：辰。武昌失陷，督署密码电本恐已为贼所得，昨晚敝处接汉口车站发来辰密电一件，既未标明辰密字样，下署瑞澂又无印字，种种均与京外通行电式不合，且有借款购粮，运送刘家庙，备大军之用等语，词意支离，尤为可疑。此事关系甚巨，格外留意为幸。棻。漾。

宝棻接得的汉口瑞澂来电为“辰密”，李作栋从柯逢时处借得，由汤化龙拟稿发出的也是“辰密”，二者相合。“种种均与京外通行电式不合”，“词意支离，尤为可疑”，这些地方，说明宝棻接得的可能就是汤化龙所作的赝品。

笔者认为，所传汤化龙“密电”案即上述几件事的讹传。它有某些“真实”的成分，又有若干猜测和想象。

汤化龙原来是立宪派。武昌起义之后，他虽然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的信任，但也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的猜忌。湖北军政府成立不久，军政府中就发生了卫队司令方定国等人的谋叛案，湖南发生了谭延闿谋杀焦达峰、陈作新案，汤化龙本人又确有向革命党人夺权的举动。这些地方，都会加强革命党人对汤化龙的警惕。10月下旬，在清陆军部任代司长的革命党人蒋作宾南下武昌，由汤化龙单独迎接。一部分革命党人不了解蒋作宾的身份，怀疑他的来意，也怀疑汤、蒋之间的关系。[①]在上述种种情况下，由某些片断事实和蛛丝马迹而敷演出“密电”说，是很自然的；而护送连甲出城的林敬之，由于他了解某些事实，而又不了解全部事实，则很容易参加“密电”说的创作并成为它的证明者。

① 胡祖舜：《六十谈往》，35页。

五

笔者无意于全面为汤化龙辩护。在武昌起义前后，汤化龙的活动有功也有过，这是需要另作分析的，本文只想指出，所传“密电”案不足凭信，汤化龙并未与柯逢时、连甲、黎元洪等串联，阴谋推翻湖北军政府，据此判定他是两面派是不符合事实的。

〔附记〕本文收集材料过程中，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历史档案》编辑部方裕谨同志等的热情支持，谨致谢意。

原载《复旦学报》，1981 年第 5 期

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
——读台湾所藏梁启超未刊函稿

梁启超的一份重要密函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梁启超致康有为未刊函件多通，其中有一通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义后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计划，值得认真加以释读。

函云：

今日第一义在先决吾党行止。弟子于北行之事总有不能释然者。前此有所希于公路，今彼乃如此，亦幸而未与共事耳！今日所希者，恐亦犹是。盖总不免求之在人，恐断未有能行吾志者。时〔昨〕觉顿携来一纸，可谓纤悉周备，而弟子犹有深念者数事：

一、满人果可与共事否？

袁若去，则铁良、良弼等必出。此辈素以排汉为事，恐未必能推心于我。

一、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

如此必明与民族主义为敌，代人受矢，以后舆望尽失。

一、我辈果能得全权如今袁氏否？

恐不能。彼有兵而我无之，临时联络，基础甚薄，不为人所惮，

且彼今方拟引赵尔巽、陈夔龙辈,此辈又岂可共事者。

一、袁倒后我乃往乎? 抑先往乃与各团共倒之乎?

先往自倒之,则可得实权,以后一切措施皆易,然漫然张空拳以当南北极强之敌,恐无此办法。若待彼倒后乃往,其可虑者有二:(一)袁倒后旬日间都中人无所恃,恐秩序全破,已为莠民所乘,不复可收拾。(二)若彼中有人能维持秩序,则其人必甚才,既有才人,则舆望归之,而彼之相需于吾辈者必不甚殷。我之归否,彼不甚以为重,即归亦寄彼篱下耳。而以后一切为彼分过,是否值得?质言之,则袁去后若能维持秩序,则其人必非赵、陈辈而铁、弼辈也。我寄铁、弼辈篱下是否得策? 将来是否能有所转圜,以收暂时已失之人心,最当熟计。舍此则惟有即日起行亲往倒袁耳,然似太险。

一、我即能得全权,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贤才相与共事?

现在海内同志无一人不以沉几观变相勉,我若骤出,恐最亲信之人亦且量而后进。他勿论,即孺博、佛苏、觉顿,亦恐不肯相助。佛苏忽来一电沮北行,又昨有一电,亦言切勿往。窃计此皆都中同志,颇知蒙王等及其他各团体有敦迫消息,恐吾辈贸贸然应之,故皇急相沮也。蓝志先亦有□(电)来,言都中盛传吾二人已至,且有登报问住址者,彼拟登报代辩云云,党中不欲吾辈轻出,几成舆论。若排众议而往,必尽失党人之心,以后谁与共大事者?

一、北军究竟能战与否,实属疑问。

饷项如何,已属极可忧。就令稍可支,而北中各处蠢动,防不胜防,兵力分疲于守御进攻,虑非可恃。

函中,梁启超对康有为拒绝承认现实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函云:

师所论或亦有之。然遽断其必如是，得毋太武！汉阳复后，英日出而调停，此众目所共见者。英美商团请逊位，其建言书亦见各报，何由尽指为伪？吾师论事论学，凡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论理学所谓隐匿证据是也。似此最易失其平。

偶因兹事，更申昨函所言。至此事果为冢骨造论与否，原可备一说，但愿师勿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凡论一切，皆谨于此耳！

末署两浑。

本函未署年月。函中言，“汉阳复后”，按，冯国璋攻占汉阳，时在1911年11月7日。此函必作于其后。函中又言：“袁若去，则铁良、良弼等必出。”按，良弼于1912年1月26日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两天后死去，此函必作于良弼被炸、死讯公布之前。函中所称“公路”、“冢骨”，均指袁世凯。“觉顿”，指汤觉顿，康有为弟子。函称：“时〔昨〕觉顿携来一纸，可谓纤悉周备。”汤觉顿带给梁启超的“一纸”当是康有为的计划，本函是对康有为计划的问难。它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义后，康有为曾企图联络满蒙亲贵，搞掉袁世凯，控制中央政权。

武昌起义前后康、梁等人的宫廷政变密谋

康有为、梁启超因担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造成社会动乱，因此，在自立军失败后，即逐渐转向推动立宪运动，企图动员社会舆论，迫使清政府接受改革；同时，在有机可乘之时，康、梁等也积极策划宫廷政变，以期用最不引起社会震动、损失最小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收获。1909

年，溥仪登基，载沣摄政，为改良派带来了新希望。梁启超等人即积极联络满族亲贵，和掌管军谘府事务的郡王载涛及载洵建立联系。当时，载涛和庆亲王奕劻、贝子载泽有矛盾，向改良派打入北京做地下工作的潘若海问计，潘建议他一面收抚禁卫军，一面拉拢驻扎保定的新军第六军统制吴禄贞，准备在1911年夏历九、十月间，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消灭奕劻与载泽等，掌握政权。[①] 计定，梁启超即利用华侨捐献的大量金钱，收买禁卫军，几乎将1910年各方所得全部投入，以致哑子吃黄连，无法回答同党的诘问。武昌起义后，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计划在滦州举行兵谏，联名要求清廷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梁启超即准备急驰回国，利用禁卫军实现上述计划，拥立时已担任军谘府大臣的载涛为总理，收抚革命党人，消弭起义。康有为同意梁启超的这一计划。10月26日，他在致徐勤密函中说：

> 适有机会，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欲胁以改政府，即以资政院改国会，并合十八省谘议局议员，且要征讨军令，往抚之。已发要人数四，入北运动。若不得，则欲募壮士数百为之，否则土头亦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事之成否，书到已见，远亦决行。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②]

这里所说的"北中兵事，有熟人"，即指吴禄贞等；所说"亦有亲贵"，指载涛等；"土头"，指袁世凯；所说"远"，指梁启超。本函表明，康有为企图抢在袁世凯成气候之前取得政权。"事之成否，书到已见。"张绍曾、蓝天蔚计划发动的日期为10月29日，故云。

---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5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② 《民立报》，1912年12月27日、28日。

然而，就在梁启超整装待发之际，忽然得到"袁党"调毅军统领姜贵题率兵入卫京师的消息，政变计划横生阻碍，急得梁启超大喊"真是魔障"。这样，他就犹豫起来了。

政治斗争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敌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虽然把袁世凯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力谋去之而后快，但是，这以后，袁世凯的势力急剧膨胀，已经去之不能。姜贵题带兵入京后，梁启超即有与袁世凯"言和"，共同对付革命军的考虑。张绍曾等在滦州举事后，清政府于次日下诏罪己，表示将"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同时，宣布开放党禁，赦免党人。这一切，使梁启超处于久未有过的兴奋中。11 月 3 日，梁启超致函徐勤，确定"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然后怀着要指挥一场大战的心情自日本回国。[①] 他准备先到滦州住一宿，然后带百数十个军人入京，完成大事。11 月 9 日，梁启超抵达大连，受到当地官吏的欢迎，满耳所闻，都是张绍曾已经入都一类的好消息，因此，更加踌躇满志，觉得事在必成，给长女函称："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勘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②]

吴禄贞是与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有联系的清军将领。1910 年任新军第六军统制，掌握着一支用新式武器配备的精锐军队。1911 年秋，梁启超曾特派潘若海持函见吴，函中，梁启超大谈军人在中国的巨大作用，声称"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梁启超又进一步对吴大灌米汤："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③]潘若海与吴禄贞会面的情况如何，由于文献无征，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二人间有某种协议是肯定的。梁启超回国时之所以如此

---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558 页。

② 同上书，559 页。

③ 同上书，562 页。

踌躇满志，与他和吴禄贞、张绍曾之间的联系显然有关。但是，11 月 7 日，吴禄贞在石家庄突然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张绍曾吓得躲进天津租界，这样，康有为、梁启超实行宫廷政变的两大军事力量都已不能依靠。同时，又传说蓝天蔚拥护革命，有不利于梁启超的计划，梁不得不仓促返回日本。

此后，康有为即酝酿新的政变计划。

梁启超密函的历史内涵及其显示的意义

汤觉顿带给梁启超的康有为“一纸”，至今尚未发现，因此，笔者无从得知其细节，但是，其主要内容可以从梁启超对康有为的问难中推知。

梁启超提出：“满人果可与共事否？”“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据此可知，康有为计划的内容之一是联络满族亲贵。

梁启超提出：“袁倒后我乃往乎？抑先往乃与各团共倒之乎？”据此可知，康有为计划的内容之二是搞掉已经掌握清政府实权的袁世凯。

梁启超提出：“我辈果能得全权如今袁氏否？”“我即能得全权，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贤才相与共事？”据此可知，康有为计划的内容之三是掌握中央政权的实际权力。

联络满族亲贵，推倒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由改良派掌握中央“全权”，三者结合，构成了一份完整的政变纲领。它是康有为武昌起义后的一份新的应变计划。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单凭自身的力量已不足以镇压革命党，不得不起用罢黜在家的袁世凯。袁世凯最初作态不出，借以抬高身价。而在

出山之后，即首先向满族亲贵开刀。11月1日，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世凯入京。16日，成立内阁，先是罢免军谘府大臣载涛和毓朗，接着，于12月6日逼迫摄政王载沣交出大印，退回藩邸，并由隆裕太后声明，亲贵不得与闻政事。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清廷，声称大局危迫已极，民军坚持共和，别无可议，要求召开皇族会议，决定方策，宣布共和。17日，隆裕召开近支王公亲贵会议，争议甚烈。19日，隆裕再开近支王公御前会议，国务大臣赵秉钧秉承袁世凯意旨，提出取消北京、南京两个政府，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亲贵们更加强烈地反对，纷纷哄闹。赵秉钧则称：若不采纳，内阁将全体辞职。第二天，袁世凯即称病不朝。

袁世凯出山时，清廷中即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于袁世凯，寄希望于康、梁。1911年12月13日，罗惇曧（瘿公）致梁启超函云："北省一般舆论有不满意于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①袁世凯出山后，他利用民军压迫清廷、夺取权力的行为引起满蒙王公亲贵的强烈不满。恭亲王溥伟就曾面奏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②溥伟这里所指的"乱臣"，显然就是袁世凯。与此同时，宗社党良弼等人则发布宣言或公启，指责袁世凯"蔑视纲常，损辱国体"，"其居心更不可问"③。在这一情况下，有一部分满蒙亲贵主张听任袁世凯辞职，由铁良组织内阁。④ 还有一部分亲贵则准备联合康、梁等改良派，共同搞掉袁世凯。《梁启超年谱长编》收有蒙古王公那彦图等人给梁启超的一通电报，中云：

---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576页。

②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八），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③ 《北京旗汉军民公启》（原件），见《大树堂来鸿集》第1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④ 《梁启超年谱长编》，589～590页。

> 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

电称："扶冲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弭〕以从。"那彦图等人并要梁启超将此意转达康有为。末署"北京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同叩"。当时，在北京的以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是一支坚决的保皇力量，他们既坚决反对共和，也反对袁世凯篡权，曾准备组织勤王军，并曾准备派人赴日本，迎接康、梁回国，共同保皇。① 显然，正是那彦图等人的电报及类似讯息点燃了康有为的热情，促使他产生联络满蒙王公、排袁保皇的幻想，并且要求梁启超立即入都实行。上引梁函云："他勿论，即孺博、佛苏、觉顿，亦恐不肯相助。佛苏忽来一电沮北行，又昨有一电，亦言切勿往。窃计此皆都中同志，颇知蒙王等及其他各团体有敦迫消息，恐吾辈贸贸然应之，故皇急相沮也。"这里所说的"蒙王"，当即指那彦图亲王；"敦迫"云云，即指要求康、梁归国。

梁启超不赞成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从上引梁函的问难可以看出：1. 他不信任铁良、良弼等"素以排汉为能事"的满族亲贵，认为不足与共事。2. 手中无兵，不能掌握倒袁的领导权，倒袁之后不会捞到多大好处，只能寄人篱下。3. 梁已经认识到，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已不可抗拒，不愿代人受矢，成为舆论反对的目标。4. 梁已经看到，清政府面临财政、军事诸多困难，未必能战。5. 梁担心首都和北方的秩序被破坏，"为莠民所乘"，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本函反映出梁启超思想的新动向，即准备承认清政府实际上被推翻的现实，也准备承认袁世凯掌握权力的现实，借以维持社会秩

---

① 《蒙古王公反对共和之坚决》，载《大公报》，1912 年 1 月 25 日；《那邸派员赴日消息》，载《大公报》，1912 年 1 月 30 日。

序，避免动乱。

袁世凯成立内阁时，即任命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这一职务除了给袁内阁装潢门面外，不会有别的作用，因此，梁启超不肯就职。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通过罗惇曧等人和袁谈判，兜售他的“虚君共和”理论，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无否决之权，无调海陆军之权”①。他向袁世凯表示，与其当官，不如让他办报，他自负地说：“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②这时候，梁启超是准备和袁世凯“推心握手”，“分劳戮力”，共图天下事的。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1903 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词教训，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归依师门。但是，在辛亥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后，梁启超就再也不肯对老师百依百顺了。本函除了对康有为的政变计划提出质疑外，还对康有为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热辣辣的批评。“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云云，都是打中了康有为的要害的。这一切显示出，他的思想已经和康有为有重大分歧。此后，师徒之间，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康有为遗物中，还保留着梁启超的另一通函件，中云：

> 昨多冒犯，平旦思之，惟有皇恐。顷得北京蒙古王公一电云（上有官电印记），谨抄呈。复之真难。如何之处，尚乞赐教，勿以

---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567 页。

② 同上书，570 页。

昨之辞直而所咎,幸甚幸甚![1]

本函所称"北京蒙古王公一电",当即上引那彦图等致梁启超电。那电发于1912年1月24日,则上引梁函当作于此后的几天之内。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同居于日本神户须磨,共同商量或函札往来都是极为方便的。"昨多冒犯"云云,可见梁对康的意见,已多所反对了。

从上引梁函可以看出,除梁外,麦梦华(孺博)、徐佛苏、汤觉顿、蓝公武(志先)等人也都不赞成康有为的计划。

1912年2月3日,张浩、梁柄光、何天柱等致函梁启超,指斥康有为的计划"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服从之理"。张等主张联袁,函称:"本初早已赞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复就绪,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2]2月5日,罗惇曧致梁启超函也说:"试思须磨所策划,均以为完满,一出发后,机局全然改变;无益费精神,亦大可不必矣。"[3]须磨,指须磨村,梁启超在日本神户的住址。须磨所计划,即指上文所述拥戴载涛为总理的政变计划。罗惇曧认为,既然那个计划已因机局变化而流产,当此时局变迁更为剧烈之际,何必白费精神呢!

分化不仅表现于康、梁之间,而且更广泛地表现于昔日的维新、保皇党人之间,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围绕着辛亥革命这一大主题重新组合,酝酿着新的角逐和斗争。

原载《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

①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863~864页,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598页。

③ 同上书,591页。